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八十年三月出版

● 第11期 ●



民國八十年一月十二日中研院近史所張玉法所長與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東亞所魏斐德所長簽署合作協定



法國社會科學學院畢仰高教授在該院與中央研究院合作項下，於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至近史所訪問研究，與近史所副所長陳三井合影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目錄

第十一期·中華民國八十年三月出版

學術會議	「胡適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李達嘉	3	
	第二屆中國政教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王綱領	9	
	「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 討論會……………林滿紅·張朋園·呂實強	11	
	「紀念中國近代史開端 150 周年」國際學術 研討會紀要……………王聿均	16	
	Conference on Oppositional Politics in Twentieth Century……………Marilyn Levine	28	
學術交流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 東亞研究所簽署合作協定……………	32	
	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歷史系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合作推動中國近世家族與政治關係之研究……………	32	
學術演講	Two Different Kinds of “Food Riots”: Kiangsu, 1910 and 1932……………Lucien Bianco	33	
	Models of Historical Change: The Chinese State and Society, 1839—1989……………Frederic Wakeman	50	
	The Evolution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njamin A. Elman	65	
	中研院近史所學術研討會一覽……………	89	
	李守孔……………林能士	90	
學人簡介	溝口雄三……………伊東貴之撰·張啟雄譯	101	
	施堅雅 (G. William Skinner) ……黎志剛·林榮佳·何永盛	115	
	In Memoriam Hellmut Wilhelm, 1905—1990……………Ursula Richter	131	
	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黃克武	140	
研究概況	《義和團研究會通訊》簡介……………陳慈玉	155	
	日本「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研討會」簡介……………久保亨	157	
	「林本源」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許雪姬	160	
	「臺灣傳統農村生產工具研究」規劃研究報告……………陳秋坤	166	
	「臺灣社會變遷之研究，1895—1990」 計劃……………陳慈玉·許雪姬	171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細菌部隊罪證陳列館簡介……………韓曉	174	
	十年來中國大陸華僑史研究的回顧與前景 (1979—1989)……………林金枝	177	
	廿年來臺灣地區出版之期刊與論文集集中有關中國 近代婦女史的研究……………游鑑明	208	
	史料介紹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及其典藏的民國史料……………呂芳上	222
		嚴復英文作品〈中國古代政治結社小史〉……………孫中興	233
國史館「財政部檔案」概述……………何思睦		23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檔案保存與整編			

	概況(八).....	莊樹華	24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收藏地圖簡介.....	謝國興	257
<b>新書評介</b>	戰爭與和平：王宏斌著《晚清貨幣比價研究》 之評介.....	林滿紅	261
	蔡德金：《汪精衛評傳》.....	王克文	268
	<i>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i> by Philip A. Kuhn.....	宋光宇	271
	<i>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i> by Emily Honig.....	李盈慧	273
	<i>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i> by Linda K. Benson.....	王大剛	279
	許著：《龍井林家的歷史》試評.....	黃富三	282
	<i>Das Chinesische Deutschlandbild Der Gegenwart</i> .....	Ursula Richter	285
<b>論文目錄</b>	國內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90—1991).....		288
<b>大事紀要</b>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九一年三月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李宇平輯	291
<b>出版消息</b>	新書出版消息.....	李宇平·洪秋芬輯	299
<b>通訊目錄</b>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一至十期總目.....		309

封面設計：黃憲鐘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玉法  
 編輯委員 張玉法 王樹槐 陳慈玉 林滿紅 張瑞德  
 陳秋坤 賴惠敏  
 執行編輯 陳慈玉  
 助理編輯 李宇平 洪秋芬 李達嘉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半年刊 第十一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  
 郵撥帳號 1034172-5  
 印刷者 永裕印刷廠  
 臺北市西昌街168號  
 中華民國八十年三月出版

定價 新臺幣 300 元 美金 11.0 元





學術會議

## 「胡適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

李 達 嘉\*

胡適於1962年2月在臺北逝世，至今已近三十年的時間。他在中國思想、學術的領域上所產生的影響，從他生前直到現在，始終持續未歇。以海峽兩岸的政治現狀作觀察，他的一些思想、言論，對中國人仍然具有相當大的價值，其影響也必然還將持續一段時間。在中國近代思想、學術史上，論影響層面的廣濶和深遠，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和胡適相比。

胡適生於1891年12月17日，他的一生正走過中國的鉅變歲月。由於他成名甚早，對時局問題又始終表現出深切的關懷，不斷提出個人的主張，因此在他生前便已成為各方注意的焦點。他在新文化運動上的表現，儘管在當時曾經引起反對派的強烈攻擊，卻終至形成歷史的主流，其成就無人可以輕易加以貶損。但是在政治主張上，他所持的漸進改革路線和自由主義思想，卻無力抵擋革命的浪潮，國共兩黨始終以言論和行動來否定他的主張。中共方面甚至在他生前便已對他進行歷史的批判，在1951年底到1956年上半年中共所發動的清算胡適思想運動中，胡適所有曾經公開發表過的文字言論，都被用作思想檢驗的材料。這次的清算運動，雖然敵火極為猛烈，所觸及的範圍又甚廣，但其政治意義卻遠大於學術意義，幾百萬言的批判文字，其實不過驗證胡適思想在現代中國一直具有不容忽視的酵素作用。到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卻又因政治發展的需要，重新肯定胡適的實事求是態度，並且鼓勵學界對胡適的資料進行蒐集、出版、研究，中國大陸對胡適的興趣，可以說是方興未艾。在國民黨方面，從早期開始，便對胡適有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助理

著愛憎交織的情結，並且始終和他維持若即若離的關係。1956年底，國民黨曾經有計劃地對胡適展開規模不算小的圍剿，視胡適思想為「毒素思想」，加以猛烈地攻擊。而在另一方面，臺灣以批評國民黨著名的作家李敖，早年即對胡適多所論述；自由派學者臺灣大學歷史系張忠棟教授，則一再為文闡揚胡適的自由民主理念。這些都說明不但胡適個人對近代中國有多方面的影響，胡適研究也和近代中國現實政治的發展有著相當微妙的關係。

1990年12月17日是胡適虛歲百歲誕辰，臺灣的一些報章雜誌以出專刊的方式來紀念他，圍繞著胡適的演講會亦舉辦多場，在臺北的歷史博物館展出了胡適的文物。在這些紀念活動中，最值得學術界注意的有兩件事，一是臺北的遠流出版社將胡適從1921年到1962年的日記，就其可以蒐集到的，以手稿本全部印行；另一則是「胡適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於12月15、16日兩天在臺北政治大學舉行。

「胡適與近代中國」研討會是國際間首次舉辦以胡適個人為中心的學術會議，由在美國紐約成立未久的胡適研究會所發起，在該會董事長美國聖約翰大學李又寧教授、副會長兼臺北分會負責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朋園教授的熱心奔走，以及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王壽南教授的穿針引線下，由政治大學出面與胡適研究會聯合主辦。任該會董事的臺灣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宏正先生則在籌募經費方面頗費心力。胡適研究會會長余英時教授因事先已有會約不克前來，仍然以書面提出「胡適在今天的中國」一篇演詞作為獻詞，由大會安排於開幕典禮中代為宣讀。余教授指出胡適對近代中國有非常廣濶的影響，一直到今天，胡適的思想還在中國大陸日漸滋長，而他晚年所強調的「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對今天的臺灣也還有嶄新的啟示。余教授的獻詞，可以說是對會議主題「胡適與近代中國」最精確的闡釋，彰顯了會議舉辦的意義。

這次會議共邀請中外學者一百餘人參加，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室主任陳漱渝先生跨海而來，並在會中提出論文一篇，是海峽兩岸分隔以來首次有大陸學者來臺與會的歷史學研討會。會中共提出論文十二篇，分七場進行，依次為：

主持人	報告人	題 目	評論人
管東貴	蔣永敬	胡適與國民黨	李國祁
	李又寧	五四前後胡適與毛澤東的關係	陳永發
Lucien Bianco	陳儀深	胡適與蔣介石	韋政通
	陳漱渝	同途殊歸兩巨人——胡適與魯迅	秦賢次
唐德剛	周質平	評胡適的提倡科學與整理國故	黃進興
	林正弘	胡適的科學主義	郭博文
Benjamin Elman	Jerome Grieder	Hu Shih and Fang Li-chih: Reflections on the Meaning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張忠棟
	呂實強	胡適對學生運動的態度	李雲漢
王曾才	沈松僑	一代宗師的塑造——胡適與民初的文化、社會	張朋園
	李達嘉	胡適在「歧路」上	呂芳上
陳治世	林載爵	胡適論自由	錢永祥
	李孝悌	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從清末的白話文談起	尉天驄
張玉法	綜合討論（引言人：Paul Ropp、唐德剛、呂士朋）		

在這十二篇論文中，雖然未能涵括與胡適相關的所有領域，卻已觸及了許多方面，包括胡適和政黨的關係，胡適和當代重要人物之間的關係，胡適

的思想、政治見解，以及胡適歷史地位和歷史角色的檢討。涉及的層面既廣，討論也極為熱烈。在這些論文中，除了新近出版的胡適日記，因受限於出版時間，無法加以運用外，舉凡海峽兩岸近年來出版有關胡適的資料，如胡適的口述自傳、日記、書信、年譜等，都得到充分的利用，並且有新的材料被發掘出來。在研究成績上，也頗有推陳出新之處。謹將各文要旨依序介紹如下。

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蔣永敬所撰述的〈胡適與國民黨〉一文，分析自一九一〇年代到六〇年代的五十年間胡適和國民黨或國民政府的關係。作者認為胡適在這段期間始終本著自由民主的信念和獨立的精神，選擇作為國民黨「諍友」的角色。在這五十年中，胡適透過五種刊物來表達意見。作者分析胡適在這些刊物上的言論，指出就其對國民黨的正面影響而言，以《每週評論》和《獨立評論》最為成功，《努力》、《新月》和《自由中國》則都曾受到國民黨方面不友善的回應，此與國民黨的處境和刊物本身言論的技巧和尺度有關。《自由中國》要由「坐而言」轉為「起而行」，尤其觸犯黨道，導致雷震案的發生。全文約二萬字。

美國聖約翰大學教授李又寧在〈五四前後胡適與毛澤東的關係〉一文中，將胡適和毛澤東的童年作比較。李教授認為兩人的童年和他們性格、氣質和思想的形成頗有關聯。五四前後，毛在思想上雖頗受胡適的影響，對胡適也有過崇拜之情，但因出身和性格傾向的不同，毛終究脫離了自由主義的道路，將自己塑造成無產階級的職業革命者。李教授在論文和口頭報告中都毫不掩飾其對胡、毛二人的好惡之情。全文約一萬五千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儀深教授的〈胡適與蔣介石〉一文，藉由胡適在面對威權政治領袖的蔣介石時所表現的言行，來討論胡適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所扮演的角色及其限制。陳文指出，從一九二〇年代到一九三〇年代，胡對蔣始終扮演「諍友」的角色。而在抗戰爆發後直到一九四〇年代，蔣多次欲延攬胡適入府，胡雖拒絕，對蔣卻有「知遇之恩」。一九五〇年代胡適在《自由中國》上的言論，與前期相比，只能算是微弱的抗議。陳教授認為，除了自由主義的本質限制外，胡對蔣的知遇之恩情懷，恐怕是影響胡適自由主義的負面因素。全文約一萬字。

來自北京的魯迅博物館研究室主任陳漱渝先生以〈同途殊歸兩巨人——胡適與魯迅〉一文，將新文化運動的兩大健將作多方面的比較。他認為胡適和魯迅同是開一代新風氣的人，各自作出了為對方無法替代的貢獻。文中以

恢宏而具氣勢的文筆，對胡適和魯迅的性格、氣質、思想、文化擇取，做了非常生動鮮明的對比，對他們之間的交往以至於疏離也有相當詳盡的論述。全文約一萬六千字。陳先生並在口頭報告中對中國大陸的胡適研究略作回顧，頗有意義。

美國普林斯敦大學教授周質平在〈評胡適的提倡科學與整理國故〉一文中指出，胡適心目中的科學是一種懷疑的態度，一種求知的精神，一個尋求真理的方法，他把這種態度和方法應用到考據和整理國故上。他也常把科學解釋為人類用來控制自然的一種力量，而且又一直在為現代的科學思想找中國的根。但胡適談了一輩子的科學，始終只談「心理建設」而不談「實業建設」，他所提倡的整理國故，對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雖然沒有發生任何積極推動的作用，但他所提倡的懷疑精神和獨立思考能力，對當今的中國人依舊是一劑及時的良藥。全文約一萬七千字。

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林正弘討論〈胡適的科學主義〉。他在論文中指出，胡適認為科學方法是人類求知識的唯一可靠方法，他心目中的科學方法，正可以用他最有名的口號「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來概括。胡適不但認為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是唯一的致知之道，同時主張科學方法的思維方式和科學精神的生活態度可以應用到為人處世、政治信仰以及人生觀等關涉到價值判斷的領域，胡適的科學觀可以說是非常徹底的科學主義。全文約一萬字。

以撰述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一書享譽學界的美國布朗大學歷史系教授賈祖麟 (Jerome B. Grieder)，則在 “Hu Shih and Fang Li-chih: Reflections on the Meaning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胡適與方勵之：對民主與自由意義的省思〉) 一文中，以胡適在「民主與獨裁」論戰中所提出的「幼稚政治」和「無為政府」兩個觀念，說明胡適對自由式民主的體認和追求。他並且指出，胡適和方勵之雖有許多的不同，但從他們的言論和作為來看，仍是一對遙相呼應的靈魂，他們為中國和人類歷史所付出的心血，以及對自由民主的執著，都值得世人敬佩和肯定。賈教授指出，胡適是對他一生具有重要影響的人，在他研究胡適的論著出版二十年之後，再度執筆撰寫有關胡適的研究，並觀察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心中有著相當複雜的情緒。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呂實強教授討論〈胡適對學生運動的態度〉。他在論文中綜合了胡適從留美時期到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期所發表有關學生運動的言論，指出胡適對學生運動的態度基本上有著深切的同情、關懷，甚

至支持，但卻主張學生應沈著、理智、冷靜，不可忘記求學的本分。他之所以一再勸導學生不可犧牲學業，一方面是基於「執事者各司其事」的考慮，另一方面則是出諸「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的理念。全文約一萬四千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沈松僑先生所撰述的〈一代宗師的塑造——胡適與民初的文化、社會〉一文，從清末民初文化發展的脈絡和社會背景，探討胡適在中國近代學術文化界能夠迅速建立霸權地位的因素。沈文認為中國傳統學術在清末民初已瀕臨全面瓦解的危機，胡適的學術工作和當時中國學術發展的內在需求正相契合。在文學革命上，胡適充滿「平民色彩」的文學觀點，徹底打破了士大夫階層和庶民大眾的固有畛域，而胡適又能運用其同鄉、同學的情誼，建立起人際網絡，並和新聞界、出版界間有密切的交往。這些因素匯集起來，使胡適能夠奠定個人令名盛望。全文約兩萬六千字。

筆者所提出的〈胡適在「歧路」上〉，主要分析胡適在五四後期創辦《努力週報》大談政治的一些因緣和轉折，並以《努力週報》上的政論為中心，闡釋胡適的政治見解和思想特質。筆者認為胡適非常執著於從根本改造的信念，這是他和當時的革命論者明顯不同的地方，也是他走漸進改革路線的重要思想基礎。文中基本上肯定胡適在改造現實政治上所做的努力，並且擺脫革命史觀的支配，將胡適的漸進改革路線放在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中重新進行審視。全文約兩萬六千字。

東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林載爵在〈胡適論自由〉一文中指出，胡適在五四時期把英國十九世紀末期的自由理論，更綜合性地介紹到中國，並將個人式自由主義和集體式自由主義的觀點引進中國，為中國近代自由思想的發展注入新成分、新精神。作者認為胡適雖接受個性價值，但在個人自由的合法領域上，卻傾向國家對某些情況必須進行干預。胡適所宣揚的自由，大抵是一種信念、一種精神、或一種啟蒙，而比較不放在社會經濟的基礎上來考慮。文中詳細分析胡適對自由的理念及其對中國近代自由思想發展的正面價值，同時也指出胡適對自由理念的發揮有其內在的限制。全文約兩萬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孝悌先生在〈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從清末的白話文談起〉一文中，肯定胡適對白話文的貢獻，但認為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應該從清末尋其端源，所以作者先對1900—1911年間所出現的白話文做了相當詳細的分析，然後再對胡適在中國近代白話文運動中的地位和意義進行估量。作者認為胡適在這個傳承裏面的意義在於他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並不像清末只把白話文當做載道、開民智的工

具，而將它重新定位為創造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全文約三萬一千字。

以上對十二篇論文所作的摘要，雖然未能盡其旨意，但從其中已可窺知各篇文章的研究旨趣。在這十二篇論文中，亦頗有可以相互呼應和互相參酌之處。大抵而言，與會學者對胡適在近代中國各方面的表現給予正面的評價，但同時也指出胡適思想不免有時代和其自身的限制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唐德剛在綜合討論時指出，會議對胡適兼具尊重與批判，是研究胡適十分正確的態度。如果更真確地說，會中對胡適思想的討論，應該是評析而非批判。與會學者能從學術的立場對胡適作較為客觀的評析，將歷史還諸歷史，並從其中尋找現代意義，而不作具有政治色彩或強烈主觀的批判，正是會議成功可貴之處。在閉幕典禮中，主辦單位邀請胡適的故舊談胡適，並由臺北哥倫比亞大學同學會和康乃爾大學同學會聯合餐宴，也加強了這項學術會議的紀念色彩。

胡適在近代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和代表的意義，在海峽兩岸一直沒有受到足够的重視和客觀平和的對待，在翻滾的革命浪潮開始平退，水中的雜質開始沈澱後，還其本來面目正是時候。胡適生前留下了大批材料，無論對研究胡適或近代中國而言，都是極珍貴的寶藏，有待人們去發掘，並運用它們創造出新的研究成果，開拓新的研究領域。「胡適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成績自然有限，但它卻以最實際的行動呼籲學界重視胡適研究，提醒人們記憶胡適的風範，這正是紀念胡適極富意義的方式。但願它真能成為胡適研究的新里程碑，真能為胡適精神的發揚帶來新的契機。

---

## 第二屆中國政教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

王 綱 領\*

### 一、前 言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曾於民國七十五年舉辦「第一屆中國近代政教關係

---

\* 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教授

」，並於七十八年舉辦「中外關係史——思想與文物交流」等國際學術研討會，成果豐碩，頗獲學術界與宗教界人士之回響與好評，故為凝聚教學研究成果、促進國際學術交流，乃於七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在淡水校本部再度召開第二屆中國政教關係會議，與會者計有中、美、日、荷四國一百七十餘位學者。

## 二、議 程

12月21日

### (一)第一場——宋晞教授主持

- 1.水野明：中國古代的政教關係（姚秀彥教授評）
- 2.張存武：十九世紀天主教在朝鮮的變適——丁夏祥上宰相書例（古偉瀛教授評）

### (二)第二場——胡春惠教授主持

- 1.乙坂智子：明代西藏政策的基本體制——對授與主要佛教團之法王號與王號之考察（光島督教授評）
- 2.古偉瀛：清末朝廷對基督教的政策（鐘鳴旦教授評）
- 3.查時傑：民國訓政時期的基督教會（呂實強教授評）

### (三)第三場——野口鐵郎教授主持

- 1.羅光：天主教的政教關係觀（趙天恩教授評）
- 2.龔鵬程：《太平經》的政治理論之評析（林安梧教授評）

12月22日

### (四)第四場——黃秀政教授主持

- 1.尹章義：臺灣佛教史之展開（一六六一——一八九五）（楊惠南教授評）
- 2.釋如悟：光復前後佛教之比較（尹章義教授評）

### (五)第五場——鄧元忠教授主持

- 1.野口鐵郎：明清時代的「正教」與「邪教」（龔鵬程教授評）
- 2.鄭志明：當代臺灣鸞書的政教立場（石萬壽教授評）
- 3.石萬壽：宋元明媽祖的封諡（鄭志明教授評）

### (六)第六場——王吉林教授主持

- 1.張明哲：基督教思想與中國民主化運動（林治平教授評）
- 2.王成勉：文社與中國民族主義（趙天恩教授評）



(七)第七場——雷家驥教授主持

- 1.莊吉發：從取締民間秘密宗教律例的修訂看清代的政教關係（吳振漢教授評）
- 2.李齊芳：鴉片戰爭後傳教士對中西學術交流的貢獻（王曾才教授評）
- 3.蔡錦堂：日本據臺時期的宗教政策（吳文星教授評）

12月23日

(八)第八場——鎌田茂雄主持

- 1.蔡輝輝：孫中山先生的宗教理念與作為（程光裕教授評）

(九)第九場——王壽南教授主持

- 1.鎌田茂雄：武周時的華嚴思想之形成——以法藏與則天武后之關係為中心（釋慧嚴法師評）
- 2.光島督：吐蕃王赤松德的宗教政策（乙坂智子教授評）

### 三、後 言

本屆會議除邀請中、日、美、荷等國專家學者參與外，特邀請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中華理教、天德教，一貫道暨民間信仰代表參加。不同教派的領袖，或高僧大德，與學者羣聚一堂，對於各種宗教的教義闡述、發展史實及其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透過客觀而理性的分析探討，可進一步得到真相，並對政治與宗教間相處之道的調整，有所助益。我們盼望淡江大學，在不久的將來，能第三度舉辦政教關係國際學術會議，俾提醒大家在工商發達的臺灣，亦能兼顧人文精神的提昇與生命意義的顯揚。最後，吾人希望，全部論文能整理成書，公諸於世。

---

## 「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

林滿紅、張朋園、呂實強\*

大會由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於 1990 年 8 月 31 日

---

\* 三人皆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至9月3日在北京龍泉飯店舉行，共有中外學者87人參加。學術會議部分共分三組討論七十二篇論文（議程詳見附錄）。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於1950年成立之初約有20人，至1960年代有150餘人，現在有200人，其中研究人員130人。1950年剛成立時，所長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范文瀾。劉大年、余繩武先後繼任。此次大會，劉、余兩氏在開幕及閉幕時都有演說，其基本精神可由余繩武所提文章的標題「殖民主義思想殘餘是中西關係史研究的障礙」看出。恪守范前所長的馬克斯歷史觀點，以反帝國主義觀點研究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歷史，也是社科院近史所的根本信條。這樣一個信條雖仍主導著這次會議，但會議的架構與文章也有很多兼容並蓄的發展。

雖然中俄關係史是社科院近史所的重點發展方向之一，但這次邀請學者當中，並無俄國及東歐學者。而英、法、加拿大學者各有一人，美國二人，日本七人，臺灣三人，顯示大陸中國近代史研究視野的推展方向。J. K. Fairbank主編的《劍橋中國史》，雖然常常成為這次會議文章批評的對象，但也顯示大陸學者對美國近代中國史研究的注意。P. A. Kuhn教授所提的論文指出：國人救亡圖存的愛國熱忱支持了清末及國共兩黨以西方民主之名遂行獨裁。雖然這篇文章在會議中受到批評，但由容許這篇文章發表，也可看出大陸學界之走向開放。

「近代中國與世界」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在追問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何以相對遲緩。二、三十年來，臺灣學界與美國學界都曾頗為留意這方面的研究。由這次會議可以看出中國大陸在講求四個現代化十六、七年之後，歷史學界正積極醞釀這方面的研究。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過去曾經遭到貶責的立憲派人物如黃遵憲、梁啟超等人以及清末的洋務運動如今都有了較為正面的評價。可能由於香港與大陸最近關係的特殊發展，香港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這個會議一個較為突顯的焦點。

出席這次會議的大陸學者，涵蓋老、中、青三代。會議主持人或是發言較多的很多是四、五十歲的年輕學者。他們對於整個會議的安排，參加評論，都很篤實認真。老、中、青三代所提出的論文，也都有踏實之作。年紀大的學者，如七十幾高齡的汪敬虞先生——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從頭到尾參加三天會議討論，也例示了大陸老一輩學者學無止境的治學風範。年輕一代學者當中，也有許多能為法國、日本、英國學者做翻譯的人才。整個會議的討論，學術氣氛濃厚，即使一般覺得較為嚴肅的經濟史論文，也都能由學理深入

討論。大陸上中國近代史研究者這種種奮勉精神，很值得臺灣的同行注意。

由於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自 1950 年成立以來首度召開的學術會議，主辦單位費盡苦心。加上 Ford Foundation 補助部分經費，整個會議，無論在精神方面或在物質方面，都使與會者感到滿意。會議的進行除了分組討論外，主辦單位並安排所有出席學者於 9 月 2 日參觀北京恭王府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社科院近史所發行的《近代史研究》雙月刊、《近代史資料》季刊，均頗具學術價值。該所所藏珍貴史料，除若干名人如林則徐、曾國藩、胡適等等之手札外，另有許多辛亥革命前後出版的報刊，也值得相關學者參考。主辦單位在這次會議中安排參觀與會議主題密切相關的機構和古蹟，也是臺灣召開近代史方面的國際會議時可以採行的構想。

### 附錄：議程

8 月 31 日上午 (10:30—12:00)

#### 第一組

余繩武：殖民主義思想殘餘是中西關係史研究的障礙  
吳乾兌：鴉片戰爭與上海英租界

#### 第二組

張振鵬：近代中國與世界  
王曉秋：近代中國人對日本的認識

#### 第三組

陳振江：通商口岸與近代文明的傳播  
龔書鐸：晚清西學約議

8 月 31 日下午 (2:00—6:00)

#### 第一組

馮天瑜：試論道咸經世派的「開眼看世界」  
王慶成：太平天國的對外關係和國際觀念  
小野和子：西歐法律思想在日本和中國的引進  
李育民：近代中國的「條約制度」論略  
呂實強：論洋務運動的本質

#### 第二組

山田辰雄：從近代史看現代日中關係  
劉天純：昭和天皇與近代中國  
尹俊春：北伐時期奉系軍閥與日本  
衛藤藩吉：日本政府對中國軍事行動的虛實

唐寶林：托洛茨基與中國第一次大革命

李玉貞：斯內夫利特（馬林）在華活動及他的悲劇

### 第三組

狹間直樹：盧梭《民約論》與中國

羅檢秋：近代墨學與西學

陳崧：30年代關於文化問題之爭

朱宗震：中國的文藝復興——國粹派的合理期望

章開沅：憤悱、講畫、變力——對外反應與中國近代化

張朋園：革命與現代化交織下的近代中國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史之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9月1日上午（8:30—12:15）

### 第一組

伊原澤周：和魂洋才與中體西用

陳 絳：在華西人與中國早期近代化（1860~1895）

夏良才：中國近代化與海關的關係

——論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

龔樟有：漢口各國租界與近代武漢初探

魏瀛濤、王笛：進入封閉的世界——西方宗教勢力在長江上游地區的拓展及其影響

### 第二組

薛銜天：試論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內容變化問題

黃紀蓮：早期中蘇國家關係概述（1917~1924）

李義彬：南京政府的聯蘇制日方針

劉存寬：雅爾塔協定與 1945 年中蘇條約

俞辛焯：孫中山的反帝鬭爭與列強的對策

——關於商團事件為中心

段云章：孫中山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 第三組

羅榮渠：中國近代化的艱難歷程

耿雲志：孫中山與梁啟超——中國現代化的選擇

李華興：梁啟超與中國近代化

丁守和：鴉片戰爭的教訓和中國現代化問題

姜義華、章清：近代中外關係與中國近代化道路的早期選擇

茅家琦：「西學東漸」與城市近代化

9月1日下午（2:00—6:00）

### 第一組

戚其章：略論甲午戰爭期間的中外關係

- 李 侃：大衝擊和大轉折：第一次中日戰爭對中國的打擊和影響  
陳 鐸：黃遵憲外交思想初探  
湯志鈞：康、梁「勤王」與日本、英國  
張海鵬：試論辛丑議和中有關國際法的幾個問題

第二組

- 白吉爾：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門戶開放與政治生活  
陳志讓：異國「異化」——兩次大戰之間英語國家中國留學生態度和行為的變遷  
陶文釗：論建國前夕中共「一邊倒」方針的歷史必然性  
章百家：影響中共對美政策演變的三個因素（1945～1946）  
丁則勤：論凍結日本資產以後的美日談判與中國

第三組

- 胡 濱：論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及其特點  
彭 明：中國人怎樣選擇了社會主義  
小野信爾：五四時期的世界主義——從王光祈的言論看  
林滿紅：明清的朝代危機與世界經濟蕭條——十九世紀的經驗  
汪敬虞：淺論近代中外經濟關係的評價問題

9月3日上午（8:30—12:15）

第一組

- 胡繩武：列強侵略與中國近代政局論綱  
孔飛力：政治參與及中國的政治體制——談西方影響問題  
林增平：清末留日中國學生反「取締規則」的鬭爭  
安藤彥太郎：日本留學時代的李大釗  
劉望齡：日本對武漢報紙的控制與利用  
俞旦初：二十世紀初年外國愛國人物在中國的介紹和影響

第二組

- 易勞逸：1946—1947年的中國民主黨派及政權的誘惑力  
張 磊：中西文化交匯的積極成果——近代廣東社會思潮述評  
吳倫霓霞：十九世紀下半葉香港出版業對中西文化接觸的貢獻  
霍啟昌：香港、香港華人與近代中國  
劉蜀永：從香港史看西方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

第三組

- 羅 瀾：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經濟（1840—1940）  
虞和平：西方影響與中國資產階級組織形態近代化  
陳錦江：環太平洋地區華人企業家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杜恂誠：中國新式銀行在對外貿易中的作用  
中村哲夫：中國銀貨經濟與世界金本位制

# 「紀念中國近代史開端1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王 聿 均\*

## (一)

「紀念中國近代史開端 15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於去（1990）年12月3日至8日在廣州市連續舉行六天。實則第一天舉行酒會和開幕典禮，第二天往東莞虎門參觀鴉片戰爭遺迹，第五天下午赴三元里，參觀「三元里人民抗英鬪爭紀念館」及林則徐與鴉片戰爭史迹展覽等。故學術報告和分組討論僅有三天半。這個會議是由廣州的中山大學、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廣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簡稱「社科聯」）、廣東省歷史學會、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各單位聯合舉辦的。而中山大學所負的實際責任尤多。大會的主任為陳錫祺先生（中山大學教授兼校務委員），第一副主任為張磊先生（廣東省社科院院長、廣東歷史學會副會長），副主任為陳勝麟（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廣東歷史學會秘書長）、楊萬秀（廣州市社科院副院長）、梁通（廣東歷史學會榮譽理事，香港南源永芳集團公司顧問）三先生，而由陳勝麟兼秘書長。二位陳先生是師生檔，也是大會的主要負責人。陳錫祺先生年近八旬，精力仍甚健旺。學識豐富，態度謙和，為羊城史學界的重鎮，著有《孫中山與辛亥革命論集》。陳勝麟先生是他的學生，除主持中山大學歷史系外，復擔任博士研究生導師，著有《林則徐與鴉片戰爭論稿》，甫由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頗獲佳評，因而聲譽鵲起。會議的大小事務，都由其實際主持。

大會的榮譽顧問姚美良先生，為香港南源永芳集團公司董事長，他贊助廣州舉行的紀念中國近代史開端 150 周年一系列的活動，並捐資在中山大學創辦「近代中國研究中心」，該中心的「永芳樓」於12月2日舉行奠基。「紀念黃遵憲當代書畫藝術國際展覽」則於三日在廣州新落成的「嘉應賓館」首展。而學術研討會亦於3日下午舉行開幕典禮。據說姚又贊助了一筆數目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可觀的款項，以供大會開支之用。

## (二)

這個國際研討會，是以 1840-1990 爲中國近代史的範圍，恰恰滿 150 周年。換句話說，也就是以一八四〇年代鴉片戰爭爲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此一戰爭係西方力量給予中國的莫大挑戰，而廣東尤首當其衝；隨之而來的各種回應和深刻反省，則逐漸促成了中國的醒覺。所以研討會討論的主要內容，就環繞在這些中心議題上。籌委會預先擬訂了會議的五個議題：一、中國近代史開端與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歷史意義；二、中國近代史開端與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三、中國近代史開端與近代中國社會思潮的變遷；四、中國近代史開端與東、西方關係的變化發展；五、中國近代史開端與林則徐等先進人物的歷史地位。在會議中所談論的問題，大致與這五個議題相吻合。

會議的宗旨，據其邀請函稱，係爲了「繁榮科學文化，促進學術交流」，出席的學者，依該會所列的名單來看，大陸學者有154人，分別來自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等四個大都市，和廣東、廣西、四川、貴州、雲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甘肅、新疆、吉林、黑龍江等十八個省，就中以北京和廣東參加的人數爲最多。依這些學者們現職的性質來區分，約有三類：一爲在各大學擔任教授、副教授者。（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北京師大、南開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大、南京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西南師大、華中師大、華南師大、暨南大學等）。二爲在研究機構擔任研究員、副研究員者。（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該院之近代史所和經濟所、各省市社科院或社科聯等）。三爲在出版社、雜誌社擔任主編、編輯、編審，在書局、報社擔任總編輯、編審、主任記者等職者。（如北京中華書局、上海人民出版社、《求是》雜誌社、上海《文匯報》等）。其中第三類的職務，嚴格說來，並非專做學術研究工作；惟據會議的接待員告訴筆者，這些總編輯、主任記者等，在大陸學術界的地位是很高的。此外，來自臺灣、港、澳者十七人，來自美國、日本、蘇聯、瑞典、波蘭、印度者十四人，三共 185 人。但有部分學者未提論文，亦有雖提論文未曾出席者，或臨時參加者，故實際人數約在一百七十五人左右。而研討會的會議程序也因此與排定的節目和時間略有變動。

### (三)

研討會的主要內容為學術報告和宣讀論文。學術報告是採取演講式的，僅舉行了兩次，第一次為六人，第二次為七人，每人報告均為二十分鐘。係在市內東方賓館的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所有與會者全體參加。因為時間緊湊，未經討論。另外在舉行開幕式時，亦有三位學者作學術專題報告。論文宣讀則由於人數多，採分組會議的方式，共舉行了四次分組會議，每次又分四組進行，共計十六組。每次會議為三小時。每組設主席二人，宣讀論文以五篇為準，亦有六篇或四篇者。每篇論文報告的時間為十五分鐘。未設評論員，論文宣讀完畢後，參加人員自由發言。因臺灣、港澳、及美、日、蘇聯諸國參加的學者人數甚少，故大陸的學者發言的較多，互相辯論與批評，也相當的認真和熱烈。包括上述的學術專題報告和分組討論的論文，一共應有論文一〇七篇，實際提出者有九十五篇左右。以鴉片戰爭及其有關問題為題者，計有三十二篇，以林則徐及其相關人物為題者，計有十七篇，以中國近代化問題為題者計有十四篇，三共六十三篇，幾佔全部論文的三分之二。由這個小的統計，可以看出此次會議討論的問題中心所在。

根據「會議程序」的規定，12月2日為報到註冊之期，與會學者皆往東方賓館註冊。翌日，正式會議開始，上午九時二十分，全體人員乘車過珠江大橋，到河南嘉應賓館，參加姚美良舉行之招待酒會。下午二時至五時，在中山大學「懷士堂」舉行開幕典禮，由大會第一副主任、廣東社會科學院院長張磊任主席，陳錫祺先生致開幕詞。另有黃浩、凌青（原名林墨卿，林則徐五代孫）、姚美良、胡守為（中山大學副校長）等四位先生分別致詞。並由陳勝麟、戴逸、中村哲夫三教授作學術報告，陳的講題為〈鴉片戰爭前後中國人面對西方雙重挑戰的回應〉，中村的講題為〈T型模式與中國近代化道路的形成和經濟中心地的階層〉。陳認為鴉片戰爭前後中國人面對了兼具侵略性和先進性的西方之雙重挑戰，而有三種不同的回應，一為閉關主義，二為甘作附庸，三為愛國主義的雙重回應，即一方面抵抗侵略，申民族大義；一方面開眼看世界，去了解並學習西方。這一派開明進步的愛國者，以林則徐、魏源、姚瑩等為代表。中村則認為鴉片戰爭後，歐洲對華的經濟侵略亦已開始，歐洲的企業和商人活動是侵略性的，但也開發了中國國民經濟，有其進步意義。繼而分析鴉片戰爭前後的變化，會發現中國經濟的「近



代化」條理。從而比較歐洲資本主義經濟與清代舊式經濟發展模式的優劣，雖有其主觀，亦言之成理。

4日上午，6日上、下午，8日上午，分別舉行分組會議，宣讀論文，並進行討論。4日下午，7日上午，則舉行學術專題報告。提出的論文，大陸學者佔五分之四強，其他各地學者則僅佔五分之一弱，計十五篇。來自臺灣的學者提出五篇，為孫常煒先生（國史館）之〈蔡元培先生與中國女子教育〉（未經宣讀，作者亦未出席），呂士朋教授（東海大學文學院長）之〈天朝世界觀在鴉片戰爭前後所受的挑戰〉，陳存恭教授（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之〈徐繼畲與瀛環志略〉，葉振輝副教授（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歷史系）之〈鴉片戰爭與臺灣〉，和筆者之〈道光年間知識份子認識的西方世界——以梁廷枏為例〉。香港學者亦提出五篇，為中文大學歷史系主任倫寬霞女士之〈從世界史的角度看鴉片戰爭發生的原因〉，香港大學趙令揚教授之〈何啟對張之洞勸學篇的批判〉，中文大學陳善偉講師之〈唐才常年譜長編編後感〉，信義宗神學院李志剛講師之〈美國第一位來華教士裨治文牧師與中美早期之關係〉，冠華貿易公司董事長陳冠華先生之〈鴉片戰爭與香港〉。日本學者提出兩篇，除神戶學院教授中村哲夫外，尚有東京大學濱下武志教授之〈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美國學者一篇，為密西根大學張春樹教授之〈中國近代化之先聲及其意義〉。蘇聯學者一篇，為海參崴遠東國立大學東方系副主任傅樂吉（Sergey U. Vradiy）副博士之〈論林則徐的《俄羅斯國紀要》〉。波蘭學者一篇，為波蘭科學院教授施樂文之〈畢蘇斯基與孫中山〉。這次會議，有三位林文忠的後裔參加，頗引起與會者的注意。除了則徐五代孫凌青（林墨卿）外，尚有另一位玄孫林永侯先生，已屆77歲高齡，現任上海文史研究館館長兼復旦大學客座教授。另一位在北京中國戲曲學院任副教授的林岷女士，則為則徐的第六代孫女。

12月8日下午，舉行閉幕典禮，由陳勝麟先生擔任主席，由李文海、魏宏運、繆全吉（臺灣大學教授）、余繩武、林子東五位先生分別發言，並由張磊先生致閉幕詞，至是此次研討會正式結束。茲將「會議程序」表按實際進行節目加以修正後，附錄於下。

#### 會議程序

時間：1990年12月3日——1990年12月8日

地點：廣州流花路東方賓館

12月2日（星期日）報到註冊

## 12月3日(星期一)

9:20 a.m. 從東方賓館乘車往嘉應賓館

10:00—11:30 a.m. 「紀念黃遵憲先生當代書畫藝術國際展覽」首展開幕(在嘉應賓館)。

11:30—12:30 a.m. 本次國際學術研討會贊助人姚美良在嘉應賓館舉行招待酒會。

13:00—13:30 p.m. 往中山大學,與會人員在「懷士堂」前合影。

14:00—17:00 p.m. 在中山大學懷士堂舉行開幕典禮

主 席:張 磊

開 幕 詞:陳錫祺

講 話:黃浩、凌青、姚美良、胡守爲

學術報告

陳勝麟:鴉片戰爭前後中國人面對西方雙重挑戰的回應

戴 逸:紀念鴉片戰爭弘揚愛國精神

中村哲夫:T型模式與中國近代化道路的形成和經濟中心地的階層

17:15 p.m. 從中山大學返東方賓館

## 12月4日(星期二)

8:30—11:30 a.m. 第一次分組會議

第一會場(東方賓館渤海廳)

主 席:袁偉時、來新夏

學術報告

謝本書:中國近代史開端爲愛國主義注入了新內容

徐光仁:中國近代史開端與林則徐等先進人物的歷史地位

喬志強:中國近代史開端與中國社會變遷

章鳴九: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的變遷

趙立人: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幾個問題

第二會場(黃海廳)

主席:段雲章、吳雁南

學術報告

姜義華:鴉片戰爭與中國人的世界意識

吳倫霓霞:從世界史的角度看鴉片戰爭發生的原因

王承仁:試論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衰落

邱遠猷：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與中國發展道路

羅福惠：近代化研究與中國近代史研究探論

第三會場（東海廳）

主 席：陳 華、王汝豐

學術報告

何若鈞：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化論略

陳絳：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與近代化的起步

金培喆：同治年間洋務事業的興起和「湘軍體制」

方志欽：尊嚴與屈辱——兩種中國近代化的始軌

路文彩：中國近代史開端與中國近代化進程

第四會場（南海廳）

主 席：黃 彥、黃 錚

學術報告

蕭致治：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化

饒任坤：太平天國與中國近代化

林 岷：林則徐與近代化

樂 正：開埠通商與近代中國的城市化問題

虞和平：鴉片戰爭後通商口岸城市經濟和行會組織的近代化

14:30—17:30 p.m. 在東方賓館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第一次學術專題報告大會

主 席：楊萬秀、王慶成

學術報告

張 磊：關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幾個問題

李 侃：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近代中國三個劃時代人物及其救國方案的比較

王聿均：道光年間知識份子認識的西方世界——以梁廷枏為例

龔書鐸：鴉片戰爭與近代中國

茅家琦：中國近代史開端以後的文化現象問題

濱下武志：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

12月5日（星期三）

7:20 a.m. 從東方賓館往東莞虎門

10:30—12:30 a.m. 參觀虎門鴉片戰爭博物館

12:30 a.m.—13:30 p.m. 由鴉片戰爭博物館在東莞招待午餐

14:00—16:30 p.m. 參觀虎門鴉片戰爭遺迹，登沙角砲臺，遠眺大角砲臺。

16:30—19:30 p.m. 啟程返廣州東方賓館

12月6日（星期四）

8:30—11:30 a.m. 第二次分組會議

第一會場（渤海廳）

主 席：李錦全、姜義華

學術報告

伊雅達：鴉片戰爭的若干問題

杜文鋒：鴉片戰後的鴉片侵略

劉鑒唐：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歷史溯源——二百年間中英矛盾的發展與變化

鄧衛中：試論「南京條約」

皮明床：論林則徐的湖廣禁煙

夏 笠：關於鴉片貿易合法化的幾個問題

第二會場（黃海廳）

主 席：廖偉章、劉天純

學術報告

陳寧生：香港與英商怡和洋行

陳樹榮：澳門·林則徐、鴉片戰爭

葉振輝：鴉片戰爭與臺灣

陳冠華：鴉片戰爭與香港

第三會場（東海廳）

主 席：陳華新、郭漢民

學術報告

駱寶善：鴉片戰爭前后的廣州地區

楊萬秀：中國近代史開端與華僑

沈茂駿：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開端和傳統農民戰爭的結束

周新國：會黨運動與中國近代史開端——兼論鴉片戰爭時期會黨運動的特徵、作用及原因。

曹念明：中國近代社會科學史的開端

#### 第四會場（南海廳）

主 席：陳周棠、陳振江

##### 學術報告

王汝豐：中華先行者的探索

陳匡時：鴉片戰爭與近代民族覺醒

林家宥：試論鴉片戰爭對中華民族自覺意識產生和發展的影響

邢鳳麟：中國近代史開端與中國人民新覺醒

郭雙林：鴉片戰爭與近代中華民族覺醒

14:30—17:30 p.m. 第三次分組會議

#### 第一會場（渤海廳）

主 席：方志欽、蕭致治

##### 學術報告

張振鷗：中國近代史開端與中美關係

羅耀九：鴉片戰爭前後中西法制觀念的衝突

李志剛：美國第一位來華教士裨治文牧師與中美早期之關係

周溯源：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與中國對外關係的變化發展

李少軍：鴉片戰爭與清朝對外政策的轉變

#### 第二會場（黃海廳）

主 席：沈茂駿、喬志強

##### 學術報告

徐 如：論近代中國的愛國主義和中國的必由之路

黎仁凱：鴉片戰爭時期的社會思潮及其特色

陳華新：繼承和弘揚鴉片戰爭的愛國主義精神

胡偉希：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

吳金鐘：論鴉片戰爭時期的愛國主義及其歷史特點

#### 第三會場（東海廳）

主 席：鍾卓安、鍾文典

##### 學術報告

孫常煒：蔡元培先生與中國女子教育（作者未出席）

馮祖貽：近代歷史轉變時期和知識分子

李吉奎：容閔與中國近代化

陳劍安：論晚清江西學界的近代化

桑 兵：文化分層與西學東漸的開端過程——以新式教育為中心

何一民：鴉片戰爭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覺醒

第四會場（南海廳）

主 席：杜經國、胡繩武

學術報告

吳雁南：鴉片戰爭與中國傳統學術思想

陳振江：經世思潮向西學思潮的演變

朱新鏞：鴉片戰爭前後的廣東經世致用學派

吳義雄：鴉片戰爭前後的今文經學與中國近代思想

12月7日（星期五）

8:30—11:30 a.m. 在東方賓館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第二次學術專題報告大會

主 席：張難生、林家有

學術報告

李時岳：鴉片戰爭和中國近代社會的畸型發展

金沖及：（未列出題目）

趙令揚：何啟對張之洞《勸學篇》的批判

張春樹：中國近代化之先聲及其意義

呂士朋：天朝世界觀在鴉片戰爭前後所受的挑戰

胡思庸：關於近代文化心理變遷問題

陳存恭：徐繼畲與《瀛環志略》

14:30—17:30 p.m. 參觀三元里人民抗英鬪爭紀念館、林則徐與鴉片戰爭史迹展覽等。

12月8日（星期六）

8:30—11:30 a.m. 第四次分組會議

第一會場（渤海廳）

主 席：陳匡時、劉志霄

學術報告

林永侯：論林則徐在上海前沿陣地的設防抗英

來新夏：林則徐的歷史價值

牟安世：中國近代史開端與林則徐——一位偉大的愛國者

黃保萬：論林則徐的愛國主義

傅樂吉：論林則徐的《俄羅斯國紀要》

第二會場（黃海廳）

主 席：方式光、盛永華

學術報告

施樂文：畢蘇斯基與孫中山

袁偉時：「與國家蹇運相表裏」——從林則徐到郭嵩燾

段雲章：從林則徐到左宗棠

陳錚：從林則徐到孫中山——尋求近代中國出路的先行者

鍾卓安：了解世界的起步和走向世界的嘗試

第三會場（東海廳）

主 席：趙春晨、張海鵬

學術報告

楊慎之：中國近代史開端時期思想界慧星——魏源

李錦全：從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進程看龔魏林的歷史地位

陳 華：關於《四洲志》的若干問題

許增紘：傳統道德與近代愛國主義——論姚瑩與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焦靜宜：林則徐與中外文化

第四會場（南海廳）

主 席：駱寶善、皮明庠

學術報告

湯志鈞：戊戌時期的澳門《知新報》

梁 通：從魏源到黃遵憲

吳廷楨：中國近代學習西方的歷史考察

陳善偉：《唐才常年譜長編》編後感

黃 錚：中國近代外交史上的黃遵憲

熊源滂：黃遵憲與維新政治

14:30—17:30 p.m. 舉行閉幕大會

主 席：陳勝麟

大會發言：李文海、魏宏運、繆全吉、余繩武、林子東等五人

閉 幕 詞：張磊（分析會議論文重要內容，作一綜合結論）

18:30—20:00 p.m. 在東方賓館友誼廳舉行宴會

## (四)

西力衝擊揭開中國近代史的序幕，鴉片戰爭的發生，乃是自然的結果。而廣州和其附近地區又首當其衝，所以留下不少戰爭的遺蹟，值得前往參觀。大會準備了四輛大巴士，載與會學者和工作人員一百五十餘人，於12月5日七時許，從廣州往虎門，經三小時的車程，於十時半到達，沿途阡陌縱橫，荔枝園接連不斷，風景絕佳。「虎門鴉片戰爭博物館」，座落於當時虎門砲臺舊址，已闢為觀光遊覽地區。1839年3月10日欽差大臣林則徐，下令英商繳煙，27日義律（Charles Elliot）屈服，願將英人經手鴉片悉數繳清，總計共有鴉片二萬零二百八十餘箱。6月3日，則徐在虎門鎮口海灘高處挑挖兩池。其池平舖石底，縱橫十五丈，四旁欄樁釘板，不令少有滲漏，前面設一涵洞，後通水溝，池岸周圍廣樹柵欄，中設棚廠數座，為文武員弁查視之所。用鹽滷水加石灰的浸化之法，歷時二十二日，銷化了英商鴉片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餘斤，每夕啟開涵洞，令之隨潮入海。此舉表示中國官員銷煙的決心，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一頁。經過了一個多世紀後，中共政府在當年林則徐銷煙處不遠的地方，重修了一座銷煙池，其尺寸大小與原池相同，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另外樹立了一座「鴉片戰爭虎門人民抗英紀念碑」，和一座雕像，上塑官兵四人（內持戟者一人），銅砲一門。又建立了碑亭和碑廊，黃瓦紫柱，相映成趣。所留下引人注目的舊物，一為當時水師提督衙門石獅，一為大門內陳列的三門大砲，兩門係嘉慶年間鑄成，一門係道光初年鑄成。遙想當年清廷水師即用此砲保衛粵省海疆。博物館內的收藏，有畫家所繪的鴉片戰爭圖片多幅，有藝術家刻意製成的有關戰爭的模型多種。如水師提督關天培為防止英艦闖入內河，特以木排鐵索沉江，加以封鎖的模型，十分逼真。這個模型很大，幾乎佔了大半間房子；江的兩岸山脈走勢，與其陡峻險要之處，也都靈活的表現出來，頗為傳神。館中也藏有少量的林文忠公手迹和奏摺等，另外有其對聯一付：「人自得之，湖山千里而外；書可讀乎，唐虞三代之前」。聯語頗發人深省。在此徘徊觀賞，歷時甚久，昔日的虎門要塞，今乃成為觀光之地，頗發思古之情；諦視江面，仍是水深浪濶，形勢雄偉，不愧為昔日南疆之門戶。

在東莞午餐後，繼續參觀虎門附近鴉片戰爭遺迹，登沙角砲臺，砲臺築於小山上，鑿通山腹，有地道數條，縱橫交織，在不同的位置都設有砲位，



鑿有砲眼，可以想像到當時若有英艦闖入，即可眾砲齊發，互相支援。對岸則有大角砲臺，作為犄角，兩砲臺居高臨下，扼險而守，足可封鎖江面。惟在鴉片戰爭時，砲已陳舊，弗能及遠，故英艦得以突破防線，暢行無阻。時至今日，這幾座廢棄的砲臺，已成純粹觀光之地了。沙角砲臺之下，有很寬廣的庭院，中有一棵大榕樹，枝葉茂密，蔽翳天日，據稱此樹已有數百年的歷史，當義律被迫繳煙時，從伶仃洋英商繳來之煙土，最初即堆積於大榕樹下，再陸續送往虎門銷燬。在山坡上，有數年前新建的「義塚」，埋葬了當年沙角失守時殉難兵丁近百人的骨骸。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主任鍾卓安先生對筆者講到這座「義塚」建立的經過，及如何挖掘出這一堆為國捐軀者的白骨。並陪同到塚上參觀。

大角沙角的江面，愈來愈寬，已近珠江入海口，再過去即為「穿鼻海」，肉眼可以清楚的看到，依然海濤洶湧，形勢極為壯觀。更遠處就是伶仃洋，可惜肉眼已無法看見了。從前讀史讀到「穿鼻海戰」、「穿鼻草約」，每憤於清廷軍事與外交之不競，今則身臨其地，登砲臺，弔義塚，不禁神往久之。至是歷史乃有了真實感，有了精神和生命。自東莞回到廣州，已是暮色蒼茫時分，深覺不虛此行。

### (五)

此次研討會，依據與會學者所提之論文，分析其主要內容，可分以下數方面：一為鴉片戰爭史的研究，包括鴉片戰爭的歷史溯源，戰爭期間的廣州地區，戰後的開埠通商和口岸城市經濟的變化，鴉片戰爭與臺灣、香港、澳門的關係，戰爭與近代民族之覺醒等問題。二為近代關鍵人物之研究，包括林則徐、魏源、龔自珍、姚瑩、梁廷枏、徐繼畲、洪秀全、左宗棠、郭嵩燾、容闈、何啟、康有為、孫中山、黃遵憲、裨治文、畢蘇斯基、張謇、蔡元培等二十餘人。三為近代化問題的討論，包括近代化與近代史是否同步發生，近代化與資本主義化，近代化與西洋化的關係等課題。四為愛國主義與思想覺醒問題之討論，包括愛國主義的社會性、時代性與階級性。五為近代中國的社會和文化思潮之變遷，包括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社會思潮、城市行會組織、文化現象、中西法制觀念的衝突，文化分層與西學東漸，今文經學與近代思想等問題。六為近代中外關係的分析，包括中外關係的變化發展，戰後清廷對外政策的轉變，中美外交關係等問題。七為中國近代史開端

及分期問題。八爲專著之研究，包括《勸學篇》、《瀛環志略》、《俄羅斯國紀要》、《四洲志》、《唐才常年譜長編》等。從以上八類來看，此次研討會討論的問題甚爲廣泛，對過去未曾涉及的範圍或研究不足的部分，都作了全面的探討。像區域史和經濟史方面，亦有學者作初步的嘗試。陳寧生女士的〈香港與英商怡和洋行〉和駱寶善先生的〈珠江三角洲與近代中國〉兩文，就是很好的例子。但也有些論文，過於籠統空泛，題目太大，涵蓋的範圍太廣，與時論或政論的性質相近，並不完全符合學術論文的標準。在觀點方面，有時亦難免流於武斷，因囿於先入爲主的思想窠臼，所獲致的結論，就不容易客觀了。史學研究的精神在求真，須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問題，不同的觀點來談問題，不同的資料來研究問題，然後庶可窺見歷史的眞面貌。欲達此種境界，胥賴兩岸學者的相互溝通和共同努力。

八十、三、二十七

---

## Conference on Oppositional Politic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Marilyn Levine\*

A Conference on "Oppositional Politic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was held at the campus of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between 20-22 September, 1990. Conceived and organized by Professor Roger Jeans, the conference was a great success in highlighting the need for broader based perspective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Republican era. The major addresses and six panel areas clearly showed that there is a much richer content for scholars to pursue. The focus of the six panels ranged from intellectuals, minority parties, rural reconstruction, to third party movements, anarchism, and anti-Communism.

---

\* Assistant Professor of Lewis Clark State College, U. S. A.

The Conference was stimulating as genuine dialogue was allowed among the panel participants, discussants, and audience. There we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of the conference as an intellectually stimulating experience. First, Professor Jeans organized the conference panel timing to allow breaks, so that when dialogues started, they had some chance to be extended, rather than bowing to the usual, temporal necessity of quick panel changes. This way, everyone, including the audience, had a chance to better explore the issues which were raised.

Secondly, Professor Jeans went through great effort to have the papers submitted and distributed to all conference participants before the conference was held. This had several advantages, such as a better chance to focus and summarize key issues by many of the panel presenters and an educated audience who had thoughtful questions prepared ahead of time. 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the pre-submission of papers led to extraordinarily articulate critiques by the discussants, whose thoughtful contributions equaled those of the presenters.

Lastly, the selection of Professors Thomas Metzger and Andrew Nathan to deliver major addresses, and John Israel and Frederic Wakeman to give final commentaries gave the conference a firm foundation, wide depth and scope of thought, and meaningful intellectual synthesis.

The work of this well-planned conference will be of value not only for its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s, but as a milestone in scholarly dialogue and cohesion in the field of Republican studies.

### **CONFERENCE PANELS & SPEAKERS**

The participants and paper titles were as follows:

#### **Major Addresses:**

1. Thomas A. Metzger, Hoover Institution, "Oppositional Politics and the Problem of Secularization in Modern China."
2. Andrew J. Nathan,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Perspectives on Chi-

nese Democracy.”

**Panel I: “Third Force”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1920s through the 1940s**

1. Roger B. Jeans,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Trials of a Third-Force Intellectual: Zhang Junmai (Carsun Chang) during the Early Nanking Decade, 1927-1931.”
2. Frederic J. Spar, Princeton, N.J., “Human Rights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Lo Longji in the 1930s.”
3. Young-tsu Wong, (汪榮祖)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The Last Stand of Liberalism: Chu Anping and His Liberal Forum, 1946-1950.”

Discussant: Don C. Pri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Panel II: The National Salvation Association, the Third Party, and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Group**

1. Parks M. Cobl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The National Salvation as a Political Party.”
2. J. Kenneth Olenik, Montclair State College, “Deng Yanda and the Third Party.”
3. Thomas D. Curran, Sacred Heart University, “Educator to Politician: Huang Yanpei and the Third Force.”

Discussant: Stephen R. MacKinno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anel III: The Minor Parties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

1. Yung-chen Chiang (江勇振), DePauw University, “Rural Reconstruction as a Re-Imported Concept: The Case of the Yenching Sociology Department.”
2. Charles W. Hayford,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Money and the Politics of Professional Independence: James Yen and the Mass Education Movement.”
3. R. Keith Schoppa, Valparaiso University, “Rent Resistance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 Shen Dingyi in Political Opposition, 1921 and 1928.”

Discussant: Bradley K. Geisert, Randolph-Macon Women’s College

**Panel IV: The Minor Parties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Civil War**

1. Mary Pangle Mazur, University of Chicago, “Wu Han and the Democratic League, 1943-1949: Prelude to a Political Academic’s

coope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2. Lloyd E. Eastma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ina's Democratic Parties and the Temptations of Political Power, 1946-1947" (*in absentia*; paper presented by John Israel)
3. Lawrence N.L. Shyu (徐乃力),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China's Minority Parties in the People's Political Council, 1937-1945."
4. Peter Ivanov,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Miscellany of China's Political Spectrum in 1945-1950."

Discussant: William C. Kirby, Washington University

**Panel V: Movements and Themes: Anarchism and Anti-Communism**

1. Edward S. Krebs,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The Anarchist Critique of Bolshevism"
2. Marilyn A. Levine, Lewis Clark State College, "Zeng Qi and the Frozen Revolution."
3. Edmund S.K. Fung, Griffith University (Australia), "The Alternative of Loyal Opposition: The Young China Party and Chinese Democracy, 1928-1949"

Discussant: Herman Mast III,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Panel VI: Minority Part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1. Yang Tiansh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Third Force in North America and Hong Kong during the 1950's." (translated by Wong Young-tsu)
2. John F. Copper, Rhodes College, "Minor Parties in Taiwan."
3. James D. Seymour, Columbia University, "Blue Princes: The Satellization of China's Minor Parties and Their Behavior during the Crisis of 1989."

Discussants: James P. Harrison, Hunter College, and Leng Shaoch'ua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Summaries of the Conference Papers and Discussions:** John W. Israel, University of Virginia, and Frederic Wakeman, J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Final Comments by Participants**

## 學術交流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加州大學 柏克萊校區東亞研究所簽署合作協定

1991年1月12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張玉法與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東亞研究所所長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代表雙方機構於臺北市國賓飯店簽署合作協定，在場觀禮者有東亞研究所副所長葉文心，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陳三井、研究員林滿紅。此係近代史研究所繼與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華盛頓大學國際研究所、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及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哲學科之後，正式建立的第五所合作及交流機構。合作交流項目包括資料交換、人員互訪、以及共同推動研究計畫等。近代史研究所近年曾先後派遣十餘位研究人員，前往哈佛大學、華盛頓大學及史丹佛大學進修博士學位或作短期研究。另外，該所在中央研究院與法國社會科學學院合作項下，亦曾派遣數位研究人員前往作短期研究。

### 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歷史系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合作推動中國近世家族與政治關係之研究

美國加州大學 Davis 校區歷史系，1990年獲蔣經國基金會之資助，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進行中國近世家族與政治關係之研究。參加研究的成員，加州大學方面有劉廣京、Don Price、Susan Mann、G. William Skinner、Jack Goldstone 等，近代史研究所方面有張玉法、許雪姬、熊秉真、陳秋坤、賴惠敏等，另中研院經濟研究所劉翠溶亦參加。初步研究成果，已於1991年4月4日至7日在 Davis 開會四天，加以討論，討論時另有學者提論文九篇。預計於1992年1月初，將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式約集世界各地學者四十餘人撰寫論文，對此論題作更深入的探討。此項開會經費，頃已獲蔣經國基金會同意資助。



## TWO DIFFERENT KINDS OF “FOOD RIOTS”: KIANGSU, 1910 AND 1932

Lucien Bianco\*

Food riots may be considered either as the most common or as a rather uncommon category among the rural disturbances<sup>①</sup> that occurred in Chin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most common category if one includes every single incident of looting by hungry people in time of food shortage or famine. A rare one if a narrower definition is preferred, limiting the use of the term to relatively important affairs. To be sure, almost every spontaneous rural disturbance was a minor affair, that exceptionally lasted as long as a week. Most disturbances were confined to a single locality and easily repressed. But at least they deserve to be classed as true riots, as they rarely came to an end without the firing of some office or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followed by a clash with the forces of order and loss of life.

Likewise and using the same kind of criteria, one could consider that while not important in themselves and not seriously threatening the central, provincial or even *hsien*-government, some food riots were more important than most other hunger-provoked incidents. They could, for instance, involve as many as thousands or tens of thousands of rioters, who would set fire to or destroy buildings, clash with the

---

\* Lucien Bianco is Director of studies at the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in Paris. He presented a preliminary version of this paper in December 1990 to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while he was a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Library.

① I refer to so-called “spontaneous” (*tzu-fa-hsing*) rural disturbances, as opposed to communist agitation and the like.

police and eventually be bloodily repressed. or they could gather several hundred or up to a thousand men, each equipped with a sack, who would go from village to village, seizing provisions. By definition not ephemeral, that type of itinerant looting could for a while escape repression. We thus hear of plundering troops, who called themselves "company of the starving people" (*chi-min-t'uan*) "company of those who eat together" (*kung-ch'ih-t'uan*) and the like.

By contrast, most looting incidents were far more modest affairs. As a rule, they lasted no more than a few hours and involved at most a few hundred, more often just a few dozen men (or women, and even children) who would sally forth to make sure of a few days' provisions by robbing a landowner, a shop, a depot or a junk. Sometimes they just wanted once to quell their pangs of hunger, as is suggested by such well-known expressions as "*ch'ih ta-hu, hsiang fu-min tso-ch'ih', tso-ch'ih ta-hu*" (to eat in the houses of the rich, etc). To be sure, eating often was followed by robbing, but these incidents rarely became really violent, and the police was not keen to repress them. When it did intervene, it was sometimes to distribute provisions to the looters, to get them disperse more quickly.

By examining in more detail two extreme cases (the widespread 1910 Su-peï disturbances, and then tiny incidents in Wu-hsi *hsien* in 1932), we will recognize that more than scope is involved in differentiating both kinds of "food riots" from one another.

### 1. ATTACKS ON SU-PEI MILLS, SPRING 1910.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april and the first week of may 1910, a wave of plundering and destructions spread from town to town in northern Kiangsu. ②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will be restricted to those

② The following account of the 1910 attacks on northern Kiangsu modern mills is based on: David Messant, "Les mouvements populaires avant la revolution chinoise (1906-1911)" (master thesis, Paris,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80), pp. 44-53; Chung-kuo ti-erh li-shih tang-an kuan (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Chung-hua min-kuo-shih tang-an tzu-liao hui-pian* (Collection of archival 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history of Republican Chi-



attacks targeting several important modern enterprises<sup>③</sup>: from April 17 to 19 on Ta-feng mill factory in Ch'ing-chiang, on April 22-23 on Hai-feng mill in Haichou and finally from April 27 to early May on Yung-feng mill in Su-ch'ien. Those were large-scale riots, no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quasi-simultaneous Ch'ang-sha rice riots. About ten thousand people took part into the looting in Su-ch'ien, more than twenty thousand in Hsin-p'u *chen*, Hai-chou *hsien*. In Hai-chou *hsien* city, a soup kitchen organized by the local elite is said to have attracted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 peasants from Hai-chou *hsien* and from neighbouring *hsien* as well. To be sure, a gathering does not amount to a riot, but when prefectural authorities overtaken by the crowd decided on April 22 to distribute millet only to holders of coupons that had been handled over to locals three days earlier, tens of thousands of hungry people excluded from the distribution went at once looting the Hai-feng Company. Not content to loot, they set buildings on fire. A second characteristic of these disturbances, besides the sheer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s indeed their violence and the large-scale arson and destructions they gave rise to. In Su-ch'ien plunderers pulled down the outer wall of Yung-feng mill and poured gas into the machine workshop prior to setting it on fire. A third characteristic is the bloody repression these violent acts brought about. In Hai-chou, a foreign engineer, Hai-feng Company's private guards and two battalions of soldiers fired at the

---

na), volume 1 : *Hsin-hai ke-ming* (1911 Revolution), Nanking 1979, first part: ke-ti jen-min fan-k' ang tou-cheng he wu-chuang ch'i-i" (Resistance struggles and armed revolts of the people in various regions), pp. 38-46; Li Wen-chih *et alii*, *Chung-kuo-chin-tai nung-yeh-shih tzu-liao* (Materials on the Modern Chinese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1. 1840~1911, Peking, 1958, pp. 975-977; Chiang Chih-liang, "Hsin-hai ke-ming ch'ien-hou Chiang-su nung-min yun-tung" (Kiangsu peasant movem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manuscript, 15 pages, a lecture given at the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april 1988)

③ Besides these large-scale attacks, many more food riots occurred in both northern and southern Kiangsu in 1910. See a list of more than thirty incidents in Wang Shu-huai, "Ching-mo min-chu Chiang-su sheng ti tsai-hai" (Disasters in Kiangsu province, 1860-1916) (hereafter: "Chiang-su tsai-hai..."), *Chin-tai yen-chiu chi-k'an*, Taipei, vol. X (july 1981), pp. 151-152.

rioters. As a result, nine people were killed, twenty-two more wounded, and seven runaway participants were drowned.

Besides their scope, the considerable damages and severe clashes they gave rise to, these disturbances were further characterized by the fact that their privileged targets were something of a novelty in northern Kiangsu. Every attacked mill ④ benefitted from a modern equipment enabling it to implement processes of flour milling imported from abroad. Thanks to their ability to produce in larger quantities, modern mills made extensive purchases of wheat which may have brought about rising prices, further escalated by floods that damaged the fall 1909 harvest.⑤ In Su-ch'ien in April 1910 the cost of wheat was four times as high as it used to be during the last yea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ereas rising prices benefitted prosperous farmers, many landpoor peasant households who had exhausted their stock experienced difficulties in acquiring seeds and foodstuff. In that respect the destruction of modern equipment can be compared to luddism.

It is furthermore possible that some regional officials deemed modern mills exporting local flour responsible for a grain shortage whose repercussions on public order they themselves would have to manage. My documentation does not enable me to assert whether successive attacks on mills distant from one another resulted from the usual contagious effect or from a deliberate coordination in which officials took part. In and outside Ch'ing-chiang anonymous⑥ placards displayed

④ To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let us add the Yu-heng company in Yang-chou and T'ai-lei company in T'ai-chou.

⑤ Concerning floods, see also Wang Shu-huai, "Chiang-su tsai-hai...", p. 147. Rising prices of rice may have been even more decisively brought about by the the rising price of silver, which following a long-term downward trend rose rapidly in Kiangsu province between 1905 and 1909 (see Wang Hung-pin, *Wan-ch'ing huo-pi pi-chia yen-chiu* (Research on late Ch'ing monetary fluctuations), Ho-nan ta-hsüeh ch'u-pan-she, 1990, pp. 130-132 and 134. I am indebted to Lin Man-hung for letting me know Wang's work. Whatever the main cause of rising grain prices, it is likely that local consumers and officials were more aware (and resentful) of large-scale purchases and exports to oterh provinces than of silver appreciation.

around mid-April invited poor people to a free flour distribution by the Ta-feng factory; some unidentified individuals distributed in various villages free meal coupons bearing the name of Ta-feng company. The free distribution was supposed to take place on April 17, and when on the morning of that day 400 peasants who had gathered in front of the mill discovered that they had been deceived, they turned their anger against Ta-feng and threw stones and bricks on the buildings. They went on destroying the premises of the mill factory: thus began Ch'ing-chiang riots, the first ones in the series. Ten days later in Su-ch'ien, placards incited peasants to equip themselves with fuel and matches and to set fire to the Yung-feng mill. At the same time, Su-ch'ien *hsien* magistrate asked Yung-feng to sell wheat, rather than to mill it into flour. At first Yung-feng refused, but the plundering of two stores belonging to the company and of a few Yung-feng boats carrying wheat persuaded Yung-feng to advance several thousand *tan* of wheat to the *hsien* government. It seems that a local commander advised Su-ch'ien looters he was supposed to repress to go instead loot Yung-feng company. He is said to have promised them impunity as long as they helped themselves with food without destroying premises and abstained from causing disturbances in town.

Whether authorities colluded or not with looters (anonymous placards were a century-long tradition associated with food riots), the spring 1910 attacks on mills in northern Kiangsu were not typical food riots: their scope far exceeded that of the average food riot, and their targets may have included, beyond those modern capitalist enterprises they selectively attacked, the latter's imperialist suppliers of equipment and funds. During the late April plundering of Hai-feng, the Russians who had heavily invested into the company insisted that Hai-chou and Tung-hai troops be called to protect the besieged mill.

---

⑥ Or not so anonymous? According to Li Wen-chih, *Chung-kuo chin-tai nung-yeh-shih tzu-liao* (Materials on the Modern Chinese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1, 1840-1911, p. 976, placards were authorized by Li-ming prefect Wang and Ch'ing-ho *hsien* magistrate Ch'en.

## 2. WU-HSI LOOTING INCIDENTS, SPRING 1932.

From late April to early June 1932, many incidents of looting occurred in Wu-hsi *hsien*. Twenty-five cases were reported in local newspapers, several more in a periodical as well as in Feng Ho-fa's compilation.<sup>⑦</sup> In a single *ch'ü* (the seventh *ch'ü*) eleven incidents occurred between May 11 and June 10 (an average of one incident every three days); in the tenth *ch'ü*, seven cases were reported within less than a week (June 2 to 7). These figures inadequately reflect the scope of the disturbances, as local newspapers are said to have reported only about one fourth of the looting incidents.<sup>⑧</sup> An eyewitness mentioned six cases that occurred between May 26 and June 4, none of which is included in the figures mentioned above.<sup>⑨</sup> Altogether it is fair to assume that more than one hundred incidents took place in Wu-hsi *hsien* during the spring and early summer of 1932, most incidents being concentrated in late May and early June.

These repeated incidents did not, however, amount to a large-scale, well coordinated agitation. In itself, each incident was a very modest local affair. As far as I know, no one incident gathered together as many as one hundred looters; in quite a few cases, less than ten people took part in the looting. What they stole did not amount to much: from two to thirty *tan* of grain (in most cases, ten *tan* or so), in some cases a few hundred *yuan* in cash, more rarely clothes, shoes and jewelry, or a wrist watch, a lamp, a whistle, not to mention quite worthless objects or utensils. All that was taken away in one or two wheelbarrows or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looters, who as a rule came after dark and took care to hide or disguise their face. All

⑦ *Jen-pao* (Wu-hsi), May-June 1932; Li Heng, "Wu-hsi ti ch'iang-mi feng-ch'ao"(Wu-hsi rice looting), *Hsin-ch'uang-tsao* (New Creation), vol 2, n°1-2 (July 1932), p. 255-264; Feng Ho-fa, ed., *Chung-kuo nung-ts'un ching-chi tzu-liao*, (Materials on the Chinese Rural Economy), Shanghai, 1933 and 1935, vol. 1, p.422-428.

⑧ Feng Ho-fa, ed. *Chung-kuo nung-ts'un ching-chi tzu-liao*, vol. 1, p. 423.

⑨ *Jen-pao*, June 7, 1932.

this amounts to extremely small-scale burglary, surreptitiously carried out, not to a daylight gathering in front of a grain store, a warehouse or a boat which angry rioters ostentatiously plunder, burn or destroy. In Wu-hsi in 1932, violence was kept to a minimum: among all the cases I know of, one victim was killed, several more lightly wounded; most victims were only hand- and foot- (sometimes also mouth-) bound or blindfolded. Looters were not always armed and when they were, they sometimes carried only knives, clubs or bars or even in one case<sup>⑩</sup> a branch wrapped up in a piece of black rag to make it look like a pistol.

Most of the victims, who as a rule did not lodge any complaint for fear of reprisals, were individuals robbed at home. The only exceptions were a school, a wood factory and a few temples and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only one case, those robbed of their grain were three landlords known for mistreating their tenants and agricultural laborers. Members of the *Hung-ch'iang-hui* (this is also the only case where an organization, rather than only individuals, took part into the movement) distributed these landlords' grain to neighbouring peasants, at least to those who were able to walk to the small town (*chen*) where the distribution took place.<sup>⑪</sup> Somewhat less exceptional is the case of another landlord who was blamed for having not only dismissed peasants who begged him to distribute grain to starving people, but also called for guards from the town (those guards were not so brave as to resist the attack when it was launched.)<sup>⑫</sup> Most other victims were not resented at all for any reason; they were simply rich or at least better off than their neighbours. This does not even apply to all the victims, as several of them had barely enough to eat before being robbed of their grain.

In the rare cases where a complaint was lodged, the lack of coo-

---

<sup>⑩</sup> *Jen-pao*, June 12, 1932.

<sup>⑪</sup> *Jen-pao*, June 7, 1932.

<sup>⑫</sup> *Jen-pao*, *ibid.*

per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police exceeded the level of its customary reluctance to chase "bandits". The identity of rather few looters was ever revealed; in one case, it was discovered not by the police, but by the victim, a sixty-four year old widow, who had been wounded in the course of the second break-up in two days or rather nights. Reckoning she was old enough to die, she followed her attackers and identified one of them, who lived a *li* away in a neighbouring hamlet (*ts'un*). The victim's neighbours who had suggested she would make a convenient target, had been paid for with her clothes.<sup>⑬</sup> While most uncovered plunderers had been until then honorably known farmers from neighbouring villages, some spoke with a *Su-pei* accent. A peasant majority of looters would occasionally be joined by a few handi-craftsmen, demobilized soldiers or some *liu-mang*.

Early June, when the looting movement was in full swing, a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was asked by an urban relative whether he had himself robbed or been robbed, as most residents in his village belonged to either one of those two categories. For the past three months, that teacher had not been paid his seventeen *yuan* salary; he was only getting a food allocation of six *yuan* per month, which would end when the school would close (by then, more than two thirds of the students were too hungry to attend class). His answer was that he was considering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to the looting or to apply for being jailed. Among twelve tax-payers recently arrested in the neighbourhood, five had themselves asked to be jailed in order to be fed in prison.<sup>⑭</sup>

The looting epidemic remained confined in the villages. It did not extend to neighbouring towns for the only reason that towns got some sort of protection. A hundred farmers who had gathered in front of a temple before attacking the neighbouring *chen* gave up their project after learning that the *chen* had just been provided an eight armed

<sup>⑬</sup> *Jen-pao*, June 12, 1932.

<sup>⑭</sup> *Jen-pao*, June 7, 1932.

guards unit.<sup>15</sup> As a rule, police and the military were used to prevent rather than to repress disturbances. A majority of urban dwellers and even well to do villagers considered that those daily looting incidents could only be ended through charity rather than repression. Such opinion was repeated again and again in the local press, and officially expressed by a resolution voted by Wu-hsi *hsien* council members. Charity itself was deemed a temporary palliative at best; a true remedy could only be provided by an economic rehabilitation of the disaster area.

Rich Wu-hsi, a disaster area? To be sure, its very prosperity had allowed for an exceptionally dense population (by the early 1930s, every peasant household relied on an average of five *mu* of land) and many of its farmers had long ago switched to mulberry trees and silk-worm breeding, making themselves more dependent on imported grain. As is well known, sericulture north and south of the Tai-hu suffered an acute crisis during the early thirties, as a result of Japanese competition and world depression.<sup>16</sup> Sericulture, which used to represent the main source of cash for local farmers, was said to have provided An-chen<sup>17</sup> silk farmers in 1932 with less than two tenths of an average annual crop revenue estimated at 200 000 *yuan*. The sericulture crisis made Wu-hsi all the more vulnerable to the range of natural and human calamities which struck the area in 1931-1932. First, the exceptionally severe 1931 Yangtze floods completely destroyed the fall crop in the low lying areas and reduced it to 1.2 or 1.3 *tan* of rice per *mu* on higher fields. A bad harvest made for higher food-grain prices, all the more so after the spring 1932 unfavorable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had compromised the winter wheat harvest. In the meantime,

<sup>15</sup> *Jen-pao*, *ibid.*

<sup>16</sup> See, among others, Lillian M. Li, *China's Silk Trade: 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 1842-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84 and 89; Chen Tsu-yu, *Chin-tai Chung-kuo ti chi-hsieh sao-szu kung-yeh, 1860-1945* (The silk industry of modern China, 1860-1945),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989, p. 104.

<sup>17</sup> An-chen is locat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Wu-hsi *hsien* (in the eighth *ch'ü*)

the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ensuing battles in Shanghai had disrupted commercial activities in Shanghai's immediate hinterland, and 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 funds which in better times would have been available to feed disaster-stricken people had already been spent for military purposes.

The disaster, then, could very well have been what we call in French "*conjoncture*", or to avoid pedantic terms, temporary. Nevertheless, by April 1932, only a minority of Wu-hsi *hsien* peasant households were still able to buy grains, whose price had reached new heights. Pawnshops were said to refuse credit or to consent advances amounting to only ten percent of the value of the deposit, against sixty to seventy percent in former years. Then appeared in succession the grim effects of an all too familiar vicious circle: neglected fields, ears eaten out by weevils while weakened farmers remained lying at home. Some villagers committed suicide, others tried to get rid of family dependents. A sixteen years old lad who had been unable to sell his little sister in town threw her into a river on his way back. The child was not drowned, as a passerby succeeded in fishing her out of the water and restituting her to the unwilling elder brother. When asked why he had not stayed in town where he could have made a living by pulling a rickshaw, the lad answered that no one but himself could go and fetch grass for the diet of the ailing father committed to his bed and no longer able to speak. ⑬

Concentrating on the wretched aspects of life is not my favourite pastime, but brings to light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Wu-hsi epidemic of looting, namely that the looting incidents were carried out as a last recourse by starving people.

### 3. ON STATISTICS AND FOOD RIOTS IN GENERAL.

Scope, and not only scope, thus differentiate the major food riots that engulfed several Su-peï prefectures in the spring of 1910 from the

⑬ *Jen-pao*, June 7, 1932.



tiny, desperate incidents of looting that took place in Wu-hsi *hsien* twenty-two years later. The Su-pei disturbances look more like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an food riots: in both cases competition between local needs and demands from extra-regional markets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bringing about the movement. Quite naturally, the revolt coincided with a contraction of supply following one or several insufficient harvests<sup>①</sup> (in good years, nobody complains about an expanding demand). However, the fact that local consumers could not provide themselves with enough food was a consequence of high costs, rather than of grain unavailability on the market. Food rioters thus attacked agents of new networks of grain commercialization, charged with undermining the priority of local needs, the sacred right of the people to consume what is locally produced. The Su-pei situation might then recall the dismantling of the old protectionist or "paternalist moral economy"<sup>②</sup> which according to Thompson was brought about by free-trade laws in England around 1700.

While there were no doubt many hungry people among Su-pei inhabitants on the eve of the *hsin-hai* revolution, by early June 1932 more than half Wu-hsi *hsien* peasants *were* starving. It is, of course, tempting to incriminate the market here as well, and once more the loss of Wu-hsi self-sufficiency in grain due to the uncontrolled expansion of cash crops. In fact, however, mulberry fields and silkworm breeding lost ground to rice and wheat cultivation both before and after 1932. That decline was motivated not by a desire to re-equilibrate cropping patterns in order to reconquer a lost self-sufficiency, but by falling cocoon prices that left silk-farmers no choice but to withdraw to formerly less profitable food crops. The novelty that disrupted traditional commercial networks had been implanted in far-away Japan, not locally; it compromised the selling of cash crops, not the buying

---

<sup>①</sup> See Wang Shu-huai, "Chiang-su tsai-hai...", pp. 143 and 147-148.

<sup>②</sup>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6, p. 66.

of grain. In other words, no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ideal of an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grain at fair prices provoked the revolt. There was indeed no revolt to speak of, rather a recourse to illegal acts dictated by the instinct of self-preservation. As local newspapers kept repeating, Wu-hsi peasants had no way but to "take the risk" (*tsou hsien*).

One can very well consider that only Su-pei type disturbances represent true food riots.<sup>②</sup> I wish, however, to defend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minute Wu-hsi type incident as well, which in any case were far more frequent than "real" riots. Large-scale food riots of the kind Bin Wong has studied for eighteenth-century Kiangsi and Chekiang or nineteenth-century Hunan<sup>③</sup> represent less than ten percent of the 500 or so twentieth-century<sup>④</sup> hunger-provoked disturbances known to me.

### Statistics. -

That assertion calls, however, for a statistical caveat. Available data are notoriously incomplete and unrepresentative. Among other equally controversial "findings", they could make us believe that many more hunger disturbances occurred in rich Chekiang and Kiangsu than

② My reluctance to accept such a narrow, exclusive definition of food riots stems not only from a desire to extol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small-scale Wu-hsi type incidents, but even more so from the conviction that there was an almost unbroken continuum linking the most minute incidents to the largest ones.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various kinds of incidents involved much more than scope. Among small-scale incidents, for instance, one needs to distinguish those that were limited to the seizing of rice (*ch'iang-mi*) or other food grain from those that included beatings or/and destructions. By contrast, quite a few larger scale affairs remained pacific to the end, even though the threat of violence was not altogether absent, as when several thousand villagers would come to the hsien city to "report a failed crop" (*pao-huang*) or to "ask for relief" (*hu-ch'iu*).

③ Bin Wong, "Food riots in the Qing dynas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LI-4 (August 1982), p. 767-788; "Les émeutes de subsistances en Chine et en Europe occidental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n°2, 1983, p. 234-258.

④ Pre-1949, of course. Rural disturbances in the wake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9-1962) represent a research topic on their own.

anywhere else in 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especially during the Nanking decade. At first glance, such conclusion seems indeed suggested by two 1934 sources. An agency for economic information noted 64 cases of looting during that year, namely 28 cases in Chekiang, 19 in Kiangsu, 5 in Szechwan, 4 in Anhwei, 3 in each Honan and Shensi, 2 in Kwangtung.<sup>24</sup> Almost three quarters (47 out of 64) of these cases took place in Chekiang and Kiangsu, since the enquiry was essentially based upon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Shanghai and Nanking newspapers. In another report that mentioned 26 cases of looting for the summer of 1934 alone (between July 1 and September 11) only four provinces were represented (Chekiang, 14 cases; Kiangsu, 5; Anhui, 4; Honan; 3), all of which were quite accessible to the reporting newspaper in Nanking.<sup>25</sup> A single *hsien* (Chia-hsing, Chekiang) was the scene of 6 of the 26 incidents recorded. Even for that notoriously over-represented *hsien*, the list remains very incomplete, as another source indicates that a single *chen* (Wang-tien) in Chia-hsing *hsien* has been the scene of no less than forty looting incidents within less than three weeks (from July 22 to August 8) of the same summer.<sup>26</sup>

So much for the use of statistics? Not quite. A second caveat relates to my own enquiry, which could make us mistakenly conclude that many more looting incidents occurred during four years or groups of years (1906-1907, 1910-1911, 1932 and 1934) than at any other time between 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Anti-Japanese Resistance war (1901-1937). In fact, I first studied the better documented 1930-1937 period and only recently became interested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Ch'ing dynasty. While I have collected rather few cases relating to the intermediate warlord period, I cannot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that many

<sup>24</sup> Chang Yu-i, *Chung-kuo chin-tai nung-yeh-shih tzu-liao, 1927-1937* (vol 3 of Li Wen-chih et alii quoted above in note 2), Peking, 1958, p. 1032.

<sup>25</sup> *Chung-hua jih-pao*, September 12, 1934, quoted in *ibid.*, pp. 1031-1032.

<sup>26</sup> *Ta-wan pao* (Evening News), Shanghai, September 26, 1934, quoted in Chang Yu-i, *Chung-kuo chin-tai nung-yeh-shih tzu-liao, 1927-37*, p. 1031.

incidents unknown to me occurred during the 1920-1921 famine in North China (to mention only one example). The only safe conclusion one can draw from my incomplete data relates to short-term periods: many more incidents occurred in 1906-1907 and 1910-1911 than during the rest of the last Ch'ing decade (1901-1904 and 1908-1909), and somewhat more in 1932 or 1934 than in any other year of the Nanking decade. Besides more specific conditions relating to each of these four peak years or groups of years, one common, easily predictable factor was that they all were preceded by natural calamities (mostly floods or drought) succeeded by poor harvests. But that applies to quite a few of the other intervening years as well.

At least one statistical conclusion is warranted by my limited sample of looting cases, namely the latter's seasonal incidence.

Table 1: Monthly distribution of 547 looting incidents and food riots.  
(China, 1901-1949)

January: 32 cases	May: 63 cases	September: 37 cases
February: 16	June: 62	October: 17
March: 56	July: 90	November: 8
April: 95	August: 57	December: 14

**Main sources:** Chang Chen-ho and Ting Yuan-ying, "Ching-mo min-pien nien-piao" (Chronicle of popular disturbances at the end of the Ch'ing dynasty), *Chin-tai-shih tzu-liao*, Peking, 49 (march 1982, pp. 108-181) and 50 (april 1982, pp. 77-121); Che-chiang wen-shih tzu-liao hsuan-chi, number 42, *Hsin-pien Che-chiang pai-nien ta-shih-chi, 1840-1949* (New Hundred Years Chronology of Chekiang province 1840-1949), Hang-chou, Che-chiang jen-min chu-pan-she, 1990, pp. 90-406; Li Wen-chih et alii, *Chung-kuo chin-tai nung-yeh-shi tzu-liao*, Peking, 1958, vol. 1, (1840-1911), pp. 973-984 and vol. 3 (1927-1937) (edited by Chang You-i) pp. 1031-1932; Wang Shu-huai, "Chiang-su tsai-hai.", pp. 149-156. Several tens, other sources contributed less than ten entries each and cannot be recorded here.

To be sure, the figures recorded in Table 1 amount at best to a very approximate, incomplete estimate. First, the sample is not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as a whole, as Chekiang and Kiangsu provinces are once more over-represented. Second, I have sometimes resorted to

rather crude devices in allocating a number of incidents to such and such months.<sup>⑦</sup> Third, I cannot claim to have eliminated every double count in the case where a single incident is recorded in two or more sources.<sup>⑧</sup>

Unsatisfactory as this table is, it nevertheless suggests a striking contrast between spring and summer on one hand, fall and winter. on the other hand: 423 incidents were recorded during the six-month period from March to August, against only 124 during the six remaining months (from September to February). Among the latter, while September with 37 incidents looks like a transitional month, the three-month period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autumn harvest (October to December) appears to be the most peaceful one. By contrast, October and especially December represent two peaks of tenant affairs (*k'ang-tsu*), as they often coincide with the time when rents are due and collected. Nevertheless, neither rent-resistance incidents nor tax-resistance riots (*k'ang-shui*) nor to my knowledge any other kind of rural disturbances displayed as sharp seasonal variations as did looting incidents and food

---

⑦ For instance, I arbitrarily imputed to the month of July 22 of the 40 incidents that occurred in Wang-tien, Chia-hsing hsien, between July 22 and August 8, 1934, and the remaining 18 to August. Likewise, when I knew only the month, not the day, of incidents recorded in the lunar calendar, I distributed them rather arbitrarily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days of each of the two successive months. Let us take as an example the seven incidents recorded by Wang Shu-huai ("Chiang-su tsai-hai", p. 151) for the second month of Kuang-hsu 33 (march 14-april 12, 1907): I counted four of them in march, and the remaining three in april. Worse still, as Wang mentions (on the same page) only one incident during the preceding month (first month of Kuang-hsu 33, corresponding to the period February 13- March 13, 1907), I assumed it happened in February, not in March! On the other hand, I simply eliminated from my sample incidents dated without more precise indications "early 1935" or "spring of 1937" or "summer and fall of 1934", and so on. Finally, the last three months of 1911 are underrepresented because my data on late Ch'ing are more complete than those referring to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⑧ The more precise the sources, the easier it is to track down double occurrences. In quite a few cases, I am suspicious that various sources refer to the same incident, even though dates (and sometimes even localisations) differ from one source to another.

riots. Quite naturally, the latter were especially frequent during the bridge between harvests, when grain reserves had been eaten up, that is to say in spring and summer.

After that long statistical digression, let us revert to traditional (qualitative, if not subjective) comments on the most common (Wu-hsi type) incidents. As short-lived as they were frequent, small-scale cases of looting are at the elementary level of social movements. Such elementary social movements are not easily differentiated from common law crimes—or rather misdemeanours in the case of petty larcenies. The line of demarcation is all the more difficult to draw as the role of famine as a supplier of bandits is well established. Many reports on famine-stricken areas end with the remark (or *clique*) that all able-bodied men had become bandits and weak ones beggars. And yet,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looting incidents analyzed above were occasional, even exceptional looters. If they survived the current crisis, they were not likely to revert to the trade of looting until the next one (namely acute dearth or famine). When uncovered, they were often revealed to be peaceful, law-abiding peasants either from the same village as their victims or from a neighbouring village or district. Some looters were at pains to distinguish themselves from professional bandits; in one case, they even petitioned the *hsien* magistrate to be allowed to go looting, by reason of the exceptionall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Others fell on their knees before the landlord they were robbing, begging him to forgive them for the excesses to which they were momentarily driven. More often, looters took care to limit their thefts to items of food; quite a few were anxious to leave behind sufficient quantities for the victim and his family not, in their turn, to go hungry. Still others claimed they only wanted to force their victim to consent selling them grain at a “fair price” (meaning, for instance, the price of the preceding or the last “normal” year) or lending them surplus grain. When the approached lender did not submit himself to such *ying-chieh*,

("hard", or forcibly extracted loan), the prospective borrower would grab the coveted sacks of rice, thus becoming an angry or desperate looter. ⑳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like of Wu-hsi type incidents (including somewhat less circumscribed, more violent acts of looting that provoked at most a few brawls㉑ were eminently typical of the defensive, reactive nature of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pontaneous peasant disturbances. As a rule, flare-ups of peasant anger were no more than simple epiphenomena of local deterioration in living conditions. Practically all of them—and not only looting incidents and most food riots—were historically unimportant in the sense that they never seriously threatened law and order for long (they did not even question it), yet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because they say a lot about peasant conditions, discontent and behaviour.

---

⑳ This paragraph draws upon former, more general articles or contributions, especially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The Case of Chin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2 n°3 (April 1975) p. 321; "Peasant movement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1986), p. 300.

㉑ The latter may be illustrated by a last example. During a famine in northern Szechwan in 1937, three to four thousand refugees invaded the offices of the *hsien* government in Wu-sheng in order to eat the palm-trees which grew there. The attack, as well as the plundering of boats loaded with carrots, happened only after famine conditions had driven some people to cannibalism, others to collective suicide, and still others to banditry. A peasant turned bandit informed an interrogating official that the reason for his illegal activities could be found in his belly if the official bothered to have it opened after his execution. This was done and nothing but grass was discovered in the bandit's stomach. Even in such dire conditions, while a starving majority waited for death, only a minority went so far as to begin looting others' property. That minority was regarded with disapproval by the rest of the villagers, who could conceive of no other course than that of awaiting death at home, or returning there to await it after having in vain wandered abroad in search of food. (Fan Chang-hsiang, "Chi-e hsien shang ti jen" (People on the line of hunger), *Han-hsueh yueh-k'an* (Sweat and Blood Monthly), vol IX n.4 (July 1937) pp. 128-129 and 132).

# MODELS OF HISTORICAL CHANGE

## THE CHINESE STATE AND SOCIETY, 1839-1989\*

Frederic Wakeman

Four sets of patterns will be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 under conditions of oriental despotism of regionalism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its evolution into modern warlordism, the restoration of Confucian governance in the Tongzhi period and its reappearance under the Nationalist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local elites and the state from the late Qing to the early 1950s, and the growing intrusion of state power into societal processes throughout the entire period. The relevance of these historical model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tate's system of social control will be tested by tracing the formation of police forces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 **Regionalism/Warlordism/Despotism**

Each of these four models locates the beginnings of fundamental change i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the period just after the Opium War of 1839-1842. The parallels between this period of peasant rebellion and regional militarism and China a century later first caught the eye of George Taylor in the 1930s, when he was writing about contemporary military conflicts in North China, and his work on Qing responses to the Taipings later strongly influenced the group of historians work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the 1950s and '60s. Karl August Wittfogel's "oriental despotism" appeared to loom behind the entire structure. The gentry were no more than a creation of

---

\* 本文為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 Frederic Wakeman 於民國80年1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表之學術演講。



the state, though they did exercise a certain balancing effect thanks to their moral criticism of the throne. Yet they were still essentially an appendage of the monarchy: their lives were dominated by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nd their livelihoods were mainly derived from incomes as scholar-officials rather than from more independent sources such as landed rents and fees.

This essentially changeless history was altered by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Opium War.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represented an entirely novel challenge to the self-maintaining system of Sino-barbarian imperial despotism, and the result was the beginning of a major structural breakdown. "Militia Ministers" (*Tuanlian dachen*) like Zeng Guofan were allowed to establish regional armies while acquiring unprecedented control over provincial financial resources they would normally never have been allowed to touch. And members of their secretariats in turn were able to go on and create a separate military elite that would constitute the nucleus of the Beiyang warlord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general drift of this historiographical argument, then, was that the Qing dynasty's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of the Taipings had been to permit the rise of regional armies in the 1860s. Regionalism spawned warlordism, and that wa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fall of the Qing dynasty itself. And of course with the imperial system fell als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gentry. This disappearance of the last possible counter-balance to the power of the state meant that when central political authority was finally restored through the victory of the Communists, there was absolutely nothing to prevent a Chinese Stalin from appearing in the form of Mao Zedong. Oriental despotism—as unchanging in its ultimate form in China as in Russia—triumphed in 1949, and only a new external challenge, allied with those Chinese forces that could be deemed "free," would put an end to its tyranny.

### Confucian Restorations

The Regionalism-Warlordism-Despotism model is not nearly as suggestive as the structure of Mary Wright's successive Confucian restorations, which were devis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impact-and-response" learning that Wright acquired in Fairbank's famous seminar at Harvard after the Pacific War. And here too the point of inception was the Opium War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 for Wright argued that self-strengtheners like Zeng Guofan were inspired by cultural loyalism to revive the dynasty. They created their own regional bureaucracies to be sure, but in the end their Confucian conservatism kept them committed to the existing state structure.

There were two consequences to this close identification of the polity with culture. The first was the association of the Sino-Manchu monarchy's very *raison d'être* with defense of tradition as a whole. This turned out to be a fatal weakness. When the imperial state fell, conven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fell with it.

A second consequence of the identity of polity with culture meant that while the futur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as fatally compromised after 1911 by its association with the dying *ancien régime*, conservative political culture remained relatively robust. In her own writing, Mary Clabaugh Wright identified this "muscular Confucianism" in Zeng Guofan's ideology as being present also 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Chiang Kai-shek. Wright linked both Chiang's counter-insurgency tactics during the Communist suppression campaigns and element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in 1934 to Zeng's influence. Nationalist conservatism was thereby seen as a throwback to Tongzhi restorationism, and consequently deemed utterly anachronistic to Wright, who toward the end of her life increasingly identified al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ith a fundamental revolutionary surge that began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In *China in Revolution* Wright seriously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prevailing claims of offici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bout Sun Yat-sen's crucial role as "father of the country" to the 1911 Revolution. Believ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omehow to be connected with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the early 1900s, Wright identified a set of new "forces" appearing in China then: women, youth, modern military troops, workers, and so forth. These were the real sources of revolution, not the overseas Chinese conspirators like Sun Yat-sen who only took judicious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these forces contributed for a *coup de main*. Much less striking at the time than this iconoclastic skepticism about Sun Yat-sen was a new theme of "gentry revolution" that appeared in the Wright volume. The theme was most strongly sounded by Chang P'eng-yuan in an important study of the constitutionalist movement. Yet, the "gentry" thesis imbedded in the Wright model eventually came to have a more lasting influence on later scholarship than either anti-Sun iconoclasm or the "new forces" theme.

### Local Elites

De Tocqueville's connection of social revolution with various forms of competition between ruling elites and the modern state has been a major rediscovery of American historical sociology during the past twenty-five years. The most influential interpretation in this vein in the China field was that of Philip A. Kuhn, whose "militarization thesis" became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tructural analysis of late Qing history. By closely examining the history of the Taiping period, Kuhn was able to show not only that local elites had won back the countryside from the rebels; but also that both sides, rebel and imperial, had experienced a parallel social militarization. Moreover, he demonstrated as well that this expansion of extra-state military power w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critical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local elites not just for existing resources, but also for new political resources created by demographic need and by foreign competition.

Kuhn also establish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ocal elite engrossment and the ideology of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so central to the "statecraft" (*jingshi*) movement after the Opium War. As Kuhn showed, this notion of gentry home rule or "local self-government" (*difang zizhi*), hearkened back to the 17th-century ideal of balancing the autocratic power of the "prefectural" (*junxian*) state with the "feudal" (*fengjian*) concerns of enlightened Confucian gentry looking after their own best interests. The local self-government movement that emerged during and after the reforms of the late 19th century has been identified in at least three different guises.

### Guises of Gentry Self-Government

The first guise is benign and affirmative, evoking autonomous municipal government by a responsive set of local leaders seeking to create their own legitimate public sphere of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This is the "gentry democracy" that Mark Elvin wrote about in describing the local elite management systems around Shanghai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is century. Recently, this phenomenon has been identified by Rankin, Rowe, and Mann as a strikingly modern form of elite activism that accompanied the creation of a new sphere of voluntary public service and that may even be identified with what Jurgen Habermas has called a "public sphere" in European society after the 18th century.

The second guise is far less positive, and more in keeping with the autocra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iental Despotism model than the putative civil society that some American historians believe was emerging in China toward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Muramatsu Yuji's masterful study of the Jiangnan bursaries suggested that the post-Taiping settle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entailed a merging of public taxes and private rents so that landlords were able to use the police powers of the state to arrest truculent tenants and enforce their own rent collection systems. James Polachek's Soochow study, which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Muramatsu's work, argued that at the lowest end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elite dominance weakened the polity and increased the likelihood of social revolution.

In their third guise, local elites were cast as mobilizers of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against the state. Leaders of provincial constitutionalists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 urban reformers like Tan Yankai later sponsored young radicals led by Mao Zedong in a united front against the warlords and the imperialists. As the appearance of unitary nationalism gave way to Marxist class struggle, however, the united front within the urban elite sundered.

The process described by this third presentation of local elites as political mobilizers therefore followed fairly classic lines: once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became clear to the privileged, the upper classes recoiled from their alliance with radical youth and betrayed the united front. The Communists, on the other hand, embraced China's rural dispossessed and so in the end triumphed. As long as the teleolog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mained alive in the person of Mao Zedong, this third version—theories of peasant nationalism notwithstanding—of the role of local elites tended to prevail among younger Western social historians.

### **The Power of the Traditional State**

In 1937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 Wu Han had had Chiang Kai-shek in mind when he published his biography of the Ming founder, Zhu Yuanzhang. In 1967 the same barbed attack on Mao by historical analogy cost Wu Han his life. In both cases, nonetheless, the point was clear: China's greatest late imperial autocrat, Zhu Yuanzhang, had in the 14th century ruthlessly cleared away the tens of thousands of local elite families that stood between his person and the peasantry from which he had emerged during the apocalypses of the mid 1300s.

The Ming founder's ideal form of local government, then, was a kind of self-administration in which local "taxchiefs" (*liangzhang*)

would gratuitously look after tax collection and a few other crucial functions. The Ming looked to self-supporting tax collectors on the one hand, and relatively informal mechanisms of control on the other.

The Qing dynasty fell heir to Zhu Yuanzhang's minimalist strategy of local governance. The first two emperors made heroic efforts to gain access to Eastern China's economic resources. These efforts largely succeeded, and the Qing state of Qianlong times was the strongest fiscal, military, and political régime in all of pre-modern Chinese history. But there were few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taxation system. Private engrossment disturbed the hydraulic system, literally clogging the waterways on which the empire depended for tribute and trade in the 1750s and '60s; and population growth put the kinds of strains on the state's political resources in the 1770s, '80s, and '90s that were earlier described in discussing Kuhn's militarization model.

By the late Guangxu years,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Hundred Days of Reform in 1898, the accumulated insufficiencies of state power had crystallized into the frustration experienced by the throne in failing to reach past provincial officialdom to engage directly with the empire's populace. The impulse on the government's side was to integrate top with bottom in order to strengthen its rule. The understanding by local elites was that this meant recognizing their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more widely shared political rule.

There were thus two impelling vis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that were coming into conflict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One was a statist drive towards a much more engaged connection between ruler and ruled. The second was the desire of local elites to increase their own involvement in local government.

### **The Modern State and Social Control**

One of the most obvious examples of the growth of state power in 20th-century China was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police system.

Yuan Shikai was the leading sponsor of the new European-style police forces of North China. The modern police forces introduced in Baoding and Tianjin were meant both to pacify the people and to provide the viceroy's government with a means of bypassing local homerule interests who until then controlled their own local militia and village braves. In Beijing itself, police reforms were carried out in the spirit of the Meiji police reforms of 1871, and a number of Japanese police specialists were engaged as instructors in China.

The best-known of these experts was named Kawashima Naniwa who director of a school to train Chinese in Japanese police methods after the Boxers and 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Beijing. In 1902 Kawashima submitted a memorandum that constituted the basic document for a program of police reorganization, and that established what was to become the ruling metaphor of national political domination—the two wings of army and police protection—during later years, Kawashima's memorandum called for a centralized national police under a police affairs board responsible directly to the emperor and headed by a member of the royal family.

This new Chinese police system was modeled after the centralized police forces of continental Europe. On October 8, 1905 a Patrol Constable Board (Xunjing bu) was set up, and in 1907, when the Green Standards were abolished, the Xunjing bu was folded into a Board of Civil Administration (Minzheng bu). Within that board all police work was brought under a single Department of police Administration (Jingzheng si). This department, nearly twenty years later, was to be the key administrative nucleus of Chiang Kai-shek's secret police within the Nationalis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 **Nationalist Police Reform**

Despite the promises of centralized authority seemingly guaranteed by the Japanese model and European examples, police control was

difficult to impose in China without prior military unification. Nevertheless, European police forces remained the primary model until the 1930s when the influence of continental law enforcement experts on the new Chinese national police system was rivaled by American police officers. In 1930, for example,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invited Captain A.S. Woods of the Berkeley, California police department to come to China and serve as an advisor.

Woods was asked to help reorganize the metropolitan police of Nanjing because of the Berkeley department's growing reputation as one of the best police forces in the world, thanks to its chief, August Vollmer, who also held a posi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s Berkeley's first professor of criminology. It was in this capacity that he trained two Chinese students who were to become Chiang Kai-shek's key police advisors: Feng Yukun and Yu Xiuhao (Frank Yee). After graduating from Berkeley's criminology program in 1932, Feng Yukun returned to China and personally submitted to Chiang Kai-shek a plan for reforming police forces throughout China. Feng was seconded, in March 1933, to Police Commissioner General Chao Chen's office to serve "as an extra secretary" in the security division. In that capacity Feng introduced a number of American police devices, including the use of radio patrol cars, lie detectors, fingerprinting, police dogs, and so forth. Within twelve months he was invited to serve as dean of police training at the Zhejiang Police Academy.

The Zhejiang Police Academy, which had been founded just after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by Zhu Jiahua, was one of the premier cadre-training institutions of the new Nationalist régime. As a national institution, the Zhejiang Police Academy also assum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olicing of Lushan, which was already being used as a training zone for counter-insurgency forces. A special cadres brigade was set up by the chief of Chiang Kai-shek's military secret service, Dai Li, to prepare agents for Juntong (Military Statistics Bureau) missions. The Zhejiang Police Academy was also a top secret training center for



Dai Li's Juntong agents, who were being groomed by Chiang Kai-shek as special cadres to take over local police forces and draw them into his secret police system.

By 1935, when Chiang Kai-shek announced his decision to merge the Zhejiang Police Academy with the Jiangsu Police Academy to form a new Central Police Academy (*Zhongyang jingguan xuexiao*), Dai Li's men were in several of the key political training posts, and special clandestine training units were already in place to prepare Juntong personnel for service as Chiang's personal bodyguards, as intelligence agents, and as secret policemen. The texts they studied were translations of Cheka and GPU training manuals provided by Communist defectors.

The Guomindang creation of an elaborate secret service system, which also included Chen Lifu's Central Statistics Bureau (*Zhongtong*), corresponded to counterpart Communist apparatuses under the Tewubu and the Tewu weiyuanhui established in 1931 after Red Brigade leader Gu Shunzhang's defection to the Nationalists.

Chiang Kai-shek's decision in 1935 to create a central police training institute stemmed from a wider vision of a countrywide police system that would integrate other systems of local control and stand alongside the army as one of the two critical buttresses of his régime. Chiang Kaishek told the graduating seniors of the class of 1937 of the Central Police Academy that, "There are two great forces in our country: the army and the police; one is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the other is for maintenance of peace. Like a plane, it takes two wings to fly; but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modern police duties and because they are the only public functionaries that are in constant contact with the people, the position of the police is even more important in our society."

Chiang Kai-shek's plans to train all of the police chiefs of China in the Central Police Academy were thwarted by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Yet the secret police system continued to grow for intelli-

gence purposes and because Dai Li was able to effect an agreement with U.S. Navy representatives to create a 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Zhong-Mei hezuo suo*). SACO provided FBI and Naval Intelligence instructors to train high-level Juntong agents on the one hand, and regular Army, Navy, and Marines officers to instruct the 50,000 members of Dai Li's Loyal and Patriotic Army (*Zhongyi jiuguo jun*) on the other. By the end of the Pacific War, the Military Statistics Bureau of Chiang Kai-shek had about 100,000 operatives, making it one of the largest intelligence and secret police organizations in the world at that time.

### **Police and State Power after 1949**

Many police forces turned coat when the Communists won the civil war. The *baojia* system was abolished in name, but a nearly identical system was set up in its stead in the form of the neighborhood Residents' Committee (*Zhumin weiyuanhui*) that was directly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n increased number of Public Security police outposts. Although many of the instruments of state power of the new régime were a legacy of previous governments, we must recognize the utterly novel character of the PRC's social government. Part of its uniqueness was sheerly quantitative, stemming from the massive bureaucratic expansion that took place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when the number of state cadres increased from 720,000 in 1949 (constituting 0.13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to 7,920,000 in 1958 (1.21 percent). Part of its novelty was qualitative, reflecting the CCP's inter-penetr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In 1952, for instance, a new nationwide system of Public Security Committees was established by organizing groups of three to eleven members in every institution in the country "to organize and lead the masses to help the government and public security organs to denounce, supervise, and control counterrevolutionary elements," and "to protect the state and public order." The Party took a leading role in these

organizations; but the coercive muscle of the Party was the public security system, which owed a significant degree of its own efficacy to earlier Republican efforts to create powerful state police apparatuses originally modeled on the Bolsheviks' Cheka. The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mmunists and Nationalists in this respect was thought control. However much Chen Lifu stressed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there was simply no comparison between the Nationalist control system's ability to govern thinking, and the Communists' ability to force ideological conformity through struggle sessions, *ziwo piping*, written confessions, cross-checking of police and personnel files, and so on. Even a Michel Foucault would have had difficulty imagining how thoroughly the hegemon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been imposed upon the Mainland Chinese since then.

Of course, the CCP also came to power as a military force, and the rank-and-file of the public security forces were originally drawn from regular PLA units toward the end of the Civil War. In 1950, under the stimulus of the Korean War, the PLA's Public Security School began to receive thousands of new recruits. Between 1955 and 1962, however, the PSB was separated from PLA control. After 1962, local public security forces were gradually brought back under the control of military regions with national-level forces ostensibly under the command of Minister of Public Security Xie Fuzhi.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o urged his followers to "thoroughly smash the public security procuratorate and justice organs," and by the end of 1967 they were being taken over by military security personnel. In November 1978 at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Hu Yaobang described the security organs of that period as "a Gestapo independ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lthough the security organs were supposed to protect the state, he said, under Kang Sheng, "the knife of the organization fell on our own heads rather than the enemy's."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was once more accountable to the Party, its personnel launched a campaign to restore the public image of the police and the procuratorate. The campaign took place within a larger nationwide movement to restore the legal system and inculcate obedience to the criminal and civil codes. The crackdown began on August 25, 1983. According to Wang Jingrong, head of the Research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5,000 criminals were executed during the next 13 months as part of a campaign to "educate others." An additional 120,000 people surrendered "to mend their evil ways," and another 70,000 suspected criminals were turned in by ordinary citizens.

The authorities subsequently claimed that there had been a major drop in the crime rate from 7/10,000 people in 1982 to 5/10,000 people in 1985. Indeed, the suppression of serious crimes during 1983-1985 supposedly brought China's crime rate down to nearly the lowest level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in 1949. This was also one of the lowest crime rates in the world.

Two major causes of crime were identified in the form of foreign "spiritual pollution" and in the spread of commercial exchanges that were part of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The Party leadership was especially offended by the spread of foreign habits and ideas among college youth, and when students demonstrated in December 1986 their disrest was attributed to outside influences. Ruan Chongwu, head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MPS), was dismissed the following April mainly because of his lenient treatment of the students at that time. His successor, Zhejiang Party Secretary Wang Fang, claimed that social disorder was being instigated by "anti-revolutionaries at home and [through] infiltration and sabotage by hostile organizations from abroad," and addition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s were soon opened on many campuses around China to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education."

Wang Fang's appointment as Minister of Public Security in 1987, in fact, presaged a dramatic switch in Chinese perceptions of crime

and social control. Public security figures began to worry that "problems affecting political order may deteriorate to become factors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While China's police chiefs warned of turbulent times ahead, the authorities described increasingly frequent attacks on public security organs.

One immediate response on the part of the MPS was to recruit more police officers and agents. While middle and upper cadres among China's 1.2 million policemen went through a program of training in special colleges under the MPS, the police were also given priority in recruiting high school graduates after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every yea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picked up as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tried to keep track of transient urban populations, which had swollen to more than 50 million by 1988. Free markets had to be licensed and patrolled—activities that led to police corruption. Traffic control demanded increased police supervision and attention. Paradoxically,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to more of a self-regulating one gave the authoritarian services of the state a much more important role than they enjoyed when the Chairman's ideological campaigns inspired autarchic collective behavior.

As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devoted more and more of its personnel's time to social regulation, two new police agencies made their appearance: a paramilitary force designed to counter internal riot and rebellion, and a secret service for counter-espionage and control of subversives. The People's Armed Police (Renmin wuzhuang jingcha) was created in March-April 1983 with a mammoth transfer of 500,000 soldiers from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By 1989 there were over 1,000,000 PAP troops garrisoned throughout China. Their men were also supposedly trained in riot control and were thus ready to be used in the event of urban demonstrations. The 27th Army had to be called in to quell the June Fourth Movement, but in Beijing, Shanghai, Chengdu, and Xi'an the Armed Police also had a major role to play

in striking out against democracy movement demonstrators.

There was also an expansion of the security services as such after the disbandment of the special unit known as "8341." After Wang Dongxing's political demise, top-level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had come directly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Political-Legal Commission (PLC), which had functioned as a "power organ" with hands-on leadership of the security and legal organizations. In 1983 a new Ministry for State Security (Guojia anquan bu) was created and charged with counter-espionage and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ctivities. Its minister, Jia Chunwang, reported directly to the PLC, which was replaced late in 1987, at the time of the intensific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activities, by a new Political-Legal Leading Group (PLLG). This Central Committee organ, which also supervised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the procuracy, and the judiciary, was directed by Qiao Shi. Its duties were not altogether clear to outsiders, but later events showed that like the American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it was charged with maintaining surveillance over suspected subversives—including potential dissidents with contacts with the West. The use of electronic monitoring and the impressive tracking of suspects through other police techniques in the days after the Tian'anmen Incident are recent evidence of the dominion of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over the Chinese.

Together, all three police forces represent the power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openly and secretly to exert unprecedented control over its citizens' lives. The regular PSB elements now devote a major part of their resources to normative policing: arresting drug dealers, seizing imported video cassettes, closing down pornographic publishers. They also, together with the other two agencies, have put in place a colossal individual and household control system that by the end of September 1989 had issued 500,000,000 electronically coded identity cards to PRC citizens advised to prepare themselves for frequent police verification. Thanks to computers imported from the U.S. and equ-

ipped with special Chinese software, this new registration system provide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means of totalitarian rule that preceding authoritarian régimes—the late Qing monarchy, Yuan Shikai's abortive republic, the Nationalists' Nanking régime—could hardly have imagined.

Yet all three of those predecessors would have appreciated the drive to acquire such mechanisms. The history of coercion—the rise of the modern police state—thus validates the fourth of our models of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during the last 150 years. To be sure, it is far from novel to describe the government that has ruled China since 1949 as representing the growing intrusion of the state into societal processes. But what is less obvious is the recognition that the intrusion began in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and that it has continued down to the present day. This perdurance lends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remarkable staying power. Even as Communist régimes unravel in the West,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the Chinese polity surrendering so readily to anything less than the severest of military and social challenges.

---

## THE EVOLUTION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njamin A. Elman

This paper represents part of an ongoing book-length research project begun in 1986 and presently nearing completion entitled "Cultural Prisons and Symbolic Violence: Civil Examinations and Confucian

---

\* 本文為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 Benjamin A. Elman 於民國80年1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表之學術演講。

Educ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400-1900." Research on this project has been most recently sponsored by the Foundation for Scholarly Exchange (Fulbright Program in Taiwan) and the Pacific Cultural Foundation in Taiwan. Special thanks are due Professors Chang Wejen, Angela Leung, Chang P'eng-yuan, Ch'en Yung-fa, Yang Ts'ui-hua, Hsiung Ping-chen, Hsing Yi-t'ien, Huang Ch'ing-lien, Lin Ch'ing-chang, and Wu Hung-yi of Academia Sinica for their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during my stay in Nankang during the fall and winter of 1990-91.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the staffs of the Fu Ssu-nien Rare Books Library, the Rare Books Room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nd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Library for their exemplary help, particularly Su Ching,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Special Collections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nd Lin Teng-tsan, Director of the Fu Ssu-nien Library.

### **1. The Evolution of Ming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mperial institutions for testing and selecting candidates for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took their final form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n an effort to bridge the civilian, cultural, and racial gaps in the Chinese imperial system that had emerged under alien Mongol militar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1280-1368), Chu Yuan-chang (1328-98), the founding emperor of the Ming, in 1368 invited Confucians to recommend local talents for appointment as prefects and magistrates. An early adept of the millenarian White Lotus Buddhist sects that had revolted against Mongol rule, the Hung-wu Emperor (r. 1368-98) was persuaded by Confucianized elites to don the ideological garb of a Confucian sage-king to reunify the empire and rekindle the orthodox legacy of the Sung dynasties.

Central to this enterprise of political legitimation was the ability to recruit talented men and assign them positions in state and local governance. Under Mongol rule, Chinese had been treated as third-class "citizens" in their own land, continually subjected to arbitrary



decisions that granted Mongols, Muslims, Tibetans, and other Central Asian peoples privileged status in the Pax Mongolica of the day. Chinese chafed under the symbolic and material forms of violence used by the Machiavellian Mongols to maintain control as a minority over the massive numbers of Han people in North and South China. Many Confucian scholars, prevented from joining the Yuan state as officials, turned to alternative careers in local society. These roles ranged from medicine to the literary and theatrical arts. Confucian eremitism, a legitimate response to alien rule, meant that when the Ming dynasty replaced the Yuan, the new ruler would have to find ways to attract such Confucians into government service. The *raison d'être* of an imperial dynasty in China depended on loyal officials who granted the symbolic right to rule to any man who unified the empire and claimed the "heavenly mandate."

In term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for example, the Ming represented the mature forms of governance that made "post-Mongol China" into a discrete temporal unit also known as the "late empire." The Mongol era in Chinese history had acted as a decisive "brake" on the evolution of innovative policies in Sung state and society. Following the Sung model for the civil and military service, the first Ming emperor reconstituted a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process [*hsuan-chü*] that governed the Confucian civilian and military bureaucracy and enabled the late imperial state to control its human resources. Through this decision, Chu Yuan-chang effectively replaced Mongol rule with his own and established bureaucratic channels that penetrated fairly efficiently down to counties and prefectures in the search for classically literate men to enter the elite world of officialdom.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thus consciously represented a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that maintained continuity with pre-Mongol China.

When compared to the Ming tax system, which was designed to extract material wealth from local society in the form of land taxes, commodity taxes, and corvée labor [*tsu yung tiao*], the Ming extrac-

tion of human resources [*chao-shih*] was longer lasting and more effective. The late imperial state lost control of its material resource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when the tax burden increasingly fell upon commoners who received none of the generous exemptions granted official families and their gentry relatives and friends. Despite early Ch'ing efforts to curtail the degree of tax evasion prevalent in South China, for example, the late imperial state never regained full control of its material resources. In contrast, state control of human resources through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process of the civil service remained relatively effective until massive peasant rebellion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ies seriously compromised the efficiency and integrity of the civil service.

In terms of the civil service, then, late imperial China symbolized the grafting of Sung models for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officials onto the post-Mongol imperial state and its dominant social elites. Accordingly, the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gulations of the state-wide examination system reproduced Confucian norms of governance and behavior under post-Yuan historical conditions imposed upon the late imperial state. Unlike early Sung rulers, the aims of Chu Yuan-chang and succeeding Ming emperors were decisively more conservative than the innovative agendas of the Northern Sung. The "anomaly" of Sung China, as Winston Lo has described it, was that it represented forms of assertive and pragmatic government that were later curtailed by Ming and Ch'ing rulers.

The civil service process, its curriculum, forms of testing, and routines for official appointment, made it one of the key continuities that bridged the Mongol era and permitted Sung institutions and values to flourish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curriculum of Neo-Confucian moral philosophy had been forged in the pre-Mongol era, achieved orthodoxy briefly just before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 (1127-1279) was extinguished by Mongol armies, and had been assimilated into the repertoire of ideological devices used by the Yuan when in 1313

the alien dynasty decreed that the Ch'eng-Chu (Ch'eng I and Chu Hsi) "school of principle" [*li-hsueh*] was required of all Chinese officials serving in the bureaucracy.

When Ming rulers reconstituted the examination system, they were not simply following Sung models. In the process of reproducing the Sung selection process, Chu Yuan-chang made the Yuan dynasty Neo-Confucian curriculum his own, a choice that meant that Sung forms of selection were accompanied by a pruning away of the actual content of Sung examinations and preserving as orthodox a relatively minor school of Confucianism that had not been dominant in Sung China until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Yuan need for a precise Confucian orthodoxy that could guarantee political legitimation and public indoctrination displaced the broader Northern Sung agenda of practical statercraft [*ching-shih*] requiring classical and historical expertise of its candidates. More telling perhaps was the result that technical fields of study such as law, medicine, and mathematics were not reduplicated in Ming examin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at Sung institutions served as models, the technical contents channeled through them in the 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 were decisively left behind.

The Ming state bureaucracy reproduced itself through a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system that had four major components: 1) schools [*hsueh-hsiao*]; 2) examinations [*k'e-mu*]; 3) recommendation [*chien-chü*]; and 4) appointment [*ch'üan-hsuan*]. This organization represented a modification of the Sung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process: 1) examinations; 2) schools; 3) appointment; 4) protection privilege [*pu-ying*]; 5) sponsored appointment [*pao-jen*]; and 6) evaluation [*k'ao-k'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ose that held office by virtue of their degrees [*k'e-mu ch'u-shen*] were part of a larger administrative process involving the Ministry of Rites [*Li-pu*] for education and the Ministry of Personnel [*Li-pu*] for appointment and evaluation [*k'ao-chi*].

In fact, when first promulgated in 1371 and repeated in 1385,

examinations were less important for official appointment than the recommendation process, whereby candidates were granted appointments through nomination by officials. Guaranteed recommendation [*pao-chü*], for example, remained an important appointment process designed as a mechanism to avoid overlooking officials in lower ranks of the bureaucracy during both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In this way, deserving subordinates were nominated for promotion by their superior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and thereafter, however,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became the most prestigious channel for selection of officials. The degreed curriculum became the basis for the public school system that extended down from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kuo-hsueh*, later *kuo-tzu chien*] to state-run schools at the prefectural [*Fu-hsueh*] and county [*Hsien-hsueh*] levels of administration. Foreigners, principally from the Ryūkyū Islands, Japan, Korea, and Siam (Thailand), were also permitted according to the terms of the imperial tributary system for foreign affairs to study in state schools as tribute students. Although Chinese candidates continu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recommendation, inheritance [*yin*], and purchase [*chüan-na*] provisions of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process, most high-level civil officials in Ming and Ch'ing China were select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success on local, provincial, and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Accordingly,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stat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were part of the larger administrative process of selecting, evaluating, promoting, and punishing officialdom. Viewed in isolation, the Neo-Confucian curriculum of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is too often misperceived as a cultural field of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discourse tied simply to the Four Books, Five Classics, and Dynastic Histories. The "examination life," its rituals of preparation and stages of success, were intimately tied to the complex and interrelated processes of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So important were examination credentials that by the Chia-ching

reign (1522-57), the imperial school system had been overshadowed by the very examinations the schools were designed to prepare student for. Education in the public schools counted for very little if the student failed to pass the state examinations. Doomed to lives as minor functionaries, students who remained in public schools too long had little chance for success in late imperial politics. In fact, by the late Ming it became difficult to gain reputable government positions for candidates who only got as far as the provincial *chü-jen* (raised candidates) degree. Earlier in the dynasty, provincial degree-holders were conspicuous in state administration, but they were eventually displaced by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metropolitan *chin-shih* degree-holders. Of the three routes of career advancement, namely metropolitan graduates, provincial graduates, and clerical officials [*li-yuan*], the *chin-shih* degree became the sole guarantee of high political position and elite social esteem.

Quotas for local and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represented state efforts to control its extraction of human resources, just as tax quotas had been set to equalize the extraction of material resources in the empire. In townships [*chou*], counties, and prefectures, the quotas for licentiates [*sheng-yuan*, that is, those candidates licensed to participate in higher-leve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were initially set at 40 candidates per prefecture and 30 candidates per county and township. During the Hsuan-te reign (1426-35), these limits were increased to 60 for the capital prefectures in Nanking and Peking, although they remained at 40 for other prefectures. Control of the number of licentiates remained a key policy of the late imperial state in its efforts to limit the numbers of candidates in the civil service selection process.

As of 1384, there were no quota limits for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hsiang-shih*], but beginning in 1425 quotas were set. During the Cheng-t'ung reign (1436-49), quotas for residents of Peking and Nanking were set at 100 candidates, with populous provinces allowed

65 candidates and less populated provinces progressively less. The quotas were increased until at the end of the Ming metropolitan *hsiang-shih* quotas reached 130, and the number for populous provinces was raised to 100 candidates.

Quotas for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hui-shih*] were not set, although the general number of successful *chin-shih* in a triennial examination usually was around 300 candidates after 1475. The quotas fluctuated widely, however. In 1385, for instance, only 32 *chin-shih* were passed, while in 1406, 472 names appeared on the roll of successful candidates—the low and high for the Ming dynasty. Figures frequently moved between 100, 200, 250, and 350 candidates, although Ping-ti Ho has estimated that during the Ming as a whole an average of 89 names per annum (289 per examination) were passed in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Regional quotas were not set for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until 1397, when the Hung-wu Emperor discovered that all 52 successful candidates for that year were southern literati [*nan-shih*]. The emperor asked for an investigation of possible favoritism, but when the readers reported back that no changes in ranking or regional representation were necessary, he had them executed. Under such imperial pressure, the roll of successful candidates was increased to 61, and a northern literatus [*bei-shih*] was ranked first. Despite Chu Yuan-chang's outrage, however, formal regional quotas were not set until 1425, when a ratio of 16:14 was established for the wealthier southern vis-à-vis poorer northern regions. During the Cheng-t'ung reign, the regional quotas were redefined as ratios between south, north, and central portions of the empire. A ratio of 55:35:10 was set for each region respectively, and after 1489 this ratio was followed until the late Ming.

Until state examinations displaced other mechanisms for career advancement, the Confucian curriculum in public schools stressed moral philosophy [*i-li*, lit., "meanings and principles"], classical

studies [*ching-hsueh*], and history [*shih-hsueh*]. Mastery of moral philosophy was measured by examination questions based on the Four Books that required an essay answer of at least 200 written graphs in length. An essay of at least 300 graphs elucidating the "meanings" [*ching-i*] of one of the Five Classics was the standard for classical studies. History questions stressed early dynastic histories such as the *Han-shu*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and the *Shih-chi*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as well as Confuciu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h'un-ch'iu*], one of the Five Classics but essentially a historical chronicle. At first even texts from the Buddhist [*Fo-tsang*] and Taoist [*Tao-tsang*] patrologies were tested, but this catholic approach was discontinued in the Hung-chih reign (1488-1505).

Provincial and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early Ming mirrored the education administered in public schools. The first high-level state examinations were in three parts. Administered together on the same day, candidates were required initially to prepare two essays based on quotations from the Five Classics and one essay on the Four Books. Next, a discourse [*lun*] based on a text from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Hsiao-ching*] was required. Finally, the candidate had to prepare an answer to a practical question on public policy [*ts'e*]. Those who passed this stage were tested again in ten days for their physical prowess in horsemanship and archery, and their mental prowess in calligraphy, mathematics, and penal law.

This more technically oriented arrangement was subsequently changed into the more formalist, three-tired format for provincial and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outlined in Table 1. Of note in this formalization of the examinations into three discrete sessions was the priority given to the Four Books over the Five Classics in session one [*ti i-ch'ang*], the addition of legal and documentary requirements for session two [*ti erh-ch'ang*], and the increase to five of required policy questions in session three [*ti san-ch'ang*]. Moreover,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answer three questions from the Four Books, but they

could specialize in one of the Five Classics and elect to elucidate only quotations from that Classic.

TABLE 1 FORMAT OF PROVINCIAL AND METROPOLITA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Session One</i>	<i>No. of Questions</i>
1. Four Books 四書	3 quotations
2. Change 易經	4 quotations
3. Documents 書經	4 quotations
4. Poetry 詩經	4 quotations
5. Annals 春秋	4 quotations
6. Rites 禮記	4 quotations
<i>Session Two</i>	<i>No. of Questions</i>
1. Discourse 論	1 quotation
2. Documentary Style 詔誥表	3 documents
3. Judicial Terms 判語	5 terms
<i>Session Three</i>	<i>No. of Questions</i>
1. Policy Questions 經史事務策	5 issues

These three testing sessions were administered triennially over a period of several days with three days in between sessions to give examination officials time to rank the papers handed in. Candidates had one full day to complete answers for each session. Normally, candidates would take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in the fall of the year they were given and if successful move on to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in Peking and Nanking in the spring of the following year. A final palace examination [*tienshih*] for all metropolitan graduates was administered by the emperor himself as a personal litmus test to ensure political loyalty to him and fair and impartial final rankings. In general, this three-tiered arrangement remained in force until 1905, although the questions for each session were frequently changed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Because of their length and complexity, the triennial examinations required a full complement of examination officials to administer.



Table 2 reveals that over 60 officials typically were assigned to the provincial and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many of them drawn from the provincial education intendant circuit [*t'i-hsueh*] and the 4200 education officials [*chiao-kuan*] assigned to state schools throughout the empire. Despite the high number of examination readers, however, the pressure to read and grade within a prescribed period of time all papers, which were prepared in black ink [*mo-chüan*] by the candidates and recopied by copyists using red ink [*chu-chüan*] to preserve anonymity, inevitably meant that the questions administered during the first session were given the most attention by the examiners and thus the students as well.

TABLE 2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OFFICIALS IN 1538

<i>Official Title</i>	<i>No. of Officials</i>
1. Readers 讀卷官	13
2. Supervisors 提調官	3
3. Overseers 監試官	2
4. Officials for Collecting Papers 受卷官	4
5. Sealers of Papers 彌封官	12
6. Examiners-archivists 掌卷官	5
7. Officer Guards 巡綽官	13
8. Seals Officials 印卷官	4
9. Supplies Superintendants 供給官	8
TOTAL	64

Source: *Chia-ching shih-ch'i-nien chin-shih teng-k'e lu* 嘉靖十七年進士登科錄 (Record of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graduates, 1538), 1538: 1b-5a, in the *Ming-tai teng-k'e lu hui-pien* 明代登科錄會編, Vol. 9. Taipei: Student Bookstore reprint, 1969, 20 vols.

In time, stylistic answers written in 8-legged essay [*pa-ku-wen*] forms, which were derived from early-Ming standardized essays [*chih-i*] that were selected as models of emulation [*chün-tse*], became expected of all candidates. The essays that dealt with quotations from the Four Books were read with extreme care, and frequently the remaining questions during sessions two and three of the examination were

viewed as merely confirming the initial standings of the candidates after the papers from session one were graded. Policy questions during session three, for example, became especially undervalued in the grading process. The result was that frequently students merely went through the motions in preparing these answers, realizing full well that their standing had already been determined based on earlier sessions.

Neo-Confucia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 were chosen by the Hung-wu Emperor and his successors as the orthodox curriculum. On the Four Books, candidates were expected to have mastered the relevant materials in Chu Hsi's *Chu-tzu chi-chu* (Collected notes by Chu Hsi). For the Five Classics, Chu Hsi's views were also favored. On the *Change Classic* [*I-ching*], Ch'eng I's commentary and Chu Hsi's "Original Meanings" [*Pen-i*] were required. Ts'ai Shen's (1167-1230) commentary to the *Documents Classic* [*Shu-ching*], which Chu Hsi had directed Ts'ai to compile, was emphasized. Similarly for the *Poetry Classic* [*Shih-ching*], Chu's "Collected Commentaries" [*Chi-chuan*] were requirements.

For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h'un-ch'iu*] and *Record of Rites* [*Li-chi*], for which Chu Hsi had not prepared commentaries, the views of other Sung Confucians were instead used for examination standards. In addition to the ancient "three commentaries" [*san-chuan*, that is, the *Tso*, *Kung-yang*, and *Kuliang* commentaries] for the *Annals*, Hu An-kuo's (1074-1138) and Chang Hsia's (1161-1237) commentaries (later dropped) were also chosen for testing. Like Ts'ai Shen, Chang had studied under Chu Hsi. For the *Record of Rites*, ancient Han and T'ang commentaries [*Ku chu-shu*] were at first required, although later in the Ming Ch'en Hao's (1261-1341) "Collected Saying" [*Chi-shuo*] was singled out for attention.

Under the Yung-lo Emperor (r. 1403-24), the championing of orthodox Neo-Confucianism was cleverly manipulated to draw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emperor's usurpation of power from the Chien-wen

Emperor (r. 1399-1402). Neo-Confucia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lassics were for the first time collected together in a definitive edition for the civil examinations and entitled *Ssu-shu wu-ching ta-ch'üan*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ommentaries] for the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 Thereafter, this *Complete Collection* alone was used for the questions on the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 administered during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provincial and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All Han and T'ang dynasty commentaries were dropped from usage, leaving the orthodox Ch'eng-Chu school in a bitter-sweet ideological marriage with late imperial autocratic government.

## 2. The Evolution of Ch'ing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Manchu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ntrol, the Ming civil and military service system was reinstated soon after the Ch'ing dynasty was formed in Peking in 1644. The four-fold division of the selection and evaluation process for officials remained: 1) schools; 2) examinations; 3) recommendation; and 4) appointment (see above). Important changes, especially in the schooling system, were made however. For example, in addition to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system of schools in the capital, prefectures, counties, and townships, special state schools were also established for the eight military banners (composed of Manchus, Mongols, and Chinese military families) as well as a school for the Manchu imperial family [*tsung-hsueh*].

Special examinations for Manchu tribesmen were also established in 1651. Those who did not know classical Chinese were permitted to take the tests in their native language [*Ch'ing-wen*]. During the K'ang-hsi reign, such examinations were formalized into "translation examinations" [*fan-i hsiang-shih*]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whereby Manchus could choose to take examinations in their own language. Such privileges were extended to Mongol tribesmen in 1735.

In addition, the Ch'ing state was concerned that other minorities in an enlarged empire more than double the size of the Ming realm

receive appropriate attention in local educational affairs. For instance, frequent memorials and edicts dealt with the special requirements of the Miao minority in southwest China. In an 1807 memorial, the provincial education commissioner [*hsueh-cheng*] in Hu-nan province, Li Tsug-han (1769-1831), requested that Miao candidates taking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be granted quotas of their own so that they would not have to compete for places with better-prepared Han Chinese. Li was quick to add, however, that local officials would have to be wary of those, notably Han Chinese, who would falsely claim Miao heritage to fill the latter's more easily attained quotas.

Initially, Manchu and Mongol translation examinations were administered in a single session with one question based on documentary style and another chosen from either the Four Books or Five Classics. Later during the Ch'ien-lung reign (1736-95), the requirements were tightened, and Manchus and Mongols were encouraged to take examinations in classical Chinese in an effort to unite civilian and military training. Questions in Chinese based on Sung Neo-Confucianism and philology [*hsiao-hsueh*] were introduced, but most Manchus still did not compete with the Chinese in provincial and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In addition, Chinese who passed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with highest honors and entered the Hanlin Academy [*Han-lin yuan*], where they served as imperial secretaries, were required to learn Manchu. Special essay tests in Manchu and translation questions from classical Chinese to Manchu were administered to Hanlin academicians in the palace to ensure that documents and memorials were accurately recorded in the dual official languages of Chinese and Manchu.

Early Manchu rulers deliberately set lower quotas for local and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in Han Chinese provinces, perceiving in late Ming high quotas the state's loss of control over gentry in local society. More stringent policies in education to regain control of the dynasty's human resources correlated with Manchu efforts in the 1660s to crack down on tax evasion by gentry families in the Yangtze delta

and recover material resources. In addition, because of the large number of Manchus in the central bureaucracy, fewer positions were now available for Han Chinese to hold, although Manchu appointments were less conspicuous in provincial and local administration.

Provincial quotas were somewhat more generous in number during the Shun-chih reign (1644-61) when, for example, Chiang-nan (Anhui and Chiang-su provinces) and the capital region of Shun-t'ien each were permitted over 60 successful candidates to compete in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In the late Ming 100 had been permitted. In 1660, however, provincial quotas were more drastically cut. Although gradually increased during the K'anghsi reign (1662-1722), the numbers remained far below late Ming quotas at a time when population in the empire reached over 150 million after 1700.

As during the Ming, no absolute limits were set on the number of metropolitan graduates permitted. In fact, 400 *chin-shih* were graduated in 1646. Of these, 233 (58%) came from the south; 153 (38%) were from the north; and 14 (4%) of the graduates came from central portions of the empire. These figures roughly corresponded to the 55:35:10 regional ratio worked out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Eventually, a ratio of 60:40, south to north, was worked out, with the quota for the central portions divided up between the south and north.

The number of metropolitan graduates tended to be around 300 names for the triennial examinations, with a range of 110 to 406 for a low in 1789 and high in 1730. Ping-ti Ho has calculated that for the Ch'ing period as a whole there were 239 graduates per examination (down 50 from the Ming) or approximately 100 per anum (up 10 from the Ming). The number of per anum graduates was actually higher than during the Ming because of the frequent use of special examinations [*chih-k'e*] such as the *po-hsueh hung-tz'u* (broad learning and extensive words) special examinations of 1679 and 1736.

Table 3 indicates that the format for provincial and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early Ch'ing remained the same as during the Ming. Similarly, the curriculum for state schools and public examinations continued to emphasize the Four Books, Five Classics, and Dynastic Histories. In addition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ommentaries] for the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 and Great Collec-*

TABLE 3 FORMAT OF PROVINCIAL AND METROPOLITA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THE EARLY CH'ING, 1646-1756.

<i>Session One</i>	<i>No. of Questions</i>
1. Four Books 四書	3 quotations
2. Change 易經	4 quotations
3. Documents 書經	4 quotations
4. Poetry 詩經	4 quotations
5. Annals 春秋	4 quotations
6. Rites 禮記	4 quotations
<i>Session Two</i>	<i>No. of Questions</i>
1. Discourse 論	1 quotation
2. Documentary Style 詔誥表	3 documents
3. Judicial Terms 判語	5 terms
<i>Session Three</i>	<i>No. of Questions</i>
1. Policy Questions 經史事務策	5 issues

*tion of Works on Nature and Principle* used during the Ming, the Ch'ing state also promote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Hsing-li ching-i* (Essential meanings of nature and principle) as a convenient compendium of orthodox Neo-Confucian teachings for use in the examinations.

Essays for the examinations were still required in 8-legged essay form. In the early Ch'ing, a maximum of 550 graphs were required for each of the first session examination essays dealing with the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 The maximum was raised to 650 in 1681 and again raised to 700 graphs in 1778, a number that remained in effect until the end of the dynasty. Models for the essays based on ancient-style prose [*ku-wen*] were collected together under imperial auspices in 1753 by the Sung Learning [*Sung-hsueh*] partisan and T'ung-ch'eng classicist Fang Pao (1668-1749) and entitled *Ch'in-ting*

*ssu-shu wen* (Imperially authorized essays on the Four Books). Again in 1814, officials asked that model examination essays prepared since Fang Pao's collection be issued to the public.

As a result of these increases in maximum essay length, however, the task of grading papers by readers and examiners increased proportionally. Despite a 50% increase of personnel from over 60 examination officials during the Ming to over 90 under the Ch'ing (see Tables 2 & 4), and further requests for added numbers of examiners, their reading load prevented them from paying adequate attention to essays prepared during the second and third sessions. Especially overlooked were the last session's five policy questions. By 1786, regulations had to be enforced requiring a minimum of 300 graphs for each answer to a policy question, indicating that candidates were preparing short replies to the questions. In many cases, the policy questions themselves contained some 500 to 600 graphs, frequently double those in the answer, although in 1735 examiners were asked to curtail their rhetoric.

As in the Ming, examination candidates were expected to master the orthodox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h'eng-Chu school for their essays.

TABLE 4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OFFICIALS IN 1737.

<i>Official Title</i>	<i>No. of Officials</i>
1. Chief Administrator 知貢舉官	1
2. Examiners 考試官	4
3. Associate Examiners 同考試官	18
4. Supervising Inspectors (Left/Right) 督理稽察左翼右翼	8
5. Inner Overseers 內簾監試官	3
6. Inner Precincts Overseers 內場監試官	4
7. Outer Precincts Inspectors 外場巡察官	6
8. Supervisors 提調官	2
9. Seals Officials 印卷官	2
10. Supplies Superintendants 總理供給官	4
11. Deputy Examiners-archivists 內收掌試卷官	2

12. Officials for Collecting Papers 受卷官	4
13. Sealers of Papers 彌封官	4
14. Copyists 謄錄官	4
15. Proof-readers 對讀官	4
16. Entrance Guards 督門官	2
17. Officer Guards 巡綽官	2
18. Proctors 搜檢官	2
19. Couriers (Inner/Outer) 委官 (內外)	6
20. Inner Precincts Suppliers 內簾供事	8
21. Medical Officials 醫官	2
TOTAL	92

Source: *Hui-shih lu* 會試錄 (Record of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1737: 1a-7a, in the No. 1 Historical Archives, Beijing.

Chu Hsi's "Collected Notes" was again required for questions from the Four Books. For the *Change* and *Poetry* Classics, Chu Hsi's commentaries were also chosen, along with Ch'eng I's commentary for the *Change*. On the *Documents*, once again the commentary by Chu's student Ts'ai Shen was required. In the early Ch'ing, the Hu An-kuo commentary was singled out for students specializing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lthough later in the dynasty, when Han Learning [*Han-hsueh*] became popula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Hu commentary was replaced by the three commentaries of the Han dynasties as the proper guide to the *Annals*. Finally, for the *Record of Rites*, Ch'en Hao's "Collected Sayings" remained orthodox.

In 1633, under the Oboi Regents, who as Manchu military men were sceptical of the efficacy of literary qualifications for office, extensive changes in the format of the examinations were introduced. The requirements that all examination essays be prepared in rigorous 8-legged essay form were abruptly rescinded. To devalue literary exercises, questions based on the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 were dropped. In effect, the entire first session of Ming and early-Ch'ing provincial and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which had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determinant in the final rankings of candidates, were jetti-



soned.

To stress practical questions of government policy and concrete themes dealing with state institutions, the regents moved the five policy questions from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examination proceedings to the first. As Table 5 reveals, the second session was shortened and simplified to now include a single discourse essay based on a quotation from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Suspicious of the extent of corruption among Chinese competing in the selection process, the Manchus had already instituted in 1658 a confirmation examination for provincial graduates [*hsiang-shih fu-shih*] to be administered in Peking before the triennial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began. Examination officials in the capital region and the Yangtze delta in particular were singled out for laxness in supervising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TABLE 5 FORMAT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EARLY CH'ING REFORM OF 1663. Rescinded in 1668.

<i>Session One</i>	<i>No. of Questions</i>
1. Policy Questions 經史事務策	5 issues
<i>Session Two</i>	<i>No. of Questions</i>
1. Discourse 論	1 quotation

These innovative and potentially valuable examination reforms produced an uproar among Han Chinese, however. Understandably, many Chinese preparing for the rigorous Ming-style examinations felt that their sacrifices and efforts had been compromised. Moreover, in an era when Ming loyalism was still a potent political and military force in the Yangtze delta, many dissenters could point to these examination reforms as an example of the betrayal of Confucian orthodoxy by ignorant Manchu usurpers. In 1665, Huang Chi (d. 1686), then Vice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Rites that was in charge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called for a return to the rigorous format of the Ming selection process. He contended:

Today, the use of only policy questions and a discourse essay, and the elimination entirely of the first session, appears to have

made the examinations too easy. Moreover, if the Classics and Histories are not required for the essays, people will no longer discuss the teachings of the sages and worthies. Please restore the three sessions [of the examinations] to their old form.

To avoid a potentially damaging clash between Chinese and Manchus, the Oboi regents yielded to Huang's request and after two examinations, the reformed format was ended and the Ming format restored.

After the youthful K'ang-hsi Emperor himself took full control of his reign in the 1680s, further efforts to reform the examination process were made. In 1687, for example, the requirements to prepare state documents in "decree" [*chao*] and "bestowal of titles" [*kao*] forms were dropped. Again, the change was short-lived. Not until 1756, were these changes reintroduced (see Table 6). The discourse essay was also subjected to changes. In 1690, other possible sources besides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were added for students to master for the discourse. The *Essential Meanings of Nature and Principle*, *T'ai-chi t'u shuo* (Theories of the Great Ultimate in diagram form), among other Sung writings could also be sources for quotations requiring discourse essays. In 1718, the *Essential Meanings* was alone designated for discourse essays, and all other sources were dropped. In 1723, however, uproar over dropping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forced the state to reinstate it for the discourse question. Until 1787, the *Hsiao-ching* and *Essential Meanings* were equally stressed.

Although frequent attacks on examination essays increased after 1738, little was accomplished to answer the charges that "contemporary-style essays" [*shih-wen*], as 8-legged essays were called, were "non-innovative" [*wu so fa-ming*] and "impractical" [*ch'üan wu shih-yung*]. Again, there were frequent calls to emphasize the policy questions in session three and increase attention paid to current affairs [*shih-wu*]. As a result, in 1757 extensive changes were made in the provincial and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as Table 6 shows. The Four Books remained on session one, but the Five Classics were moved to the

second session and replaced on the first session by a discourse essay (stressing the *Essential Meanings*). Along with quotations from the Classics, students were also expected to compose during session two a poem in eight-syllabic regulated verse [*pa-yun lü-shih*], indicating revival of interest in T'ang-Sung poetry as a testable measure of

TABLE 6 FORMAT OF PROUINCIAL AND METROPOLITA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MID-CH'ING, 1757-1781.

<i>Session One</i>	<i>No. of Questions</i>
1. Four Books 四書	3 quotations
2. Discourse 論	1 quotation
<i>Session Two</i>	<i>No. of Questions</i>
1. Change 易經	1 quotation
2. Documents 書經	1 quotation
3. Poetry 詩經	1 quotation
4. Annals 春秋	1 quotation
5. Rites 禮記	1 quotation
6. Poetry Question 詩題	1 poetic model
<i>Session Three</i>	<i>No. of Questions</i>
1. Policy Questions 經史事務策	5 issues

cultural attainment. As before, however, the policy questions remained relegated to the last session.

After 1763, candidates were no longer required to includ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ir fathers, grandfathers and great-grandfathers when they registered for examinations. Since the early Ming, candidates had to classify their immediate family as either "official" or "commoner." By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yin* privilege, whereby sons of officials could inherit their student ranking without taking any examinations, had receded in social importance when compared to the Sung and Ming periods. Furthermore, in 1786 for a case dealing with Hang-chou, the state reiterated that education officials should not distinguish between those who came from commoner or merchant families for admission to state schools, solidifying a policy begun in the early Ming when sons of merchants were for the first time enfranchised to take the civil examinations.

Further reforms were initiated in 1782, when the final form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began to take shape (see Table 7). The poetry requirement was moved from session two to the first session, immediately after quotations from the Four Books. The discourse

TABLE 7 FORMAT OF PROVINCIAL AND METROPOLITA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CH'ING, 1782-1901.

<i>Session One</i>	<i>No. of Questions</i>
1. Four Books 四書	3 quotations
2. Poetry Question 詩題	1 poetic model
<i>Session Two</i>	<i>No. of Questions</i>
1. Change 易經	1 quotation
2. Documents 書經	1 quotation
3. Poetry 詩經	1 quotation
4. Annals 春秋	1 quotation
5. Rites 禮記	1 quotation
6. Discourse 論 (removed 1787)	1 quotation
<i>Session Three</i>	<i>No. of Questions</i>
1. Policy Questions 經史事務策	5 issues

essay based on the *Essential Meanings* was moved to the second session, following quotations from each of the Five Classics. Policy questions remained last and least important. After modifications were introduced in 1787, whereby the discourse requirement was removed entirely, the examination format remained unchanged until 1901, when radical reforms were promulgated (see Table 8).

TABLE 8 FORMAT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CH'ING AFTER 1901 REFORM UNTIL 1905 ABOLITION.

<i>Session One</i>	<i>No. of Questions</i>
1. Discours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s 中國政治史事論	5 essays
<i>Session Two</i>	<i>No. of Questions</i>
1. Policy Questions on world politics 各國政治藝學策	5 questions
<i>Session Three</i>	<i>No. of Questions</i>
1. Four Books 四書義	2 essays
2. Five Classics 五經義	1 essay

In addition, the requirement that candidates specialize on one of the Classics for session two was changed. Beginning in 1788, a new selection process was initiated for the required quotations from the Five Classics. Thereafter one quotation for each of the Classics was selected to be elucidated during the second session. In place of four quotations from each Classic, three of which students selected to answer based on their choice of specialization during registration, each Classic would be chosen every three years as the source of the five quotations for the required essays. Degree candidates were expected to study all of the Classics for each of the triennial provincial and metropolian examinations. An 1835 memorial to the Tao-kuang Emperor (r. 1820-50) asking that legal expertise be tested regularly as one of the five policy questions administered during the third session was not enacted, although legal questions did sometimes appear on provincial and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In essence, these successive changes made the actual examinations easier than they had been during the Ming and early Ch'ing periods. China's demographic realities, however, to which the reforms for easing requirements discussed above were directly addressed, meant that as the examinations were made less difficult in terms of content, the actual odds for passing them became more and more prohibitive. Population in the empire had reached 300 million in 1800 and then 450 million in 1850 with no commensurat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government positions available to deal successfully with the increase in graduates. The odds to attain *chü-jen* status on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became over 1500 to 1, and for success on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they soared to 6000 to 1.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0-64),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in many provinces were brought to a halt. Particularly hard hit, because the Taiping rebels made Nanking their capital, Chiang-nan ceased holding examinations in 1859. Candidates from Chiang-su province who could do so were asked to travel to Che-chiang for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while An-hui students took the examinations in liberated areas of the province. The Yangtze delta had dominated imperial examinations since the Ming dynasty, but after the devastation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sons of Chiang-nan families were no longer unchallenged in the national examination competition. Provinces such as Hu-nan in the central Yangtze and Kuang-tung in the southeast increasingly placed their candidates among metropolitan graduates.

During and after the rebellion, examination quotas were drastically increased, recommendation again became an important means to select officials, and the sale of degrees and official positions encouraged by the state to raise funds for military campaigns reached unprecedented levels. Overworked examiners frantically asked for increases in personnel when the increases in 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taking examinations meant that they would have to read double the number of papers than previously. Corruption became endemic. Despite efforts during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74) to rectify the breakdowns in the selection process, the state effectively lost control over its human resources.

By the time the civil service selection process was completely revamped in 1901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hang Chin-tung (1837-1909) and other reformers, who were inundated with Western and Japanese models of 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the changes came too late. Table 8 reveals that the 1901 reforms repeated one of the changes initially carried out in 1663 but then quickly repealed (see above), namely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policy questions for testing. Session one of the new proceedings focused on Chinese political history, while session two required five answers to questions dealing with world politics. The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 were relegated to the last session. Such changes, however, were by now insufficient. Had the reforms of 1663 remained intact, it is interesting to speculate how differently the civil service might have evolved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 中研院近史所學術研討會一覽

(1990年10月~1991年3月)

### 1990年

- 10月13日 張存武：「清同治間處理韓民移俄的政策」  
11月1日 張啟雄：「『獨立外蒙』的國家認同與主權歸屬交涉」  
11月5日 范毅軍：「中國近代對外以及國內埠際貿易，1879~1929  
——一個統計數字的分析」  
11月29日 許雪姬：「臺灣中華會館成立前的臺灣華僑，1895~1927」  
12月8日 呂實強：「胡適對學生運動的態度」  
12月20日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  
12月27日 Prof. Lucien Bianco (法國社會科學學院)：“Two Different Kinds of ‘Food Riots’: Kiangsu, 1910 and 1932.”

### 1991年

- 1月11日 Prof. Frederic E. Wakeman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Model of Historical Change: The Chinese State and Society, 1839-1989.”  
1月17日 翟志成：「大陸易幟前夕大勢暨熊十力的艱難抉擇」  
1月24日 Prof. Benjamin A. Elman(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Cultural Prisons and Symbolic Violence: Civil Examinations and Confucian Educ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月9日 翁佳音：「一個被遺忘的臺灣中部原住民『王國』(1638~1732)」  
3月16日 黃自進：「吉野作造對中國革命的認識與態度的轉變」  
3月28日 李達嘉：「商人與政治——對五四前後上海商界的觀察」



## 學人簡介

# 李 守 孔

林 能 士\*

近一、二十年來，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蔚然成爲風氣，在國內史學界儼然有成爲顯學之趨勢。從近年來國內有關這方面學術討論會的經常舉行，史料的大量刊布，以及論文專著數目的急遽增加，足以說明此一現象。以往，由於受到時代大環境及傳統史學觀念的影響，國內史學界致力於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學者屈指可數。在民國四、五十年代，美國史學界爲了探索中國政局的鉅大變動而興起了一股研究近代中國的熱潮，國內受此影響，部分學者乃轉而投注於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他們可說是國內在這方面研究的開風氣人物。而李守孔教授無疑地是其中研究著作最爲豐碩、指導後進成績斐然的一位著名歷史學者。

李守孔教授於民國十二年八月四日（陰曆六月二十二日）出生於河南省臨汝縣（今已改爲臨州市）。臨汝雖然民風保守，卻是洛陽到南陽、許昌到洛陽的必經要道。李家在當地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家庭，家中略有田產，算是富家，但仍保有中國傳統的儉樸家風。祖父秀才出身，樂善好施，在地方上具有名聲。父親畢業於舊制中學，是一位典型的地方士紳，叔父畢業於河南大學法律系，曾擔任過法官、軍法處處長等職。李教授係家中獨子，幼年時零丁孤立，出生不及一載，慈母過世，父親再娶，遂由祖母一手撫養長大。當時河南一帶盜匪猖獗，李教授幼年時候即曾遭當地土匪綁票，多日才由家中贖回，飽受精神創傷。

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爆發，李教授在這一年畢業於臨汝縣立第一小學，隨後進入當地的河南省立臨汝中學就讀。畢業後，因臨汝中學並無高中部，遂離家遠赴洛陽中學就讀高中。在三年的高中生涯中，李教授開始嶄露頭角，

---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曾擔任過班長，並受到校長的器重。民國三十二年夏天，在敵機轟炸聲中，李教授完成洛陽中學高中部的學業。當時國內著名大學已陸續播遷到西南大後方。此時河南正鬧災荒，因此家人並不贊同遠赴昆明、重慶報考大學，暫時只得呆在家中。卻不料這一年暑假，河南大學竟在臨汝招收新生，也是惟一的一年有大學在臨汝設立考區。李教授乃就近報考，在三千多名考生中，錄取一百二十名，李教授是其中的一位。九月開學後，李教授成爲河南大學文史系歷史組的一位新生。

在抗戰期間，各大學經常隨戰況的轉移而一再播遷，河南大學也不例外。在四年的大學生活中，河大校址就播遷過五次，校長更換了四位，實際上課時間不到兩年。從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入學到第二年五月，算是最安定的一段歲月。三十三年五月起，日軍企圖打通平漢鐵路，發動中原會戰，學校開始不斷遷徙，一直到抗戰勝利後遷回開封。因此，李教授回憶這段大學日子時，認爲大半課業荒廢於烽火播遷途中，既無閱覽典籍的機會，又乏名師的汲引。儘管如此，在那不平凡的時代，日子仍然頗多值得回憶的。在四年中，李教授曾經在豫西陝南的崇山峻嶺間徒步，兜過數千里大圈子；也闖過敵軍封鎖線，回趟淪陷區；親眼看到過敵人的戰車騎兵聯合瘋狂大進攻，也挨過敵機的大轟炸；接觸過抗日游擊隊和英勇的國軍，也和中共的職業學生拼鬥過。

儘管如此，李教授在這期間曾聆聽過哲學大師馮友蘭的講學，並受教於名學者姚從吾教授。姚教授是國際間史學方法和遼金元史的權威學者。他於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接任河大校長，並親自講授文史系歷史組的「歷史方法論」，也帶領過歷史組同學在開封城內外調查過古蹟。

三十六年四月間，也就是李教授畢業前夕，全國各地爆發學潮，河南大學內的中共職業學生也發動罷課遊行。李教授當時擔任校內三民主義青年團幹事，在幹事長的領導下，對中共職業學生展開反制行動，卒使校園恢復平靜。事後李教授與另一位幹事曾到南京總團部報告平息學潮經過，受到陳誠書記長的招待與獎勵，回校後補行參加畢業考試。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李教授從河南大學畢業，當時教育部在南京舉辦第二次僑教師資講習會，姚校長推薦五位優秀學生參加，李教授也在推薦之列。此時國內已動盪不安，而講習完畢後一時也尚未分發，於是經河南大學前校長田培林的介紹，於當年秋天輾轉到臺灣省立彰化中學任教。任教一學期後，得王泳學長的介紹轉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助教。此時大陸戰事逆

轉，傅斯年接長臺大，延攬著名學者日多，歷史系名師尤極一時之盛，河大前校長姚從吾也於此時到臺大任教。

從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到四十四年七月的七年半期間，李教授在臺大歷史系擔任助教。當時系內既無工友、電話，事務又極繁雜，加以系上諸教授又各立門戶，承顏觀色，備極辛酸。起初幾年曾有另尋出路之打算，終因姚前校長從吾的勗勉才打消此意。於是在處理系中行政工作之餘，開始摸索研究工作。最初想研究秦漢史，先後閱讀了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等書，後來又轉向明史。但因乏人指導，全憑本身揣摩，成效終究有限。此時先後完成匈奴史長編、流寇史長編等文，但皆屬練習之作，並未發表。民國四十年寫成「明代白蓮教亂考略」一文，歷經波折，終於在臺大文史哲學報第四期發表，這是李教授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民國四十三年六月，爲了準備講師升等，乃根據當時所能找到的資料，寫成「中國最近四十年史」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但當時校內升遷制度尚不健全，率由系主任或院長決定，因此至第二年才正式升任講師。

民國四十四年八月升任講師後，李教授個人研究方向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之前，國內史學界研究中國近代史者很少。此時大陸陸續出版了一系列近代史資料叢刊，最先是義和團，隨後有辛亥革命、回民起義、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等。當時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崔書琴教授，爲了瞭解敵情，蒐購了一些大陸出版品。李教授於是透過總幹事劉世昌（河大校友）的介紹，得有機會看到這批資料。當時「中國近代史」是大專院校的共同必修科目，李教授在校內講授此一科目，每班人數動輒超過一、兩百人，國內又缺乏適當的教本，遂決心撰寫一部有憑有據的「中國近代史」。原本預計寫二、三十萬字，但完成時則已厚達七百多頁，六十萬字。此書敘事始於十六世紀葡萄牙東航，迄於清朝之滅亡，爲期約四百年，是當時國內注明出處的第一本「中國近代史」教本。

《中國近代史》一書於四十七年九月出版後，李教授原準備以此書作爲副教授升等的著作。但系主任劉崇紘教授則認爲升等著作最好是論文，於是李教授再費一年功夫，將該書最後一章「改革與立憲」擴充爲「清季的立憲運動」一文，約十萬字，發表於幼獅學報，分析清末立憲活動及其影響，至爲詳盡。

民國四十八年八月李教授升任副教授後，專心著述，短短數年之間，完成不少論文。當時他與師大的戴玄之教授時相往返論學，討論研究方向。兩

人咸認有關太平天國的研究名家輩出，而義和團的研究似乎尚乏人間津，同時有關這方面新近刊布的資料也不少，於是兩人決定往此一範圍攜手並進。後來戴教授的研究大抵皆以近代中國的秘密社會與宗教為主，未改其志，而李教授個人則在寫過〈清季山東之教案與拳亂〉後，研究興趣則轉向清末民初革命黨與立憲派的互動關係。當時國內的研究環境並不理想，有關中國近代史的書籍期刊尤其貧乏。適巧原在臺中的中央圖書館此時已搬至臺北，李教授乃就近翻遍該館所藏的清末民初的報刊雜誌，先後寫成〈各省諮議局聯合會與辛亥革命〉、〈光緒戊戌前後革命保皇兩派之關係〉、〈唐才常思想之兩極端〉、〈唐才常與自立軍〉、〈民初之國會與黨爭〉等論文，分別在《大陸雜誌》及《中國現代史叢刊》上發表。也撰成《民初之國會》一書，獲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會資助出版。該書分別就各省代表團時代、南京參議院時代、北京參議院時代、正式國會時代，敘述民初國會之演變及黨派之分合，資料原始，論點中肯。

民國五十四年八月，李教授升任臺大歷史系教授。這一年適逢國父誕辰百年紀念，國內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有編著《國父孫中山先生傳》、《國民革命史》兩書之計畫。前書決定由傅啟學教授執筆，《國民革命史》則邀李教授擔任。規定字數約五十萬，限九月底交稿。由於時間迫促，李教授接此重任後，於授課之餘，日以繼夜，一面搜集史料，一面刪節編寫，窮一人之力，終於如期殺青，而字數較預計則超出甚多。該書秉持國民革命之立場，根據公開之直接史料，敘事力求詳實。書成後，黨政要員人手一冊，總統也親頒獎金八萬元。由是李教授名氣漸開，但也由於日以繼夜趕稿的緣故，正值壯年的李教授也開始配戴起老花眼鏡。

由於撰寫《國民革命史》的緣故，到了民國五十六年間，中國國民黨知識青年黨部主任委員李煥乃邀約李教授負責主編一部《中國近代史》，作為大專院校的教本。李教授遂約同一些知名學者教授，分章撰寫，再由李教授總其成。此書後來交由幼獅書店付梓，出版後廣為各大專院校採用，迄今已發行二十幾版，影響力可見一斑。

約在此前後數年，李教授的個人研究則較偏重於李鴻章的事功。李氏生平事蹟牽涉晚清數十年之內政、外交、軍事、教育，及工商、交通諸端。後人對其褒貶不一。鑒於前人對李鴻章的研究，或是屬於史論性質，未引用原始資料；或是僅係與李鴻章有關史書的個案研究。李教授於是從直接史料下手，先後撰成：〈八國聯軍期間慈禧歸政德宗之交涉〉、〈三國干涉還遼

之交涉》、〈雜談盛宣懷的事功〉、〈光緒己亥建儲與庚子兵燹〉、〈李鴻章襄贊湘軍幕府時代之表現〉、〈常勝軍協剿太平軍之研究〉、〈李鴻章遺摺薦袁世凱繼任直隸總督辦〉、〈李鴻章與同光新政〉、〈李鴻章與甲午戰爭〉等多篇論文。數年後李教授再以中國近代史的發展為脈絡，綴連上述諸文，參證有關資料，於民國六十六年撰成《李鴻章傳》一書，由學生書局出版，態度力求客觀，不作貿然褒貶。

同時，自撰成《國民革命史》一書後，李教授的研究範圍也逐漸往中國現代史發展，特別是在國民革命史的專題研究方面。原來在民國六十年代後，由於影印技術的進步，不少現代史料漸次公開，而國內政治環境也逐步開放，教育部因而於六十二學年度起，將「中國現代史」定為大學院校的共同必修科。在此種情況下，李教授認為中國現代史如同一處未開發的園地，到處是史料，隨時有問題，或隱或現，任憑選擇與蒐集，稍一用心，必有斬獲。因此，數年之間，先後完成〈中華革命黨與護國軍〉、〈民六政潮與南北分裂〉、〈國父護法與廣州軍政府之成立〉、〈段祺瑞與民初之政局〉、〈五卅慘案與國民救國運動〉等論文。

除了埋首研究外，李教授也經常參加國內外的重要學術會議，交換研究心得。而且每次與會，必有論文發表。民國六十六年，參加韓國嶺南大學三十週年國際學術會議，在會中發表公開學術演講。七十年十月，在日本東京舉行辛亥革命七十週年紀念國際學術會議，李教授也是被邀請參加的國內學者之一，並提出〈清季留日陸軍學生與辛亥革命〉論文，受到與會日本學者很高的評價。此外，近十幾年來，國內外有關中國近現代史學術討論會經常舉行，李教授是這些會議的常客，所提出的論文以及會中的發言，都備受矚目。

除了令人刮目的研究成績外，李教授任教臺大歷史系四十餘年，可說是桃李滿門。在講師、副教授期間，擔任外系的共同科目「中國近代史」，往往每班學生有一、二百人，因此臺大畢業生中上過他課的不計其數。民國五十四年升任教授後，開始在歷史研究所授課，並指導研究生從事研究，攻讀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生，率多由他指導完成論文。五十六、七年間，爲了提升近代史的研究風氣，乃協助歷史研究所向教育部爭取經費，在所內成立近代史組以及專門研究室（即所謂第八研究室）。

除了在臺大任教外，李教授也經常被禮聘至他校兼課，包括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輔仁大學歷史系、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政治作戰學校

政治研究所、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等。從民國六十五年至七十年，還兼任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充實該所圖書設備，提高研究水準，使具有規模。同時，他校慕李教授之名而請他擔任論文指導教授的研究生，也不在少數。迄今為止，經李教授指導而完成論文，獲得碩士學位者有一百多位，博士學位者有十餘位。如今他們分別在各大專院校或研究機關，擔負起中國近、現代史教學與研究的薪傳責任。

除研究與教學外，李教授也常應邀到外面演講，結合了歷史與社會。他也長期擔任「心廬」和「青邨」的講座，受訓者皆為國軍中的年輕將領。並且應國史館之邀，審定《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應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之邀，審定《國父年譜》，撰寫《中華民國名人傳》、《中國現代史辭典》各數十篇。從民國六十一年起，李教授以常務理事身份，擔任中國歷史學會總幹事，前後達七年之久。中國歷史學會於民國四十三年在臺北成立，從成立到民國六十一年的一十八間，總共才召開過五次大會，出版過三本「史學集刊」。李教授擔任總幹事後，在經費不充裕的情況下，大會每年定期召開，地點輪流；史學集刊每年如期出版；並經常舉辦學術討論會；打破以往理監事選舉的保障制度，無疑地給該學會帶來了一股朝氣。

李教授於去年（民國七十九年）七月自臺灣大學退休。前年九月曾因造血機能失調住院治療，經一年多的休養，如今又健壯如昔。退休後仍未忘懷學術繼續鑽研，並參加各種學術活動。綜其一生，正如他所說的，「孤苦憤發，始略有所成」。執教臺灣大學後，全心投入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先後完成十多部專書，數十篇學術論文，可謂著作等身。同時，獻身歷史教育四十餘年，提拔後進不遺餘力。此等風範，正是青年學子的最佳榜樣。

---

### 李守孔教授著作目錄

---

#### 一、專書：

1. 中國最近四十年史，臺北，中華書局，民國43年6月，292頁。
2. 中國現代史，臺北，光華出版社，民國47年2月，391頁。
3. 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民國47年9月，755頁。
4. 民初之國會，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民國53年10月，160頁。
5. 國民革命史，臺北，國父誕辰百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民國54年11月，759頁。
6. 中國近代史，臺北，幼獅書店，民國56年10月，505頁。

7. 三民主義對中共內部思想的影響，臺北，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民國59年6月，38頁。
8. 本國歷史（上、下兩冊），臺北，幼獅書店，民國59年8月，上册230頁，下册241頁。
9. 中國現代史，臺北，三民書局，民國62年9月，211頁。
10. 中國現代史答問，臺北，學生書店，民國62年12月，238頁。
11. 民國史二十講（與呂士朋等合撰），臺北，幼獅書店，民國63年3月，390頁。
12. 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民國63年8月，196頁。
13. 八年對日抗戰之眞象，臺北，正中書局，民國66年1月，132頁。
14. 民初之國會（中國現代史料彙編），臺北，正中書局，民國67年1月，308頁。
15. 李鴻章傳，臺北，學生書局，民國67年8月，401頁。
16. 訓政時期的政治（載中華民國政治發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74年12月，891-1064頁。
17. 中國近代史，臺北，幼獅書店，民國77年8月，339頁。

## 二、學術期刊發表之論文：

1. 明代白蓮教亂考略，臺北，臺大文史哲學報第4期，民國41年12月。
2. 馬如龍降清之研究，臺北，大陸雜誌第20卷第1期，民國49年1月，頁14-18。
3. 清季之立憲運動，臺北，幼獅學報第2卷第2期，民國49年4月，頁1-92。
4. 咸豐六年雲南省城減回考實，臺北，大陸雜誌第20卷第6期，民國49年3月，頁10-13。
5. 清季山東之教案與拳亂，臺北，幼獅學報第3卷第2期，民國50年4月，頁1-20。
6.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與辛亥革命，臺北，中國現代史叢刊（第3冊），民國50年8月，頁321-374。
7. 八國聯軍期間慈禧歸政德宗之交涉，臺北，大陸雜誌第23卷第7、8期，民國50年10月，頁11-14, 23-29。
8. 光緒戊戌前後革命保皇兩派之關係，臺北，大陸雜誌第25卷第1、2期，民國51年7月，頁10-15, 20-24。
9. 梁任公與民初之黨爭，臺北，新時代，第3卷第6期，民國52年6月，頁21-26。
10. 唐才常思想之兩極端，臺北，大陸雜誌第28卷第2、3期，民國53年1、2月，頁11-14, 28-32。
11. 三國干涉還遼之交涉，臺北，大陸雜誌第29卷第7、8、9期，民國53年10、11月，頁12-18, 14-22, 23-28。
12. 民初之國會與黨爭，臺北，中國現代史叢刊（第5冊），民國53年11月，頁81-

- 212。
- 13.唐才常與自立軍，臺北，中國現代史叢刊（第6冊），民國53年11月，頁41-159。
  - 14.國父誕生前後中國之變局，臺北，新時代第5卷第11期，民國54年11月，頁17-21。
  - 15.清季河南之革命運動，臺北，中州文化論集，民國56年11月，頁253-265。
  - 16.國父孫中山先生中日兩國合作之主張，臺北，百年來中日關係論文集（張岳軍先生八十壽），民國57年5月，頁63-89。
  - 17.盛宣懷的事功，臺北，傳記文學第14卷第3、4、5期，民國58年3、4、5月，頁13-21, 63-70, 67-75。
  - 18.清季河南之諮議局，臺北，中原文獻第1卷第4期，民國58年6月，頁14-15。
  - 19.清末之諮議局，臺北，史學彙刊第2期，民國58年8月，頁189-216。
  - 20.清季新軍之編練及其演變，臺北，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2期，民國59年4月，頁81-138。
  - 21.光緒己亥建儲與庚子兵變，臺北，故宮文獻第1卷第4期，民國59年9月，頁1-12。
  - 22.李鴻章襄贊湘軍幕府時代之表現，臺北，幼獅學誌第9卷第2期，民國59年12月，頁1-25。
  - 23.常勝軍協剿太平軍之研究，臺北，姚從吾先生紀念論文集，民國64年4月，頁59-79。
  - 24.李鴻章遺摺薦袁世凱繼任直隸總督辨，臺北，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3期，民國60年5月，頁79-86。
  - 25.淮軍平捻之研究，臺北，新時代第11卷第10、11期，民國60年10、11月，頁19-22, 26-30。
  - 26.民初之政黨，臺北，載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民國60年12月。
  - 27.李鴻章與同光新政，臺北，故宮文獻第3卷第1、2期，民國60年12月，61年3月，頁21-33, 39-49。
  - 28.李鴻章與甲午戰爭，臺北，新時代雜誌第12卷第4、5期，民國61年4、5月，頁19-23, 22-27。
  - 29.段祺瑞與辛亥革命，臺北，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6期，民國63年5月，頁277-297。
  - 30.中華革命黨與護國軍，臺北，中華學報第2卷第1期，民國64年1月，頁111-144。
  - 31.總統蔣公領導對日抗戰的全盤戰略，臺北，中國文化復興月刊第8卷第10期，民

國64年10月，頁29-33。

32. 民六政潮與南北分裂，臺北，史學彙刊第7期，民國65年7月，頁63-116。
33. 晚清知識份子與救國運動，臺北，中華學術院史學論集，民國66年1月，頁502-515。
34. 晚清雲南回變始末，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報第1期，民國66年4月，頁99-145。
35. 同盟會時代湖北新軍之革命活動，臺中，東海學報第18卷，民國66年6月，頁40-80。
36. 國父護法與廣州軍政府之成立，臺北，中華學報第4卷第2期，民國66年7月，頁171-202。
37. 晚清之立憲運動，臺北，中國文化復興月刊第11卷第3期，民國67年3月，頁9-16。
38. 段祺瑞與民初政局，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報第2期，民國67年7月，頁15-45。
39. 辛亥革命期間之國際背景，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十週年論文集，民國68年11月，頁257-278。
40. 辛亥革命期間張謇與南北和議，臺中，東海學報第21卷，民國69年6月，頁1-10。
41. 中國近代之文化復興，臺北，文藝復興月刊第122期，民國70年5月，頁14-18。
42. 近七十年來國人對中國近代史之研究，臺北，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13期，民國70年5月，頁397-406。
43.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後清帝退位之交涉，臺北，孫中山與辛亥革命論文集，民國70年10月，頁1489-1518。
44. 民國三十三年日本打通中國大陸作戰之背景，臺北，近代中國第42期，民國73年8月，頁40-50。
45. 中國國民黨改造之意義與價值，臺北，近代中國第43期，民國73年10月，頁29-41。
46. 中國國民革命與韓國早期復國運動關係之研究，臺北，近代中國第44期，民國73年12月，頁174-181。
47. 訓政時期的中國國民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文化創刊號，民國74年4月，頁20-34。
48. 駁斥中共曲解國父思想與辛亥革命本質，臺北，近代中國第48期，民國74年8月，頁136-141。

### 三、學術會議發表之論文：

1. 東亞各民族的一般性與特異性，韓國大丘，韓國嶺南大學三十週年國際學術會議學術會議（刊登嶺南學報），1977年。
2. 辛亥革命之序幕——與中會之創立與首次廣州起義，臺北，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會



議論文集第1冊，民國70年9月。

3. 民國十四年五卅慘案與國民救國運動，臺北，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考古組下冊），頁1393—1429，民國70年10月。
4. 清季留日陸軍學生與辛亥革命，日本橫濱，辛亥革命七十週年紀念研討會論文，1981年。
5. 辛亥革命對韓國革命的影響，韓國漢城，第4屆中韓學術會議論文，1982。
6. 河南與辛亥革命，臺北，辛亥革命討論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2年6月。
7. 北伐前後國民政府外交政策之研究，臺北，民國史早期討論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3年4月。
8. 中國國民黨訓政之實施與憲政之預備，臺北，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會，民國73年5月。
9. 國民政府之國家統一運動（民國十八年至十九年），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討論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3年5月。
10. 抗戰初期中共之輸誠與攘奪政權之陰謀，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4年8月。
11. 中共攘奪抗日戰果之史實——論所謂「平型之役」與「百團大戰」，高雄，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4冊），民國74年11月。
12. 孫中山先生與五四學生愛國運動，臺北，孫中山先生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會議（珠海書院主辦），1985年11月。
13. 青年軍之組織與訓練，臺北，青年軍史研討會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民國75年6月。
14. 蔣中正先生與討袁運動，臺北，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冊。
15. 閩變之研究，香港，中國近六十年來（1926—1986）之憂患與建設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香港珠海書院主辦）1986年10月。
16. 趙聲與清季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民國75年12月。
17. 抗戰期間中央政府之職權與功能，臺北，紀念抗戰建國五十年學術研討會論文，民國76年7月。
18. 南洋華僑與討袁運動，香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學術討論會（香港中文大學、南洋學會主辦），1987年9月。

#### 四、其他：

1. 讀「河南直隸汝州全志」書後，臺北，中原文獻第2卷第7期，民國50年7月。
2. 漫談國士，臺北，中央月刊第4卷第4期，民國60年4月。
3. 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價值和方法，臺北，自由青年第55卷第3期，民國65年3月。
4. 民國六年國父護法中文史料隅錄，臺北，載「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與史學」，民

國64年11月。

5. 蔣總統與現代中國，臺北，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6輯（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民國65年11月。
6. 悼念胡伯玉將軍，臺北，傳記文學第31卷第2期，民國66年8月。
7. 中華民國之肇始——武昌起義，臺北，中央日報，文史版，民國67年10月10日。
8. 蔣公對歷史的深遠影響，臺北，中央日報，民國68年4月5日特刊。
9. 金門古寧頭奏捷三十週年，臺北，傳記文學第35卷第4期，民國68年10月。
10. 近代國內中華民國史之編纂與研究，臺北，中國時報，民國68年10月10日雙十節特刊。
11. 石破天驚——辛亥革命成功的蠡見，臺北，中央日報，文史版，民國69年10月14日。
12. 中國國民黨與臺灣經濟建設，臺北，青年戰士報，民國70年3月29日。
13. 張伯英先生與河南大學，臺北，中央日報第10版，民國70年7月29日。
14. 全民革命的辛亥革命，臺北，青年戰士報，民國70年10月8日。
15. 第二期國民革命與臺灣，臺北，中央日報，民國70年10月25日光復節特刊。
16. 民族覺醒與文化復興，高雄，中山學術講座專輯(-)，民國71年4月12日。
17. 全民抗戰與國民精神總動員，臺北，中央月刊第14卷第9期，民國71年7月。
18. 民國人物傳與民國紀事本末，臺北，傳記文學第41卷第2期，民國71年8月。
19. 左宗棠，臺北，中國歷史人物廣播講座專集（教育部訓育委員會編印），民國71年9月。
20. 何應欽上將著「八年抗戰」讀後感，臺北，臺灣新生報第3版，民國71年9月9日。
21. 蔣公在八年抗戰前勸告日本唾棄軍國主義之箴言，臺北，中國時報，民國71年10月31日蔣公誕辰96週年特刊。
22. 建國七十年來的內憂與外患，臺北，中華民國建國70年建國史專題演講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印），民國72年1月。
23. 辛亥革命的前奏——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岡之役，臺北，自由日報，民國72年3月29日，特刊。
24. 我國行憲的艱辛歷程，高雄，中山學術講座專輯(-)，民國73年5月20日。

---

「學人簡介」欄徵稿：傳略以二、三千字為宜，應包括出生時地、學經歷、學術貢獻等方面，並請附著作目錄。

---

本通訊歡迎世界各地學者，撰文介紹各該地區近代中國史研究情形、出版狀況、會議消息，及傑出學人之貢獻，以廣學術交流。

---

# 溝口雄三

伊東貴之\*撰

張啟雄\*\*譯

溝口雄三先生，1932年誕生於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是日本研究中國思想史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現任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科主任教授。

溝口先生，1958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科。大學時代專攻魯迅、趙樹理等之作品，即近代中國所謂的人民文學。大學畢業後，曾回家鄉名古屋市繼承祖傳家業。不久因興趣所在不同，而且也痛感自身學問之不足，乃就近考入名古屋大學研究部，繼續攻讀學問，進入矢義高教授之門。在入矢教授的指導下，先生之興趣乃得以上溯號稱中國新文學源流的明末，專攻李卓吾(李贄)。因此機緣，先生從此邁入思想史研究的領域。透過李卓吾、戴震等的研究，當時，先生特別關心到近代中國和前近代中國的特質，於是執筆撰寫碩士論文，題為「日本之近代與中國之近代」，並於1967年獲頒名古屋大學研究部人文科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專攻的碩士學位。同年四月，回母校東京大學任中國文學系助手。兩年後獲聘為埼玉大學教養部助教授。1975年升任同校教授。1978年繼西順藏教授之後，轉任一橋大學社會學部教授。1982年東京大學以教授山井湧先生退休之故，乃禮聘先生回母校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科執教鞭，任教授迄今。其間，先生曾以《中國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年)一書，榮獲文學博士學位。

先生在學界甚為活躍，身兼數職。目前則擔任東方學會評議員、《東方學》雜誌編輯委員、日本中國學會評議員、日本中國學會學術專門委員、東大中國學會理事及該學會雜誌《中國——社會と文化》編輯委員。其中東大中國學會乃1985年東大中國哲文學會改組所成的學會。該學會創設之際，先生所扮演的決定性角色，自無庸贅言。該學會自創設以來，一改舊風，不再拘泥於以往的哲學、語學、文學的研究；改為由歷史學、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自然科學等範疇來招募研究者從事研究的作風。其研究地

\* 東京大學中國哲學研究所博士班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域也不再拘限於中國一域，更廣及於東亞全域。再者，會員的資格限制，也不再拘泥於東京大學，此乃其會員之所以能遍及日本全國各大學、各研究機構，甚至進而擴及於海外之東亞研究學人的原因，因之乃能享譽海內外。至於該學會的運營方針，則幾乎全出自先生一人之高瞻遠矚。創會迄今雖逾數載，先生仍然不忘為該學會運營而盡心盡力。

關於學術交流，先生力主和臺灣、大陸、香港、新加坡、美國、加拿大、德國、英國、法國等外國學者，進行廣泛而且深入的研究交流。以1989年為例，先生曾以客座教授的身份應聘於臺灣新竹市的清華大學任教；並因此項機緣，先生更於1990年3月積極推進中日文化交流，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系因此乃能順利與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張永堂所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玉法所長）、同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管東貴所長）簽訂學術交流契約。再因此項機緣，先生又於1990年8月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出席該研究所主辦的國際學術會議——《中國現代化研討會》，並提出〈中國民權思想的特質〉論文一篇（收錄於《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9期），享譽甚高。會議期間，先生並曾與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作更進一步的學術交流。在學術交流之外，先生更獲得了該研究所的深厚友誼。

先生之學問，雖說專精於明清思想史，實際上先生之學問則上溯宋代、下迄清末、近現代，換句話說，宋代至民國之間，先生無一不將之列入自身之研究範疇。尤其是近世中國及前近代中國思想，先生更有廣闊的視野，並且能積極的展開研究。先生的研究，首先建立於對代表戰後日本中國思想史研究的荒木見悟、島田虔次、西順藏等大師之研究作批判性的攝取與繼承，然後再加上自身所專精的東洋史學，特別是社會經濟史學的研究，乃能將自身之學問，從舊有的理氣論、人性論等範疇狹隘純哲學式中國哲學思想的脫胎換骨，進而踏入含有政治、經濟思想的哲學新路，此為先生治學之第一特徵。

其次，自明代以迄清末的思想潮流中，先生因不拘泥於其表象的學派認同，因此乃能不分學派、盡全力去掌握明清思想史的一貫真髓，此為先生治學之第二特徵。

先生曾闡述明末清初之「理」觀，以為此期之「理」觀乃自否定「人欲」走向肯定凡人皆有占有欲、生存欲——直接了當地說，乃經濟性的欲望，經此轉換，「理」方再生。此等「理」觀不失為調和社會欲望均「分」條理的道德主義性格，也不斷更新了它的內在意涵。從某種意義來看，以「天理」的世界觀，社會福祉的「仁」觀，「公」「均」「平」為特徵的「大同」思

想，在本時期的大範疇中是恒久不變的。先生將此種見解印證到近代中國政治時稱，也因為這種傳統，培育出了清末的革命思想，而孫文的民生主義可以說是中國獨特的大同式共和思想，它與稍後的社會主義思想，都是淵源於此種傳統思想的。因此，回顧島田虔次氏所倡，近代中國思想在明末的李卓吾時期即已告「挫折」（《中國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1949年）的說法，或許是因為對清末的革命思想過度共鳴，才會對清朝的體制產生全盤否定的黑暗觀，因而對清代思想史給予不當的過低評價，先生對此既持懷疑，遂加批判。

溝口先生在上述的明清思想史範疇的研究上，主要乃着眼於中國獨特的自生性以及內發性的近代歷程，再加上為此作出準備之前近代中國的特有質地，方有以致之。

先生治學的第三特徵乃先生自身對歐洲政治思想史以及日本思想史（尤其是日本儒學）的深度關懷和高深的造詣所致。這也可以說是基於比較思想史、比較近代化論，甚至於是比較文明論的全球性視野之研究根底所造成的。先生所持有的這種研究根底則是我們所不可忽略的。明治以來，日本學界將歐洲，直截了當地說，乃是將近代西歐的價值觀，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即使在歷史學界或社會科學界，此種觀念仍然根深蒂固，而且此種現象持續至戰後。戰後，日本學界在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領域上，對於戰前所謂的「亞細亞停滯論」認為應加以克服，並找出中國近世史上和歐洲所一樣萌長的個人主義自我和合理主義的精神。此等主張，在先生看來，仍未脫離西歐中心的價值觀，甚至於認為這是以歐洲研究來套用中國研究。對於此點，先生以為這是必須加以批判的。譬如島田虔次氏在《中國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一書中，認為：「個」人從「天理」世界觀的桎梏解放（析出）出來和自立（自律）起來，「天理」和「人欲」進而為「天」和「人」的分裂，這就是近代中國的標誌。對於島田氏此種在近世中國思想史中，將中國思想的展開，視為與歐洲思想展開是同類型的見解，就成為先生的批判對象。再者，如丸山眞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年）和守本順一郎《東洋政治思想史研究》（1967年），將可視為是中國自然法的朱子學體系，比擬為歐洲中世的湯姆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自然法，來加以理解。先生對此種看法，認為是誤解了中國的特殊性格，也都一一加以批判。又如丸山氏，在同書中述及中世自然法思想的解體過程之時，竟採用 F. Borkenau 《從封建的世界像到公民的世界像》（*Der Übergang vom feudalen zum*

*bürgerlichen Weltbild*, 1934) 一書中所謂的從「自然」到「作為」式的觀點，不論是對日本或是對中國邁向近代過程的描述上，先生都認為是不妥當的。

結果，先生主張：亞洲有亞洲的；不，更精確地說，各國有各國，各民族有各民族之獨自的價值標準，而這些價值是在各該國各該民族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所釀成的。再就近代化而言，亞洲的近代化過程，在其前近代期，以其自生性展開者，作為質地的根幹，然後再於其上導入近代歐洲的思想罷了。先生以為，中日兩國大約在同時遭遇到近代歐洲，而且也接受了它。儘管如此，中日兩國的近代化過程卻有顯著的差異。例如，日本是以天皇制中央集權國家為根幹，再加上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式近代化論，又有國權主義式的近代化論。相對的，中國卻先廢掉皇帝，走向地方分權等等。中日兩國在近代的發展上雖有不同，但卻都是紮根於其前近代時期質地上的差異所致。

以下讓我們從溝口先生主要的研究業績來概觀先生的思想。

### 一、專書著作

1. 《中國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年。
2. 《李卓吾——正道を歩む異端》（中國の人と思想⑩），集英社，1985年。
3. 《儒教史》（戶川芳郎、蜂屋邦夫共著《世界宗教史叢書》10），山川出版社，1987年。
4. 《方法としての中國》，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年。
5. 《中國の思想》，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1991年。

### 二、翻譯、校注

1. 《魯迅集》（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第2卷），平凡社，1963年。
2. 李贄《焚書》（入矢義高編《近世隨筆集》所收，中國古典文學大系55），平凡社，1971年。
3. 王陽明《傳習錄》全譯（荒木見悟編《朱子、王陽明》所收，世界の名著續4），中央公論社，1974年。
4. 《佐藤一齋、大鹽中齋》（與相良亨、福永光司共校《日本思想大系》46），岩波書店，1980年。
5. 《中江兆民全集》（與松本三之介、松澤弘揚、松永昌三、井田進也共編）全17卷、別卷1，岩波書店，1983~86年。

### 三、論文（關於明清思想史）

1. 〈《孟子字義疏證》の歴史的考察〉，《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

- 要》48號，1969年3月。
2. 〈明末を生きた李卓吾〉，同上55號，1971年3月。
  3. 〈明末清初思想の屈折と展開〉，《思想》636號，岩波書店，1977年6月。
  4. 〈《明夷待訪錄》の歴史的位位置〉，《一橋論叢》81卷3號，1979年3月。
  5. 〈中國前近代における『理』の機能をめぐって〉，同上83卷4號，1980年4月。

以上諸文經修改後收錄於《中國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一書中。

6. 〈中國、道統、世界〉，《理想》464號，理想社，1972年1月。
7. 〈いわゆる東林派人士の思想——前近代期における中國思想の展開（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75號，1978年3月。
8. 〈中國における公私概念の展開〉，《思想》669號，1980年3月。
9. 〈天人合一における中國的獨自性〉，前掲《佐藤一齋、大鹽中齋》「解説」，岩波書店，1980年5月。
10. 〈無善無惡の思想史的意義〉，《歴史學研究》487號，青木書店，1980年12月。
11. 〈明清期の人性論〉，《佐久間重男退休記念論文集》，燎原書店，1982年3月。

其中，《中國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一書，一如前述，比起歐洲思想來，其主體特質則完全屬於異質性的近代中國思想，先生則將此種思想上的主體特質定位於前近代期的中國思想，並以李卓吾為研究基點，而李卓吾則是摸索創造新「理」觀而苦鬪的思想家。

再經黃宗羲、顏元、李塨、以至戴震，其間「理」的轉變脈絡可見，最後則鳥瞰直至清末共和思想之間的明清思想史，因之得以縱觀此規模宏大的思想傳承，從而開拓了日本之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劃時代新範疇。其中，關於明末清初時期，無論就其政治觀、君主觀、公私觀、人性觀等都有很大的變化，在背景上證實了富民層（地主、商人）在經濟上及社會上的力量，均已增大。這暗示了他們所扮演的角色，恰與歐洲資產階級所扮演的角色，頗有類似之處。

在〈いわゆる東林派人士の思想〉一文中，先生透過了對東林派人士的思想研究，分析明末清初時期政治觀變化的真相。政治結構上，在朝的張

居正等在野的鄉紳地主階層（東林派）的對立，正好說明了所謂國家（朝廷）主導或鄉村（地主）主導的意識形態對立或政治路線對立。於是先生乃將此一時期定位為自一君萬民的專制皇帝制，轉換為以地主為基盤的皇帝制之歷史過渡期。先生並表示後者（以地主為基盤的皇帝制）在清朝政權之下也有相當程度的實現。

在《儒教史》一書上，先生擔當了第六章到第十二章的部分。就思想而言，這也可以說是以上諸研究的集大成。這部分是從北宋道學形成期新儒學的抬頭說起，視野相當廣泛，論述則包含了王安石等、朱子學的成立與體制教學化、陽明學的興起、以及清代新「理」觀的展開、清末共和思想，進而論及現代思想。換句話說，是對上起宋代下迄現代的思想史作通盤性的敘述。此外，也旁及於以封建論和田制論為中心的清代經世論，並就此描繪出清末共和思想、土地公有論、社會主義的土地固有論等的傳承脈絡。

從溝口教授近年的研究業績來看，先生的研究則已不再受限於明清時代的專門領域，先生更企圖廣及於中國思想史全體。對於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特別是中國近代史研究，先生對問題的看法也相當引人注目。

關於前者，先生對「理」、「道」、「天」等中國思想的基本概念重新考察，以更廣濶的視野寫下了一系列的論文，並陸陸續續地連載於岩波書店所發行的《文學》雜誌中。此系列論文如下：

- (1) 〈中國の『理』〉，《文學》第55卷5號，1987年5月。
- (2) 〈中國の『自然』〉，同6號，同年6月。
- (3) 〈中國の『道』〉，同8號，同年8月。
- (4) 〈中國の『天』〉，上、下，同12號，第56卷2號，同年12月，1988年2月。
- (5) 〈中國の『心』〉，同第56卷6號，1988年6月。
- (6) 〈中國の『公、私』〉，上、下，同9、10號，同年9月、10月。

其中，特別是在〈中國の『理』〉和〈中國の『天』〉的論文上，曾對唐宋變革期的天觀轉換，即天譴的天觀到天理（理法）的天觀，以及「天理」世界觀的成立加以析論，並解明了其特質和在明清時期所展開的情況。再者，在此連載的系列論文中為求相輔相成之效，也同時登載了相良亨與田原嗣郎兩氏對與此相關的概念，其在日本所具的思想意含，一一加以詮釋。

關於後者，因為標題較為敏感，所以在學界所引發的反響也較大，〈近代中國像に歪んでいないか〉（《歴史と社會》2號，リプロポート，1983



年5月)、〈「中國の近代」をみる視點〉(UP 1980年10月~1981年1月號,東京大學出版會)、〈近代中國像の再検討〉(《史潮》新19號,1986年7月。原題爲〈ふたたび〈近代中國像〉をめぐって〉)等均屬之,皆收錄於先生所著《方法としての中國》一書之中。透過這些研究,戰後日本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在忙於讚美中國革命之餘,溝口教授對於專從革命角度來立論的近代中國研究加以批判。論其弊害,則以爲基於洋務—變法—革命的三階段論,對洋務運動所給予的評價,不但過小而且不當,而且更進一步對視中國近代爲前近代之延續的觀點,提出批評,稱之爲缺乏把握廣角視野的研究。在同書所收的〈中國における『封建』と近代〉(初出於《文明研究》第7號,1989年3月號,東海大學文明學會)等論文,對於「封建」一語的看法,認爲直至中國清末的認識,與今天所述之歷史區分論或生產關係論上的概念不同。「封建」應是和「郡縣(制)」作對比的制度論概念。再者,先生也論證了由鄉紳地主層所主張的地方自治運動,而此階層所主張的分權公治式君主主義,不久爲清末的共和思想所繼承。先生同時也指出在反帝、反封建的鬭爭過程中,地方自治問題有被漠視的情形。另外,同書所收的〈津田シナ學とこれからの中國學〉(《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次第18、19卷月報,1988年2~3月號,岩波書店)等論文中,也析述了今後中國學所當有的發展狀況。至於溝口教授以近代中國爲對象的其他論文,有如下述:

- (1) 〈ある反『洋務』——劉錫鴻の場合〉,《伊藤漱平退官記念論集》,汲古書院,1986年3月。
- (2) 〈光緒初期の議會論〉,《中國——社會と文化》第1號,東大中國學會,1986年6月。

至於先生與中國文學的關係,本文亦不敢忽略,茲略述如下:

- (1) 〈魯迅〉,《中國文化叢書》第5卷,大修館書店,1968年1月。
  - (2) 〈公安派の道〉,《入矢、小川教授退休記念中國文學語學論文集》,1974年10月。
  - (3) 〈清末における道と文〉,《東洋文化》第61號,1981年3月。
- 再者,以下二篇論文,在比較中日兩國的儒學之餘,更描繪出日本陽明學中形成暗流的日本人特殊心性:
- (1) 〈二つの陽明學〉,《理想》572號,1981年1月。

(2) 〈日本の陽明學をめぐって〉，《現代思想》，青土社，1982年9月。

此外，值得一提的另一本文學作品——《李卓吾——正道を歩む異端》。此書雖屬針對一般民眾的啟蒙書籍，但在介紹李卓吾的為人與思想的同時，先生更共鳴似的追索到視卓吾為「知己」，私淑於卓吾的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陰，本書深刻地描繪出了吉田氏當年的內心層面。

關於先生所發表的中文論文，有上述在臺北出版的〈中國民權思想的特質〉，也有在大陸發表的〈關於無善無惡論思想史的意義〉（《中國哲學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與〈論明末清初時期在思想史上演變的意義〉（《史學評論》，史學評論社，1986年7月；《日本學者論中國哲學史》，中華書局，1986年11月）。

最後，關於先生的新著，則有以先生為中心所編集發行的《思想》第792號（特集《儒教とアジア社會》，岩波書店，1990年6月）中所登載的〈中國儒教の10のアспект〉一文。另外，預定於最近刊行的專著與論文，也有下列四種。

(1) 《中國思想——日本思想との比較から——》，ペリかん社，1991年11月，預定刊行。

(2) 〈中國の民權思想〉，《シリーズ・世界史への問い》第10卷所收，岩波書店，近刊。

另外，關於先生所編纂、監修的預定刊行物，也一併列述如下：

(3) 《アジアを考える》全7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93年預定刊行。

(4) 《碧巖錄》校注，全3卷，岩波書店，1991年～93年預定刊行。

(5) 《朱子語類語彙索引》全3卷，內山書店，1993年預定刊行。

其中，《アジアを考える》系列中，《アジアへの接近》（第1卷），《アジアシステム》（第2卷），《歴史と現在》（第3卷），《社會と國家》（第4卷），《アジアの近代》（第5卷），《社會變動》（第6卷），《歴史における思惟》（第7卷）等全7卷中，先生所網羅的學者有臺灣、香港、韓國、新加坡、美、英等國的研究新秀，和日本目前的亞洲研究精英，先生期盼本書所提出的新見解，將成為二十一世紀亞洲研究的指針。此外，《碧巖錄》校注一書，乃是與入矢義高氏共同主持，本書對唐宋時代的口語語彙所作的正確性解讀作業，對於今後的《碧巖錄》研究，將有不可忽視的貢

獻。《朱子語類語彙索引》一書的編輯工作，由中日兩國共同分擔，口語語彙部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擔任，固有名詞由北京中華書局擔任，至於思想、政治、社會等語彙則由溝口教授所主持的宋明研究會來擔任。由於溝口教授的奔走盡力，此項國際性學術合作事業，對於今後中國研究事業的貢獻，可以預料將成爲今後國際性學術合作的先範。

先生學貫古今，識見深睿，後生魯鈍，於先生之學未能通盤理解，遑論記述，故掛一漏萬之處，自所難免。雖然如此，敢於此略述先生之學問於一二者，蓋欲將先生之學問公諸學界，以饗學術知音。

### 溝口雄三教授著作目錄

#### 一、著書、譯書

- 1.《魯迅集》（共譯），《中國現代文學撰集》第2卷，1963年，平凡社。
- 2.《焚書》（李贄）（抄譯），《中國古典文學大系》55《近世隨筆集》所收，1971年，平凡社。
- 3.《傳習錄》（王陽明）（全譯），《世界の名著》續4《朱子・王陽明集》，1974年，中央公論社。
- 4.《佐藤一齋・大鹽中齋集》（共著），《日本思想大系》46，1980年，岩波書店。
- 5.《中國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1980年，東京大學出版會。
- 6.《李卓吾》，1985年，集英社。
- 7.《儒教史》（共著），1987年，山川出版社。
- 8.《方法としての中國》，1989年，東京大學出版會。
- 9.《中國の思想》，1991年，放送大學出版會。

#### 二、論文（日文）

- 1.「吶喊」ノート(1)，《魯迅研究》31號，1963年6月。
- 2.「一件小事」をめぐって，（「吶喊」，一ト(2)），《魯迅研究》32號，1963年10月。
- 3.「頭髮的故事」をめぐって，（「吶喊」ノート(3)），《魯迅研究》33號，1963年12月。
- 4.中國の魯迅研究と日本の魯迅研究，《魯迅研究》34號，1965年4月。
- 5.魯迅における知識人と民衆（「吶喊」ノート(4)），《魯迅研究》35號，1966年5月。
- 6.知識人のえがく農民像《近代中國の思想と文學》，大安，1967年7月。

7. 魯迅，《中國文化叢書》第5卷，大修館書店，1968年1月。
8. 「明代における個人主義」について，《中國の文化と社會》1—8，1968年6月。
9. 「孟子字義證」の歴史的考察，《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48，1969年3月。
10. 大學における中國語教育のあり方について(1)，《中國の文化と社會》3—8，1969年10月。
11. 同上(2)，同上3—9.10，1969年12月。
12. 同上(3)，同上3—11，1970年2月。
13. 同上(4)，同上3—12，1970年5月。
14. 反宋學の道，「實存主義」54號，1970年12月。
15. 明末を生きた李卓吾，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55，1971年3月。
16. 中國・道統・世界，《理想》464號，理想社，1972年1月。
17. 土着中國に對するての土着日本，《理想》470號，理想社，1972年7月。
18. 中國思想研究上のいくつかの問題，《歴史學研究》400號，青木書店，1973年9月。
19. 公安派の道，《入矢・小川教授退休紀念中國文學語學論集》，1974年10月
20. 中國的理觀とその展開，《東洋倫理想史》，學文社，1977年4月。
21. 明末清初思想の屈折と展開，《思想》636號，岩波書店，1977年6月。
22. いわゆる東林派人士の思想，《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75，1978年3月。
23. 「明夷待訪錄」の歴史的位罫，《一橋論叢》81—3，1979年3月。
24. 明末清初思想研究の當面の課題，《歴史學研究》468號，青木書店，1979年5月。
25. 中國における公私概念の展開，《思想》669號，岩波書店，1980年3月。
26. 中國前近代における「理」の機能をめぐって，《一橋論叢》83—4，1980年4月。
27. 天人合一における中國的獨自性，《佐藤一齋・大鹽中齋集》，岩波書店，1980年5月。
28. 無善無惡の思想史的意義，《歴史學研究》487號，青木書店，1980年12月。
29. 《中國の近代》をみる觀點(一)。UP96號，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年10月。
30. 同上(二)，UP97號，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年11月。
31. 同上(三)，UP98號，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年12月。
32. 同上(四)，UP99號，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年1月。
33. 二つの陽明學，《理想》572號，理想社，1981年1月。

34. 明末における道と文，《東洋文化》61號，1981年3月。
35. 明清期の人性論，《佐久間重雄退休紀念論文集》，燎原，1982年3月。
36. 日本的陽明學をめぐって，《現代思想》，青土社，1982年9月。
37. 中國近代像は歪んでいないか，《歴史と社會》2號，リプロポート，1983年3月。
38. 兆民の漢語語句，《中江兆民全集》月報8，岩波書店，1984年6月。
39. 兆民の漢文世界（上），同上10，岩波書店，1984年9月。
40. 兆民の漢文世界（下），同上12，岩波書店，1985年1月。
41. 認定の方法論と文章・文體論，同上14，岩波書店，1985年5月。
42. 認定の方法論と文章・文體論（續），同上15，岩波書店，1985年8月。
43. 儒教・封建・反君主思想，《國語通信》9，筑摩書房，1985年9月。
44. ある反「洋務」——劉錫鴻の場合——，《伊藤漱平退官紀念論集》，汲古書院，1986年3月。
45. 天下と國家・生民と國民，《歴史學研究》553號，青木書店，1986年4月。
46. 光緒初期の議會論，《中國——社會と文化》1號，東大中國學會，1986年6月。
47. ふたたび「近代中國像」をめぐって，《史潮》新19號，歷史學會，1986年7月。
48. 中國思想の受容について——林羅山を一例に——，《日本の美學》，ぺりかん社，1986年11月。
49. 方法としての中國，UP171號，東京大學出版會，1987年1月。
50. 中國の「理」，《文學》55—5，岩波書店，1987年5月。
51. 中國の「自然」，《文學》55—6，岩波書店，1987年6月。
52. 李贄，《中國思想史》（下），ぺりかん社，1987年7月。
53. 中國の「道」，《文學》55—8，岩波書店，1987年8月。
54. 中國の「天」（上），《文學》55—12，岩波書店，1987年12月。
55. いま儒教ルネッサンスをどう考えるか，《空潭》1，1988年1月。
56. 中國の「天」（下），《文學》56—2，岩波書店，1988年2月。
57. 津田シナ學とこれからの中國學（上），《津田左右吉全集》18卷月報，岩波書店，1988年2月。
58. 津田シナ學とこれからの中國學（下），同上19卷月報，岩波書店，1988年3月。
59. 中國の「心」，《文學》56—6，岩波書店，1988年6月。
60. 中國の「公・私」（上），《文學》56—9，岩波書店，1988年9月。
61. 中國の「公・私」（下），《文學》56—10，岩波書店，1988年10月。
62. ヨロ糸をもたない儒教，《讀賣新聞》10月11日，夕刊文化欄，1988年10月。

63. 儒教とアジア世界（上），《中外日報》11月30日，中外日報社，1988年11月。
64. 儒教とアジア世界（中），《中外日報》12月1日，中外日報社，1988年12月。
65. 儒教とアジア世界（下），《中外日報》12月2日，中外日報社，1988年12月。
66. 思想としての道，東京大學公開講座《道》所收，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年12月。
67. 日本の宋明學研究と中國の宋明學研究，《空潭》2，1988年12月。
68. フランスシナ學と日本漢學と中國哲學，《空潭》3，1989年1月。
69. 儒教資本主義と儒教社會主義，UP195號，東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1月。
70. 中國における「封建」と近代，《文明研究》7號，東海大學文明學會，1989年3月。
71. 《讀四書大全說》口語語彙考，《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所收，汲古書院，1990年3月。
72. 中國儒教の10のアスペクト，《思想》792號，岩波書店，1990年6月。

### 三、論文（中文）

1. 關於無善無惡論思想史的意義，《中國哲學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
2. 論明末清初時期在思想史上的歷史意義，《史學評論》，史學評論社，1986年7月。
3. 論明末清初時期在思想史上演變的意義，《日本學者論中國哲學史》，中華書局，1986年7月。
4. 陽明學與佛教（禪），《世界宗教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88年1月。
5. 儒教與資本主義掛鉤？《當代》34期，合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2月。
6. 儒教・近代和現代，《哲學社會科學動態》94期，山東社會科學院主辦，1990年2月。
7. 日本人為何研究中國，《新史學》第1卷第2期，臺北三民書局，1990年6月。
8. 中國民權思想的特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8月。

### 四、書評

1. 島田虔次《中國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日本讀書新聞》1586號，1971年3月。
2. 荒木見悟《明代思想史》，《週刊讀書人》972號，1973年4月。
3. /社會思想の歩み・そ古典をたずねて/王陽明《傳習錄》，《學生新聞》598號，1975年4月。
4. /一冊の本/津田左右吉《文學に現はれたる國民思想の研究》，《邱其山》6—19，1988年3月。

5. 王家謙《中日儒學の比較》，《週刊文春》1988年7月。
6. 最近の中國學の成果，《週刊讀書人》，1988年8月。
7. 《いま・日本と中國を考える——日中比較文化論》，《神奈川大學評論》7號，1990年2月。

#### 五、監修

1. 《朱子語類》譯注，《汲古》12號，汲古書院，1987年12月。
2. 同上，《汲古》13號，汲古書院，1988年6月。
3. 同上，《汲古》14號，汲古書院，1988年12月。
4. 同上，《汲古》15號，汲古書院，1989年6月。
5. 同上，《汲古》16號，汲古書院，1990年2月。
6. 同上，《汲古》17號，汲古書院，1990年6月。

#### 六、小品文

1. 中國思想史研究(1)，週刊《東洋經濟》3619號，1971年9月。
2. 同上(2)，同上，3620號，1971年9月。
3. 思想史からみた中國(1)，《中國研究》38號，日本中國友好協會出版部，1973年5月。
4. 「公」と「おおやけ」，《中國研究》44號，同上，1973年11月。
5. 思想史からみた(2)，《中國研究》46號，同上，1974年1月。
6. 袁中道のことなど，《中國語》175號，大修館書店，1974年8月。
7. 知なき〔知〕のテーゼ，《日本讀書新聞》1848號，1976年3月。
8. 「研究史上の重要な誤解」について，《歴史學研究》月報196號，1976年4月。
9. 「孤單」の知己——松陰における李卓吾，《日本思想大系》54卷月報61，岩波書店，1978年11月。
10. すすめたい書物，《一橋小平學報》79號，1979年4月。
11. わが著書を語る，《出版ニュース》1189號，出版ニュース社，1980年8月。
12. わたくしにとって読むとは，《價值ある情報》17-12，ダイヤモンド社，1980年11月。
13. であいの功德というもの《價值ある情報》17-13，同上，1980年12月。
14. ヨーロッパの光と影と，《價值ある情報》18-1，同上，1981年1月。
15. 《論語》の勝手讀みのすすめ，《價值ある情報》18-2，同上，1981年2月。
16. 正月有感，《價值ある情報》18-3，同上，1981年3月。
17. 中國近現代思想の研究の現況，《價值ある情報》18-4，同上，1981年4月。
18. 中國の「自然」について，《笹》12月號，1981年12月。
19. 中國の「無」について，《笹》2月號，1982年2月。
20. ある異端・李卓吾という人，《中國の歴史》研究ノート11，平凡社，1982年

10月。

21. 清末の「民権」と「官権」，《中國の歴史》研究ノート12，平凡社，1982年12月。
22. 共和革命思想と儒教，《中國の歴史》研究ノート13，平凡社，1983年2月。
23. 天における「おのづから」と「自然」，講座《日本思想》月報1，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10月。
24. ある「タテマエ」の話，月刊《新時代》27號，1984年5月。
25. この「本」を買いたい，《諸君》16—8，文藝春秋社，1984年8月。
26. 今年私はこれをやりたい——《碧巖錄》改訂作業，《中外日報》1月1日號，1988年1號。
27. 李贄——正統ゆえの異端，《中國思想史》（下）所收，べりかん社，1987年7月。

## 七、翻譯

1. 魯迅「明天」
2. 嚴復《天演論》(1)原文對譯，埼玉大學紀要外國語學文學編12，1987年12月。

## 八 辭典

1. 《哲學辭典》〔宋學・陽明學・理氣說・本然の性・氣質の性など〕，青木書店，1971年12月。
2. 《世界傳記大事典》〔王夫之・王守仁・李贄〕，1978年。
3. 《小學館百科事典》〔顧憲成・東林黨・六諭・六諭衍義〕，小學館，1982年。
4. 《廣辭苑》〔中國儒學の項〕，岩波書店，1983年12月。
5. 《中國思想辭典》〔李贄〕，研文出版，1984年4月。
6. 《中國文學辭典》，小學館，
7. 《朝日百科・世界の歴史》83（17世紀の世界2・人物）〔王船山〕，朝日新聞社，1990年7月。

## 九、座談會

1. 朱子・王陽明をめぐる，《續・世界の名著》4卷附録，中央公論社，1974年6月。
2. 中江兆民の漢學(一)，《中江兆民全集》月報11，岩波書店，1984年11月。
3. 中江兆民の漢學(二)，《中江兆民全集》月報13，岩波書店，1985年3月。
4. 中世におけるイエ，《中世史講座》4卷，學生社，1985年4月。
5. 《異と同の瀕踏み——日本・中國と概念比較》，《文學》55—1，岩波書店，1987年1月。
6. 道と日本人，COMMUNICATION27號，NTT出版，1990年9月。



# 施堅雅 (G. William Skinner)

黎志剛·林榮佳·何永威\*

## (一) 開拓中國區域社會經濟史的研究

施堅雅 (G. William Skinner)，1925 年出生於美國加州屋崙市。1947 年康奈爾大學東亞系學士，1954 年人類學系博士，係中國區域體系理論 (regional systems theory) 的開創者。歷任哥倫比亞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1958-60)，康奈爾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1960-62) 及教授 (1962-65)，史丹福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1965-89)。現任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人類學系教授及比較研究中心研究員。1968 年被選入全美名人榜，1969 年獲得古根海姆基金會的獎金 (Guggenheim Fellow)，1980 年被選為美國科學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會員，1983 年當選亞洲學會會長。學術著作甚豐 (見著作目錄)。他在 1964-65 年發表的《中國鄉村的市集和社會結構》(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一文被視為區域研究的經典作，開創中國史學界對區域史的熱潮。

施堅雅多年來研究的重地，是探討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與變遷。在治學方法上，特別強調中國研究對建立社會學理論的重要性。他先後運用地理學的中地理論 (Central place theory)、人類學對鄉民經濟的分析、以及政治學的發展週期理論等來研究近代中國的市場體系、都市化和社會變遷。他參考早期中國社會學家與人類學者的田野調查。日本學者對鄉村的研究，加上豐富的方志資料，運用量化分析，精心建構鄉村市場與區域經濟的經典理論。他對中國基層社會結構及市集和城市體系的研究，在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方面產生深遠的影響，引起廣泛討論。本文分別就施氏對華僑社區研究、

---

\* 作者依序為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歷史學博士候選人、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歷史學博士研究生，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

\*\* 本文撰寫時，曾得到施堅雅教授提供很多意見和資料，謹此致謝！第二節譯稿由韓子奇先生 (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 翻譯，謹此致謝！

農村市集、巨區理論及其對中共社會的研究作一簡要介紹。

## (二) 華僑社區研究

在施氏芸芸著作中，除對中國本土研究之外，還包括對東南亞華人的研究。施氏之參與東南亞華人研究，開始時是出於偶然。自大學本科一直至研究所他都矢志研究中國。他於 1949 年千里迢迢到成都作實地田野研究。由於政權的改變，施氏被迫於 1950 年 8 月離開大陸到東南亞去，為康奈爾大學組建東南亞研究課程。從那年開始，他便穿梭於泰國和印尼之間，親聞目視五十年代東南亞華人，因殖民地制度的崩潰、排華情緒的高漲的種種變動。

施氏最早面世的東南亞華人研究作品，是兩部研究泰國華人的專書：《泰國的華人社會：歷史分析》(*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1957) 和《泰國華僑社會的領導和權力》(*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 (1958)。在《泰國華僑社會》一書裏，他細膩地描繪出泰華自十四世紀以來，世世代代與暹羅社會（尤其是暹羅皇室）溶為一體的過程。在施氏筆下，泰華在暹羅社會的各個領域上都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既是暹羅作為中國藩邦的具體明證，也是暹羅皇室的主要官僚成員之一。他們一方面從中國引進貨品，豐富暹羅的經濟生活，另一方面就地取材，生產外銷暹羅特產。他們不單通過不同行業（例如演員、醫生、修路工、收稅員）與暹羅各階層打成一片，他們甚至廣泛地與當地人通婚，把自己變為道道地地的暹羅人。施氏就以這源遠流長的泰華溶進暹羅社會為標準，評論現代泰國對泰華施行的種種偏激政策。

《泰國華僑社會》一書的可貴處，在於施氏把泰華成功溶進暹羅社會的漫長過程，栩栩如生地展現人前，令讀要一方面看到整個過程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另一方面在千差萬別、縱橫交錯的事例中找到連貫的脈絡。

在《泰國華僑社會的領導和權力》一書裏，施氏以曼谷為中心，集中討論當前泰華團體的組織結構。他從語系、行業、社區組織三方面，把泰華獨特的組織結構絲絲入扣地描繪出來。通過大量的泰華領袖的生平比較，他把泰華領袖在泰國社會裏所扮演的中間斡旋人角色，淋漓盡緻地表露出來。不過，在書末，他對泰華領袖的中間人角色曾表示不樂觀的態度。他認為，現存的泰華組織已不可能容許泰華領袖有效地反映華人團體的利益和願望。他

這種看法維持了一段時間，一直至六十年代才改為比較樂觀看待泰華領袖的社會功能。

綜觀施堅雅論泰華的兩部專書，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他日後用於研究中國的區域理論 (Regional Systems) 早已在泰華研究裏孕育出來。他那種從千頭萬緒、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網絡之中，去展現宏大深奧的人類學系統的手法，也早在他的泰華研究裏表露無遺。在論泰華的兩本專著裏，他並不採用含蓋面廣但內容模糊的概念 (諸如文化、種族、國界、氣候地區)，把活生生的、渾然無間的人的活動分肢割裂。反過來，他從具體事例出發，正視人類活動的複雜性、渾然性、和有機性，腳踏實地建構他認為富說服力的人類學理論。

1956 年至 58 年間，施氏曾到雅加達去研究印尼華人情況。當時，他的研究重點是華人如何溶入當地社會。於 1961 年，他把自己研究印尼華人的成果與他較早時研究泰華的成果作深入比較，寫成名頌一時的 “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Chinese Culture Overseas: A Comparison of Thailand Java” 一文。他打破多年來廣泛流行的華人不能被同化的理論。為了證明華人是可被同化，他比較泰華和爪哇華人的異同，指出爪哇華人之所以不能像泰華般順利溶入當地社會，是因為爪哇於十八世紀以後淪為荷蘭人的殖民地，社會結構被改變為等級森嚴、以荷蘭人為中心、以種族為分界線的模式。為了適應殖民地社會，爪哇華人不得不從以往向印尼人同化的方向，轉移往向荷蘭人同化的方向，把自己改變為荷蘭統治者，歐亞混血兒和印尼本土人三者之間的中間團體。恰恰是爪哇華人被夾在三種種族之間，他們之中就出現了一類名為 Peranakan 的「文化混集華人」(creolized Chinese) 他們的特色是融合二至三種文化特徵，獨立游弋於不同種族羣體之間。

施氏的東南亞華人研究到 1966 年更往前推深一步。那年，他撰寫一文，比較印尼 Peranakans、菲律賓 Mestizos 和馬來亞 Babas 三類「文化混集華人」。他徵引不少泰國、寮國、緬甸和越南的華人事蹟，從比較中突出三類「文化混集華人」的特色。文章的主旨，是指出東南亞華人在不同地域的同化程度雖各有差異，但這些差異並不是來自華人的孤芳自賞，而是來自各地域在吸納外來人上都有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反應。

綜觀施氏對東南亞華人的研究，具有三個特色：(1)精確掌握研究主題，(2)充滿原創性的理論分析，(3)完備紮實的資料例證。這三種特色，他後來都全用於研究中國本土之上。施氏眼中的中國，是一個異常複雜又到處生機勃

勃的社會組織。故此，不論是東南亞華人也好，在中國本土上的華人也好，他們都同具備著強大的流動性。二者的流動性，不止於地理上的流動，還包括社會性的、政治性的和種族性的流動。即是說，同一語系、同一地源、同一種族的人，怎樣到別的語系地區，與別的種族共住共活，最後產生的文化交流和異族交融。而恰恰是在這種千變萬化，連綿不絕的交流融合之中，我們才可以真正了解東南亞華人和中國本土上華人的特質。

### (三) 農村市集的結構

施堅雅對鄉村市場體系的研究，是討論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經典著作。他以中國鄉村的定期集市為立足點，根據中地(Central places)理論，討論鄉村社會的貿易活動與市場網絡。從鄉村的墟市(小市集、Standard market town)、推衍至大市集(intermediate market town)，及鄰近的市鎮(central market town)、市場體系構成一個層級性的經濟連續體。<sup>5</sup>小市集屬農民出售及購買鄉村日用品的市場，亦為聚集土特產以供應外地市場的起點，可算是農村家庭消費與商品經濟網絡中最基本的環節。大市集是集散商品中起居間及轉手作用的墟市，商人一方面聚集本地的農產品和手工業品運往鄰近市鎮，也將外地中心市場運來的貨物轉售給當地農民。市鎮通常處於交通運輸便捷的地區，負責零售外來各地的日用品，也是收集本地產品運往外地市場的終點。此外，不同中地市集的墟期長短與空間分佈，受供求需要、自然地理及運輸條件等因素所制約。不同中地市集的墟期通常避免重複，而同級中地的集市則可以墟期一致。施氏認為平均十八個自然村圍繞一個墟市(小市集)，六個墟市圍繞一個大市集，六個大市集團繞一個市鎮，形成一六角型的空間分佈模式。施氏的鄉村市場理論，對集市的空間結構，提供系統的說明。

施氏研究鄉村市場的主要貢獻，是修正過份強調以縣城等行政單位討論社會結構的偏弊，指出定期集市在社區組織中的核心作用。他發揮 Von Thünen 的核心邊陲學說及 Christaller 的中心地空間模型，根據中國的地形山脈及河道交通等條件，揭示各級中地空間經濟與文化活動的差異。集市不單是商業活動的空間經濟體系，更是地方社區的社會文化體系。施氏反對以鄉村作為地方社區的基本單位，指出定期集市才是農民、商人與士紳活動的中心。在各級中地的定期市集內，媒人在介紹婚姻、商賈在洽談生意、士

紳在談學論道。而茶館食肆、江湖賣藝、迎神賽會等等，更是墟市的主要娛樂活動，因此市場體系不但促進農民、商人及士紳的相互接觸，更成為鄉民小傳統文化的主要單位。施氏有力地反駁鄉村社會是一個封閉的體系，指出中地市場擴濶了農民文化視野。

施氏於 1977 年進一步發揮中地理論，完成市鎮的擴張性市場體系的論說（詳後）。他補充自己早期對鄉村市場的看法，承認宗族聯盟、水利會、治安隊及祭祀圈等社區組織，是處於鄉村與市集中介的重要單位。一些學者試圖修正施氏對集市社區文化研究的假設，例如 Lawrence Crissman 及陳其南批評施氏高估鄉民經濟的理性行爲，Arthur Wolf 批評施氏低估農民文化的差異，黃宗智反對定期集市是華北農村社區的重心，Steven Sangren 指出社區祭祀並不一定在集市進行，Prasentit Quara 認為華市農村的通婚範圍及社區團體均不限於定期集市等。施氏的市集結構論雖非金科玉律，但中美學者對地方社區發展的研究，卻鮮有不受其理論的影響。

#### （四）巨區理論與研究工具書的編撰

區域理論是分析中國基層社會的一個時空概念。這一理論的特色是以人文及自然地理特徵所劃分的「功能區域」(functional regions) 來代替以政治行政系統劃分的一元性區域 (uniform regions)。這區域理論有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省區作為區域現代化研究的單元。

施氏認為中國基層社會結構有兩種不同的中心地區。一種是以各級官僚衙門系統組成的政治中心。亦即遍佈全國各地的各級地方行政系統。另一種則是反映中國社會「自然結構」的市場及貿易系統。後者是施氏對中國基層社會的各種非政治活動及經濟網絡的獨特之見。依據「中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 中對市場、腹地、交通、資源分配及自然地理特徵等功能分析，施氏創立了他的巨區理論。

施氏採用地理學上的中地理論，以各地商業和其他人文活動中的從屬關係來區別各地域為核心地區 (core) 或邊緣地區 (periphery)。施氏依據他在四十年代末期在四川所作的田野調查及中心地及區域系統的模式，把十九世紀末葉的中國市場結構分為墟市 (小市集)、大市集、市鎮、地方城市 (local city)、地區城市 (greater city)、區域城市 (regional city)、都會 (regional metropolis) 和中央大都會 (central metropolis) 等八個金字塔

式的市場層級。在《中華帝國後期的城市》(*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77 年版) 一書中，他以 1893 年為例，計算出中國一共有三萬九千多個不同類型的經濟中心（見表一）。最近，施氏重新修正過去的估計，他認為在 1893 年中國大約有 35,000 個不同類型的經濟中心，他估計當時中國城市人口為全國人口百分之六。

表一：一八九三年中國的各級中心地區

各級的經濟中心地區	中 心				平均各中心城鎮的人口	
	數 量	百分比	邊 緣	總 數	中 心	邊 緣
中央大都會 central metropolis	6	100%		6	667,000	
都會 regional metropolis	18	90.0	2	20	217,000	80,000
區域城市 regional city	38	60.3	25	63	73,500	39,400
地區城市 greater city	108	54.0	92	200	25,500	17,200
地方城市 local city	360	53.8	309	669	7,800	5,800
市場鎮 central market town	1,163	50.2	1,156	2,319	2,330	1,800
大市集 intermediate market town	3,905	48.7	4,106	8,011	690	450
小市集 standard market town	13,242	47.8	14,470	27,712	210	100
總 計	18,840	48.3%	20,160	39,000		

資料來源：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287.

施氏依據通航水道和山脈地形，把清代十八個行省劃分成滿洲、華北、西北、長江上游、長江中游、贛長江、長江下游、東南沿海、嶺南及雲貴等

十大巨區。每一個巨區均有一中心城市作為整個區域的核心，例如東北（滿洲）的瀋陽、長江中游的武漢、嶺南地區的廣州及西北的西安等。由於自然地理的障礙及高昂運費，區域與區域間的經濟活動受到極大限制，因此施氏認為各巨區具有獨立性。各巨區間的人文經濟活動亦有不同的特點。他建議學者應以巨區作為分析中國歷史發展的單元。這一理論的貢獻是把中國基層社會作出一個較清楚的空間模型，使學者能區分政治中心和商業系統間網絡之關係。

施氏非常重視工具書對了解中國區域社會的關鍵作用。從1963年開始，他花費十年時間，主編《近代中國社會研究、文獻解題索引》(*Modern Chinese Society: An Analytical Bibliography*)。這是第一套大規模使用電腦把中國文獻編成索引的著作，分西文、中文及日文三冊書目，收錄自1644年至1972年研究中國社會的論著。全書三冊的解題類目由九十八個內容標碼所組成，分有歷史、地理、地方、編著者姓名、編著者機關名稱及綜合等六種索引。在每個內容標碼下，每條資料在排列方面採用主題和時代分類法，另外加上地理分佈、地區歸類、資料來源及圖書館標記等方法，介紹提出的資料。這套精心鉅製的書目類編，特別重視區域分佈對中國社會研究的重要性，也隱含了施氏其後發揮巨區理論的雛型。由於這套書目分類方法精密完備，對學者思考研究題目及搜集文獻幫助極大。總括而言，《近代中國社會研究、文獻解題索引》使用一種全新的編目方法，豐富的內容標碼開拓中國社會研究的領域，而細緻的索引更使檢索資料非常方便。

### (五) 區域理論在中國史上的應用

施氏認為任何有系統的事物都有各式各樣的時間週期。因此，他特別強調時間週期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重要性。他分析中國歷史發展時，特別強調自然環境在區域經濟變動上的影響。因此他認為中國史的研究不應以整個中華帝國、省區或府縣作為研究單位，而應以自然地理特徵所劃分的「巨區」和該等區域的發展「週期」來分析中國歷史。這理論引發了美國的中國史學界近二十年來對區域研究的熱潮。

施氏反對用朝代興衰的週期模式來分析中國歷史變動的趨勢。他認為朝代興亡固然對各區域的發展有一定影響，但由於各區域之間有不同的地理因素、天氣變動及獨特的社會政治背景，中央政令對各區域總有輕重之分；因

而同一政策亦會帶給各巨區有不同的影響。施氏強調各巨區發展在時間週期上很少有相類的地方。

在分析巨區發展週期時，施氏強調中心大都會對整個巨區興衰週期的影響。施氏以華北及東南沿海等巨區做例子。華北巨區的發展週期在第八和十三世紀的演化最為顯著。這時期的華北巨區以開封為中心。開封在十一世紀末人口達到一百萬，但由於外族侵擾，開封城於十二世紀早期開始衰落，到十三世紀達到最低點。依據施氏的分析，開封的興衰基本上只是一區域性的現象，並沒有帶來全國性的震動，由於地理和交通上的限制，開封及其附近的工業產品很少能銷售到華北以外的地區。華北的繁榮，只有鄰近的三個巨區受惠，而這三個巨區的時間發展週期亦有差異。明清時期，華北地區有過二次以北京為中心的發展週期。第一次發生在十五世紀中葉，而以明清之際（1580-1660）一連串的瘟疫、叛亂和外族入侵作結。第二次始於太平天國和捻亂，終於以後幾場的災難。這二次週期都帶來人口劇變，但對鄰近巨區的影響並不顯著。

東南沿海的週期跟華北有很顯著的差別。當開封在第八世紀時已成爲華北的中央大都會，大部分東南沿海地方仍在墾荒階段，到了宋初東南地區已形成三大經濟重心，先是漳泉區，繼有甌靈區。到十一世紀時，已有長距離的國內外茶葉市場，造船業的興旺也促使不少沿海城鎮發展成商業重鎮。到十四世紀後，中國政府的海禁政策引起該地區的蕭條。但到十六世紀初期，福建商人與葡萄牙，日本及西班牙商人間的貿易有蓬勃的發展，漳泉地區也因而興旺起來。到明清之際，由於朝廷的海禁政策，該區經濟亦衰退下來。

此外，其他巨區的例子很多，例如 1757 年廣州成爲獨口通商口岸，亦影響到嶺南巨區的發展。晚清最大的一次大災亂，太平天國事件，主要發生在長江下游，只對長江中游及贛長江等巨區產生比較大的影響。

施氏也注意到各區域間的社會流動策略的差異。有些地區師爺盛出，有些偏遠地區的居民以從事太監、軍人及妓女作爲社會流動的手段，這有別於中心地區居民從事仕途及商業活動的途徑。施氏本身亦應用這理論，從事長江上游地區市場形態及人口的分析。他指出用巨區週期分析中國歷史的發展，要遠比目前史學界採用的朝代興替的分析，要深刻得多。



## (六) 對中共政治社會的分析

施堅雅根據中國發展週期的理論，進一步分析 1949 年以後中共的統治政策。在他與 Edwin Winckler 合作的文章中，借用政治學家 Etzioni 的理論，指出中共的統治權力與人民的政治參與均有不同的循環週期，經歷由正常至高潮，由高潮至降溫，再回復到正常的發展週期。在毛澤東掌權期間，諸如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等事件，在決策權力目標與人民依賴型態的循環性方面，反映中共統治的激進、危機及自由化等不同的發展週期。他們的研究指出毛澤東時代的統治政策一共經歷了十一個週期，這是一兼顧歷史演變和政策模式的理論。

但施氏對當代史研究的貢獻，以探討現代化與反現代化對傳統市場體系的衝擊為主。施氏早期的研究指出許多地區的市場體系在現代化來臨前已達成熟階段。他對中共妄圖把自然的空間經濟結構納入政治行政架構的錯誤，尤有透關的分析。他認為中共早期強制鄉村市場具有一致的墟期，完全破壞了各級中地形態下的經濟依賴關係，使集市系統的運作陷於癱瘓狀態。在現代化交通並未普及的情況下，破壞傳統的市場體系，只會影響鄉村商品的分配，降低農民的生活水平。直至八十年代，中共始恢復金字塔式的集市經濟結構，促進各級中地鄉鎮的商品流通，改善交通設施，使鄉村市場從定期集市逐漸向自由市場過渡，幫助農村現代化的推行。

## (七) 結語

自《中華帝國後期的城市》一書出版後，施堅雅近期的研究興趣集中在家庭制度，歷史人口學與比較史學等方面。他通過運用大陸 1982 年人口普查的量化資料，重新檢討長江上游巨區的家庭結構對區域人口與經濟的影響。他詳細論證長江上游巨區的識字率及嬰兒夭折率，顯示核心地區的識字率較邊陲地區為高，而其殺嬰的比率卻比邊陲地區為低。最近施氏對中共八十年代人口的研究，亦顯出核心與邊陲的區域體系至今仍然適用。此外，他更從事比較中國、日本與法國等巨區結構的大規模研究。近年來他三訪日本，考察德川時期日本的生育率控制對區域發展的影響，並正在開始對十九世紀初期法國的區域研究，不久將有論著面世。

總括而言，施氏的區域體系理論，對近代中國社會勾劃出一個清楚的輪廓。他多年來鍥而不捨地發揮鄉村市場與巨區結構的論說，探討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開拓了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典範；而他嚴謹的治學方法，亦值得治史者所效法。

## PUBLICATIONS

### Books and Monographs

- Report on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thaca: Cornell U., Southeast Asia Program, 1951. 91p. (Data papers 1).
- (General editor)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ailand*. Bangkok: Cornell Research Center, 1956. 185+125p. (in Thai and English)
-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 Press, 1957. xvii+459p. (Japanese edition: Bangkok Jap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1973, 365p.)
-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 Ithaca: Cornell U. Press, 1948. xvii+363p. (Monograph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III) (Japanese edition: Tokyo: Ajia Keizai Kenkyujo, 1961. 417p.) (Reprinted 1979 by Universities Microfilm International.)
- (Editor) *Local, ethnic, and national loyalties in village Indonesia: A symposium*. New Haven: Yale U.,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59. 68p.
- (Editor)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n analytical bibliography*, Vol. 1, *Publications in Western languages, 1644-1972*. Stanford: Stanford U. Press, 1973. lxxviii+802p.
- (Editor, with Winston Hsieh)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n analytical bibliography*, Vol. 2, *Publications in Chinese, 1644-1969*. Stanford: Stanford U. Press, 1973. lxxci+802p.
- (Editor, with Shigeaki Tomita)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n analytical bibliography*, Vol. 3, *Publications in Japanese, 1644-1971*. Stanford: Stanford U. Press, 1973. lxxix+531p.
- (Editor, with Mark Elvin)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Stanford U. Press, 1974. xiii+458p.
- (Editor, with A. Thomas Kirsch) *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Thai society: Essays in honor of Lauriston Sharp*. Ithaca: Cornell U. Press, 1975. 386p.
- (Edito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 Press, 1977. xvii+820p.

(Editor)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 Stanford: Stanford U. Press, 1979. xxiv+491p.

### Articles and Book Chapters

- "Aftermath of Communist liberation in the Chengtu Plain," *Pacific Affairs* 24, 1 (Mar. 1951): 61-76.
- "The new sociology of China,"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 4 (Aug. 1951): 365-71.
- "Peasant organization in rural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77 (Sept. 1951): 89-100.
- "A study in miniature of Chinese population," *Population Studies* 5, 2 (Nov. 1951): 91-103. (Reprinted in *Social demography*, edited by Thomas R. Ford and Gordon F. De Jong.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0, 642-56.)
- "Cultural values, social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growth," *Population Bulletin of the United Nations* 5 (July 1956): 5-12.
- "The unit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ailand*. Bangkok: Cornell Research Center, 1956, 3-6. (In Thai and English)
- "Chinese assimilation and Thai politic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6, 2 (Feb. 1957): 237-50. (Reprinted in *Southeast Asia: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edited by John T. McAlister, J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383-98.)
- "The Chinese of Java," In *Colloquium on overseas Chinese*, edited by Morton H. Fried.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58, 1-10.
-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the Social Science* 321 (Jan. 1959): 136-47.
- "The nature of loyalties in rural Indonesia," In *Local, ethnic and national loyalties in village Indonesia: A symposium*. New Haven: Yale U.,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59, 1-11. (Reprinted in *Social change: The colonial situation*, edited by Immanuel M. Wallerstein. New York: Wiley, 1966, 265-77.)
- 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Chinese culture overseas: A comparison of Thailand and Java,"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16 (1960): 86-100. (Reprinted in *Readings in South-east Asian anthropology*, edited by Donald J. Tugby. Brisbane: U. of Queensland Press, 1967. Reprinted in *Southeast Asia: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edited by John T. McAlister, J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399-415.)
- "Java's Chinese minority: Continuity and chang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 3 (May 1961): 353-62.
- "The Chinese minority," In *Indonesia*, edited by Ruth T. McVey. New Haven: HRAF Press, 1963, 97-117. (Indonesian translation: Golongan minoritas Tionghoa. In *Golongan etnis Tionghoa di Indonesia*, edited by Mely G. Tan. Jakarta:

- Penerbit PT Gramedia, 1979, 1-29.)
- "What the study of China can do for 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 4 (Aug. 1964): 517-22. [Chinese translation in *Ta-hsueh-sheng-huo* (Hong Kong) 6 (1966): 8-13.]
- "The Thailand Chinese: Assimilation in a changing society," *Asia* 2 (Autumn 1964): 80-92.
-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s I, II, and II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1 (Nov. 1964): 3-44; 24, 2 (Feb. 1965): 195-228; 24, 3 (May 1965): 363-99. (Part I reprinted in *Peasant society: A reader*, edited by Jack M. Potter et al. Boston: Little, Brown, 1967, 63-93; and in *Man, space and environment: Concepts in contemporary human geography*, edited by Paul Ward English and Robert C. Mayfield. New York: Oxford U. press, 1972, 561-601. Parts I, II, and III separately reprinted in Bobbs Merrill reprint series. Reissued 1974, 1977, and 1981 as a pamphlet by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Japanese edition: Kyoto: Horitse Bunka Sha, 1979. 222p.)
- "Communication (on marketing systems in Communist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5, 2 (Feb. 1966): 319-24.
- Overseas Chinese leadership: Paradigm for a paradox," In *Leadership and authority*, edited by Gehan Wijeyewardene. Singapore: U. of Malaya Press, 1968, 191-207.
- (with Edwin A. Winckler) "Compliance succession in rural Communist China: A cyclical theory," In *A sociological reader on complex organization*, 2d ed., edited by Amitai Etzioni.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9, 410-38.
- "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 An open and shut cas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3, 3 (July 1971): 270-81.
- (with Arthur P. Wolf) "Maurice Freedman (1920-75) [obituary]," *China Quarterly* 63 (Sept. 1975): i-iii.
- "Maurice Freedman, 1920-1975 and Bibliography of Maurice Freedm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8, 4 (Dec. 1976): 871-85.
- "Mobility strateg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regional-systems analysis," In *Regional analysis, Vol. 1. Economic systems*, edited by Carol A. Smi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327-64.
- "Urban development in imperial China [Part One introduction],"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Stanford U. Press, 1977, 3-31.
- "Urban and rural in Chinese society [Part Two introduction],"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 press, 1977, 253-73.
- "Urban social structure in Ch'ing China [Part Three introduction]," In *The city in*

-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 Press, 1977, 521-53.
-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 Press, 1977, 211-49.
- "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 Press, 275-364. (Reprinted in *Studies in Chinese society*, edited by Arthur P. Wolf. Stanford: Stanford U. Press, 1978, 1-77.)
- "Vegetable supply and marketing in Chinese cities," *China Quarterly* 76 (Dec. 1978): 733-93.
- "Introduction,"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 Stanford: Stanford U. Press, 1979, xi-xxiv.
- "Vegetable supply and marketing in Chinese cities," In *Vegetable farming systems in China*, edited by Donald L. Plucknett and Halsey L. Beemer, Jr.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1, 215-80.
-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Song to 1900*, edited by Albert Feuerwerker.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2, 11-16.
- "Asian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Asian Studies Newsletter* 19, 4 (Apr. 1984).
- "Rural marketing in China: Revival and reappraisal," In *Markets and Marketing: Proceedings of the 1984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Economic Anthropology*, edited by Stuart Plattner.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7-47.
-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J. of Asian Studies* 44, 2 (Feb. 1985): 271-92.
- "Rural marketing in China: Repression and revival," *China Quarterly* 102 (Sept. 1985): 393-413.
- "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a," *Late Imperial China* 8, 1 (June 1987): 1-79.
- "Conjugal power in Tokugawa Japanese familie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In *Sex and gender hierarchies*, edited by Barbara D. Miller. Chicago: U. of Chicago Press, forthcoming.

### Book Reviews

-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by Victor Purcell. *Far Eastern Quarterly* 11, 2 (Feb. 1952): 268-70.
- Ting hsien: 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 by Sidney D. Gambl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95 (Sept. 1954): 206-07.
-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Siamese-Chinese relations* by L. Hoontrakul.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42, 2 (Jan. 1955): 147-49.
- Les esprits des feuilles jaunes* by Hugo Bernatzik.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43, 2

- (Jan. 1956): 163-70.
- Chinese spirit-medium cults in Singapore* by Alan Elliott. *Pacific Affairs* 29, 3 (Sept. 1956): 300-01.
- The Chinese in modern Malaya* by Victor Purcel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6, 3 (May 1957): 483-84.
-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by Karl Wittfogel.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22 (Mar. 1959): 168.
-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by Maurice Freedman. *Pacific Affairs* 22, 2 (June 1959): 207-08.
- The dragon's seed: Peking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by Robert S. Elegant. *Far Eastern Survey* 28, 7 (July 1959): 110.
-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by Leon F. Comber. *Far Eastern Survey* 28, 12 (Dec. 1959): 192.
-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by Leon F. Comber.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3, Part 2 (1960): 415-16.
- Chines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Singapore* by Maurice Freedm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 4 (Aug. 1960): 473-75.
- Rusembilan: A Malay fishing village in southern Thailand* by Thomas M. Fraser, J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 1 (Nov. 1960): 117-18.
-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 by Ng Bickleen Fo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6, 44 (Jan. 1961): 404-05.
-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Rose Hum Lee. *China Quarterly* 5 (Jan.-Mar. 1961): 153-55.
- China, its people, its society, its culture* by Chang-tu Hu, et a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76, 1 (Mar. 1961): 142-44.
- Upper Nankin Street, Singapore* by Barrington Kaye. *Pacific Affairs* 34, 1 (Spring 1961): 84-85.
- Double identity: The Chinese in modern Thailand* by Richard J. Coughl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3, 3 (June 1961): 606-08.
-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y Kung-chuan Hsiao.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3, 5 (Oct. 1961): 1119-22.
- Die Überseechinesen in Südostasien* by E. J. Solich.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38 (Nov. 1961): 176-77.
- Social structure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G. P. Murdock.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2, 2 (1962): 276-79.
- The Lolo of Liang Shan* by Lin Yueh-hw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4, 2 (April 1962): 416-17.
- Life and ritual in old Siam* by Phya Anuman Rajadhon. *Ethnohistory* 9, 3 (Summer

- 1962): 295-97.
-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by C.K. Yang.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4, 5 (Oct. 1962): 1082-84.
- Thailand: A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by O. Inso.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33, 1 (Feb. 1964): 117-19.
- Treacherous river: A study of rural Chinese in North Malays* by William H. Newel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3 (June 1964): 465-66.
-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by Victor Purcell. *China Quarterly* 24 (Oct.-Dec. 1965): 181-83.
- East-West parallels: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to modern Asia* by W. F. Werthei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5, 1 (Nov. 1965): 125-26.
- The third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by C.P. FitzGerald. *China Quarterly* 26 (Apr.-June 1966): 198-99.
- 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by Gilbert Rozm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5, 1 (Nov. 1975): 131-34.
- Other voices: The style of a male homosexual tavern* by Kenneth E. Read.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7, 1 (Fall 1981): 71-75.
- China's island frontier: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aiwan* edited by Ronald G. Knapp. *Pacific Affairs* 54, 4 (Winter 1981-82): 718-20.
- Urban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edited by Lawrence J.C. Ma and Edward W. Hanten. *Pacific Affairs* 55, 3 (Fall 1982): 482-85.
-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by Wang Gungwu.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Review* 6, 2 (Nov. 1982): 74-78.
- The sociology of secret societies: A study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Singapore and peninsular Malaysia*, by Mak Lau Fo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2, 3 (May 1983): 717-18.
- Guests in the dragon: Social demography of a Chinese district, 1895-1946*, by Burton Pasternak. *China Quarterly*, 100 (Dec. 1984): 884-86.
-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by Judith Baniste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1 (1989): 230-31.

### Manuscripts in Draft or in Preparation

- "Creolized Chinese societies in Southeast Asia: Three contrastive cases," (to be submitted to *J.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Sibling differentiation: Culture and configuration in Chinese families," (to be submitted to *J.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Rebellious daughters and their brothers: Politics and filiality in Chinese families," (to be submitted to *Ethos* or *China Quarterly*).

- "Family rebels and political rebels: Some hypotheses about Chinese political history," (to be submitted to *Modern China* or *J. of Asian Studies*).
- "City walls and late imperial Chinese society: A regional-systems analysis," (to be submitted to *Harvard J. of Asiatic Studies*).
- "Defens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forces of repression in North China: A regional-systems analysis," (to be submitted to *J. of Asian Studies*).
- "Nôbi as a regional system", (to appear in the first symposium volume of the *Nôbi Regional Project*, edited by Akira Hayami and G.W. Skinner).
- "Determinants of longevity in the Nôbi Plain," (to appear in the first symposium volume of the *Nôbi Regional Project*, edited by Akira Hayami and G.W. Skinner).
- "Infanticide as family planning in Tokugawa Japan," (to be submitted to *Population Studies*).
- "The reproductive strategies of Tokugawa Japanese villagers," (to be submitted to *American Ethnologist*).
- "Reproductive strategies, the domestic cycle, and fertility among Tokugawa Japanese villager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Workshop on Women's Status and Fertility/Mortality.
- "Regional system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Implications for social-science history," (to appear in *The geography of social change*, edited by Carville Earle and Leonard J. Hochberg, Stanford U. Press, forthcoming.)
- "Nuptiality and ferti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A regional-systems analysis," (to be submitted to *J.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or *Past and Present*.)
- "Gender and work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A regional-systems analysis," (to be submitted to *Demography* or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 "Reproductive behavior in West China: A regional-systems analysis of 1980s data," (in preparation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Population Assn. of America, Toronto, April 1990).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歷史叢書

2) 鄭天杰先生訪問紀錄 ——為海軍辯証——

陸寶千訪問 官蔓莉紀錄 精 300元 平 250元

鄭天杰將軍(1911~——)，福建林森人，民國二十年畢業於馬尾海校。抗戰時，親與長江布雷之艱危工作。勝利後，任靈甫艦艦長，旋長汾陽艦。民國四十年後負責海軍教育及駐美武官；最後調總統府參軍以迄退役。本書於我國海軍在抗戰時之作戰情形，並外人對「閩系」一詞之誤解，有正確而詳盡之敘述。

函購八折，郵撥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 In Memoriam Hellmut Wilhelm, 1905-1990

Ursula Richter\*

It is only one-and-a-half years ago that this Newsletter carried a laudatio for "Hellmut Wilhelm, Sinologue" by Professor Michael Gasster,<sup>①</sup> in which the author was able to state that Wilhelm, as Professor Emeritus of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Seattle, USA) after his retirement in 1971 had "continued his scholarly work in Seattle, where he still resides". We now have the sad duty to announce that the great scholar is no longer with us. Born in Qingdao, Shandong, on 10 December, 1905, Hellmut Wilhelm died in Seattle on 5 July, 1990. Together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those engaged in Chinese Studies, we bemoan the loss of one of the most prolific and creative contributors to our fie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view of Michael Gasster's exhaustive account of Professor Wilhelm's eventful life and scholarly achievements, we shall here merely add a selected list of Wilhelm's publications.<sup>②</sup>

1930

"Der Zusammenhang zwischen Schrift und Kultur in China" (The link between script and culture in China) in *Archiv für Schreib- und Buchwesen* 4: 161-164.

1931

"Die Mutter Gu Ting-Lins" (The mother of Gu Yanwu 顧炎武) in *Sinica* 6: 229-237.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①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8（民國78年9月），pp. 27-51.

② I am indebted to Ms Monica Wilhelm for lending me a reprint of "A List of Publications of Hellmut Wilhelm up to 1968" in *Monumenta Serica* 29 (1970-1971): 7-12; and a copy of *Parerga* 2 (1975).

1932

*Gu Ting Lin, der Ethiker.* (Gu Yanwu, the moral philosopher) Doctoral dissertation, Darmstadt. 77pp.

"Der chinesisch-japanische Konflikt und die Rechtsgrundlage der japanischen Stellung in den drei Ostprovinzen Chinas (Mandschurei)"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and the legal foundation of Japan's position in China's three eastern provinces--Manchuria) in *Zeitschrift f. öffentl. Recht u. Völkerrecht* 3, pt. 2: 235-248.

1933

"Ein Briefwechsel zwischen Durgan und Shi Ko-Fa" (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Dorgon 多爾袞 and Shi Kefa 史可法) in *Sinica* 8: 239-245.

1934

"Ting Wen-Kiang, Notizen von einer gemächlichen Fahrt in Südchina" (Ding Wenjiang 丁文江, Notes from a leisurely trip to South China; trl. as "Ethnological Researches Into the Aboriginal Tribes of South-western China") in *Anthropos* 29: 659-677.

"Historische Schilderungen des Luschan" (Historical descriptions of Mount Lu 廬山) in *China-Dienst*: 680-684.

1935

"Gi Kang und seine Abhandlung über die Pflege des Lebens" (Ji Kang 嵇康 and his treatise on life preservation) in *China-Dienst*: 903-906.

"Über den chinesischen Patriotismus" (On Chinese patriotism) in *China-Dienst*.

1936

"Der Prozess der A Yün" (A-Yun's lawsuit; analysis of a legal case of the Song dynasty) in *Monumenta Serica* 1 (1935-36): 338-359.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of Richard Wilhelm's trl. of *Liä Dsi* (Liezi 列子, orig. Jena 1912). Jena: Diederichs.

Review: Harold Acton, Ch'en Shih-hsiang, *Modern Chinese Poetry* in *Monumenta Serica* 2, no. 1: 218-219.

1938

Reviews: Ida Pruitt, trl. and ed., *The Flight of an Empress* and Daniele Varè, *The Last of the Empresses* in *Monumenta Serica* 3: 315-317.

1939

Reviews: Fung Yu-lan,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J.K. Shryock, *The Study of Human Abilities: The Jen wu chih of Liu Shao* in *Monumenta Serica* 4: 359-366.

1940

"Der historische und der legendäre Kuang Ping" (The historical, and the legendary Guan Ping 關平) in *Monumenta Serica* 5: 447-460.

"Gu Ting-Lin, Abhandlung über die Verwaltung" (Gu Yanwu, A treatise on administration; trl.) in *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 (Peiping): 1-9.

"Some Dictionaries of Chinese Technical Terms: A Bibliography" in *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 664-676.

"Confucius and the Ch'un-ch'iu" in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2: 297-300.

1942

"A Selected List of Sinological Books Published in China since 1938" in *Monumenta Serica* 7: 92-174.

Bibliographical Notes on Ch'ien Ch'ien-i 錢謙益" in *Monumenta Serica* 7: 169-207.

*Chinas Geschichte: Zehn einführende Vorträge.* (China's history: Ten introductory lectures) Peiping: Vetch. 208 pp.

Reviews: I. V. Gillis, Pai Ping-ch'i, comp., *Title Index to the Catalogue of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and Horst Böhling, *Chinesisches Sachenrecht* in *Monumenta Serica* 7: 350-352.

1943

Biography of Chang Er-ch'i 張爾歧 in Arthur 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 34-36.

"Second List of Sinological Books Published in China since 1938" in *Monumenta Serica* 8: 336-393.

"Leibniz and the *I-ching*" in *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 205-219.

"Um die Metaphysik. Ein Briefwechsel zwischen Ku Yen-wu und Chang Erh-ch'i übersetzt" (On metaphysics; 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Gu Yanwu and Zhang Erqi, trl.) in *Sinologische Arbeiten* 1: 136-152.

1944

*Die Wandlung. Acht Vorträge zum I Ging.* (Change; Eight lectures on the Yijing 易經) Peiping: Vetch. 157 pp.

*Gesellschaft und Staat in China. Acht Vorträge.* Peiping: Vetch. 175 pp.

Reviews: Wolfram Eberhard, *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Aufbau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II: Lokalkulturen im alten China* and *Sinica XVI. Jahrgang, Heft 1-6* in *Monumenta Serica* 9: 209-230; 257-259.

1945

*Deutsch-chinesisches Wörterbuch.* (German-Chinese dictionary) Shanghai: Nössler. 1236 pp.

"Bemerkungen zur T'ien-wen Frage" (Remarks on the problem of *tianwen* 天文) in *Monumenta Serica* 10: 427-432.

1946

"Third List of Recent Sinological Publications in China" in *Monumenta Serica* 11: 151-189.

1947

"Schriften und Fragmente der staatsrechtlichen Theorie in der Chou-Zeit, I. Das Buch Teng-hsi-tzu" (Texts and frag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law in the Zhou era, I: the book *Deng Xizi* 鄧析子) in *Monumenta Serica* 12: 41-96.

Review: Eugen Feifel, trl.,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und ihrer gedanklichen Grundlage, nach Nagasawa Kikuya, Shina gakujutsu bungeishi* in *Monumenta Serica* 12: 326-331.

1948

"Eine Chou-Inschrift über Atemtechnik" (A Zhou inscription on breathing techniques) in *Monumenta Serica* 13: 385-388.

1949

"German Sinology Today" in *Far Eastern Quarterly* 8: 319-322.

"The Background of Tseng Kuo-fan's Ideology" in *Asiatische Studien* 3: 90-100.

1951

"The Po-hsüeh Hung-ju Examination of 1679"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71: 60-66.

"The Problem of Within and Without--A Confucian Attempt in Syncretism"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2: 48-60.

Review: John King Fairbank, Kwan-ching Liu, *Modern China: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Chinese Works, 1898-1937* in *Far Eastern Quarterly* 10, no. 4: 383-385.

1952

"Der Zeitbegriff im Buch der Wandlungen" (The notion of Time in the Book of Changes) in *Eranos-Jahrbuch* 20: 321-348.

Review: Frank Moraes, *Report on Mao's China* i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23, no. 2: 192-193.

1957

"Das schöpferische Prinzip im Buch der Wandlungen" (The creative principle in the Book of Changes) in *Eranos-Jahrbuch* 25: 455-475.

"The Concept of Time in the Book of Changes" (English trl. of 1952 by Ralph Mannheim) in *Man and Time. Papers from the Eranos Yearbooks*. New York: Pantheon.

"The Scholar's Frustration: Notes on a Type of *Fu*" in John K. Fairban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310-319; 398-403.

"A Note on Sun Ch'o and his *Yü-tao-lun*" in *Sino-Indian Studies* 5, no. 3/4 (Liebenthal Festschrift): 261-271.

"The Sacrifice: Idea and Attitude. Thoughts from the Book of Changes" in: *Harvest*, London: Analytical Psychology Club.

1958

"Der Sinn des Geschehens nach dem Buch der Wandlungen" (The meaning of events according to the Book of Changes) in *Eranos-Jahrbuch* 27: 351-386. *Die Wandlung. Acht Essays zum I Ging*. (Re-edition of 1944 with new preface) Albae Vigiliae, Neue Folge, Heft 17. Zurich: Rhein-Verlag.

"The Stockades of the Soul: Some Chinese Post-classical Songs" in *Geist und Werk*. Zurich: Rhein-Vlg., pp. 217-224.

Review: Launce G. Thompson, trl., *Ta T'ung Shu: The One-World Philosophy of K'ang Yu-wei* in *Monumenta Serica* 17: 501-502.

1959

"A Note on the Migration of the Uriangkai" in *Studia Altaica* 5 (Festschrift Nikolaus Poppe): 172-176.

"The Heresies of Ch'en Liang (1143-1194)" in *Akten des 24. Orientalisten Kongr., München*, Wiesbaden. (Extract)

"Comments" (on the pla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general education) in Wm. Theodore de Bary, ed., *Approaches to the Oriental Class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202-204.

"Communist China's First Decade: 8. Literar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Leader* 42, no. 21: 19-22.

"*I-ching* oracles in the *Tso-chuan* and the *Kuo-yü*"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79: 277-280.

"Shih Ch'ung 石崇 and his Chin-ku-yüan 金谷園" in *Monumenta Serica* 18: 314-337.

1960

*Gesellschaft und Staat in China. Zur Geschichte eines Weltreiches.* (Re-edition of 1944, with new preface, extended notes and apparatus, and an added essay o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amburg: Rowohlt, 149 pp.

"The Heresies of Ch'en Liang" in *Asiatische Studien* 11 (1957/58, issued 1960): 102-112.

*Change: Eight Lectures on the I-Ching.* Trl. from the German Cary F. Baynes. New York: Pantheon. 111 pp.

"Chinese History" and other articles in *Colliers Encyclopedia*.

1961

"Confucianismo" in *Enciclopedia Universale dell' Arte* (also English version, "Confucianism" in *Encyclopedia of World Art*), Rome: Istituto per la Collaborazione Culturale, pp. 766-774.

"Die eigene Stadt als Schauplatz der Gestaltung" (The home-town as the scene of formation) in *Eranos-Jahrbuch* 29: 207-242.

ed., *Kungfutse, Schulgespräche--Gia Yü* (家語) Trl. Richard Wilhelm (1914/15), Düsseldorf, Köln: Diederichs, 237 pp.

"Zum Verständnis des Werks" (How to understand the book) in *Wu Ch'eng-en, Der rebellische Affe.* (Wu Cheng-en, *Xiyou ji* 吳承恩, 西遊記) Hamburg: Rowohlt, pp. 258-265.

Review: Peter H. Lee, trl. and ed., *Kranich am Meer. Koreanische Gedichte*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 no. 3: 385.

1962

"From Myth to Myth: The Case of Yüeh Fei's Biography" in Arthur W. Wright, Denis Twitchett, ed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46-161.

"Das Zusammenwirken von Himmel, Erde und Mensch" (The interac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Man) in *Eranos-Jahrbuch* 31: 317-350.

Reviews: Heinz Friese, *Das Dienstleistungssystem der Ming-Zeit (1368-1644)*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 no. 2: 223-224.

Ch'en Shou-yi, *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2, no. 3: 458.

1963

"The Image of Youth and Age in 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 in *The China Quarterly* 13: 180-194.

*Estado y Sociedad en China*. Trl. from the German José Diaz Garcia. Caracas: Universidad Central de Venezuela. 336 pp.

Reviews: André Chih, *L'Occident "chrétien" vu par les Chinois vers la fin du XIXe siècle (1870-1900)* and Carson Chang,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 Thought 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3, no. 2: 173-174; 167-168.

1964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Modern Needs" in Wm. Theodore de Bary, Ainslie T. Embree, eds., *Approaches to Asi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69-72.

"From Myth to Myth: The Case of Yüeh Fei's Biography" (ident. with 1962) in Arthur W. Wright, ed., *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New York: Atheneum, pp. 211-226.

*Change: Eight Lectures on the I Ching*. Trl. C.F. Baynes. New York, Evans-ton: Harper & Row, Harper Torch Books (Paperback of 1960 edition).

"Wanderungen des Geistes" (Roamings of the spirit) in *Eranos-Jahrbuch* 33: 177-200.

1965

"Chinese Confucianism on the Eve of the Great Encounter" in Marius B. Jan-sen, ed., *Changing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 Modern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283-310.

"Tu Fu" 杜甫 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64), 22: 538-538A.

"The Reappraisal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China Quarterly* 33: 122-139.

"The Fisherman without Bait" in *Asiatische Studien* 18/19: 90-104.

Review: J.C. Cheng, *Chinese Sources for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0-1864*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no. 3: 505-506.

1966

"Taoismo" in *Enciclopedia Universale dell' Arte* (also English version, "Taoism" in *Encyclopedia of World Art*), 543-550.

1967

"Chinese Mythology" 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5: 642-645.

"The Poems from the Hall of Obscured Brightness" in Jung-pang Lo, ed., *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pp. 319-340.

"Ch'en San-li" 陳三立 in Howard L. 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 Republican China*, 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225-228.  
 "Preface to the Third Edition" in Richard Wilhelm, trl., *The I-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Trl. into English Cary F. Bayn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xiii-xx.
- "The Interplay of Image and Concept in the Book of Changes" in *Eranos-Jahrbuch* 36: 31-57.
- 1968  
 "A Note on Chung Hung and his *Shih-p'in*" in Chow Tse-tsung, ed., *Wen-li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p. 111-120
- 1970  
 "The Creative Principle of the I-Ching" (English trl. of 1956 by Jane A. Pratt and Marianne Cowan) in *Spring* (Zurich): 91-110.
- 1971  
 "On Ming Orthodoxy" in *Monumenta Serica* 29 (1970/71): 1-26.  
 "On the Oracle Recorded in *Tso-chuan*, Hsi 4 (656 B.C.)"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1, no. 4: 504-505.
- 1972  
*Sinn des I Ging*. (Seven Eranos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last one trl. from the English by Helwig Schmidt-Glinzer) Düsseldorf, Köln: Diederichs.  
 "On Sacrifice in the *I-Ching*" in *Spring*, pp. 74-89.
- 1974  
 "Wanderings of the Spirit and Hexagram 56 in the *I-Ching*" (English trl. of 1965 by Hildegard Kaufmann and Crispin Wilhelm) in *Spring*, pp. 80-100.
- 1975  
*The Book of Changes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A Selective Bibliography. Parerga* 2.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and Foreign Area Studies. 29 pp.
- 1977  
*Heaven, Earth, and Man in the Book of Changes: Seven Eranos Lectures*. (English version of 1972)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1981  
 ed., *Kungfutse, Schulgespräche—Gia Yü* (Reedition of 1961) Düsseldorf,



Köln: Diederichs, 238 pp.

1985

*Die Wandlung. Acht Essays zum I Ging.* (Re-edition of 1958, with a preface by Wolfgang Bauer) Frankfurt/M.: Suhrkamp, 119 pp.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新出專刊兩種

(2) 趙聚鈺先生年譜 魏秀梅著

精 400元 平 350元

趙聚鈺先生(1909~1981)，上海復旦大學工商管理學系畢業。先後任職湖北建設廳、大冶鐵礦管理處、軍事委員會審計廳、湘桂鐵路會計處、金城銀行及中央信託局等單位，四十五年調行政院國軍退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秘書長，四十八年九月升該會副主任委員，五十三年升主任委員。盡力於榮民、榮眷之就業、就醫、就學、就養等，受益近百萬人，復以成就卓著，斐聲國際，進而藉此拓展國民外交，於我國國際地位之增進，厥功甚偉。

(3) 中國近代鐵路事業管理的研究——政治層面的分析

張瑞德著

精 350元 平 300元

有關中國鐵路事業的發展，學者每多由經濟學的觀點，討論鐵路事業的各種產出(outputs)，以及鐵路對各項產業活動、都市化、所得分配的影響。本書作者從鐵路事業的外在環境及組織運作、人事管理、組織目標等投入(inputs)方面探討近代中國鐵路發展的概況，並以此事業的管理經驗為例，觀察中國近代政府部門在外在新興情勢的要求下，擴張其職能、積極介入經濟事業時，在組織及人事上所作調整的成效，並藉以略窺中國現代化的歷程及其所遭遇到的問題。

函購八折，郵撥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 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

黃克武\*\*

清代考證學的興起可以追溯到明末中國思想界的巨大變化，這個變化伴隨著明亡清興的歷史變局、社會經濟的變遷，以及耶穌會士引進西學的衝擊，對中國近三百年的學術思想產生相當深遠的影響。明末思想轉變的基線是從「理學」轉向「實學」，亦即從道德形上學的關注轉移到對實際事物的高度興趣。具體而言，這個轉變的過程包括三個主要的學術方向，一為氣的哲學，一為經世之學，一為考證學。這三者後來成為清代學術思想的主流，其影響一直延續到十九和二十世紀。以考證學來說，甚至一直到今天還是一個具有相當支配力量的學術理念。<sup>①</sup>

氣的哲學、經世、考證三者雖同時展現了儒學由抽象轉向具體的精神，其間有互相增強的作用，但亦各自有其獨立的起源與發展。以氣的哲學（亦稱氣的一元論）來說，它為理學內部的發展，是針對程朱理氣二元論而起的反動，這種哲學強調本體論的基礎是物質性的「氣」（英文多譯為 material force 或 ether of materialization），認為理與氣合而為一，而理只是氣的一方面；其思想可追溯到明代程朱學者羅欽順（1465~1547）以及王學中從劉宗周（1578~1645）到黃宗羲（1610~1695）一系的發展，至清代則以王夫之（1619~1692）、戴震（1723~1777）、阮元（1764-1849）的哲學為代

\* 本文撰寫過程中曾與墨子刻教授 (Prof. Thomas A. Metzger) 多次討論，獲益良多；又蒙康無為教授 (Prof. Harold L. Kahn) 指正，特此誌謝。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① 在當代臺灣許多學者仍從事考證的工作，傅斯年曾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旨趣是「保持亭林（顧炎武）百詩（閻若璩）的遺訓」，杜維運也曾在 1972 年「二十年來我國的史學發展」討論會中指出近二十年來「考據仍然是史學的主流」，考證傳統在臺灣史學界延續不斷。至於在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之後「實事求是」——清代考證學的口號——又為學術界所強調。這個口號雖是針對馬克斯主義下的「影射史學」而發，但與乾嘉傳統不無關係。見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民國 17 年）。〈二十年來我國的史學發展討論會記錄〉，收入李弘祺等著：《史學與史學方法論集》（臺北：食貨出版社，民國 69 年），頁 376-383。

表。②至於氣的哲學與考證的關係則頗歧異，例如黃宗羲、戴震的考證學可能與其氣的哲學有密切的關係，但楊慎(1488~1559)、陳第(1541~1617)、方以智(1611~1671)的考證工作則與氣的哲學之關係不深。經世與考證二者也有分途與合流的錯綜關係，有些學者的考證工作源於經世之志，並以考證來表達經世的意念；有的學者的考證工作則純粹出於知識上的興趣，與經世的理想背道而馳。至清末二者的關係更為複雜，舉例言之，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與「孔子改制考」是以考證的型式來建構經世的理論；而錢穆的「劉向劉歆父子年譜」則以考證的作品來批評康有為。③總之，由於這三種學術取向的交錯發展，再加上數百年來理學的背景與西學的衝擊，近世實學的起源問題成爲一個迷人的學術挑戰，而學者們在相互辯論的過程中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解釋。

有關近世氣的哲學與經世思想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在此不擬細述，④

- 
- ② 山井湧：〈明清時代における氣の哲學〉，《哲學雜誌》46: 711(1951)，頁82-103。後收入氏著：《明清思想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頁 149-175。
- ③ 有關考證興起與經世思想的關係見陸寶千：〈論清代經學〉，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3（民國64年），後收入《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民國67年）。余英時也指出戴震、錢大昕、汪中等考證學者始終不能忘懷經世致用，見〈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收入《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6年），頁 429-430。有關汪中思想中考據與經世的關係見周啟榮“Scholar and Society: The Textual Scholarship and Social Concerns of Wang Chung (1745-1794),” 載《漢學研究》，第4卷，第1期（民國75年），頁 297-313。考證與經世的衝突反映在章學誠對考證的批評之上，他以爲考據學者只知「補苴罅績」，未能掌握「史義」；史義有兩層含義，一方面是「網紀天人，推明大道」，另一方面則是「史學所以經世」。見章學誠：〈浙東學術〉與〈答客問上〉，收入《文史通義》（臺北：史學出版社，民國63年）。對康有為「二考」的精采研究見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76年），頁 61-208。
- ④ 有關近世經世思想的研究甚多，見《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3年）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上也有多篇重要著作，有關《經世文編》之研究的評介見拙著：〈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期（民國75年）頁 83-96。英文方面的新作有 Benjamin A. Elman,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而有關氣的哲學之研究除了山井湧之外還有胡適：《戴東原的哲學》（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56年）；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香港：新亞書院研究所，1974）；Wm. T. de Bary ed.,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中有多篇論文與此有關，如 Ian McMorran, “Wang Fu-chih and the Neo-Confucian Tradition,” Chung-ying Cheng, “Reason, Substance, and Human Desir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Neo-Confucianism”; 另有 Irene Bloom 對羅欽順的困知記之翻譯與研究，見 *Knowledge Painfully Acquir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本文的焦點是近世考證學的源起，作者企圖澄清自民初以來中西學術界對此問題的解釋及其互相辯論的歷程，並思考未來研究的方向。

民初以來學者多同意考證學的興起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但各學者因著重點不同，有下列六類的解釋：

1. 考證學源於明末前後七子的復古以及楊慎、陳第、方以智等人個人的經歷與博學的雅好。
2. 考證學受到耶穌會士所傳西學的影響。
3. 由於清廷的高壓統治與籠絡，士人參加政府的學術計畫或自行從事與政治無關的考證工作；並有學者由此評估考證學者精神上的淪落。
4. 考證學與社會經濟變化有關，社會中的許多成員如官員、商人的獎掖、出版印刷業的發達以及人口的成長都直接間接促成此運動的發展。
5. 考證學源於思想性的因素或儒學內部的發展，例如認為考證的興起涉及於對宋明理學「空談心性」之反動，或認為受程朱陸王的辯論、氣的一元論的提出或經世思想的出現等因素影響。
6. 認為考證學的出現是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的交互影響，並強調上述第四項社會經濟變化的重要性。

上述解釋因素的排列順序主要不在提出時間的先後，而在性質上的不同。

有關考證學興起的第一個解釋將之追溯到明末前後七子文章之復古，以及楊慎、陳第、方以智等人個人的經歷與博學的雅好。例如朱希祖與蕭一山認為：

竊謂清代考據之學，其淵源實在乎明弘治嘉靖間前後七子文章之復古……然欲作秦漢之文，必先能讀古書，欲讀古書，必先能識古字；於是說文之學興焉。……然古書之難讀，不僅在字形而尤在字音；於是音韻之學興焉。

他們認為楊慎的「古音叢目」、「古音餘」，陳第的「毛詩古音考」是由此而來，而顧炎武（1613～1682）的「音學五書」也是繼承此傳統。<sup>⑤</sup>

錢穆雖然沒有提到明末前後七子，但同樣地將顧炎武、閻若璩（1636～1674）考證工作追溯到楊慎、陳第、梅鷟（生卒不詳，主要活動時間約於十

⑤ 蕭一山：《清代通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6 年）冊 1，頁 941-942。所謂前七子是：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廷相、康海、王九思。後七子是：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良、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

六世紀初葉)、焦竑(1540~1620)、方以智等人,他引用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論方以智通雅:

明之中葉,以博洽著者稱楊慎,而陳耀文起而與爭。然慎好僞說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勝。次則焦竑亦喜考證,而習與李贄遊,動則牽綴佛書,傷於雜蕪。唯以智崛起崇禎中,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一掃懸揣之空談。而這些明末先驅者的考證興趣一方面是個人对博學的喜好與友朋之間相互辯論而起,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宋元的傳統。<sup>⑥</sup>

至於個人經歷對考證興起的影響可以以陳第為例,根據容肇祖的研究,陳第考證的方法「大約本著他的家庭傳習的法律的觀念(其父為老吏),而推用到考證古書上」。陳第自己也說他讀書時常參看傳註不同的解釋而作判斷,有如斷獄。<sup>⑦</sup>其後的學者也同意前後七子的復古與楊慎的特起,以及受楊慎影響的焦竑、陳第等人對晚明考證學的興起有相當的助力。<sup>⑧</sup>

有關考證學興起的第二個解釋是強調耶穌會士的影響。梁啟超指出:

自明之末葉,利瑪竇等輸入當時所謂西學者於中國,而學問研究方法上,生一種外來的變化;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後則漸應用於他學。<sup>⑨</sup>

事實上,明末清初學者如焦竑、陳第以及劉獻廷(1648~1695)似乎都受到利瑪竇所譯有關拉丁拼音字母之著作的影響,而認識到拉丁字母在拼寫古音上的價值,三人在考證音韻的研究上有重要成就,成為清代考證學者的先驅。<sup>⑩</sup>

彼德生(Willard Peterson)有關方以智(1611~1671)的研究也顯示耶穌會士所傳西學與十七世紀思想變動有關。方氏一方面是一個耶穌會士傳

⑥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冊1,頁135-136。錢氏雖詳細分析了陳第與顧炎武考證作品的連續性,但並沒有說明陳第等人考證的淵源,筆者推測他認為這些人是襲自宋元以來考證之風,例如錢穆在朱子新學案一書中詳細地說明了朱子的考證學,見《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民國60年),第五章。

⑦ 容肇祖:《明代思想史》(臺北:臺灣開明書店,民國51年),頁279。

⑧ 林慶彰:〈實證精神的探求——明清考據學的發展〉,收入《中國文化新論學術篇:浩瀚的學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0年),頁298。

⑨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長沙:商務印書館,民國10年初版、民國29年國難後四版),頁46。

⑩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p. 216。有關劉獻廷的貢獻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41-44。

入西學的評註者，另一方面他又從未真正地醉心於理學；他個人選擇了以考證與有益社會之研究工作作為安身立命之處。<sup>①</sup>方氏的生平經歷成為十七世紀思想變動的一個重要案例，這個案例顯示在主流的學術辯論（理學對心性的辯論，下詳）之外，其它因素如個人的抉擇或西學的影響也促成考證學的興起。

有關考證學興起的第三種解釋則著眼於當時的政治環境，亦即認為：由於滿族對士人的壓迫，因而促使他們轉向考證學的研究。首持此說的可能是清末力主反滿的民族主義史家章炳麟(1869~1935)。<sup>②</sup>梁啟超也指出：「異族入主中夏，有志節者恥立乎其朝；故刊落聲華，專集精力以治樸學」。<sup>③</sup>此外，亦有人強調清初文字獄更對士人造成內心的強烈恐懼，故轉而從事考證，例如 Luther Goodrich 與 Lawrence D. Kessler 的作品詳細描述了清初皇帝為消解士人反滿情緒發起了各種不同的運動，<sup>④</sup>在這種環境下，不具政治色彩的 (apolitical) 考證學逐漸興盛起來。

錢穆與唐君毅 (1909~1978) 都支持此說。錢穆認為宋明學者的理想是得君行道，以天下為己任，但乾隆時皇帝卻公然表示「以天下治亂為己任尤大不可」，難怪「乾嘉學術一趨訓詁考訂，以古書為消遣神明之林園」。唐君毅在「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分析考證學之起因時強調：「當時因無講學自由，為避免遭禍而埋首陳編」。同時錢、唐二人均認為考證學者因避禍而走入故紙堆中，精神上便有一種委屈感，其後又以文物之發明而沾沾自喜，因此氣度狹窄，喪失了知識份子的崇高精神。<sup>⑤</sup>

① Willard J. Peterson, "Fang I-chih: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In W. T. de Bary ed.,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pp. 369-411. *Bitter Gourd: Fang I-chih and the Impetus for Intellectual Chan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② 章炳麟：〈清儒〉，《檢論》（臺北：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卷 4，頁 23 上。

③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 45。

④ Luther C. Goodrich,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 (Baltimore: Waverly Press, 1935). Lawrence D. Kessler, "Chinese Scholars and the Early Manchu Stat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1: 179-200 (1971)。亦見吳哲夫：《清代禁燬書目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民國 58 年）

⑤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 57 年），冊 1，頁 2，自序。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香港：新亞研究所，民國 44 年），頁 113-114。然而錢唐二人對考證之批評重點亦有不同，錢氏強調士人經世理想之淪落；唐氏則重視考證學者喪失了精神價值，「不願亦不能，直接與活潑新鮮之宇宙人生，自然，社會之事之理接觸」以及「使學術成私人之事，而不能以樹立民族之公共精神為目的」。

在中國大陸的馬克斯主義史家侯外廬也強調政治方面的解釋。他認為考證學的興起主要是受到康熙以來「反動文化政策」的影響。這些政策包括文字獄、薦舉山林隱逸與博學鴻詞以及一些像《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等大型的編纂工作。尤其是四庫計畫徵集了數百位包括戴震在內的有名的學者，成為考證學的大本營。侯氏認為：皇室的鼓勵與「封鎖」限制了士人的學術興趣並形成了新的學術潮流。<sup>⑯</sup>

上述環繞著政治因素的解釋著重文字獄與四庫計畫等歷史事件，但最近一本有關「四庫全書」編纂過程的研究，筆者覺得對上述觀點提出了新的挑戰。該書作者蓋博堅 (R. Kent Guy) 認為四庫計畫並不是一個完全貫徹皇帝旨意的計畫，相反地，它是在士紳、官僚以及皇室之利益的互動情況之下成長，它受到所有力量的形塑，而並非受到任何力量的完全控制 (shaped by all but dominated by none)。作者發現在實行這個計畫的過程中知識份子不僅沒有受到壓迫，而且還積極地利用這個計畫來為本身牟利。這本著作間接地修正了上述視考證為滿族壓迫之結果的解釋，該書顯示滿人的控制與籠絡政策並不足以完全解釋新學術風氣的源起，而清代政治與學術之關係也不像我們過去所想像的那樣單純而直接，士人學術思想發展有其自主性的一面。<sup>⑰</sup>

此外，許多學者都同意文字獄雖會影響士人論政，但論政之外有許多學術選擇，不一定非得從事考證，故文字獄等政策是考證學興起的外緣而非本因，其本因要從內在的演變來探討。<sup>⑱</sup>

有關考證學興起的第四個解釋強調社會經濟變化對學術思想的影響。例如倪文孫 (David Nivison) 在討論章學誠思想一書中注意到考證和清初士人

<sup>⑯</sup>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卷5，頁410-411。

<sup>⑰</sup> R. Kent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sup>⑱</sup> 強調內在因素的學者如余英時與陸寶千都有這種看法。知識份子對文字獄這類思想箝制的反應有許多方式，例如 Leo Strauss 認為西方的思想迫害使學者發展出特殊的寫作技巧，將寓意隱藏在字裏行間 (writing between the lines)，而只有會心的讀者才能讀出其真正的義涵。如 Swift 的格列佛遊記與 Montesquieu 的波斯書簡以想像出的幽默故事對專制作嚴厲的批判，就是很好的例子。余英時也指出清初士人在專制淫威下常有「象徵性之隱語」。這些都是對思想箝制的他種反應。見 Leo Strauss,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Glw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52), pp. 22-37. Jonathan Swift, *Gulliver's Travel*; Montesquieu, *Persian Letters*. 余英時：〈方以智自沉惶恐灘考〉，收入《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頁511-512。

階層之成長的關係，他指出對於那些因為社會上職位有限，無法藉此博取聲名的士人而言，考證學成爲一個自我實現的方法。<sup>①⑨</sup>雖然他並沒有進一步分析這一問題，但卻已指出由於人口增加造成士人階層的擴大是考證學出現的一個重要的社會背景。

比較廣泛地注意到考證學之社會背景的作者仍推梁啟超。他第一個將考證視爲是一個整體的社會運動，而且指出「當運動熱度最高時，可以舉全社會各部分之人人，悉參加於此運動」。他提到當時官員的生活型態、家中藏書、相互討論質疑的風氣；當時豪商閥族的講掖，例如淮南鹽商「既窮極奢欲，亦趨時尚，思自附於風雅，競蓄書畫圖器，邀名士鑑定，潔亭舍豐館穀以待」；著名的書肆；以及出版業聘名流擔任校讎工作等。梁氏認爲當時除了學者對考證的興起有所貢獻之外，其它的社會角色亦直接間接地推動此一運動。<sup>②⑩</sup>

或許最企圖將中國思想史放在社會經濟脈絡中來觀察的學者是馬克斯主義的史學家。上述的侯外廬是這一研究取向的重要代表。在《中國思想通史》一書中，他將明末清初的變遷視爲是「封建」秩序的解體以及商業經濟（資本主義）的萌芽。他認爲這一時期的思想發展——他稱爲「啟蒙運動」——是社會經濟變遷的反映。根據他的看法，啟蒙運動的領導者像顧炎武、黃宗羲等人，代表了城市中等階級的利益，所以黃宗羲提出了「工商蓋皆本也」的觀念。不過侯氏否認十七世紀顧、黃等人的考證工作與十八世紀考證運動之間的關連。因爲對前者而言，考證是經世的手段，但在後者考證卻喪失這種崇高的精神而淪爲清廷統治的工具。<sup>②⑪</sup>在書中作者花了很長的篇幅描述十八世紀商業的發展，但遺憾的是他卻沒有澄清這種經濟變遷和學術興起的關係。這種解釋的空隙留給後人繼續研究的機會，艾爾曼的書後來補足了這方面的缺憾（下詳）。

對於近代考證學興起的第五個解釋認爲：考證學的興起涉及儒學內部的發展。其中最普遍的看法認爲考證是針對理學空談心性而起的反動，故轉而

①⑨ David Niviso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üeh-ch'eng, 1738-180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5.

②⑩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 106-109。

②⑪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卷 5，頁 29。有關侯氏論點之描述與批評見 Thomas A. Metzger, "Ching-shih Thought and the Societal Change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Period: Som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 in 《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pp. 21-34。



研究經史實學。這個意見至少可以追溯到顧炎武、黃宗羲等人。顧氏在「答友人論學書」中指出：「今之君子，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sup>②</sup>黃宗羲也反對理學家束書游談，力主「窮經」與「讀史」。<sup>③</sup>在清初有不少的學者和他們有相同的看法。其後梁啟超（1873~1929）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根據顧、黃等人的意見，更力持這種觀點。他在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清代思潮是對宋明理學的大反動。因為理學研究的是「昭昭靈靈不可捉摸之一物」，後來產生「狂禪」一派，不避酒色財氣；同時士人又受科舉制度的腐化，至明末學術界已無生機。梁氏認為清代的考證學的興起其基本動力是對晚明學風的攻擊與反彈：

承明學極空虛之後，人心厭倦，相率反於沉實。

因矯晚明不學之敝，乃讀古書，愈讀愈覺求真解之不易，則先求諸訓詁名物典章制度等等，於是考證一派出。<sup>④</sup>

這一種解釋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被人們廣泛接受，成為明清思想變遷的一個正統解釋。例如蕭一山於民國十二（1923）年完成的「清代通史」以理學的反動為清學成立的第一背景。<sup>⑤</sup>而被譽為民國以來影響力最大的學者胡適（1891~1962）也十分同意這個觀點。胡適認為宋明理學討論了五百年的玄學，結果導致政治腐敗與異族入侵，因此十七、十八世紀反理學運動興起，反對空虛冥想並注重實證。他並大力讚賞考證學中的「歸納方法」合乎西方的科學精神。<sup>⑥</sup>

雷文生（Joseph R. Levenson）在《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一書中也討論到清代的考證學，他將

② 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亭林文集》，收入《顧亭林遺書集》（臺北：中華文獻出版社，民國 58 年），第 6 冊，卷 3，頁 1 下。

③ 見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收入《鮚埼亭集》（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 56 年），卷 11，頁 9 下。

④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 45、46。此書於 1959 年由徐中約譯為英文，並由史華慈作序，Liang Ch'i-ch'ao, *Intellectual Trend in the Ch'ing Period*, translated by Immanuel Hsü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⑤ 蕭一山：《清代通史》，冊 1，頁 940。

⑥ 胡適：〈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分別收入《胡適文存》（臺北：遠東圖書公司，民國 64 年），卷 3，頁 53-107 與卷 1，頁 383-412。其後的學者如杜維運也持同樣的觀點，見杜維運：〈顧炎武與清代歷史考據學派之形成〉，收入《清代史家與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 73 年），頁 95。

之置於「經驗主義」(empiricism)的範疇之下。與梁啟超和胡適相類似的是,雷文生同樣將清代的經驗主義視為是對理學的批判,並認為經驗主義具有現代化科學中反玄學、重理性推理與經驗事實的精神。但他認為清代經驗主義雖然在反玄學這一點上與西方科學一致,它本身卻不是科學的,也不必然會導致現代科學的興起,關鍵在於清代學者所問的問題以及所提出的答案與現代科學家大相逕庭。他指出顧炎武等學者雖提出實事求是的口號,但他們卻很少探索事物之間之秩序的彼此關連,或像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那樣以實驗工作與理性推理來建立對自然世界的了解。

在結論中雷文生用「流產的」(abortive)一詞來形容清代的考證學。由此可見他對清代學術思想的根本關懷在於探討:為何考證學無法導致現代科學的興起?②這種研究取向在西方漢學界曾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但近年來卻受到嚴厲的批評,許多人指出這種問題的方式沿襲自韋伯學風,帶有強烈的西方中心與目的論的色彩。③但雷文生式的思考方式無疑地是根深柢固的,在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有關清代考證學的重要著作中,他仍然問了一個雷文生式的問題:為什麼考證學無法發展成「現代科學」?④

這些主張考證學源於對宋明理學之反動的學者強調宋學與清學之間的不連續性。但有些學者則對這種不連續性有所質疑。最直接對此提出挑戰的是余英時。余英時認為上述的滿洲壓迫論、社會經濟變遷的解釋以及反理學說都是「外緣」,這些因素雖有助於學術的轉向,但卻無法說明為何學者們選擇特殊的題目作為考證的對象,他認為這個問題必須從學術發展的內部變遷來尋找解答。他嘗試以「內在理路」的觀點闡明宋明理學和清學之間的連續性關係。他的觀點相當有創見,但亦有其學術上的淵源,在他之前有好幾位學者曾強調宋明理學與清代考證學的連續性關係。這些看法對余氏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第一位是章學誠,在「朱陸異同」與「浙東學術」(分別作於 1777 與

②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3-14.

③ 對西方漢學中西方中心與目的論取向的批判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61-79.

④ 艾爾曼所提的問題見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83-84. 該書主旨將於下文作進一步介紹。

1800年)二文中,章氏認為顧炎武與閻若璩的學術立場源於朱熹(1130~1200);而黃宗羲與萬斯同(1638~1702)則襲自陸九淵(1139~1193)與王陽明(1472~1529)。雖然這二條學術譜系是章氏所自創,其原因在此無法細論。<sup>⑩</sup>但無疑地他的觀點刺激學者重新評估宋明理學與考證學的關係。因此研究章氏思想的學者多注意到思想的連續性,倪文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sup>⑪</sup>余英時的觀念一方面直接受章氏啟發,另一方面似乎也受到倪文孫的影響。

另一位注意到理學與考證學之連續性的是錢穆,錢氏是余英時在香港新亞書院時的老師。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以「兩宋學術」與「晚明東林學派」為引論,說明清學有其宋明的淵源,這是針對梁啟超對清代學術史之見解所提出的批判。他並指出許多考證學者都深受宋明理學的影響,而且一個學者在漢學(考證學)上的成就要從宋學(理學)的角度來評估。<sup>⑫</sup>

馮友蘭(1895~1990)也看到理學與清學的關係。馮氏認為當清代漢學家討論「義理之學」時,他們所討論的主題以及所用的經典文獻仍與宋明理學家相同,就此而言清代的漢學是宋明理學的延續發展。<sup>⑬</sup>

在西方學術界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也可屬於此一範疇。狄氏認為明代思想有其本身的活力與多樣性,不可一言以蔽之地說是「空虛」,他並指出在宋明理學之內就有一實學的傳統,這些實學家居於十七世紀思想變動的起點。<sup>⑭</sup>狄氏對宋明理學的重新評估使後來學者進一步思考宋學

<sup>⑩</sup> 二文均收入《文史通義》,有關章氏建立學術譜系的詳細分析見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書店,1976)頁45-81。

<sup>⑪</sup> 倪氏對理學與清學連續性的強調可以追溯到他於1953年在哈佛大學所寫的博士論文“Th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Thought of Chang Hsueh-ch’eng”。當1959年史華慈為徐中約所譯清代學術概論寫序時,他表示這種連續性或可適用於章學誠,但他懷疑可用於說明整個清代的考證傳統。Benjamin I. Schwartz, “Foreword”, in Liang Ch’i ch’ao,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Ch’ing Period*, p. xiv.

<sup>⑫</sup>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冊I,頁1。他說:「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然其時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菴、習齋,一世魁儒膏碩,靡不寢饋於宋學,繼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謝山、乃至慎修諸人,皆於宋學有甚深契詣。而於時已及乾隆漢學之名,始稍稍起。而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往往視其所得於宋學之高下深淺以為判。」

<sup>⑬</sup> Fung Yu-lan,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Tr. by Derk Bodde, vol. II, pp. 630-31.

<sup>⑭</sup> 狄百瑞曾編好幾本這方面的書,可謂西方漢學界中研究理學之先導,見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Principle and Practicality: Essay in Neo-Confucianism and Practical Lear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與清學的連續性問題。總之這些學者均已認識到反理學情緒之本身不足以完全孕育考證學的興起，理學與實學之間雖有牴觸，但也有連續性的一面。筆者認為上述這些作品所形成的學術背景使余氏注意到理學與考證學之間的「內在」關係。

余氏以為宋明以來儒學發展的一個內部動力是程朱學派和陸王學派之間的辯論，這個辯論是長久以來儒學之中「尊德性」與「道問學」之間的衝突。至晚明這二派都各自堅持本身的學術立場而無法說服對方，而雙方又都堅持本身所言是儒學的原始義涵，因此義理的辯論就演變為如何發明經典之真正義涵的辯論，而玄學思考也就逐漸為經史考證所取代。

為了支持以上的論斷，余氏指出清代學者的考證作品很多是以考證的方式來談義理問題，而延續了程朱與陸王的辯論，例如顧炎武和閻若璩的考證作品是為反陸王，而陳確（1604~1677）、毛奇齡（1623~1716）的考證工作實際上是將矛頭對準了程朱。至此學術的戰場已從玄學思辯轉移到考據。同時他認為就儒家思想的整體演變而言，明學至清學的轉變是從「尊德性」到「道問學」，亦即是從強調道德面轉向強調知識面。清學中考證與經世二者都顯示了儒學「道問學」精神的高度發揚。所以他將這整個過程描述為清代知識主義的興起。<sup>⑤</sup>

除了余英時之外，從程朱、陸王之爭的角度觀察考證學之興起的學者還有陸寶千。他在「論清代經學」一文指出明中葉之後朝政日非、邊患日亟而有經世思想的興起，由於要求經世所以轉向儒家經典汲求治道之泉源，因而造成經學研究的盛行。但為什麼以考據的方法來治經？陸氏以為此則涉及程朱、陸王之爭。因雙方力圖互相否定，在爭辯中除了運用玄學思辯之外也注意文獻的探討，以「取證於經書」來支持自身的論點，學者因而從事考證；陸氏並更進一步從程朱陸王哲學上的差異認為陸王主張心理為一，故不以讀書為必然；程朱以心、理析為二，心以經書為對象，故程朱理學蘊含有從經書體認義理的精神，而正音讀、通訓詁是了解經書的第一步。所以陸氏認為

<sup>⑤</sup> 余英時的觀點見上述論戴震與章學誠之外，尚有〈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原載《中國學人》，期2（1970），頁19-41，後收入《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65年）；〈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歷史與思想》，頁121-156；英文論文見Yü Ying-shih,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Ch'ing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1: 105-146 (1975).

「考據爲程朱理學中所必蘊之物」，清初官方力倡朱學，爲考據學的興起奠定基礎。<sup>⑤</sup>陸氏的解釋不但與余英時的看法不謀而合，更重要的是點出了經世思想與盛對考證的影響。

也有學者從氣的哲學之角度分析考證學的淵源。日人山井湧早在一九五〇年就注意到這一點，他詳細地追溯明清時期以「氣」爲主之哲學取代朱熹以「理」爲主之哲學的過程。他認爲氣的哲學至戴震而完成，而此過程可溯及明代羅欽順（1465～1567）、王畿（1498～1583）、呂坤（1534～1616）、劉宗周（1578～1645），至清初則有陳確（1604～1677）、黃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顏元（1635～1704）、李燾（1659～1733），到十八世紀除戴震（1724～1777）之外還有程瑤田（1725～1814）、凌廷堪（1755～1809）、焦循（1763～1820）、阮元（1764～1849）等二十四位學者；而上述學者中有多位是著名的考證學家。他認爲這二者之間所展現的一致性並非偶然，這展現了氣的哲學與考證學的內在關連。因氣的哲學之興起與王學有關，在結論中他指出：以考證學是「源於以左派王學爲中心之明代心學之反動」的論點有重新檢討之必要。<sup>⑥</sup>

錢新祖對焦竑（1540～1620）的個案研究也從思想史的觀點對考證的源起提出一新的見解而與上述山井湧的論點也不無關係。他以明末對考據甚感興趣的陸王學者焦竑爲例，說明考證學源於陸王。他指出焦竑一方面支持陸王學派反對程朱學派，另一方面又對佛道思想有高度的興趣，但他對佛道的興趣並沒有導致對儒學的否定，他是由儒進於佛道，並認爲佛道是儒學的進一步開展，最後他並由此而達到對儒學的重建。重建後的儒學對程朱學派「理氣二元」的理論有所挑戰，提出「氣的一元論」。這種觀點認爲理不再是「氣中的理」（the *li* in *ch'i*），而變成「氣之理」（the *li* of *ch'i*）。作者認爲重建的儒學對後來清代的發展有相當有意義的啟示，尤其重要的是它構成了清代考證學運作的脈絡。他同意前述梁啟超視考證爲理學之反動的說法並非全無事實根據，但他以爲考證學者對王學與王學左派的批評之邏輯是出於上述重建後的儒家思想。他以下棋作比喻，認爲晚明的「狂禪」論者和清考證學家雖然互相攻伐，但玩的卻是同樣的棋。傾向陸王又主張三教合一的焦竑、反理學並爲漢學代言人戴震，與攻擊戴震的章學誠雖學術立場截然不

<sup>⑤</sup> 陸寶千：〈論清代經學〉，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3（民國64年），頁1-22。

<sup>⑥</sup> 山井湧：〈明清時代における氣の哲學〉，《哲學雜誌》，46: 711（1951），頁82-103。

同，從「氣的一元論」之角度來看三者卻是屬於同一論述傳統（discursive tradition）。所以他認為考證學是從陸王學派一系發展出來的<sup>⑧</sup>。

錢氏的論點遭到余英時強烈的批評，他的批評有以下幾點：

一、余英時認為錢氏的論點太模糊，書中有許多地方在用字與論證上讓讀者捉摸不定而似懂非懂。

二、余英時從史料運用的角度提出質疑，他認為作者引《焦氏筆乘》為史料有些時候並不適當，因為該書為焦竑的讀書筆記，許多部分是抄自他人著作，不可一概視為焦氏的思想。余氏發現有許多關鍵性的史料實際上是焦竑引趙貞吉（1508～1576）的作品。對於余氏這一點批評筆者並不完全同意，焦氏筆乘中雖有不少引自他人的話，這些部分在運用時要十分謹慎，但未嘗不可在其中找到焦氏思想的線索。事實上每一個人的思想中都包含了他人的思想。

三、余英時以為焦竑的考證興趣不是受其哲學立場的影響，而是從閱讀楊慎、梅鷺等人的作品而得到的刺激。他認為焦竑作為一個理學家、考證學者以及文人可以分別從明代三個學術潮流——哲學、考證、文學——來理解，這三者雖非無關但有其自身脈絡的發展。例如他指出明代的考證即是繼承了宋元傳統而發展。余氏反對將焦竑的理學與考證二方面的興趣建立內在的關係。

四、最後余氏剖析氣的一元論與考證的關係。他強調氣的一元論源於程朱學者羅欽順，並引章炳麟的看法認為戴震有關理氣的理論是從羅欽順來的。因此若要從理學傳統中找尋考證的根源，余氏以為與其強調陸王還不如強調程朱。他並懷疑可以將焦竑、章學誠說為氣的一元論者。總之他同意建立氣的哲學與考證之聯繫是一個迷人的課題，但必須謹慎處理。他以為 Irene Bloom 的說法較恰當：

許多主要清代思想家，包括十七世紀的王夫之與十八世紀的戴震，亦支持氣的哲學，因此可以辯稱氣的哲學雖不是考證的先決條件，卻必然是伴隨著清代考證的新型態而發展。氣的哲學雖然無疑地是清代思想的重要主題以及許多著名思想家關懷的重點，但是在大多數的時候

<sup>⑧</sup> Edward T. Ch'ien, *Chiao Hung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M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它卻似乎不是興趣之所在與辯論之焦點。<sup>③⑨</sup>

上述的學者分別研究了影響清初考證學興起的內在與外在因素，至此綜合性的研究方有其可能，一九八四年一本有關清代考證學的專書終於出現了，該書雖早於錢與余的辯論，卻綜合了上述多數的論點，此即艾爾曼的《從哲學到考證——帝制晚期思想與社會方面的變遷》。該書的主旨是研究明清江南地區考證的源起、發展與意義，而他同時注意到內在與外在二方面的因素。全書三分之一的篇幅用來描述內在思想的演變，山井湧、Irene Bloom 與余英時的作品都為作者所引用，而三分之二的篇幅則分析促成江南地區考證成長的社會與制度因素。該書對內在因素的介紹多依靠二手的研究；有關外在因素的分析則頗有創意，上述梁啟超所提到的社會因素作者都作了深入的探討。他提到豪門巨室的支持、官方與私人圖書館的設立、出版與印刷業的興盛等。尤其重要的是他以引自 Thomas Kuhn 的學術社羣的概念闡明社羣內知識溝通的管道，例如共有的研究方法、通信、集會、集體合作等，這些因素構成學術社羣的共識。作者以為這種共識的產生對考證的發展十分重要。<sup>④⑩</sup>

艾氏著作成功之處有二點：第一，他澄清了考證運動的社會根源，因此我們可以了解考證不僅是思想變遷的產物，或是對政治情況的反動，它同時也受社會組織與溝通型態的影響；第二，他的討論結合了促成考證興起之內在與外在二方面的因素，使讀者對此一運動有一持平的了解。這二方面的貢獻使該書成為有關此一主題的重要著作。但筆者也覺得該書有些美中不足之處，例如上述雷文生式的問題仍帶有西方中心的線性史觀，似宜避免，中國文化的發展，不一定非得走西方文化所曾走過的路；如果改問「考證學與中國近代科學發展的關係」或較適合。其次是作者似乎假設所有的讀者對清代學術史有相當的了解，因此對一些專有名詞如「漢學」、「宋學」、「今文」、「古文」以及其間相互關係並沒有詳細說明，因此對背景知識不強的讀者來說，閱讀上十分困難。

在過去七十年間有關考證起源的研究經歷了很大的變遷。這個變遷饒富

<sup>③⑨</sup> Yü Ying-shih, "The Intellectual World of Chiao Hung Revised: A Review Article," in *Ming Studies*, No. 25 (1988), pp. 24-62. 所引 Irene Bloom 的意見見 *Knowledge Painfully Acquired*, pp. 31-32.

<sup>④⑩</sup>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該書的中文評介見黃進興《漢學研究》第4卷第1期（民國75年）上的書評。

趣味地展現了不同方法論之間的互動，在這過程中最重要的著作無疑要推梁啟超、余英時與艾爾曼三人的作品，而累積的研究成果使歷史的圖像日益清晰。最後我們再回顧這些解釋：

1. 考證源於明末前後七子的復古以及楊慎、陳第、方以智等人個人的經歷與博學的雅好。
2. 考證學受到耶穌會士所傳西學的影響。
3. 由於清廷的高壓統治與籠絡，士人參加政府的學術計畫或自行從事與政治無關的考證工作；並有學者由此評估考證學者精神上的淪落。
4. 考證學與社會經濟變化有關，社會中的許多成員如官員、商人的獎掖、出版印刷業的發達以及人口的成長都直接間接促成此運動的發展。
5. 考證學源於思想性的因素或儒學內部的發展，例如認為考證的興起涉及於對宋明理學「空談心性」之反動，或認為受程朱陸王的辯論、氣的一元論的提出、經世思想的出現等因素影響。
6. 認為考證學的出現是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的交互影響，並強調上述第四項社會經濟變化的重要性。

上述的解釋雖已建構了大致的輪廓，但筆者認為還有幾個相互有關的工作值得繼續努力：第一，可以對更多的明清考證學家作個案的研究以進一步檢驗上述觀點的有效性；尤其是當各項解釋因素間有衝突時，應釐清何者為主、何者為從、以及何者無關。最後我們必須承認考證學的源起是多元性的，不同的個案適用不同的解釋因素。<sup>④</sup> 第二，清代另外二個學術主流——氣的哲學與經世之學——和考證學興起之間的關係還不够清楚，在研究過更多的個案之後，對此問題有進一步澄清的必要。第三，明清之際社會變遷對考證（或實學）的影響還可再作深入探討，由於人口與商業活動的激增，士人所處的環境有根本的改變，這些改變對士人的生活以及傳統儒家理想構成一新的挑戰，而它所產生的影響除了倪文孫所指出的一點之外還有那些？第四、考證學（或實學）與近代中國科學發展的關係如何？如果不從目的論的角度觀察，可以試問它在中國科學發展史上扮演何種角色？第五，近代考證學的興起對中國近代社會文化或現代化的過程有何影響？例如考證帶起的今文學運動與古史辨運動已有學者作過研究，但是在其他方面還有那些衝擊？第六，除了歷史性的描寫與分析之外，亦不可忽略哲學性的評估工作，唐君毅與錢穆對考證的歷史角色已有評論，他們的評論是否恰當？筆者認為這些研究工作將會增加我們對清代考證運動乃至整個近代思想史的了解。

<sup>④</sup> 筆者認為如陳第、梅鷟、劉獻廷、陳確、毛奇齡等人都可再作深入的探討。



# 《義和團研究會通訊》簡介

陳 慈 玉\*

「中國義和團運動史研究會」係中國大陸各地史學工作者自願成立的學術團體，此研究會自 1986 年 8 月起不定期出版《義和團研究會通訊》，至 1990 年 12 月為止，已出版了 14 期，每期約有 20~30 頁左右，主要刊登有關義和團的研究狀況、學術活動等方面的消息和動態，並且注重相關著作的評介和外文資料的節譯，亦報導有關開展研究工作的各種建議和想法。

眾所周知，1977 年以後的大陸史學界已經不再完全無條件地讚美義和團，而率直地指出其弱點與局限性，並且意欲了解當時農民實際的生活及其意識型態。所以「義和團的性質」問題常常是他們研討的重點之一，固然有些學者仍然沿襲以往的說法，認為義和團是一種農民運動，也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但亦出現義和團並非農民戰爭的說法。再者，此研究會爲了深入探討義和團，特別把教案史納入其研究領域，以促進南方以研究教案爲主和北方以研究義和團爲主的學者之間的交流，而《通訊》則報導其研究動向與相關資料，以下，介紹此《通訊》的大致內容：

## 一、會議報導

「中國義和團運動史研究會」曾參與籌辦數次大型研討會，並在《通訊》中綜述其研討重點和相關發言：

1. 「全國義和團運動史學術討論會」，1986 年 5 月 6 日至 10 日，天津市（第 1 期刊載）。
2. 「19 世紀中國教案——義和團學術討論會」，1987 年 9 月 20 至 24 日，安徽省績溪縣（第 5 期刊載）。
3. 「義和團運動史暨教案史學術討論會」，1988 年 7 月 28 至 8 月 1 日，黑龍江省黑河市（第 8 期刊載）。
4. 「第三屆（1989 年）近代中國教案學術討論會」，1989 年 11 月 20 至 25 日，貴州省貴陽市（第 11 期刊載）。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5. 「義和團運動90周年學術討論會」（山東省歷史學會舉辦），1990年7月26至30日，青島市（第13期刊載）。
6. 「義和團運動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1990年10月7至11日，山東省濟南市（第14期刊載）。

## 二、史料介紹和史蹟調查

1. 〈中日義和團聯合調查團赴冀魯考察側記〉，第3期（1987年4月）。
2. 〈《北華捷報》中的教會問題論爭資料選譯〉，第6期（1988年4月）。
3. 〈易州庚子拾零〉，第9期（1989年1月）；第10期（同6月）
4. 〈四川義和團運動史料補遺〉，第10期（1989年6月）。
5. 〈《拳亂時的中國旅行》與義和團天津之戰〉，第12期（1990年7月）。

## 三、節譯外文著作

這可以說是此《通訊》的核心部分，學術本無國界，經由翻譯，可以促進國際交流，所刊載的譯文之內容大致有三種：

1. 近年來西方的研究動向，例如：包德威 (David D. Buck)，〈近年來西方義和團運動研究綜述〉（第2期，1987年2月）、張格物 (Murray A. Rubinstein)，〈1964年至1986年美國關於在華教會史研究狀況〉（第12期，1990年7月）等。
2. 有關義和團著作的評介，例如：小林一美，「中國史學家的義和團源流論」（第3期，1987年4月）、包德威，〈《近年來中國的義和團運動研究》一書的前言〉（第7期，1988年6月）、佐藤公彥，〈評《義和團戰爭與明治國家》〉（第8期，1988年11月）、孔菲力 (Philip Kuhn)，〈評周錫瑞著《義和團運動的起源》〉（第10期，1989年6月）等。
3. 相關短文，有的是時人的回憶，例如：芮文德 (Apllice Reed)的〈記山東德州基督教工作的開端與發展〉（第4期，1987年8月）、法國伊索勒神父，〈處於臨戰狀態的趙家庄堂口〉（同上）、八國聯軍的法國司令官福里，〈北堂之戰〉（第12期，1990年7月）等；亦有將當時耶穌會士之間來往的通信集《中國與錫蘭》（1898年版本）的部分內容，編在一主題者，例如〈德國占領膠州灣的影

響〉（第11期，1990年2月）；另外，編譯最近出版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德文資料，例如〈斯太爾教派的創立和安治泰來華〉（第11期）等。而蘭金（Mary Backus Rankin）的〈古田事件——1895年基督教徒與菜會的鬭爭〉（第4期，1987年8月）則為學術論文。

---

## 日本「中國近現代經濟史 研討會」簡介

久保亨\*

最近幾年來，日本史學界都在每年夏天召開「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研討會」，雖然此會未曾接受政府或大學等研究機構的補助，純係民間性質的討論會，但是每次參加的學者仍多達20~40人左右，正式召開的研討會已達6次。當初所以產生此研討會的主要原因如下：1.對以往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大多偏向政治史的反省；2.設立一交流機會以解決分散的研究情況的問題；3.受到中國大陸研究經濟史的新動向的刺激。

開始籌劃召開此研討會是在1984年3月，後來，同年12月舉行預備報告會，翌年以後，都在每年7、8月之間舉行。然而，更正確地說，在此之前，已有其雛形存在。這就是1977年到1980年代前半期京都大學「中國經濟研究會」所主辦的合同研究會（或密集研究會），以及1983年在名古屋所召開的「棉業史討論會」，這都是以年青學者為主的全國性學術交流（其中情況請參照《近きに在りて》2號，1982年9月；5號，1984年5月）。因為累積了近十年的經驗，所以相關學者大多能積極地了解召開此研討會的意義，其準備工作也得以順利進行。

以下，列舉自預備報告至第6次研討會的時間、地點、參加人數、主題

---

\* 日本國立信州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

和宣讀論文者，此外，歷次會議報導都刊登在各期的《近きに在りて》上。再者，第1屆研討會的論文已結集為《中國蠶絲業の史的展開》，與第3屆的論文集則為《中國經濟政策史の探求》，同由汲古書院出版發行。

### 預備報告會

1984年12月16日 東京（本郷會館）34人

#### (1) 中國製絲業の發展過程

鈴木智夫：清末浙江蠶絲業をめぐる諸問題

曾田三郎：第1次世界大戰前後の中國製絲業

奥村哲：國民政府下の中國蠶絲業——長江下流域における——

#### (2) 小島淑男：近代中國の地主制と國民經濟

#### (3) 古山隆志、上野章：上海地域賃労働者の状態史研究へ向けて——上海賃労働史研究序説——

#### (4) 高綱博文、菊池敏夫：民國經濟史に関する統計的研究——1912～1936年——

（参照《近きに在りて》7號，1985.5）

### 第1屆研討會

1985年7月20日～22日 沼津（駿海莊）49人

#### 「中國近現代蠶絲業史」

古田和子：近代蠶絲業への社會的對應——日本との比較において——

鈴木智夫：洋務運動期における上海生絲貿易の研究

曾田三郎：第1次世界大戰後の中國製絲業

奥村哲：恐慌下の蠶絲業再編過程における“官”と“民”

古山隆志、上野章：上海製絲業と労働運動

（参照《近きに在りて》8號，1985.11）

### 第2屆

1986年8月23日～25日 箱根（靜雲莊）45人

#### 「近現代中國における國家と經濟〔I〕」

岸本美緒：清朝中期經濟政策の基調——1740年代の食糧問題を中心にして——

黒田明伸：18世紀より1920年代までの中國における貨幣流通とその展開

渡邊惇：袁世凱政權の財政、經濟政策——周學熙、熊希齡を中心に——

沈祖煒：關於近代中國政府投資的幾個問題

久保亨：國民政府期の國家と經濟——經濟發展戰略をめじって  
(參照《近きに在りて》11號，1987.5)

### 第3屆

1987年8月22日～24日 湯河原（厚生年金會館） 26人

「近現代中國における國家と經濟〔Ⅱ〕」

報告：

川井悟：國民政府の經濟建設政策における一問題點——全國經濟委員會テクノクラートの存在と意義をめぐる——

弁納才一：1930年代南京政府の合作社政策——江蘇省と江西省の例を中心として——

萩原充：國民政府の鐵鋼産業政策

川井伸一：戦後の中國紡織業と中紡公司——予備的考察——

問題提起：

久保亨：國民政府期の經濟政策史研究——その成果と課題をめぐる——

奥村哲：基礎概念に関する問題提起

小濱正子：南京政府論への新しいアプローチ——權威主義體制論——

(參照《近きに在りて》12號，1987.11)

### 第4屆

1988年7月23日～25日 箱根（靜雲莊） 34人

「近現代中國の農業・農村問題」

川井伸一：書評：吉澤南著《個と共同性》

リント・クローヴ：中國近代化における農村工業——河北省高陽縣を中心に

座間紘一：中國農村問題の所在——改革下の山東省農村を訪ねて

内山雅生：華北農業經濟史研究の成果と課題

吉田宏一：河北省豐潤縣米廠村における農業經營と農民層分解の動向

(參照《近きに在りて》14號，1988.11)

### 第5屆

1988年7月29日 東京(學士會分館) 26人

佐野健太郎：民國期中國煙草產業の經營の一側面——英米と南洋の財務政策をめぐつて——

飯塚靖：浙江省における棉作改良事業

富澤芳亞：綿絲統稅交渉における紡績業の動向

塚瀬進：日中合弁鴨綠江採木公司の分析——中國東北地域における日本による林業支配の特質——

(參照《近きに在りて》16號，1989.11)

### 第6屆

1990年7月21日 東京(學士會分館) 37人

「清末の開港場と對外經濟關係」

朱蔭貴：1860～90年代に中國資本主義が順調に發展できなかつた内因の考察

宮田道昭：開港以後における汕頭港の流通狀況と地域經濟

本野英一：1880年代の茶貿易衰退をめぐる一考察—漢口・上海のイギリス向け紅茶取引を中心に—

黒田明伸：書評：濱下武志《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をこう讀む

(參照《近きに在りて》18號，1990.11)

## 「林本源」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許雪姬\*

### 一、前言

提起板橋林家，不僅在臺灣，就是在日本、大陸和南洋也都知道臺灣首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富的「臺灣林」。然而在臺灣史的研究中，儘管臺灣第二家的霧峯林家早已擬定其家族歷史和建築的相關研究，並已出書，<sup>①</sup>一些中小富戶如張士箱家；龍井林家；清水蔡家、楊家都已有人研究，但以板橋林家為中心的研究，戰後仍不多見，即使有，在時間上，也大半偏重在清代及割讓初期。不及於日據時期，在性質上不及其家族結構，商業體系，及其與政府之間結成的強固網絡，故號稱臺灣第一家的林家在歷史研究成果上卻瞠乎其後，何以會造成這樣的結果？有以下三個原因：

(一)林家相關資料及文物在內渡時倉皇中失掉不少，携回廈門的部分，又因民國3年12月31日發生的火災而銷燬，<sup>②</sup>缺少最基本的資料，自然難以做研究。

(二)林家在日據五十年中，成員有的是中國籍，有的是日本籍，更有的以日籍臺灣籍民的身分活躍於大陸，後兩者難脫「協助」日本「統治」臺灣，侵略滿洲、華南、南洋之嫌，在戰後仇日的氛圍下，去研究林家毋寧是尷尬的。

(三)1897年林家二房熊光的孫女林正子與吳密察等人在日本東京發起林本源研究會，出版兩期會報後，會務暫時中止，相對於霧峯林家的出錢出力研究自己的家族，板橋林家的後裔似乎對這方面興趣不大。

由上面三個因素可知，要研究林本源最先要突破資料的困境，其次是將林家在日據時的歷史予以定位，解除「立場」的問題，第三希望林家後裔能盡量提供部分家藏的資料，<sup>③</sup>以利研究。

## 二、「林本源」的相關資料

### (一)官方文書：

1. 清代官方文書以故宮所藏的各種檔案為主，如宮中檔、軍機處月摺包奏摺錄副、上諭檔、月摺檔，這些檔案不僅林家的資料不少，而且是相當關

① 林家後人所組的財團法人臺灣省臺中市素真興慈會委託臺大土木系與歷史系合作，進行「霧峯林家歷史及宅園研究工作」，建築部分已出版；歷史部分也已出版《霧峯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 1729~1864 A. D.》一書，尚有 1864~1945 A. D. 之間共三部書，黃富三教授還在撰寫中。

② 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5228 號，大正 4 年 1 月 8 日，三版。

③ 據林衡道先生訪問記錄，林熊徵長子林明成家中有林本源賬簿資料。

鍵性的史料。其次實錄、起居注、東華錄、清史稿也有值得參考之處。

2. 日據時期以藏在臺中臺灣省文獻會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為最重要的官文書，其次為藏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相關資料，如：外務省文書S. 5. 1. 6. 0本邦の地方政府及び個人に對する借款關係雜件，23. 福建の部：臺灣銀行及び林熊祥關係の對省政府借款關係，大正5年11月～昭和10年7月；3. 3. 3. 25 廈門ニ於テ林維源銀行設立計畫一件，明治38. 4～明治38. 11，1冊；A. 5. 3. 0. 3 臺灣人關係雜件，昭和2年～昭和17年，廈門ニ於ケル臺支人武力派ニ關スル調査；後藤新平文書也有兩件有關林家的資料，一為六二：糖業關係，及18：林本源製糖會社ニ關スル件大正六年；一為九七，林本源家政整理關係，明治40年8月。此外，本所外交檔也有相關檔案，如機關03-20，宗號40-(1)，閩粵兩省欠還臺灣銀行檔案。

#### (一)私人全集文集

與林家相接觸的人物如施士浩（《後蘇齋合集》）、《陳衍石遺先生集》）或閩浙臺的地方官吏如劉銘傳《劉壯肅公省三奏議》）、姚瑩（《中復堂全集》），及如《李文忠公全集》、《左文襄公全集》等都有相關記載。日據時期如鈴木三郎文書中有有關林本源家關係書類。<sup>④</sup>

#### (二)報紙資料：

清代 *The North China Herald*（《北華捷報》）、《申報》；日據時期的《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新民報）。

大園市藏著《板橋與林本源家》（東京，日本殖民批判社，昭和五年），澁澤壽三郎，《林本源庭園案内》（昭和十年），至如《臺灣通史》、《臺灣文化誌》中也有林家的傳。

#### (三)林家自行出版的資料

1. 王國璠，《板橋林氏家傳》
2. 吳守禮，《臺灣林本源家文物及資料》《呂世宜西邨先生研究資料》
3. 林熊祥，《林文訪先生詩文集》
4. 林景仁，《東寧草》等。

#### (四)方志

《噶瑪蘭廳志》、《淡水廳志》、《海山郡要覽》、《板橋街誌》。

#### (五)口述歷史

<sup>④</sup> 吳密察調查，〈林本源關係文書〉，《林本源研究會會報》，第二號，1988年4月15日。



本所曾於民國 79 年 3～4 月訪談林衡道先生，他提供相當多的資料，如家族成員的情形，又如稱謂問題。

### 三、過去研究的情況

戰後有關林本源的研究極為缺乏已如上述，比較重要的論文有四：王世慶、史威廉合著〈林維源先生事蹟〉（《臺灣風物》24卷4期），許雪姬〈板橋林本源及其邸園之研究〉（收入臺大土木所都計市民國七十二年版的《板橋林本源園林研究與修復》），王世慶〈林本源之租館和武備與乙未抗日〉（臺灣文獻38卷4期）、吳密察〈明治三八年における厦門林維源銀行の設立計畫〉（《林本源研究會會報》，第二號），此外吳守璞、陳漢光、林衡道、高橋彝男也有相關的作品，<sup>⑤</sup>茲不贅。

由以上論述可以歸納出過去研究林家，在時間上較偏重於清代（王文、吳文爲日據時期）；在性質上則有以下三個重點：

（一）家族成員的傳記：如林平侯、林國華、林維讓、林維源、林爾嘉（菽莊）、林景仁（小眉）等傳。

（二）林家花園：林家花園是清代臺灣四大名園之一（霧峯萊園、新竹潛園、北郭園），而其面積、綉麗、花費卻屬臺灣第一，研究林家花園建造的原因、經過，及其建築上的特色，有不少篇章。如劉如桐，《林本源庭園建築史料》；李騰嶽，〈板橋林氏林園泥爪〉；唐風，〈時甫侍郎與林家花園〉；高橋彝男，〈關於林本源邸〉；李乾朗，〈板橋林本源庭園建造之謎〉。

（三）與林家有關的文人呂世宜、謝瑄樵也有不少研究；如林家委託吳守禮編《呂世宜西村先生研究資料》；林斌，〈記謝瑄樵與呂世宜〉。

比較具全面性有關清代林家的研究只有「板橋林本源及其邸園研究」一文，此文企圖將板橋林家在臺灣的情況（斷至清代）勾勒出來，就其成員，其義舉，林維源對當時的貢獻，及林家財富、地位象徵的林家花園建造的經過，及歷經的滄桑都曾觸及。

### 四、今後研究的方向

有關林本源的研究今後當朝下列方向進行：

<sup>⑤</sup> 參看許雪姬，〈板橋林本源及其邸園研究〉一文中的參考書目。

### (一) 家族史

1. 林家成員個別的歷史——日據時期活躍於中日舞臺的林爾嘉（他在廈門設電話、自來水，興建漳廈鐵路，對廈門貢獻良多），林熊徵（倡導同風會、公益會、有力者大會，是總督府對付文化抗日的一只棋子）、林熊祥（華南銀行的設立、借款給福建省政府、皇民奉公會會長等）相當精彩的一生）、林鶴壽（管理林本源祭祀公業，後在上海經營鶴木公司，但因在臺錢莊負債累累，在上海的房產遭拍賣），此外如林景仁、林彭壽、林嵩壽、林祖壽、林松壽、林柏壽、林熊光等有關成員都應做深入了解。

2. 林家的婚姻圈——林家自認家大業大，全臺士紳無一可以與談婚嫁，因此在選擇對象上大半是在大陸的官宦之後，如林爾康娶太師陳寶琛之妹，其子熊祥再娶陳寶琛之女；林熊徵娶盛宣懷第五女盛關頤；林景仁娶南洋僑商巨富張煜南女，林剛義娶福建都督孫道仁女，林鼎禮與林履信分別娶金門旅日巨賈王迎祥的兩個女兒、林熊徵妹嫁嚴復的三子嚴玟，另一個妹妹嫁給沈葆楨的兒子沈仲三、林崇智娶道臺周南之女兒；與日人聯姻的有林熊光娶牧師石原保太郎之女石原文子；娶法國人的有林克恭、林志寬。除了林祖壽娶清水富家蔡蓮舫的女兒，是娶臺灣人的唯一例外。

3. 林家的家庭結構：林家人丁旺盛，他們之間如何稱呼，婚喪喜慶的習俗有何特別？其心理狀況如何，可以由社會人類學的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

4. 分家及祭祀公業：林家偌大的家產，及其較特殊的家庭結構，使日據時期的析產工作相當困難，因此由日本政府出面強迫各房簽字以減少分家所帶來的家族摩擦，也就因此日本政府介入林家的家族事務中，因此分家對林本源家族而言，是一項相當重要的課題。

### (二) 財富的累積與產業的經營

林家自林平侯起，在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就成為全臺鉅富，其商業經營及土地開墾上必有獨到之處，必須究明。尤其是林維源時代林家的財富、聲勢達到最高峯，他在撫墾工作上如何進行？又如何經營商業？商業的內容為何？到了日據時期三房頭六記號各自經營何種行業？而林家各房合資的林本源製糖會社，及以後的華南銀行，都有必要做深入研究的必要。

### (三) 林家在日據時期的活動

1. 林家在日據時期與總督府的關係

林家與總督府間的關係依時間來分可以分做初、中、末三期：1895年～

1906年即由割讓到林維源過世，先期是敵對狀態，後來雙方和解，此時期是為早期；1907年～1937年，此期為中期，也是林家受日本扶植，及林家代表保守勢力對抗文抗活動的時期；1937年～1945年，此期是末期，林家隨日本勢力進出各地，如朝鮮、滿洲、南洋等地的投資期。然而在這同時日人對林家仍是猜忌的，如要林熊祥做皇民奉公會的會長，並對林家不合作的成員予以迫害，使雙方關係又趨緊張，然而有關這一方面的研究付之闕如。

## 2. 林家與其他臺灣新興家族

林家與霧峯林家在清代就已是名門大族了，相對於日據初期崛起的鹿港辜家，高雄陳家及基隆顏家，清水蔡家、楊家，林家與這些家族間的關係如何？如林家在領導保守勢力時，這些家族多半加入，因此研究林家與其他家族間的關係是相當必要的。

## (四) 林家與總督府的對岸經營

臺灣總督府的對岸經營林家應該占有重要的角色，一者總督府借著臺灣籍民將勢力滲透到對岸，盡量減少中國人對日本資本、勢力的抗拒；林熊祥借款給福建省政府（居然比臺灣銀行借得還多）；有關這方面由於史料尚未齊整，也尚未有人研究。

## (五) 林家與中國政府間的關係

日據五十年林家固然在日本政府的統治下，大半成員加入日本籍，但加入中國籍的成員也有，如林爾嘉；也有與中國政局發生關係者，如林熊徵投資漢冶萍公司，贊助黃花岡起義；林松壽曾任北京政府交通署署長，有關這一方面也還沒有探討。

## 五、結 論

研究林本源雖然有資料不足之憾，但是如果參考當時的官方文書、私人文集、報紙、雜誌及林家成員的口述歷史，仍然可以針對林家的成員、家族企業，與日本政府的關係，林家與總督府的對岸經營，及林家與中國政府間的關係等幾個重要問題加以研究，相信研究林本源，不僅僅是在研究一個家族的歷史，應該也是研究清末、日據時期臺灣史最重要的一環。

# 「臺灣傳統農村生產工具研究」 規劃研究報告

陳 秋 坤\*

## 一、規劃目的

本規劃研究的初期目的有二大項：一是建立人才庫，對國內從事臺灣傳統農村生產工具的研究者或收藏機構，進行聯絡及建檔工作，俾了解目前農具收藏及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以爲未來擬定研究計畫的參考。其次，爲求集思廣益，本規劃研究從民國 79 年 10 月 19 日開始，召集有關學者專家，進行系列工作會議 (workshop) 和田野觀察活動，俾從理論和實務方面，檢討農具研究的範圍以及分支研究計畫的推行。

在人才庫方面，我們大致已跟國內研究或收藏傳統農具的重要學者與民間專家，取得聯繫，並設法邀請他們參加研究規劃工作。目前，受邀參與研討會議的成員名單及其服務機構，有如下表：

張森富 (臺大農機系)  
賈精石 (臺大農機系)  
溫振華 (師大歷史系)  
江韶瑩 (藝術學院)  
陳明雄 (屏東農專)  
李廣武 (行政院農委會)  
吳桂森 (外埔鄉農務館)  
包漢英 (臺糖總務課)  
姚孟嘉 (漢聲雜誌社)  
管東貴 (史語所)  
臧振華 (史語所)

莊英章 (民族所)  
石 磊 (民族所)  
張存武 (近史所)  
張炎憲 (中山社科所)  
翁佳音 (臺灣史田野研究室)  
詹素娟 (臺灣史田野研究室)  
李季樺 (臺灣史田野研究室)  
王康男 (臺大農機系)  
古偉瀛 (臺大歷史系)  
陳俊明 (中興農機系)  
陳寶川 (屏東農專)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謝俊夫（屏東農專）  
謝清祿（行政院農委會）  
王工文（外埔鄉農務館）  
楊三和（臺糖博物館）  
黃榮泉（泰雅族文化村）

劉益昌（史語所）  
陳仲玉（史語所）  
林美容（民族所）  
陳茂泰（民族所）  
陳秋坤（近史所）

在這些成員中，大多數為任教於大學和專科學院的教授，尤其是農業機械科系專家，更是本規劃倚重對象；其次則為跟農具研究有關之專業人員，包括博物館等學者、史學家和民間從事農具收藏與研究的專家。這些專業人員，大部份對臺灣傳統農業生產工具甚為熟稔，少部份人則是曾經參與實際農具典藏與初步研究工作者。他們對未來成立農業遺產博物館或整理編製農具圖錄以及有關研究工作，都有一定助益。

經由前後幾次討論，我們覺得傳統生產工具的研究，目前宜就與農業生產有關的農具及其相關手工業為主要範圍，暫時不包括民間傳統初級工業如染布、製冰、織布等等。惟農具的研究範疇，應擴大包括史前先民農具、土著民族的旱田農作以及漢人傳統水田和旱田農作系統。如此，方能從農業文化的發展層次，觀察臺灣農業技術發展的全貌。

在研究取向方面，應從農民固有的農業知識體系著眼，試圖從使用農具者的眼光，了解農具的分類及其使用功能；避免從客位的立場，譬如以現代經營效率的眼光，批判農民的農作技術。為此，研究者應以實物為主，配合人類學者的田野研究方式，探訪各地具有豐富農作經驗的耆老；從他們的眼光和經驗，研判農具的分類、使用年限以及需求的勞動力，俾依此理解全年四季的農具使用狀態以及農村社會勞動力的分配情形。最後，則是將農具的製作及其技術水平跟農村社會經濟結構整合起來觀察，藉有系統的農具分類研究，分析傳統農民的生產力及其生產技術的侷限性。

## 二、規劃工作的進行狀況

本規劃研究前後辦過三次研討會，分別從農業遺產博物館的收藏與展示以及農具的分類整理等二大方面，邀請專人報告。第一，有關農具遺產的典藏與展示方面，目前國內最有可能成為農具典藏及研究中心的機構為屏東農專（即將於民國八十年七月升格為國立屏東技術學院）。過去六年來（1986～

1990)，該校農業機械科謝俊夫、陳寶川和陳明雄等三位教授與教育部簽訂研究計畫，有系統地收集散存民間農舍的傳統農具，並造訪民俗工匠藝人，俾為未來補修、保固破舊農具，進行儲才工作。此外，教育部也應允撥款供該校建造大型農具典藏博物館，在可見的未來，位居屏東內埔鄉的屏東技術學院將可成為臺灣傳統農村生產工具的研究兼展示中心。

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本規劃研究會率領參與研討會同仁參觀屏東農專所收藏的農具。大體看來，該校收藏已粗具規模，舉凡農民四季農作活動的器械，都有相當的實物標本。目前最大困難在於庋藏場所及展示空間係由倉庫改裝，過於粗糙而狹小；若干大型器械，如碾米工場（土壟間）設備，限於空間無法復原，只能暫時散置倉庫一隅，對農具的保藏，並不理想。至於農具的分類與整理，包括農器的定名（俗名）及其使用功能，尚因人力限制而未能有系統著手進行。

就屏東農專未來建館的計畫而言，該校計畫主持人謝俊夫教授和國立藝術學院江紹瑩教授等有關專家普遍認為，建館的硬體設計必須事先長遠的規劃，務使建物配合展示理念和農具的特質。在國內一時尚無合適的典範博物館可堪仿效之際，它必須參考同為水田農作系統的日本民俗博物館的硬體設計，俾有足夠的空間，容納和展示個別的器具。另一方面，農業遺產博物館也必須預先就農具的分類與整理，進行研究及規劃工作，尤其在農具的命名和歸類方面，必須兼顧農民本身的民俗農作知識和地域農業特色。

在屏東農專之外，我們尚參觀臺中外埔鄉農務館和臺南臺糖博物館。外埔鄉農務館是由前任鄉長吳桂森任內（1985～1989）規劃完成。這是由全鄉鄉民共同動員而完成的小型農具展覽館，並在民俗專家王工文的協助下，進行農具的定名、分類工作。原始構想是藉農具的收集整理與排比，達到普及農業遺產知識的教育效果。農務館的最大特色之一，在收藏一套具體而微的傳統農機器械，且在每件農具標示學名和民間通用俗名，對農具的正名，具有一定的意義。惟限於展示場係由倉庫改裝而成，空間狹小且欠缺保固、維修工作，致使農務館不易形成永久的典藏場所。建議臺灣省政府和臺中縣市政府以外埔鄉農務館為基礎，擴大興建臺中地區農具博物館，俾使農務館能吸收其他私人農具收藏，擴大為正式的展示兼教育場所。

其次，由臺糖研究所主持的臺灣糖業博物館，建於1980年，主要典藏臺灣糖業製作機具和相關歷史文物。鑒於糖業在臺灣經濟史上曾經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且臺糖公司在業務鼎盛時期，曾為國內最大且最具規模的企業

機構，因此，製糖工業及臺糖公司本身，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對象。目前糖業博物館限於人力、物力，只能庋藏部份製糖用具，包括舊式煮糖大鍋、輾蔗石器以及各種甘蔗採收機器。有關糖業發展的歷史深度方面，則較為欠缺。臺糖公司本身收藏豐富的檔案文件，亟需專人針對製糖業及臺糖公司進行專題研究計畫。

第二，在傳統生產工具的研究方面，經由幾次研討會的交換討論，目前的共識可分兩方面。一是以屏東農專及其他典藏機構現有的農具，進行有系統的整理。這項工作包括將農具分類、定名、拍攝及描測，目的在編輯成套的農具圖錄，作為農業遺產研究的參考工具書。其次是針對個別農具的演化歷史，進行科技整合研究。一個可行的辦法是結合農業機械專家的專業知識和人文學者的歷史素養，研究特定的農具，譬如田園耕作常見的犁具。目前所知，已有屏東農專陳明雄教授和師範大學溫振華教授願意共同提出分支計畫，研究臺灣農業史上的犁器，這是很好的開端。臺灣大學農機系張森富教授，也有意進行四十年來水稻收穫機具演變史的研究工作。另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秋坤先生將和李子寧先生合作，提出『臺灣傳統農具與水稻耕作知識系統』的研究。我們期望這些科技合作的分支計畫，能夠順利進行，俾進一步啟發有興趣的學者專家，提出有關農具的研究計畫。

### 三、規劃研究建議事項

基於文化保存觀點，本規劃研究建議國科會支持有關臺灣傳統農村生產工具研究專題計畫。農業在臺灣經濟史上的重要性，已無庸再言。值得強調的則是過去二十年來，農村生產工具隨著社會經濟型態的轉型而快速動力機械化；許多過去曾與農民生息相關的傳統農作用具，因為農作全面機械化的結果而普遍面臨淘汰的命運，隨意被棄置田間農舍。過去幾年來，雖然有美籍專家 Bruce Billings 教授、屏東農專農機科教授以及若干私人機構，從事搜集、保藏和初步的研究工作，但這些努力卻限於人力、物力而尚未能展現應有的成果。許多研究及收集整理農具，現在如果不做，未來將因農具散失四處而更難收集完備，且做起來愈將事倍功半。英國碩儒李約瑟（Joseph Needham）教授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窮其一生精力，致力搜集、編寫有關中國傳統科技文明發展史鉅著，成績斐然，舉世注目。作為現代國人，更有責任搜羅、整理、展示及研究跟臺灣乃至大陸傳統農業生產體系息息相關的生

### 產工具及其技術文明。

本規劃研究根據參與規劃研討會同仁意見，建議如下事項：

- (一)有鑑於農業遺產博物館的建館及展示研究，係屬開創性工作，國科會宜協助屏東技術學院教授及其他有關研究人員前往日本、大陸以及美國等地，參觀類似民俗博物機構，以便該校建館參考之用。未來農具博物館應仿效國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編制，獨立運作，避免淪為目前縣市文化中心那般空洞而欠缺典藏與教育功能。
- (二)以屏東技術學院和其他公私藏農具為基礎，按一年四時農作活動，有系統地收集、拍攝、描繪及說明個別農具及其演變歷史，進而編輯成套有關臺灣傳統農業生產工具圖錄。這套圖錄，短期目標可作農具研究參考工具書，如 1937 年由 Rudolf P. Hommel 編製的 *China at Work* 和大正十年(1921)臺灣總督府印製之《臺灣の農具》，即可作為範例。長期計畫則應師法李約瑟博士《中國科技文明史》的撰述方法，有系統地將農具的生產技術和農民固有的農業知識體系合併觀察，以探討近四十年，乃至二百多年來，臺灣農業發展的軌跡。
- (三)對個別農具歷史的研究如犁、收穫機具等器械的演變，國科會應予支持，尤其泛科際整合研究計畫，在現階段農具研究，更屬迫切。其次，不少民間私人收藏家和民俗專家對農具的定名和辨識，具有特殊貢獻，國科會宜以「田野訪問費用」名目，酌加補助，藉以借重他們豐富的民俗知識。
- (四)傳統農村生產工具研究，短期固然宜以佔農業生產結構主要部份的漢人水田稻作為主，惟從文化保存觀點，長期研究視野應包括史前先民農具以及土著民族的旱田耕作器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臧振華教授，有意從事史前農具的研究；同院民族學研究所石磊和陳茂泰教授也有意研究高山族的旱田農作系統。目前這些研究構想尚在醞釀之中。在可見的未來應有提出分支計畫的可能性。
- (五)本規劃研究結束之後，將向國科會提出一項中型研究計畫，預備分成下列幾項專題進行分支研究計畫：
  - 1.謝俊夫、陳寶川：傳統稻作農具的使用方法及其圖錄製作
  - 2.溫振華、陳明雄：臺灣犁的種類及其差異原因之探討
  - 3.張森富：四十年來本省水稻收穫機具之演變
  - 4.臧振華：臺灣史前農業工具研究
  - 5.陳秋坤：臺灣傳統農村生產工具、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研究，1700~1840



# 「臺灣社會變遷之研究， 1895-1990」計劃

陳慈玉·許雪姬\*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七位同仁，為探討近百年來臺灣的社會變遷，分別提出七個有關臺灣史的研究計劃，最近已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通過，將在民國八十年七月開始進行。這七個計劃共分為四個主題，分別是臺灣家族企業、社會組織、戰後政治變遷及日據時期的閩臺關係。以上七個專題都屬於近史所「臺灣社會變遷之研究，1895—1990」計劃中。茲簡介於下：

## （一）臺灣家族企業的形成

臺灣的中小乃至大企業都是聚沙成塔、一點一滴慢慢形塑的商業集團，因此了解民間企業的由無到有、與政府的關係，首腦人物的經營理念等，是了解當代臺灣社會經濟發展與變遷的一大關鑑，同時也是了解傳統農業社會成功地轉型為現代工商業社會的一重要線索。本主題之下有兩個計劃，分別探究日據時期基隆顏家和光復後臺南幫企業的發展：

1. 日據時期臺灣的新興財團——以臺陽礦業財團為個案研究，陳慈玉負責。

基隆顏家（顏國年、顏雲年）所創立的臺陽礦業財團，在日據時期（1985~1945）臺灣工礦業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顏家由礦業起家，透過其多元化的經營，和當時的殖民地當局與日本財閥合作，蓄積了相當的資本，成為臺灣的五大家族之一。然而隨著日本戰敗，顏家喪失了憑藉，雖仍在政界、商界有一席之地，但已無復往昔之風光，足以顯示民間商人與政府的互動關係，足以影響其企業之興衰。本專題主要在探討日據時期臺灣礦業的發展實況、顏家與臺灣總督府及三井財閥間的關係，及臺灣經濟在日本經濟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2. 臺南幫企業集團的形成與發展，謝國興負責。

---

\* 二人均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所謂「臺南幫」企業集團，係指以臺南紡織、環球水泥、統一公司及其眾多相關企業所組成的企業集團。這一企業集團的形成，若自第一代經營者侯雨利投入工商業的時間算起，至今已六十餘年；若自該集團的第一個大型現代化企業——臺南紡織設立算起，距今亦已三十五年。本計畫第一年擬以臺南幫的形成作為主要的研究範圍，亦即 1920年~1950年，至於 1960年以後，可算是該集團的發展、擴充期，擬作為第二年繼續研究的範圍。除了企業本身的發展外，其企業的投資者、經營者，及其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亦是研究的重點，故本計劃主要的研究，在於探討企業集團之形成、經營、發展；領導人物之成長背景；政治經濟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

### （二）臺灣社會組織的發展

日據時代臺灣保甲制度之研究——鄉村社會組織和保甲之關係，主持人為許雪姬，共同主持人為洪秋芬。

保甲制度如何影響日本政府對臺的殖民政策？1898年8月起實施到1945年6月17日才廢止的保甲制度在日據臺灣社會組織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這是本研究最重要的主題。日本自占領臺灣後，面對著層出不窮、神出鬼沒的「土匪」，統治一直未上軌道，還曾有一段時期高唱「臺灣賣卻論」，在這種情況下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以保甲制度做為消滅「土匪」的對策，以律令發佈保甲條例以維持地方的安寧為目的，恢復了保甲制度，保甲制度在鄉村社會組織，如何透過地方政府及保正、甲長來實際運作，有篩選一個村或街在做實地訪談、調查之必要，希望本計劃能藉由研究保甲制度的建立、變遷，瞭解到制度的運作及落實，來探討日據時期日本對臺的殖民政策。

### （三）戰後臺灣的政治變遷

以往有關二次大戰前後臺灣政治變遷方面的研究雖然不少，但相形之下，探討影響政治層面既深且廣的軍事和外交問題則不多，本主題下的兩項研究計劃即針對這兩方面：

1. 二次戰後臺省建軍的研究，1945~1949——以鳳山建軍為個案，朱滋源負責。

二次戰後，隨著日軍的撤離臺灣，臺灣在軍事佈防上完全屬於真空狀態，但到了 1949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駐防金門的部隊，卻能擊敗共軍的攻擊，一舉扭轉了臺灣的命運，這些調赴金門防禦共軍攻勢的部隊，都是先期在臺灣受訓的軍隊，由此看來，在短短五年的時間所訓練出來的軍隊極為可觀，在這段期間，以在鳳山的建軍最為重要。本計劃希望以鳳山建軍為個

案，瞭解臺灣建軍的背景及其經過，政府在接收臺灣到播遷來臺這段時間，對臺灣軍事上所做的苦心經營，及美國政府對臺灣建軍的協助，並檢視這五年建軍的成果。

## 2. 釣魚臺列嶼的主權歸屬，張啟雄負責。

日據時期釣魚臺雖然屬於日本管轄，有謂在臺灣總督府的管轄下，實則歸沖繩縣（琉球）管轄。戰後，琉球與釣魚臺歸美國管理，美國宣稱日本對琉球有剩餘之權，於是將琉球羣島移歸日本管轄後，包括釣魚臺列嶼，此舉立即引發了 1970 年前後，中日之間有關釣魚臺的歸屬紛爭。1990 年 10 月，因臺灣省區運會聖火傳遞至釣魚臺事件，中日間再度爆發了歸屬紛爭的問題。本主題希望能由超然客觀的學術研究，亦即利用歷史學、海洋地理學、語言學等學門，配合相關史料，以國際法觀點、「中華世界秩序」觀點，來理解歷來釣魚臺列嶼主權紛爭的經過、釣魚臺列嶼真正的主權歸屬。

### （四）日據時期的陸、臺關係

日據時期臺灣與大陸實質上分屬兩個不同的國家，此兩者的關係因此重新展開。而最具體的是臺灣籍民在大陸和華僑在臺灣的各種活動，亦即人民互相交往的關係，以及雙方的商貿關係，是其中很重要的兩部分：

#### 1. 日據時期臺灣與大陸間的商貿關係，林滿紅負責。

臺灣與大陸間的商貿關係，自荷據時期起、歷經明鄭、清代到日據時期，除了 1655 年清廷為打擊明鄭實施海禁外，從不曾間斷過。本計畫希望能對 1895 年以後陸、臺貿易的內容如臺灣輸大陸的米、糖、茶葉、樟腦；大陸輸臺灣的日用品如棉紗、棉布、紙、陶、瓷、紙錢及其他雜貨；貿易路線及貿易商做一研究。其中，有關日本占領臺灣後，從事陸臺貿易的商人當中，如日本商人、大陸原來投資陸臺貿易的郊商、臺商、洋商間關係如何蛻變，大陸與臺灣之間如何透過住在日本的華僑進行轉口貿易，成為研究重點。

#### 2. 日據時期的臺灣華僑，1927~1937 許雪姬負責。

1895 年臺灣割讓後，依馬關條約的規定在 1897 年 5 月 8 日不回大陸、不選擇中國籍的臺灣住民，都成為日本籍，而在臺灣住民去就決定日後自大陸來臺的中國人就稱為臺灣華僑。有關臺灣華僑的研究可以分成三個時期來加以討論：1895~1927，1927~1937，1937~1945。本計畫主要著重在第二個時期的研究。這個時期值得研究的重點有四：① 1927 年臺灣華僑組織臺灣中華總會館後，對臺灣僑運的影響。② 1931 年臺北總領事館成

立，象徵著大陸與臺灣之間新關係的建立，歷任領事的表現是研究的重點。  
③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臺灣華僑面臨的困境，及回祖國投資的因應措施。  
④ 臺灣華僑與臺灣人政治團體間的關係。

此七項計畫除了重視文獻資料外，並盡可能利用口述史方式的訪談所得來增益其不足之處，而且也希望利用田野調查的方式來建構史料，以拓展臺灣史研究的學術領域。

---

##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細菌部隊罪證陳列館簡介

韓 曉\*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舊址，位於哈爾濱市平房區的興建、新疆、新偉和友協等四個街道辦事處的管轄區內。距哈爾濱市中心二十多公里。東鄰劉家窩堡屯，南與原侵華日軍第八三七二空軍部隊舊址（今哈爾濱飛機製造公司）接壤，西靠何家溝河，北鄰正黃旗頭屯和正黃旗五屯，方圓大約六點一平方公里。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通稱「石井部隊」，對外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始建於1933年，其本部設在哈爾濱市內南崗區宣化街和文廟街接壤地帶；附屬細菌實驗場設在拉濱（拉法——哈爾濱）鐵路線上的背蔭河站以東一公里處。石井四郎軍醫正（少佐）任部隊長。

實質為細菌武器研究所的石井部隊，唯恐暴露秘密，將部隊化名為「加茂部隊」、「東鄉部隊」。建隊不久，由於東北抗日聯軍的作用，背蔭河細菌實驗場發生了「越獄暴動」事件，致使他們報請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批准，於1936年初開始將石井部隊遷至平房。他們在平房站以北四公里的地方，霸占了六點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密建「軍事城」。1938年6月，當石井部隊的建設初具規模的時候，關東軍司令部發佈了第一五三九號命令，將方圓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地盤劃為平房特別軍事區域。在距部隊五公里的地方變成

---

\* 哈爾濱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館長

了「無人區」。

當石井部隊於 1939 年正式建成的時候，部隊擁有人員八百名，1941 年部隊人員擴充到近三千人。平房本部下設第一部（細菌研究）、第二部（實戰研究）、第三部（防疫給水研究）、第四部（細菌生產）、總務部、訓練教育部、器材供應部和診療部。並在林口、海林、孫吳、海拉爾分設四個支隊，在大連設有衛生研究所。1942 年部隊使用密匿番號，整個石井部隊稱「滿洲第六五九部隊」，平房本部稱「滿洲第七三一部隊」（1945 年 2 月，改稱滿洲第二五二〇二部隊）；林口支隊稱「滿洲第一六二部隊」，海林支隊稱「滿洲第六四三部隊」，孫吳支隊稱「滿洲第六七三部隊」，海拉爾支隊稱「滿洲第五四三部隊」，大連衛生研究所稱「滿洲第三一九部隊」。

日本軍國主義爲準備細菌戰，企圖在中國侵駐地建設細菌武器研究網。在建立石井部隊的同時，在新京（長春）設立了滿洲第一〇〇部隊。蘆溝橋事變後，在北平（北京）設立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隊，在南京設立「榮」字第一六四四部隊，在廣州設立「波」字第八六〇四部隊。此外在侵華軍各師團還設立了機動性的「防疫給水部」。而石井部隊本部——滿洲第七三一部隊卻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細菌武器研究中心和細菌戰指揮大本營。

滿洲第七三一部隊主要活動是：

1. 研製細菌武器。他們研製的細菌武器大體上分爲進攻性和預防性兩大類：所謂進攻性武器是指把鼠疫、傷寒、霍亂和炭疽等傳染病菌變武器，通過投擲炸彈、媒介物和撒佈等方法去殘殺敵對力量；所謂預防性武器是指在失控的情況下，預防各種傳染病蔓延或者對日本人細菌感染後的治療而研製的各類疫苗、菌苗和血清。

2. 用活人作試驗。爲檢驗各類傳染病菌的毒力和疫苗、菌苗、血清的效能，他們竟慘無人道地用活人作試驗。據不完整的調查，他們通過五十多種方法進行細菌試驗，殘殺無辜的中國人、蘇聯人、蒙古人、朝鮮人等至少有三千多名。

3. 實驗性的使用細菌武器。他們經常組織「遠征隊」或「陰謀破壞班」，與其他細菌部隊密切配合，在大面積殘殺無辜人民的活動中檢驗細菌武器的效能。據初步調查，他們進行的這類活動至少有六次。

石井部隊的頭目們，深知這些活動是見不得人的，在 1945 年 8 月 14 日最後撤退之前，奉命將主要建築物、儀器設備以及重要資料等罪證全部銷毀。可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還遺留下一些殘迹。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中國的有關的學者在七三一部隊侵駐地——平房，發現了其罪證遺址、遺迹十九處，其中有七三一部隊的代表性建築物——本部大樓舊址。調查發現石井四郎（中將）和北野政次（少將）曾先後在這裏策劃細菌武器的研究活動；還有細菌研究中心——四方樓及監獄遺址、冷凍實驗室、焚屍爐、動物飼養室、跳蚤培植室、焙燒瓷製細菌彈殼的窩體、城子溝野外實驗場舊址。這些遺址、遺迹對研究七三一部隊的罪行起到了歷史的旁記作用。

1982 年末，經批准，將七三一部隊罪證遺址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同時，黑龍江省人民政府和哈爾濱市人民政府決定設立「哈爾濱市平房文物管理所」，加強對七三一部隊罪證遺址的保護和利用。為了發揮其對全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陣地作用，1984 年將文管所改稱「哈爾濱日本細菌工廠展覽館」，1985 年又改稱「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當年 8 月 15 日正式對國內外開放。

該館在國家投資對其十九處罪證遺址加以保護利用的同時，還在其部隊長室舊址開闢了臨時的「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室」，展出了其罪證實物、照片、日本細菌戰犯供詞、目擊者證言等三百餘件。

開館五年來，接待國內外觀眾十五萬人次，其中日本、蘇聯、美國、臺灣、香港等二十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觀眾三萬七千人次；此外，從 1988 年開始，每年提供部分文物到日本大阪、京都展覽，接待日本及其它國家的觀眾三十萬人次。

該館從 1987 年開始，還舉辦了「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圖片流動展」，深入平房區和動力區的農村、學校展出五十餘場次，參觀者達二萬五千人；他們還到各機關、學校、部隊等地舉行報告會，有二萬多人受到了愛國主義教育。此外，該館還組織專業人員到日本進行考察和到香港參加「近百年中日關係國際研討會」，與國際上的歷史學者進行了學術交流。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雖然規模小，但在向全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向世界「反對戰爭」宣傳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名人日記兩種

王世杰日記	10冊	精2000元	平1500元
徐永昌日記	2冊	精 800元	平 700元

函購八折，郵撥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 十年來中國大陸華僑史研究的 回顧與前景 (1979-1989)

林 金 枝\*

華僑史是中外關係史和世界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華僑是中外關係的橋樑和紐帶。中國歷代海外交通、國際貿易、文化交流等都有華僑參加並發揮積極作用。今天中國大陸制定外交政策、經濟政策，尤其是華僑政策和國家的四化建設，往往也要以華僑的歷史和現狀作參考依據。華僑史已成為一門有裨實用的學科。

華僑出國歷史，如果從唐代算起，已有一千多年了。但是，中國對華僑史的研究時間卻很晚，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才起步。1905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中國殖民偉人傳》，介紹歷史上著名的華僑人物。不少人認為，中國華僑史的研究是從那時開始的。果如是，迄今也只有八十多年的歷史。

八十多年來，中國華僑史研究走過了一條艱難曲折的道路。從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後期，中國華僑史的研究是有成績的。李長傳、溫雄飛、劉繼宣、束世征、姚楠等人曾出過一批有影響的華僑史專著。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和新加坡南洋學會也曾先後出版過一些很有學術價值的書刊和論著。可惜，抗日戰爭爆發後，華僑歷史研究遂即停頓下來。

1949年以後，大陸的個別高校和科研機構也曾開展過華僑歷史研究，但其成績不大。「文革」期間，受到極「左」思潮的影響，華僑史研究又中斷了十年。由於上述原因，中國大陸對華僑史的研究長期未能得到長足的發展。

自1979以來，中國大陸實施對外開放政策，華僑史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

\*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教授

下面將著重通過中國大陸華僑史一、研究隊伍；二、學術活動；三、科研工作成果以及中外學術交流等四個方面狀況的詳細介紹和論述，闡明中國大陸華僑史研究已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出現了中國歷史上華僑史研究繁榮的新時代。同時對中國大陸華僑史研究工作提出一些看法，兼就已公開出版的有關華僑問題專著、論集和譯著逐一進行簡要評介，俾助讀者了解和利用。

### 一、研究華僑機構增加，研究隊伍得到充實

(一)高等院校和科研系統的專職和兼職研究人員近百人。從事研究華僑問題的機構主要有：

- (1)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華僑研究室；
- (2) 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
- (3) 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華僑研究室；
- (4) 華僑大學華僑研究所；
- (5) 福建社科院華僑研究所；
- (6) 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華僑研究室；
- (7) 吉林大學歷史系華僑研究室；
- (8) 華東師大中國史學研究所華僑研究室；
- (9) 汕頭大學華僑研究室、華人文學研究室；
- (10) 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華僑史研究組；
- (11) 海南大學華僑研究室；
- (12) 北京大學華文文學研究室；
- (13) 中國社會科學院華文文學研究室；
- (14) 龍岩師專胡文虎研究室；
- (15) 廈門大學陳嘉庚研究室。

此外，廈門大學歷史系、暨南大學歷史系、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華南工學院、廣州教育學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南亞研究所、世界史所、拉丁美洲所、雲南東南亞所、廣西印支研究所以及新華社新聞研究所等等也有專或兼職人員從事研究華僑史和華僑問題的。

(二)華僑歷史學會組織和僑務工作部門兼職及業餘專業人員的有二、三百



人。

1. 華僑歷史學會系統：

中國華僑歷史學會、華僑研究所以及廣東、福建、廣西、雲南、上海、吉林、四川等省市華僑歷史學會都有專職、兼職人員進行研究。

2. 全國僑報系統和專業雜誌

- (1) 華聲報；
- (2) 廣東僑報；
- (3) 福建僑報；
- (4) 廣西僑報；
- (5) 雲南僑報；
- (6) 浙江僑聲報；
- (7) 江門僑報；
- (8) 華僑華人歷史研究；
- (9) 華夏；
- (10) 華人之聲；
- (11) 華人文學；
- (12) 僑務工作研究；
- (13) 僑聯工作通訊；
- (14) 河北僑務；
- (15) 僑聲……

3. 各省市僑務辦公室及各地鄉訊，也都有僑務工作者或歸僑人士進行華僑的研究和宣傳工作。

由上可見，近年來中國華僑史研究隊伍發展甚為迅速，並具有下列特色：

(1) 從研究隊伍人數來看，由「文革」前個別單位或個別研究的一支小隊伍（最多只有二、三十人），發展到現在包括專職、兼職和業餘在內的數百人的一支大隊伍。這支隊伍基本由二部分組成：一是以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專職研究人員為主體的專業化隊伍，他們以探索有關華僑問題的理論和撰寫歷史和海外華僑、華人專著為主；另一是以僑務工作者、離退休僑務幹部和歸僑為主體的專職、兼職或業餘為主體的隊伍，他們主要是結合實際工作研究華僑現狀及變化，總結僑務工作的經驗教訓，撰寫回憶錄、華僑志和華僑史料以及僑鄉調查資料。這兩支隊伍各具特色，互有所長。

(2) 從地區分布看：由過去主要分布在閩粵二省的高等學校變成現在分布全國十多個省市，近三十所大學和研究機構，以及許多僑務工作部門。

(3) 從研究任務來看：由過去只把華僑史研究看成是一般研究任務中的一項變成爲現在許多部門將其列爲工作重點，出現了研究「華僑熱」的傾向和色彩。

## 二、研究機構和學會組織開展學術活動頻繁

近年來，中國華僑歷史學會以及廣東、福建、上海、雲南、吉林、海南、廣西、遼寧、四川、河南等省市、自治區及市、地、縣興辦的華僑歷史學會已有二十多個，都舉辦大、中、小型的學術討論會，大都有專、兼職研究人員以及僑務系統宣傳工作幹部參加，約有三、四十次，提交會議討論的論文和資料約 1000 篇（有些重複）。已有相當部分在公開和內部刊物（會訊）或論文集發表，也有專著出現，數量之多是空前的，呈現繁榮景象。

### （一）歷次學術會議簡介

近年來，華僑史研究機構和學會組織、開展學術活動頻繁，形式多種多樣。

1. 中國華僑歷史學會舉辦和聯合舉辦五次學術討論會，每次參加會議的有數十人至 120 人，提交論文和資料五次約在 250 篇左右。內容包括華僑歷史和現狀多個方面。華僑歷史學會會員約有 200 人。五次會議分別爲：

(1) 1981 年 12 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國華僑歷史學會並舉行第一次學術討論會。參加會議約百人。

(2) 1983 年 3 月，中國華僑歷史學會第一屆第一次學術討論會在京舉行，來自三十多個有關研究機構、學術團體和僑史工作者及部分省市僑辦、僑聯的有關負責同志共八十多人出席。

(3) 1986 年 7 月在北京召開全國華僑歷史學會第二次代表大會暨第三次學術討論會，來自十九個省、市、自治區的一百二十餘名代表出席。

(4) 1987 年 5 月，中國世界民族學會和中國華僑歷史學會在北京聯合舉辦《東南亞華人現狀及其發展趨勢座談會》。

(5) 1988 年 5 月，中國華僑歷史學會與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在北京大學共同舉辦華僑史理論學術討論會，出席會議三十多人。

2. 省市自治區的華僑歷史學會及其學術活動。

自 1981 年中國華僑歷史學會成立後，一些省、市、自治區及地、縣的華僑歷史學會、研究會，也陸續成立，開展學術活動。其中省區一級的已有十個。以廣東華僑歷史學會成立最早，活動較頻繁，影響也較大。

(1) 廣東華僑歷史學會舉辦四次學術討論會

廣東華僑歷史學會於 1982 年 6 月成立以來，已舉辦了四次學術討論會（分別在 1982 年 6 月、1982 年 8 月、1984 年 11 月和 1986 年 1 月），每次參加會議的約 50~80 人不等，提交論文和資料各有 30~60 篇。

(2) 福建華僑歷史學會、東南亞學會舉辦多次學術討論會

福建東南亞學會曾於 1963 年成立，是全國最早成立的專門研究東南亞問題的學術團體。先後在 1979 年 4 月和 1980 年 6 月召開二次學術討論會，討論華僑史和華僑問題，每次約 60~80 人參加，提交論文和資料各有 30~50 篇。

福建省華僑歷史學會於 1984 年 2 月成立並舉行學術討論會。參加人數約 100 人，提交論文 70 篇。1987 年 9 月，該學會又在廈門大學舉行學術討論會，出席會議的有 80 多人，提交論文 50 多篇。大會側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華僑、華人經濟的演變、特點及前景進行了探討。

1988 年 10 月，該學會又與省僑辦宣教處、《福建僑鄉報》編輯，在福州聯合舉辦胡文虎研究討論會，肯定了重新研究胡文虎生平的重要性，部分學者認為應該肯定他是一位傑出的愛國僑領。

(3) 上海華僑歷史學會成立並舉辦一次學術討論會（1983 年 12 月），參加人數 50 多人，提交論文 24 篇，學會會員 57 人。

(4) 雲南華僑歷史學會成立暨學術討論會（1985 年 6 月），參加人數數十人，提交文章 25 篇，學會會員六十人。

(5) 吉林華僑歷史學會成立暨學術討論會（1985 年 12 月），參加人數及文章、會員不詳。

(6) 廣西華僑歷史學會成立暨學術討論會（1986 年 12 月），參加人數 67 人，提交論文資料 33 篇，學會會員 67 人。

(7) 海南華僑歷史學會於 1986 年 8 月成立，出席會議有 45 人，學會會員數十人，會後出版《瓊州僑史》（創刊號），約有 5—6 萬字。

(8) 遼寧省華僑歷史學會成立暨學術討論會 1987 年 12 月在瀋陽召開。各地僑史工作者和研究人員數十人參加會議，大會收到 32 篇論文資料和回憶錄。

(9) 四川省華僑歷史學會成立並舉行第一次學術討論會（1988年11月），參加人數80多人，提交論文資料多20篇。

在各省市華僑歷史學會的推動下，廣東省的汕頭、梅縣、潮州、佛山、江門、中山、梅州、台山、揭陽；海南省的瓊山、文昌；福建省的泉州、漳州、閩西、廈門以及廣西的桂林、玉林等地的地方性僑史學會相繼成立，成爲僑史研究隊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 3. 大學科研機構舉辦學術討論會

近年來，一些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專門舉辦華僑、華人問題的學術討論會。

(1) 1984年10月，廈門大學召開陳嘉庚學術討論會；

(2) 1986年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舉辦「戰後東南亞華僑華人變化發展及其趨勢」學術討論會；

(3) 1986年9月暨南大學舉辦戰後華人變遷研討會；

(4) 1986年6月華僑大學舉辦「華僑與新四軍」專題座談會。

### 4. 舉辦國際性學術會議

近年來，一些高等院校就華僑、華僑史、華人文學和華僑教育等問題也先後舉辦五次國際性的學術會議。

(1) 1985年12月中山大學主辦華僑、華人歷史研討會。

中國大陸第一次華僑華人歷史國際研討會於1985年12月在廣州召開。會議由中山大學、香港大學和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聯合發起，中山大學主辦。參加該會的有來自美國、澳大利亞、日本、東南亞、香港等十個國家和地區以及國內專家學者七十多人，提交論文30多篇，研討會的中心問題，著重討論當代華僑、華人歷史、現狀以及華僑、華人同母國、僑鄉的關係。體現了歷史學者緊跟時代發展的步伐。

(2) 1986年5月廈門大學海外函授學院舉辦華人文學研討會；

1986年5月，在廈門大學召開華人文學首屆討論會，來自東南亞國家和香港地區的代表和國內學者近百人，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30篇，會議著重討論東南亞華文、新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係。

(3) 1986年3月，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舉行了華僑教育比較討論會。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與日本宮崎大學教育學部根據合作協議，於1986年3月在廈門大學舉行華僑教育問題討論會，來自日本和國內學者20多人出席了會議，提交論文19篇。會議專門對華僑教育進行了討論。

(4) 1987年9月，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主辦《海外華人與抗日戰爭》國際研討會；

由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與新加坡南洋學會聯合主辦《海外華人與抗日戰爭國際研討會》於1987年9月22日在暨南大學召開，出席研討會的有來自澳大利亞、新加坡、香港以及廣州地區從事華僑華人研究的專家學者60多人。會後還舉行了海內外華人問題研究交流會。

(5) 1989年4月《戰後海外華人變化國際學術討論會》。

由中國華僑歷史學會、福建省華僑歷史學會、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和新加坡南洋學會聯合主辦的《戰後海外華人變化國際學術討論會》於1989年4月24日至28日在廈門召開。來自新加坡、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來、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聯邦德國、荷蘭、日本和香港等十二個國家和地區專家學者和國內的專家學者150人出席了討論會，提交討論會的論文共70多篇。會議圍繞著二次戰後世界各地華僑、華人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和思想意識情況以及華人社區與社團組織等方面發生的各種變化進行了廣泛的討論。

#### (二) 學術會議討論內容

學術會議討論內容涉及範圍很廣，各地也有互異，大體可分二類：

##### 1. 一般性討論會

(1) 研究華僑史的意義、方向、任務和工作方法等。

(2) 研究華僑歷史（華僑定義、出國原因、分期、華僑與祖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係，華僑與僑居國友好相處及新做的貢獻）；

(3) 華僑的現狀（國籍、職業以及人口流動分布的變化）以及發展趨勢（同化、教育、社團等等）；

##### 2. 專題討論會

(1) 華僑愛國主義問題（愛國主義的形成、特點、內容及發展趨勢）；

(2) 陳嘉庚（諸如辦學、政治活動、陳嘉庚與經濟建設）、胡文虎等人物評價；

(3) 第二次大戰後東南亞華僑、華人發展變化的特點和發展趨勢；

(4) 華僑與中國四化建設的關係（如何發揮僑鄉優勢，加速僑鄉建設，以及如何調動華僑、歸僑、僑眷為中國四化建設作貢獻等）；

(5) 華僑、華人教育問題；

(6) 華僑史理論討論；

- (7) 華僑與新四軍的關係；
- (8) 沿海港口與華僑的關係；
- (9) 地方僑史的資料搜集和編寫；
- (10) 其它。

### 三、華僑史研究成果取得較大進展

近年來，在中國華僑歷史學會的推動下，各級僑務部門和有關單位的支持下，以及華僑史、華僑問題的研究工作人員的辛勤努力，研究成果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可喜現象，一批有學術價值的專著、論文集、資料匯編、工具書以及通訊會刊等，先後與國內外學者讀者見面。

據不完全統計，十年來，國內已正式出版的（含部分正在排印）專著、資料匯編和工具書有五十多部，約 1600 萬字；以華僑歷史為題材的小說等文學作品有數十部，約五百萬字；公開與非公開出版發行的僑史文集和研究期刊、會刊通訊等有 110 多集（輯），約 1000 萬字，以上三項約達 3000 萬字以上。現分類介紹：

#### (一) 公開出版的學著、論集

現將出版各書，逐一介紹如下：

##### 1. 《辛亥革命與華僑》

該書由洪絲絲等著，1982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1949年以來以《辛亥革命與華僑》為題出版的專著，該書由六篇文章組成，約八萬字。

##### 2. 《陳嘉庚興學記》

該書由廈門大學王增炳、余綱等著，1981年3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是一部記述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在祖國和僑居國興辦教育事業功績的專著。作者系統地描述了陳嘉庚先生一生熱心興辦教育的思想和言行。著重介紹了陳嘉庚在集美、廈門、新加坡等地創辦學校的感人事迹。全書共分七章約十萬字，另加一個附錄「陳嘉庚興辦教育大事年表」，並附珍貴照片五十一幅。

##### 3. 《陳嘉庚傳》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陳碧笙和歷史系楊國楨教授合著，1981年9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分十五章，16萬字，還附有《淺論陳嘉庚》一文和大事記表，對愛國僑領陳嘉庚的生平事迹作了系統扼要的概述。該書榮獲

1985年度全國愛國主義通俗讀物優秀獎。

4. 《華僑史研究論集》

由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吳澤主編，華東師大出版社 1984 年 4 月出版，該書收錄了 29 篇文章，共 32 萬字，是已公開出版華僑論文集規模較大的一本，收集了全國各地學者的代表作。

5. 《歸僑丹心》

描述歸僑、僑眷先進人物的通訊集《歸僑丹心》，1981 年 12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 10 萬字，收錄了二十五篇文章。介紹了二十八位在國內單位工作的歸僑、僑眷先進人物的成長和事迹。他們之中有科學家、工程師、醫生、教師、體育健將、工商業家等等。

6. 《寸草心集》

江西省僑務辦公室主編的一本專門介紹歸僑感人事迹的專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共收入十一篇文章，介紹來自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的八位歸僑經歷。他們在海外的家世、童年和回到母國後的生活、工作，有助於讀者了解歸僑在母國內地的真實情況。

7. 《集美學校七十年》

由紀念陳嘉庚先生創辦集美學校七十週年籌備委員會校史編寫組編著的集美學校校史《集美學校七十年》一書，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於 1983 年 9 月出版。

8. 《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研究》

該書由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林金枝教授撰寫，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8 月出版。全書 15 萬字。主要內容有《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的幾個問題》、《解放前華僑在廣東的投資及其作用》、《近代福建華僑企業的發生和發展》以及《華僑在上海地區企業投資的若干問題考察》。

9. 《華僑與辛亥革命》

該書係近代史資料專刊，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1 年出版。全書收集 12 篇文章，約 27 萬字。主要是記敘和反映辛亥革命時期海外的革命活動，大部分據作者的親身經歷，或據當事人提供的資料整理而成，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10. 《回憶陳嘉庚》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會同全國僑聯、福建省政協等單位為紀念「華僑旗幟、民族光輝」陳嘉庚誕辰 110 週年，編輯《回憶陳嘉庚》，1984

年10月文史資料出版社出版。

該書由 41 篇文章組成，約 22 萬字。作者都是陳氏生前的親朋好友，如莊希泉、洪絲絲、莊明理、陳共存等人。從各個角度回顧了陳嘉庚光輝的一生。為研究陳嘉庚提供了許多第一手的資料。

#### 11. 《陳嘉庚年譜》

該書由廈門大學教授陳碧笙等編著，1986年3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約二十萬字。該書以年譜的形式，將其一生的事迹作了較系統的排列，對了解和研究陳嘉庚一生有所幫助。

#### 12. 《陳嘉庚畫集》

由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全國僑聯、福建省政協聯合編輯，1984年文史資料出版社出版。鄧小平為畫集題詞——《華僑旗幟，民族光輝陳嘉庚》。該畫集提供了研究陳嘉庚生平豐富的圖片資料，有些圖片是第一次發表。

#### 13. 《印度尼西亞華僑史》

該書由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溫廣益、蔡仁龍副教授編著，1985年3月海洋出版社出版。全書十二章，50萬字，附有54幅珍貴的歷史照片。

該書著重闡述古、近代印度尼西亞華僑的產生、發展及其歷史地位和作用。該書史料豐富，學術性強，是1949年以後公開出版的第一部有關東南亞國別華僑史的學術專著，榮獲福建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 14. 《海外赤子——華僑》

該書由鄭民、方雄普等人編著，1985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華僑歷史學會會長洪絲絲為該書作序。全書12萬字。該書作為人民出版社編輯《祖國叢書》的一種，是一本介紹華僑情況的通俗讀物。

#### 15. 《伊洛瓦底江的僑歌》

該書係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徐四民的回憶錄，原名《一個華僑的經歷》，曾在海外發行。1986年7月文史資料出版社出版。全書共十一萬字，書中敘述作者從八年抗戰到1949年，及從緬甸回國定居近半個世紀的坎坷歷程，是這一代南洋華僑生活寫照。

#### 16. 《炎黃子孫在海外》

該書由葛仁局編著，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二十萬字，是一本反映中華民族子孫後代在海外奔波奮鬥的艱難歷程的讀物。全書圖文並茂，以翔實的資料介紹著名科學家楊振寧、李政道；建築專家具聿銘；文學家韓素音



等華人在事業上所取得的光輝業績以及對人類作出的貢獻。

17.《開拓者的腳步》

該書由全國僑聯喬澣主編，1985年2月人民出版社發行。全書17萬字，收集了十八篇文章，介紹了在國內各單位工作的歸僑、僑眷成長的事跡，是《歸僑丹心》一書的續集。

18.《菲律賓華僑史》

該書由暨南大學黃滋生、何思兵編撰，全書十五章，38萬字。1987年9月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書中記述遠古至現代菲律賓華僑社會的歷史變遷，重點闡述明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華僑社會的發展變化以及華僑與當地人民的友好關係和戰鬥情誼。

19.《印尼華僑史》

該書由暨南大學李學民、黃昆章編撰，1987年12月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書分七章，34萬字，記述上至漢唐、下迄1940年代，涉及印尼華僑社會經濟、政治、教育文化等各個方面，重點闡述印尼華僑工商業經濟的性質、作用和地位。該書取材豐富、取捨得宜，使用了未曾用過的新材料，有自己的特色。

20.《契約華工史》

該書由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副研究員吳鳳斌撰寫，1988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分五篇三十一章，37萬字，該書是作者在六十年代對數十個歸國契約華工進行調查後，結合中外文的圖書報刊資料撰寫的一部論著，其中不少是第一手資料，是一部有學術價值的專著。實事求是地介紹契約華工在歷史上的地位及其對世界各國的繁榮與進步所作的貢獻和作用。

21.《美洲華僑史》

該書由中國人民大學李春暉、南開大學楊生茂教授等人編著，全書約五十萬字，將由出版社出版。

22.《華僑華人史研究集》

該書由中國華僑歷史學會委託鄭民、梁初鴻負責選編，1989年北京海洋出版社出版。論文集分二冊，約八十萬字。集中反映了全國各地專家、學者以及僑史工作者近年來對華僑史和華僑問題的研究成果和代表作。主要內容涉及華僑歷史、經濟、文化教育以及華僑對僑居國和母國貢獻等問題。中國華僑歷史學會會長洪絲絲為該書作序。

23.《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概論》

該書係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教授林金枝撰著。1988年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係作者根據到全國各地調查的資料，結合文獻撰寫而成。是當今中國對近代華僑投資企業歷史比較有系統的第一部學術專著。全書二十五萬字，分三章。一為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的發展變化；二為近代華僑投資企業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公司；三為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的主要廠礦公司名稱一覽。廈門大學中外關係史博士生導師兼國務院學位評定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韓振華教授為該書寫序。

#### 24. 《龍的子孫——海外傑出華人奮鬥生涯》

該書由新華社新聞研究所方積根和姚平芳編著，1987年新華出版社出版。全書17萬字，分工商企業界、科技教育界和文藝界三部分，收集了世界各地30位華僑華人的奮鬥生涯和事迹，敘述他們的理想和成長之路，歌頌他們的創業精神和愛國愛鄉豪情。

#### 25. 《美國華裔名人剪影》

該書由方雄普編著，1987年5月東方出版社出版。全書約16萬字。介紹了五十一位美籍華人及他們的生活歷程、開拓和進取；從他們身上反映出來的勤勞、勇敢和智慧，以及他們緬懷祖國之情。已故全國僑聯副主席洪絲絲為該書作了序。

#### 26. 《華僑華人論文集》

該書由廈門大學陳碧笙教授選編，1989年3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收輯了中外學者撰寫的文章36篇，共41萬字。該書內容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華僑華人社會歷史和現狀多方面的文章。

#### 27. 《福建華僑華人》

該書由福建省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主編，將由福建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全書按福建華僑、華人主要聚居國家分冊出版。主要介紹福建華僑華人概況和人物資料。該書第一分冊《印度尼西亞》已於1987年9月出版，約13萬字。

#### 28. 《東南亞華人經濟》

該書由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汪慕恒教授主編，1989年4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收集了有關研究第二次大戰後東南亞華人經濟發展與現狀的論文13篇，15萬字。中國華僑歷史學會副會長，復旦大學教授田汝康為該書作序。

#### 29. 《廣東籍華僑名人傳》

該書由中山大學溫廣益主編。1988年7月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收錄該書人物共有32人，16萬字，是一本較系統地介紹廣東籍華僑人物的傳記。

### 30.《華僑與抗日戰爭》

該書由曾瑞炎撰寫，1988年3月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它是中國大陸一部比較全面論述華僑參加母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著作。全書26萬字，收有30幅歷史照片和四個附錄。

### 31.《異域忠魂》

南京雨花臺文物管理委員會1987年編輯出版。該書是紀念抗日戰爭時期在菲律賓被日本法西斯殺害的九位中國外交官，是一本比較完整的九烈士史料專輯。

### 32.《崢嶸歲月》

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該書收集了三十一篇回憶文章。記述了抗戰期間僑居海外的華僑青年回國參加抗戰的英勇事迹。

### 33.《當代海外中華英傑》

由天津技術開發集團編寫的《當代海外中華英傑》叢書第一輯。《華夏科學家·企業家》，1987年中國科學院科學出版社出版。書中介紹華人科學家丁肇中、李政道、楊振寧、李遠哲以及企業家陳弼臣、李嘉誠等人如何取得非凡業績，是一部謳歌海外赤子報效故土的史詩。

### 34.《伊洛瓦底戰歌》

該書由緬甸歸僑撰文，1988年出版。書中收集了53篇文章，熱情謳歌當年與日本侵略者鬪爭的動人事迹，緬懷在艱苦歲月中獻出生命的戰士。全國僑聯副主席蕭崗為該書撰寫了回憶文章。

### 35.《旅俄華工與十月革命》

該書1987年10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書中追隨歷史的足跡，真實地再現了當年數十萬華工在俄期間主要是十月革命時期的活動。

### 36.《僑務知識手冊》

該書由全國僑辦組織編寫，將由中國華僑出版公司出版。它是中國第一本公開出版發行的有關僑務知識手冊。該書收集面廣、涵量大。全書約24萬字，從華僑史話、華人社會、僑務工作機構與羣眾組織、統戰、涉外經濟工作、政策問答、出境指南、僑鄉、鄉刊、僑報等九個方面較為詳細地介紹我國僑務、統戰、涉外方面的方針、政策以及必須掌握的知識，是一本實用

而方便的知識手冊。

### 37. 《海外華文報刊的歷史與現狀》

該書由方積根、胡文英撰著，將由新華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廣泛收集國內外資料的基礎上，對世界四十三個國家一千多種報刊的發展變化，按歷史發展順序作了全面系統的介紹。並對當代仍在出版發行的三百多種華文報刊作了重點評介。

### 38. 《美國華僑史》

該書由暨南大學楊國標等人撰寫，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全書分十四章，約 40 萬字。它是中國大陸系統論述美國華僑歷史的第一部專著。作者根據大量的中外文獻和第一手資料寫成，內容豐富。

### 39. 《海外華僑人概況》

該書由楊萬秀主編，將由廣東人民出版社於年內出版。該書集最新資料，分國介紹了世界 90 多個國家和地區華僑、華人移殖、人口及其分布，經濟事業概況、社團、華文教育、華文報刊、著名華僑華人等方面的情況。內容豐富，資料翔實，兼有學術性和知識性，是一部華僑問題的工具書。

此外，陳碧笙教授主編的《華僑簡史》、《南洋華僑史》以及莊國土《中國封建政府對華僑的政策》等書，已分別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和廈門大學出版社排印中。

## (二) 資料選編

### 1. 《華工出國史料選編》

華工出國歷史，是中國近代乃至世界近代史上的一個重要課題。過去國內僅有若干短篇論文散見各地報刊，迄今未有專門著作和史料匯編出版。該書主編陳碧笙十幾年前即注意這個問題，著手積累資料，現已由盧文迪、彭家禮、陳澤憲等人編纂成書，先後於 1980年——1985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全書共分八輯，計 350 萬字，每輯後面附有索引。《史料匯編》比較全面地搜集了有關華工出國的中外文資料，內容豐富，史料翔實，對研究華工出國歷史有很高的學術參考價值。

### 2. 《晚清海外筆記錄》

該書由福建師範大學華僑史資料選輯組編，1983 年海洋出版社出版。全書 22 萬字，廣泛收集了十九世紀後期中外人士遊歷各地的遊記、筆記和日記。分華僑在東南亞、澳洲、夏威夷、北美洲、拉丁美洲等部分，生動地描繪了華僑在僑居地的生活、勞動環境以及華僑代表人物活動片段。表達了

華僑對家鄉的眷戀之情。

### 3. 《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選輯》

該書由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林金枝、莊為璣編纂，將由福建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發行。

《選輯》一書，是編者於六十年代到廣東、福建、上海等省市的五十個市縣進行調查，收集了近代（1840~1949）海外華僑、歸僑投資國內資本主義企業（工業、農業、礦業、交通業、商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等）的史料，結合文獻和有關檔案資料編纂而成，許多是第一手資料。該書按地區編排，分廣東、福建和上海三卷，全書共一百五十萬字。其中福建卷（37萬字）已於1985年7月出版發行。該書榮獲福建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廣東卷》（57萬字）也在排印中，年內可出書。

### 4. 《非洲華僑史資料選輯》

該書由方積根編著，1986年7月新華出版社出版，全書約32萬字，是一部研究非洲華僑歷史的有價值的資料書。由論文選編、專著摘譯和書刊參考目錄索引三部分匯編而成。內容敘述從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後，大批華工前往非洲的原因、生活習俗、職業演變和爭取生存權利的鬭爭。

### 5. 《華僑抗日救國歷史資料選輯》

該書由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副研究員蔡仁龍、李國樑主編，1987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編寫委員會出版，共計48萬字。其內容有概述、歷史、文獻、檔案、報刊資料及回憶錄等，按僑居地國別分類編排，內容豐富，不少史料為目前國內罕見。全國僑聯副主席洪絲絲為該書作序。

### 6. 《「豬仔」華工訪問錄》

該書是1963年5~6月中山大學的黃重言、劉玉遵和廈門大學吳鳳斌、桂光華，到廣東陽江縣華僑農場訪問44位契約華工的訪問記錄，全書15萬字，已分別由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和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印刷出版。該書反映了豬仔出國、勞動、生活和鬭爭的整個過程，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資料。

## （三）工具書

### 1. 《華僑史論文資料索引》

該書由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與中山大學圖書館合編，1981年出版。收錄範圍為1895~1980年中國和國外、港澳地區公開出版的中文期刊三百六十五種，專著二百多本。近三十年來臺灣、香港、新加坡等一些學術

機構及團體出版的刊物也收錄在內。

## 2. 《華僑華人史書刊目錄》

該書是中國華僑歷史學會的一本資料叢書，鄭民等人編纂，由中國展望出版社於 1984 年出版。該書共收入華僑華人史書刊目錄三千多種，來自北京、上海、廣州、廈門、福州、南京、昆明、武漢等地 47 家圖書館的藏書目錄。該目錄分中文、西文和日文三部分；中文部分又分圖書和報刊二種。

## 3. 《福建省收藏華僑、華人圖書聯目錄》

由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陳聲貴編，全書 15 萬字，1989 年由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

## (四) 論文集（內部出版）

十年來，華僑史研究出版了許多論文集，形式多種多樣。除公開發行外，還有內部出版，有大專院校科研機構出版的和全國以及省市華僑歷史學會出版的論文集。據不完全統計，近年來出版了四十多本論文集（輯），約八百多萬字。現分別介紹如下：

### 1. 大專院校出版的論文集

(1) 《華僑史論文集》第一、二、三、四輯和《華僑教育第一、二輯》。

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先後出版《華僑史論文集》第一、二、三、四輯，收入文章十篇，約八十萬字。內容包括華僑歷史、華僑在僑居國的社會地位以及貢獻；華僑與當地人民反對殖民主義者的鬥爭；華僑對母國的熱愛和表現以及華僑史的研究和方法等。

該所也出版了《華僑教育》二輯，共三十多篇文章，約 30 萬字，重點介紹國內幾種主要類型的華僑教育以及海外華僑、華人教育的一些發展概況。

此外，該所於 1986 年 9 月出版《華僑研究所科學論文、選集》，論文十四篇，20 萬字，內容主要涉及華僑歷史、華僑經濟和華僑教育等方面。

### (2) 《華僑問題資料》八輯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自 1978 年至 1980 年間，出版《華僑問題資料》八輯，共一百萬字。主要內容以華僑歷史（華僑出國原因、契約華工、華僑與祖國和僑居國的關係、作用和貢獻）為主，同時兼及對當代華人經濟、教育、國籍、華僑發展趨勢等現狀問題探討。該所 1986 年還出版有關華僑史和華僑問題的專號，收入文章 15 篇，約二十萬字，內容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華僑華人的發展變化以及東南亞華僑歷史方面的論文和資料。

### (3)《華僑華人歷史論叢》

由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輯的《華僑華人歷史論叢》（第一集）1985年出版，20萬字，收有16篇文章。1987年出版《華僑華人歷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論文28篇，約25萬字。這些文章論述了華僑歷史有關問題和中國僑鄉社會的發展變化等。

### (4)《華僑史研究論文集》

華僑大學華僑研究所編輯的《華僑史研究論文集》（一、二集）已分別於1986年8月和1988年9月出版。華僑大學校長葉飛為該書題寫書名。二集約37萬字，內容包括各種調查報告、譯稿、論文和資料。

#### 2.華僑歷史學會出版的論文集

##### (1)廣東華僑歷史學會及其分會出版的論文集

1982年、1983年和1986年分別由廣東華僑歷史學會編輯出版《華僑論文集》一、二、三集。論文三十多篇，八十萬字。主要內容有關於華僑史和華僑問題撰寫與研究的意見；有對華僑社會、現狀和發展趨勢等方面的探討，以及華僑愛國主義等等。

汕頭華僑歷史學會編印《汕頭僑史論叢》（第一輯），1986年9月出版。收入24篇文章，共23萬字。內容廣泛，史料豐富，地方色彩突出，是一本研究汕頭華僑史的有參考價值的書。

江門華僑歷史學會編輯出版《五邑僑史》，現已出版六期，每期約5～6萬字，史料富有地方色彩。

梅縣市華僑歷史學會編輯出版《梅縣市僑史》，現已出版2期，每期約4萬字，史料富有地方色彩。

##### (2)福建華僑歷史學會及其分會出版的論文集

由福建華僑歷史學會編輯的《華僑歷史論叢》已出版四輯，分別於1984年5月、1985年6月、1986年9月和1987年10月先後出版，每期收入二十多篇文章，各約三十萬字。

《論叢》涉及華僑經濟、文化教育和歷史、人物傳記、華僑與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關係，福建華僑史以及如何發揮僑鄉優勢與國家四化關係等方面的問題。內容豐富，對研究東南亞華僑史和福建華僑史有學術參考價值。

晉江地區華僑歷史學會編的三輯《華僑史》，約46萬字，分別於1982年1月、1983年7月和1985年10月內部發行，這是以地區為單位編寫地

區華僑史的三本集子。書中關有論文、地方史料、回憶錄、人物傳記、僑鄉建設、僑團動態、海外書窗等等，史料豐富，地方色彩濃厚，對晉江地區華僑史的研究有幫助。

泉州僑聯編輯《泉州華僑史料》一、二輯，分別於 1984 年 7 月和 1985 年 10 月出版，每輯各約 15 萬字。集子內容廣泛，富有地方特色。主要題目有論文、僑鄉史料、回憶錄和人物介紹等，對研究泉州華僑史提供了不少資料。

龍溪地區歷史學會編纂的《龍溪地區華僑史》第一輯於 1985 年 7 月出版。共收文章 16 篇，計 4 萬字。內容主要是地區僑史和僑史人物。

#### (3) 上海華僑歷史學會出版的論文集

上海市華僑歷史學會編輯《上海僑史論叢》（第一集），1987 年 5 月出版。收入 17 篇論文和資料，約 15 萬字。《論叢》涉及華僑歷史和現狀的各方面問題。

#### (4) 海南歷史學會出版論文集

海南華僑歷史學會編輯《瓊州僑史》（創刊號），1986 年 9 月出版。全書共 6 萬字，刊登論文、僑鄉調查報告、人物回憶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瓊州鄉音》編輯室寫的《瓊僑史略》，是一部關於海南籍華僑歷史的長篇著作，其重點是東南亞瓊僑。

此外，有的省市除了成立華僑歷史學會外，還成立華僑研究會。如廣東華僑研究會 1987 年 12 月在廣州成立，會長為廣東省僑辦主任司徒戎生，出版會刊《華僑與華人》，現已出版 3 期，每期約 10 萬字，是一份以研究華僑、華人問題為內容的學術性、理論性、政策性和資料性相結合的刊物。

河北省華僑歷史研究會於 1987 年 3 月在石家庄成立，已出版《燕趙僑史》二期，每期約 2～3 萬字。

#### (五) 通訊和會刊

近年來，中國華僑歷史學會和廣東、福建、廣西等省的華僑歷史學會都出版通訊和會刊，累計達七十多期，約 400 萬字，刊載不少論文、調查資料、回憶錄、學者簡介以及研究動態等等，成為溝通學術訊息和討論問題的主要渠道。

1. 《華僑歷史學會通訊》、《華僑歷史》、《華僑、華人歷史研究》和《僑史資料》

上述四種刊物都是中國華僑歷史學會主辦。主要用來報導全國開展華僑



歷史和華僑現狀研究，反映僑史研究成果，交流國內外學術研究動態等，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實行，國際學術交流日益頻繁，為適應需要，自 1986 年起，該會將《通訊》先改為《華僑歷史》（共出版 6 期），現已改為《華僑華人歷史研究》（已出版 6 期），每期約十萬字，自 1988 年起已公開發行。

自 1987 年 1 月起，學會還出版不定期的刊物《僑史資料》（已出版 5 期），以刊登華僑、歸僑的親身經歷的回憶錄為主，同時也刊登根據一手資料整理的文章。

### 2. 《廣東華僑歷史學會通訊》、《華夏》和《僑史學報》

上述三種刊物都屬廣東華僑歷史學會主辦。《通訊》從 1981 年 11 月創刊至 1984 年 6 月改版《華夏》前，出版了 10 期，發表文章六、七十篇，約二十多萬字。對交流信息、促進學術研究以及調動僑史學者的積極性等方面發揮了作用，贏得國內外學者的好評。

1985 年 1 月，該學會將《通訊》改名為《華夏》，向國內外公開發行（雙月刊）。其旨在傳遞鄉音，報導鄉情，宣傳僑務，介紹僑鄉文明。已出版 24 期，每期約 8~10 萬字。

1985 年秋，學會又復辦會刊，定名為《僑史學報》，內部發行（季刊）。現已出版 14 期，每期約 8 萬字。該刊以學術論文為主要內容，欄目包括華僑歷史、華僑經濟、文化教育、僑史資料、人物傳記、學術動態等。

### 3. 《福建華僑歷史學會通訊》

它是福建華僑歷史學會主辦的會刊，是不定期刊物。創辦以來，出版一期，主要報導學會成立消息和學術動態。

### 4. 《八桂僑史》

《八桂僑史》是廣西華僑歷史學會不定期會刊，它是一本專門刊登有關研究廣西華僑歷史和現狀的文章的刊物，十六開本，1987 年 1 月創刊，現已出版 4 期，每期約七、八萬字。

#### （六）其他刊物發表的論著

除上述刊物外，諸如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的《南洋問題》（已出版五十六期）以及《南洋資料譯叢》、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東南亞歷史叢叢》、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東南亞研究資料》、北大南亞所《南亞與東南亞資料》、雲南東南亞研究所《研究集刊》、《東南亞》、廣西社會科學

院《印支研究》、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的《海交史研究》、中外關係史學會通訊、中國東南亞研究通訊，以及中山大學、廈門大學、暨南大學、華僑大學、福建師範大學和汕頭大學的學報、《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學術研究》、《福建論壇》以及僑鄉各地出版的文史資料等刊物，也經常地發表一些有一定質量的華僑史和華僑問題的論文和資料。

#### (七)華僑文學、傳記

近年來，以華僑、歸僑為題材的文學創作，如傳記文學、長篇小說，電影電視劇本相繼問世。據不完全統計，已出版數十部，約 500 萬字。

##### 1. 《風雨太平洋》

歸僑作家杜埃的長篇小說《風雨太平洋》（第一部），41 萬字，已分別由北京文藝出版社和廣州花城出版社同時出版。該書是一部反映菲律賓華僑和當地人民並肩同法西斯作鬪爭的巨著。

##### 2. 《陳嘉庚外傳》

由洪永宏撰寫的長篇傳記小說《陳嘉庚外傳》，分《出洋記》和《歸來記》上下二集，共五十萬字，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敘述了陳嘉庚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展現了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葉南洋華僑社會的生活畫卷和 1941 年冬陳嘉庚率僑眾保衛獅島、保衛南洋，最後被迫避居印尼鄉間的情景。

##### 3. 《海魂》

廈門大學陳嘉庚研究室郭玉聰創作的《海魂》，1985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約二十四萬字，以小說體裁的形式，歌頌了「華僑旗幟、民族光輝」陳嘉庚先生的一生。

##### 4. 《巨鯨》

由傅子玖創作的長篇傳記小說《巨鯨》，已於 1986 年由中國花山文藝出版社在石家庄出版。該書記述了陳嘉庚的偉大業績。

##### 5. 電視連續劇《烽火僑女》

一部反映四十年前印尼歸僑女英雄的十二集電視連續劇《烽火僑女》，已於 1986 年 7 月完成。《烽火僑女》反映歸僑李林從一個天真少女成長為一個進步青年，最後在雁北獻身於抗日救國事業的過程。

##### 6. 《海囚》

由洪永宏創作的小說《海囚》，21 萬字，1980 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描寫契約華工出國的悲慘遭遇和反抗外國殖民者的鬪爭。

### 7. 《從徒工到僑領——司徒美堂文學傳記》

張興漢編寫的《從徒工到僑領——司徒美堂文學傳記》，1987年9月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全書16萬字。作者用文學筆調介紹和歌頌愛國華僑領袖司徒美堂支持祖國母國建設的動人事迹。

### 8. 《魂繫故土》

由海軍革命烈士編委會組織撰寫的《魂繫故土》，即將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該書是一部反映海外華僑林文虎愛國戰鬥一生的文學傳記，曾生將軍為該書寫了序言。

#### (八) 出版大量僑刊、鄉訊

過去全國各地以傳遞鄉音、聯絡鄉訊，牽引廣大旅外同胞懷國思鄉、念親為宗旨的鄉刊、鄉訊，「文革」期間曾一度停刊。自1978年各地陸續復刊以來，近年來已取得了新的發展。截止1988年的統計資料，全國各地出版的僑刊、鄉訊，達150種以上，其中以廣東為最多，有112種。全省17個市、27個縣、66個區、鄉有僑刊、鄉訊，年對外發行量約70多萬份，通過各種渠道，到達世界各地100多個國家和地區。

目前各地僑刊、鄉訊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以地區、市或區、鄉為報導範圍的期刊或鄉訊，如《中山僑刊》、《新寧雜誌》、《瓊州鄉音》、《潮人》、《高明鄉訊》、《蕭田鄉訊》等；二是以宗親姓氏為報導對象的族刊，如臺山縣葉氏宗親創辦的《光大季刊》等；三是以前報紙形式發行的省市級刊物，目前廣東、福建、廣西、浙江、雲南等省都辦有《僑報》、《僑聲報》。這些僑刊、鄉訊的內容豐富多采，大都闢有華僑史話、僑鄉掌故、海外僑情等欄目，每期印數少者數百，多者數萬。以其帶有濃厚的鄉土氣息和宗親情誼，贏得了海外鄉親感情上的共鳴，溝通和加強海內外親人間的聯繫，深得海內外僑胞的讚賞。

#### (九) 編寫《華僑志》

近年來，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各縣正在編寫省誌、市誌和縣誌，大約在1990年完成，主要僑鄉廣東、福建、廣西、雲南、上海、浙江等省市及其所屬的主要僑鄉，考慮到華僑眾多特點，正確認識華僑和華僑問題，幫助人們正確理解僑務政策，促進僑務工作的開展，以適應各地兩個文明建設的需要，都在省、市誌以及縣誌中，首次編寫《華僑誌》。由各省、市、縣僑辦、僑聯組織人員編寫。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開拓性的工作，對各地華僑史研究幫助甚大。現在已有一些省市和縣編寫了華僑誌的初稿，不少市縣已寫

了部分篇章。不久各地即可陸續正式出版。

#### 四、中外學術交流活動活躍

十年來，華僑史和華僑問題研究的另一新氣象，就是中外學者互訪活動頻繁，合作研究順利開展以及華僑史譯著出版增多，表明中外學者的學術交流活動正蓬勃發展。

##### (一)中外學者學術交流活動頻繁

據不完全統計，自中國大陸對外開放以來，美國、加拿大、英國、荷蘭、法國、西德、意大利、紐西蘭、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以及香港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華僑、華人研究學者約有百人組團或單獨來華講學、參觀、考察、研究、出席學術會議、搜集資料、舉辦圖片展覽等活動，中國也有數十位學者前去上述國家和地區進行學術交流活動和從事研究工作，因而有助於中國學者開拓視野、增長知識，也有助於國外學者了解中國的情況。

(1)外國學者來華訪問活動。他們中間以新加坡、美國、日本、澳大利亞、菲律賓、香港學者為多。來華訪問的有：

①新加坡 南洋學會魏維賢、林我鈴、吳振強、李勵圖、蔡良乾、林和會；亞洲研究會林子勤，陳田啟、柯木林、林孝勝、楊松年；新加坡國立大學廖建裕、崔貴強、李繩毅、鍾臨杰、麥留芳、李廷輝以及陳共存、黃望青、王秀南等。

②菲律賓 菲律賓大學施振民、德拉薩斯大學張素玉女士、亞典耀大學洪玉華女士、《世界日報》吳永源、吳文煥以及吳景恒、鄭泗湖等人。

③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大學謝愛萍女士。

④泰國 朱拉隆功大學強·貽拉威、孫順興、泰國歷史研究會江白潮等人。

⑤美國 舊金山加州大學王靈智、紐約華埠歷史研究社陳國維、加州大學卜枝利亞裔研究圖書館潘余慧子、華裔研究中心婦女權益促進會楊碧芳、方翠柏，舊金山中華文化基金會會長麥禮謙及夫人張玉英，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美研究中心主任成露西以及鄭治中、薛君度、沈已堯、陳依范、梁惠玲、袁清、沙其敏等人。

⑥加拿大 魏安國、李懷敏、李勝生等人。

⑦ 澳大利亞 國立大學王庚武、付因徹、洪越碧、麥凱；悉尼大學劉涓平、李全壽；弗林斯德大學楊進發；澳華歷史博物館廖·伊麗斯女士以及澳洲駐日使館研究員鮑雪侶女士等人。

⑧ 紐西蘭 坎特堡大學W·E·威爾莫特，澳克蘭大學葉·宋曼英女士。

⑨ 荷蘭 萊頓大學包樂史、宋理和、彭軻、露絲·蘇坦克，阿姆斯特丹大學吳良全、簡·布雷曼等人。

⑩ 聯邦德國 漢堡大學傅吾康、格丁根大學定海特布斯。

⑪ 英國 史諾博士

⑫ 法國 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沙蒙及其丈夫德及·龍巴等人。

⑬ 日本 國際大學游仲勛；九州宮崎大學市川信愛；東京大學濱下武志、若林正義；京都立命館大學西口清勝；亞洲文化綜合研究所段柏林；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陳德仁；創價大學亞細亞研究所陳荆和；日本大學小島淑男；明治學院大學司馬純詩；名古屋學院大學林善義等人。

⑭ 香港地區 香港大學顏清滄、雷朗女士、林天蔚、趙令揚、林賴勝；中文大學叫葉漢明、陸鴻基、蔡寶瓊等人。

#### (二) 中外學者合作研究

中外學者合作研究以中山大學與香港大學和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簽署五年華僑史研究計畫為最早。計畫規定，1984年和1985年分別在香港和廣州舉辦學術討論會，交流三校研究成果，出版華僑史教學參考資料。1984年秋，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與日本宮崎大學教育學部合作搞《華僑教育的比較研究》。1986年，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又與泰國朱拉隆功大學亞洲研究院簽訂為期二年的《潮汕移民與泰國華人社會》的合作研究計畫。

此外，中山大學人口研究所也計畫與國際一些研究機構研究華人口問題，福建師範大學、華僑大學與日本宮崎大學合作研究日本華僑、華人對促進中日文化交流的貢獻和華僑學生回國升學諸問題等項目。

#### 3. 翻譯出版國外研究華僑華人論著增加

近年來，一些科研、翻譯人員已譯出一批有關國外學者撰寫華僑史和華僑問題的專著，供國內同行研究參考。計20多本，約400萬字，主要論著有：

##### (1) 《海外華人》

該書由法國學者郎素瓦·德勃雷編著，趙喜鵬譯，1982年2月由新華

出版社出版發行。全書 10 萬字。該書作者用三年時間遍游歐美亞各地之後而寫出這本書，主要回顧海外華人的歷史，他們堅忍不拔的精神及其生活悲劇。

(2) 《海外排華百年史》

該書由美籍華人沈已堯編著，已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全書約 15 萬字。該書詳細地闡述了各國對華移民政策演變的歷史過程。

(3) 《華僑資本的形成和發展》

該書由日本學者李國卿著，郭梁等譯，1984 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 21 萬字，書中對華僑資本的形成與發展，以及華僑經濟的前途等問題作了比較深入的考察，是一部有份量的學術論著。

(4) 《紐約唐人街勞工和政治》(1930~1950年)

該書由美籍華人鄭治中著，楊萬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全書 10 萬字。該書作者以大量史實，詳細記述本世紀三、四十年代紐約華人與美國當局開展的鬭爭，並介紹華工移居美國的歷史背景以及紐約唐人街形成及其社會和政治結構等等。是研究美國華僑史有學術價值的一本書。

(5) 《秘魯華工史》(1849~1974年)

該書由美國瓦特·斯圖瓦特著，張鎧等譯，1985 年 2 月海洋出版社出版，全書十二章，共 17 萬字。該書以翔實的史料描述了十九世紀中葉二十五年間華工在秘魯非人遭遇。敘述了「豬仔」被拐賣出國途中的悲慘和海外的痛苦生活。

(6) 《三寶壟歷史》

該書由印尼華人林天佑用印尼文寫成，全書 22 萬字，由李覺民、陳巽華譯，1984 年出版。作者主要根據華人公館的檔案材料，並參考當地各種報刊以及英、荷文有關著述編寫而成，是一本珍貴的印尼華僑史籍。

(7) 《爪哇土生華人政治》

該書由華人廖建裕著，由暨南大學翻譯，將由友誼出版公司出版，是一本資料豐富、內容新穎的華僑史書。該書以第一手資料，詳細地介紹了 1917~1942 年期間印尼土生三大政治派別的政治活動與鬭爭。

(8) 《東南亞與華人——王慶武教授論文選集》

該書系澳大利亞籍華人，現任香港大學校長，著名中國史、華僑史和東南亞史研究專家王慶武教授的論文集，姚楠教授主譯，1987 年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該書收集了王教授 1961~1984 年有關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和

華僑史等方面的論文十二篇，約二十萬字。

王廣武教授另一論文選集——《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一書，也由姚楠主譯，約 20 多萬字，1988 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

王教授長期從事研究工作，學貫中西，對南洋史的研究造詣極深，著作頗豐。此二集所選論文，引經據典，考核周詳，並有精辟獨特見解。

(9) 《東南亞華僑經濟簡論》

該書由日本著名華僑經濟專家游仲助教授撰寫，郭梁、劉曉民譯，汪慕恒校，1987 年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分五章，約 11 萬字。該書資料翔實，運用大量統計資料來探討東南亞華僑經濟的性質、特點和作用以及發展前景等問題，很有學術參考價值。

(10) 《金山路漫漫》

該書由美籍華人麥美玲、遲進合著，1987 年 12 月新華出版社出版。全書 12 章，以中美兩國關係發展為線索，以二次大戰華人社會發展為重點，在人們面前展現出一幅華人社會彩色斑斕的巨幅畫卷，該書具有較高的文學性、學術性，可讀性強。

(11) 《陳嘉庚研究文集》

該書由澳大利亞華人學者楊進發博士著，1988 年 8 月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全書共 16 萬字，文集的主題包括了陳嘉庚在南洋活動的部分歷史，其中涉及到陳嘉庚的家族與朋友、實力、教育貢獻以及政治活動等內容。

(12) 《美國華人史》

該書係美籍華人陳依範著，韓有毅等譯。1987 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28 萬字。該書是一部華人自開始向美國移民至本世紀 70 年代在美國爭取生存和奮鬥的歷史。作者以豐富的史料介紹美國華人社會經濟發展作出的卓越貢獻和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3) 《新金山——澳大利亞華人》（1901~1921 年）

該書係澳大利亞籍華人學者楊進發博士論文，姚楠、陳立貴譯，1988 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全書 25 萬字，係中國大陸第一本詳細介紹早期（1901~1921 年）澳洲華人歷史的譯著。書中還論述澳洲華人各種組織和社會活動及華人對當地與祖國的貢獻。

(14) 《從中國到加拿大》

該書係由加拿大魏安國教授等人撰寫，許步曾譯，1988 年 9 月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全書分四編 19 章，50 萬字。主要探討加拿大華人從

1858 年到 1980 年的歷史變遷，廣泛論述加拿大華人社團及其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

(15) 《華工與官員》

該書係澳籍華人、歷史學家顏清滄教授專著，栗明鮮譯，將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該書史料翔實，內容豐富，著名華人史學家王賡武教授為該書作序，認為該書較全面系統地對晚清時期海外華人的保護問題進行研究和探討，它首次用西方語言，對於官方在東南亞及其他海外華人居住地有關華人事務作了研究，並且開拓了有關南非和美國華人的外交事務方面的研究，是顏教授研究清季外交史和華僑史的一部力作，有較高的學術參考價值。

(16) 《星馬華人社會史》(1800~1911年)

該書係澳大利亞華人學者顏清滄教授的另一專著。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教授為該書作序，全書分九章，約 30 萬字，將由中國華僑出版公司出版。該書內容豐富，資料翔實，是一部研究星馬華人社會歷史開拓性的力作，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17) 《新馬華人對國家認同的轉向》(1945~1959年)

該書由新加坡大學華語研究中心崔貴強撰寫，1989 年廈門大學出版社排印出版。全書分十三章，約三十二萬字。作者利用新馬各地大量的報刊、圖書和檔案文件，縱論第二次大戰後至 1959 年間新馬華人國家認同問題的轉變過程。資料新穎，內容豐富，是一部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論著。

(18) 《中國人在荷屬東印度的經濟地位》

該書由(英)卡德著，汪慕恒等人譯，全書 17 萬字，廈門大學出版社正在排版中。

## 五、中國大陸華僑史研究工作的幾點看法

### (一) 研究華僑史出現新局面

中國華僑史研究的老前輩姚楠教授撰寫的《淺談我國華僑史的研究》一文認為：「二十世紀我國研究華僑史大致概括為下列幾個時期，梁啟超寫《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和《民報》刊載《南洋華僑史略》等，屬於萌芽時期；二十年代何海鳴等出版《僑務旬刊》可說是始動時期；從二十年代後期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成立和四十年代初中國南洋學會成立，一直延續至五十年代，可以說是發展時期；自七十年代後期起，則是新的發展時期了。」



我以爲姚楠先生的看法是完全符合客觀事實的。

歷史上中國對華僑史的研究，從來沒有出現過今天這樣喜人的景象。值得特別提起的是：華僑史已被列爲史學研究方面的重點項目，華僑史研究的新局面，正在初步形成。目前大陸各地高等院校，科研單位以及各省市的僑務、僑聯工作者，正在積極開展華僑史的研究。據了解，大陸各地有關單位近期的華僑史研究計畫，就有數十部專著，從而可以看出中國大陸研究華僑史的新局面正在形成。如果這些專著中，能如期全部出版，並達到一定水平，這不僅是一個很可觀的成績。

上述計畫的專著，大體可歸納下列幾項內容：

1. 華僑史（如華僑史概要、華僑簡史）；
2. 地區華僑史（如拉丁美洲華僑史、南洋華僑史、東南亞華僑史）；
3. 國別華僑史（如印度尼西亞、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緬甸、美國等）；
4. 省際華僑史（如福建華僑史、廣東華僑史、各專區縣的華僑史）；
5. 專題華僑史（契約華工史、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概論、東南亞華僑經濟史）；
6. 華僑人物傳記（南洋華僑人物傳、福建華僑名人錄、廣東華僑名人錄……革命烈士傳）；
7. 省際華僑志（廣東華僑志、福建華僑志、廣西華僑志……）；
8. 現狀研究（華僑經濟、華僑教育、華僑社團……）；
9. 工具書（華僑、華人詞典）。
10. 其他。

(二) 研究成果富有特色

近年來，中國大陸華僑史的研究學者開展對華僑史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儘管由於目前條件的限制，不能或很少到國外開展調查研究，但是他們已發揮僑鄉優勢，進行調查研究。這些成果是有特色的，它組成了華僑史研究重要的一環，獲得了許多寶貴的資料，這是國外學者無法做到的。它們是：

1. 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的調查和研究；
2. 契約華工史的調查和研究；
3. 僑鄉族譜的調查和研究；
4. 地方華僑史志的調查和研究（諸如各地華僑出國原因、出國歷史的發

展變化，華僑出國後與母國的關係以及各省市縣編寫的華僑志等）；

5. 華僑人物傳記的調查和研究（如陳嘉庚，出版了關於他的幾本書：《陳嘉庚傳》、《陳嘉庚年譜》、《陳嘉庚興學記》等）；

6. 僑鄉華僑教育的調查和研究；

7. 如何發揮僑鄉優勢為大陸四化建設服務的調查和研究。……

(三) 研究工作出現了良好勢頭

近年來，隨著學術研究工作的進一步開展，華僑史、華僑問題的研究開始出現良好的發展趨勢：

1. 由一般華僑史問題的研究開始重視對海外華僑、華人社會現狀和發展趨勢等問題的研究。

2. 由過去主要研究東南亞地區華僑的歷史變成現在研究範圍遍及世界五大洲的許多國家華僑史的研究。

3. 由封閉式的自我研究開始轉變為中外學者合作，共同進行研究。

4. 由過去學院式的研究開始探索發揮華僑優勢為大陸四化建設服務的研究。

近年來，各地華僑歷史學會、研究會和科研機構，先後就華僑、華人社會結合各省僑鄉的現狀、發展趨向，進行調查研究和科學預測。根據實際情況，從理論的高度上探討今後僑務工作發展戰略，向政府決策部門提供諮詢服務，以便更好地發揮華僑優勢，為大陸四化建設服務。

(四) 學術刊物出版日益發展

一個學校或一個學會，辦得好壞，成果是否顯著，主要反映在它出版的刊物是否有學術水平，能否持續下去，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如四十年代南洋學報的創辦，就留下了極其寶貴的學術資料。這個刊物從 1940 年創辦至今已近五十年了，目前還在出版，誠屬可貴。據了解，南洋學會 1990 年在新加坡召開以《邁向二十一世紀的華人社會》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以示慶祝。過去，中國大陸也出版了一些刊物，但都未能公開發行而失去與國外交流的機會。

文革前，國內發表華僑歷史研究的刊物是很少的。當時，只有廈門大學的《南洋研究所研究集刊》、《南洋資料譯叢》和暨南大學的《東南亞研究資料》涉及一些華僑問題論著。現在大陸已有三十幾種公開或內部出版的專門刊載華僑歷史或華僑問題的刊物（不含各地鄉訊），這些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發表了一系列華僑歷史或現狀的論文和資料，成為溝通學術信息和討論

學術問題的主要渠道。此外，一些大學學報和一般刊物，也都發表一些華僑歷史或華僑問題的文章，他們都可與國外研究機構進行交流。如今，學術刊物出版日益發展，已出現可喜的景象。

#### (四)華僑史研究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年來，大陸華僑史研究取得不少進展，成績也比較顯著。但整個研究工作還不能滿足國內客觀社會的需要，與國外學者相比差距還不小。主要問題有

##### 1. 研究重點存在偏重。

從研究課題選擇來看，重歷史，輕現狀，重東南亞華僑史（包括國別史）、美國華僑史，輕其他地區史。當然，這和各單位現有的人員、資料以及東南亞華僑人數多有關係。但現狀的研究，總的說來，在一般大專和科研機構中的專職和兼職人員還是重視不夠的。

從過去的研究成果看，雖然數量不少，但研究成果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僑情變化的論題太少。據不完全統計，從 1983~1985 年 7 月，大陸各種刊物發表的有關華僑問題文章共 408 篇，其中涉及二次大戰後的僅占 3%。同時，近期國內已完成或正在撰寫東南亞國別華僑史的專著，一般也只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或各國獨立自主時期為止。二次大戰後的華僑現狀大多只作簡要介紹，幾乎成了空白。近二三年來，國內幾次的學術討論會，已開始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已引起許多專家學者的重視。

##### 2. 統籌安排，分工協作不夠。

目前，大陸華僑史研究機構日益增多，因而互相間如何協調和加強研究，也就成爲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從各單位的研究課題來看，由於沒有統一的領導組織，沒有統一的協調機構，出現了一些重復的研究課題。如華僑史稿方面有幾本，而東南亞華僑史、美洲華僑史、新加坡華僑史、印尼華僑史等等都有二、三本，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重復。當然有的重復也不要緊，但互不通氣、各搞一套，力量未免有所分散。同時，國內各學術團體主辦的刊物或出版的論文集，彼此缺乏聯繫，有時造成一篇論文前後好幾個刊物重復刊登，或一本譯著同時被好幾個單位翻譯。如能做到統一安排，分工協作或合作，在資料利用和人力的使用方面合理化，勢必在內容上能更充實些，在完成時間上也會更快些，將發揮更大效益。

##### 3. 圖書資料比較缺乏。

當前，國內華僑史和華僑問題研究工作的一大障礙，主要是圖書資料缺乏。華僑史研究不能停留在用舊的資料來寫新文章，或以較少資料來寫大文章的階段，而必須在掌握大量豐富資料的基礎上，對資料進行分析研究，才能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結論來。

由於國內外匯較緊，大多數研究單位都沒有單獨的外匯預算，只有靠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統一訂購，但國內統一進口外國出版的圖書資料，數量有限，有些圖書或刊物，全國只有一、二份，國家又要保證優先供應重點單位，不可能做到每個大學或研究所都有一份，這就使研究工作遇到一定困難。但是，就是一些新近的有效的圖書資料，也往往因無人整理編目而得不到充分利用。

#### 4. 研究課題有待深入。

近年來，國內華僑史的研究成果，就其總體而言，不僅整量不多，而且質量還有待深入和提高。以研究陳嘉庚為例，近年來研究陳嘉庚的論著相當多，其中有的質量也比較高，大都是介紹陳氏的愛國愛鄉，敘述其對母國的貢獻。其實，陳嘉庚一生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在星馬度過，他對星馬和南洋地區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也作過巨大貢獻。然而，國內涉及這方面的論著卻為數極少。因此，對陳嘉庚的研究範圍和課題有待於擴大和深入。其他許多課題的研究也有待於深入展開。

#### 5. 僑務部門與大學科學研究機構的合作研究尚需加強。

近年來，僑務部門和大學研究機構對華僑史和華僑問題的研究，雖有所配合，但合作研究不夠。目前，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和僑情以及僑務工作任務的變化，僑務部門和科研機構的合作研究，亟需加強，以利於揚長避短。因為僑務部門掌握僑情，較了解當前華人的變化，但由於平時忙於事務以及圖書資料的不足，難有充裕的人力時間從事理論研究；大學研究機構有一支專職研究隊伍，擁有較豐富的圖書資料，但由於對當前華人的情況了解有限，而且經費嚴重不足，難於發揮自身的優勢，雙方如能合作研究，取長補短，則華僑、華人問題的研究工作，就能獲得更好的科研成果。

## 六、前 景

回顧十年來中國大陸華僑史的研究工作，雖然存在不少問題，但卻取得了很大成績，這是中國大陸對外開放在僑史研究方面初見成效的具體表現。

我們深信，隨著大陸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開展，對外交流活動也將日益活躍。只要廣大僑史研究人員積極配合，著重戰後僑情變化和僑史新課題的研究，在全體僑史研究人員和僑務部門的共同努力下，華僑華人的研究工作一定會在原有的基礎上結出更加豐碩的成果。據最近《華聲報》報導，專為華僑、華人出書的中國華僑出版公司，成立僅半年多，便已發出書稿 80 種，其中 50 種已面市。同時，擬在今後數年內組稿出版《海外炎黃精英傳》和《歸僑精英叢書》二套叢書（計劃出數十本），為僑華華人立傳，介紹他們在異國的生活，他們的愛國愛鄉情懷以及他們為母國和世界的經濟、科技、藝術方面所作的貢獻，將是豐碩科研成果的具體見證，也是研究華僑史和華僑問題非常可喜的一件事。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專刊兩種

(0) 延安的陰影 陳永發著 精350元 平300元

文化大革命中被戴錯帽子死亡的人以百萬數，肉體雖然健在，但回憶往事，心有餘悸的人更多。本書以中共最近出版資料為基礎，為此曠古所未聞的人間慘劇尋找歷史根源。和一般作品不同的是，本書在作此努力時不自我設限，所以在1940年代毛澤東這類人造的紅太陽開始東昇時，已發現陽光底下呈現影陰，而1945年紅太陽昇至頂天時，陰影仍存，不過由於陽光熾烈，看不到陰影罷了。在追根溯源方面，本書強調思想統一和集權中央兩政策結合的貽禍人間，並批評中共以整風、審幹和肅反這一套方法達到毛澤東思想定於一尊目標的作法，同時也澄清中共所謂羣眾路線的整風、審幹和肅反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是否真已尊重羣眾。

(1) 私立南海大學 蘇雲峯著 精300元 平250元

私立南海大學是一羣海南菁英與海外瓊僑，於抗戰勝利後所創設的一所大學，其目的在建設一個現代化的海南。大學開辦於1947年11月，結束於1950年4月，有若「曇花一現」，然在海南發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義。由於它生命短暫，幾已為人們所遺忘，茲根據私立海南大學的原始檔案及有關資料，重建其籌創及經營經過。舉凡在創設大學的理想、重要領導人物，尤其是梁大鵬教授、大學師生與硬體設施方面，都有具體的陳述，不僅證明它的具體存在，亦證明它有相當成就。不幸，它誕生於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在幾經挫折之後，為中共當局所關閉，令人歎惜。

函購八折，郵撥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 廿年來臺灣地區出版之期刊與論文集中有關 中國近代婦女史的研究

游 鑑 明\*

在〈近廿年來大學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婦女史研究概況(臺灣地區)〉一文中,個人曾就近廿年來研究所論文進行分析與介紹,<sup>①</sup>爲了進一步瞭解此一研究概況,本文繼續收錄期刊與論文集中有關中國近代婦女史的學術論文,並以 1970~1990 年底在臺出版者爲主。茲將每篇論文依時序編製成下表:

作 者	論 文 題 目	論文來源	頁 次	年 月	備 註
陳仲玉	太平天國的婦女政策	大陸雜誌 42:8	245~255	1971.4	收入鮑家麟編著 《中國婦女史論 集》(1979.10)
鮑家麟	李汝珍的男女平等思想	食貨月刊復刊 1:12	12~21	1972.3	同 上
鮑家麟	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思想	中華學報 1:1	109~130	1974.1	同 上
呂芳上	抗戰時期中國的婦運工作	東海大學歷史學報 1	159~176	1977.4	收入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 (1981.7)
蔣永敬	胡漢民提倡女權的思想及其成就	食貨月刊復刊 8:7	1~13	1978.10	收入鮑家麟編著 《中國婦女史論 集》(1979.10) 及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 (1981.7)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① 本文原刊載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8期(民國78年9月),頁73~82。

鮑家麟	秋瑾與清末婦女運動	鮑家麟編著 《中國婦女 史論集》	346~382	1979.10	本文亦收入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
林景淵	下田歌子與我國女子留學生	近代中國 15	131~137	1980.2	
陳哲三	清季革命書刊中有關女權運動的記述	同 上	138~146	同 上	
金貞和	太平天國時期的婦女問題	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	104~114	1981.7	
王爾敏	近代湖南女權思潮先驅	同 上	115~128	同 上	
李又寧	中國新女界雜誌的創刊與內涵~中國新女界重刊序	同 上	179~241	同 上	
李又寧	傳統對於近代中國婦女的影響	《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第二冊	261~272	1981.8	
鮑家麟	民初的婦女思想(1911~1923)	同 上	275~299	同 上	
呂士朋	辛亥前十餘年間女學的倡導	東海大學歷史學報 5	1~11	1982.12	
王家儉	民初的女子參政運動	師範大學歷史學報 11	149~171	1983.6	
戚世皓	辛亥革命與知識婦女	辛亥革命研討會論文集	267~285	1983.6	收入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2冊(1988.5)
廖秀貞	清末女學在學制上的演進及女子小學教育的發展(1897~1911)	成功大學歷史學報 10	217~261	1983.9	同 上
丁碧雲 沙依仁	近三十年來婦女對社會發展及貢獻	《社會科學論叢》第31輯	259~268	1983.12	
梁惠錦	臺灣民報中有關婦女政治運動的言論	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學術討論會	396~428	1984.5	收入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2冊

張素碧	日據時期臺灣女子教育研究	雲林工專學報 4	429~519	1985.5	同上
李又寧	孫中山先生與清末民元的婦女運動	《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1冊	251~264	1985.12	
吳文星	日據時期臺灣的放足斷髮運動	瞿海源、章英華主編《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上册	69~108	1986.6	收入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2冊
陳曼玲	戰時婦女動員與女青年從軍運動	青年軍史研討會	1~32	1986.6	
周漢光	清末的女子教育	中國歷史學會集刊 18	241~269	1986.7	
梁惠錦	抗戰時期的婦女組織	國史館館刊 2	169~188	1987.6	
顧燕翎	從週期理論與階段理論看我國婦女運動與女性意識的發展	中山社會科學譯粹 2:3	37~59	1887.7	本文原發表於「女性知識份子與臺灣發展」研討會(1987.2)
游鑑明	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	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論文集	195~242	1987.8	本文大部份收入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20)
梁惠錦	抗戰時期的婦女工作幹部訓練	國史館館刊 3	125~158	1987.12	
楊碧玉	秋瑾政治人格的形成、發展與特質之研究	復興崗學報 39	269~290	1988.6	
吳文星	日據時期臺灣社會的領導階層與社會文化之變遷~以放足斷髮運動為例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	49~74	1988.6	
梁惠錦	北伐期間國民黨領導下的婦女運動(1926~1928)	北伐統一六十周年學術討論集	492~516	1988.10	
李又寧	北伐時期的婦女	《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三篇〈統一與建設〉(二)	768~797	1989.1	



陳青鳳	義和團運動中的婦女組織～紅燈照～的考察	政治大學歷史學報 7	143~162	1990.1	
顧燕翎	女性主義者秋瑾	婦女與兩性學刊 1	27~48	1990.1	
游鑑明	中國國民黨改組後的婦女運動	師範大學歷史學報 18	343~398	1990.6	
洪美華	清代中期民間秘密宗教中的婦女(1736~1850)	鄭志明編《宗教與文化》	137~176	1990.12	本文原發表於「中華民國宗教國際學術會議」(1989.9)
何思聰	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之研究(民國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	國史館館刊復刊 9	141~182	1990.12	

由上表得知，在三十七篇論文中，以刊載於1980年之後的論文最多，計有三十一篇，而且每年至少一篇，顯示中國近代婦女史的研究頗受重視。為提供同好參考、研究，以下即根據表列論文簡介如后：

### 1. 陳仲玉〈太平天國的婦女政策〉：

太平天國在典章制度中訂有婦女政策是史無前例的創舉，本文即就宗教、社會、組織、軍事等方面，探究婦女政策的成因及其政策進行的實效。首先，闡述太平天國的婦女政策，計有四項：(一)設女營、立女軍；(二)置女館、收婦女；(三)設女官、辦女試；(四)廢奴婢、禁娼妓。其二，討論婦女政策的成因，有宗教的因素、社會的背景、組織的成因與軍事上的因素等。其三，檢討實施上的矛盾現象，分成一夫一妻制與後宮粉黛以及女官女將與「牝雞不可司晨」等兩部份。作者歸論，太平天國採基督教教義中男女地位平等的觀念，廢除不利婦女的措施，確實開風氣之先。惟其男女平等的政策僅是利用婦女的能力，非出自基督教教義中的仁道愛心，也非以改革婦女地位為出發點，故對中國婦女的地位問題未產生直接的影響。

### 2. 鮑家麟〈李汝珍的男女平等思想〉：

李汝珍是清末關心社會問題的學者之一，從李氏撰寫的「鏡花緣」一書可以看出，李氏對傳統社會陋俗的不滿，尤其是與壓抑女性有關者，故本文根據「鏡花緣」歸納出李氏的女權思想，計有六點：反對雙重道德標準、反對纏足、反對塗脂抹粉、反對算命合婚、提倡女子教育、主張女子參政及關心婦女問題；此外，針對男女不平等的生活，李氏虛構武則天關心婦女問題的措施、編造男女易位的女兒國，以刻劃出女性的痛苦。作者強調，李氏的男女平等思想是土生土長的，而且影響甚深，由金一的「女界鐘」至秋瑾、康有為、梁啟超、嚴復、蔡元培與胡適等人的女權觀念，無不源自李汝珍的思想。

### 3. 鮑家麟〈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思想〉：

辛亥革命時期的新女性不少是以新面貌出現，其中以參加革命團體的女志士尤受矚目，而這群婦女能衝破傳統的藩籬是源自思想上的蘊釀與報章雜誌的傳播，有鑑於此，本文根據辛亥革命前婦女思潮中主要人物的言論與作為加以析論。首先探討戊戌政變時期與女學與禁纏足的言論，包括康有為、梁啟超、王韜、譚嗣同、嚴復、林紓及張之洞等人的觀點。其次，介紹康子新政時期的婦女思想，主要是以金一的「女界鐘」和秋瑾的言論、行誼為議題，再次，綜觀辛亥革命前，以婦女為對象的各類書報之言論，並敘述婦女於革命前後之諸種活動。由作者的敘述可以瞭解，戊戌變法的前後，不僅是婦女思想逐漸改變的關鍵，也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 4. 呂芳上〈抗戰時期中國的婦運工作〉：

中國的婦女運動至抗戰時期邁向新的境界，並根據「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大綱」，訂有具體的方針與基礎。本文首先介紹抗戰時期全國各地的婦運組織；其次，針對三百五十個以上婦女團體的工作進行分析；其三，詳述抗戰時期的婦運刊物，並列表說明；其四，討論婦女參政的實現與職業平等的爭取。此外，作者指出，此期婦運工作有若干缺點，諸如組織方式欠佳、人力與經費缺乏及宣傳刊物無法深入等；但作者也強調此期的婦運使婦女在觀念上有長足的進步，不再以解決婦女自身問題為唯一，並能與男性共同解決社會問題。

#### 5. 蔣永敬〈胡漢民提倡女權的思想及其成就〉：

在討論正文之前，作者先對中國近代女權運動的發生做概況性的敘述，繼而探討胡漢民提倡女權的歷史淵源及其早期倡導女權的言論與成就。作者認為在中國革命運動中，對女權的提倡最力者，首推胡漢民。再次，分析胡氏於五四運動後對女權的提倡，此期胡氏的言論集中於家族專制、經濟獨立與女權的關係。最後，說明胡氏如何經由立法來解決女權問題，作者特別指出，民法中所實現的男女平等精神，是胡氏一向提倡女權的結果，亦為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一貫政策。

#### 6. 鮑家麟〈秋瑾與清末婦女運動〉：

在清末民初的婦女運動與排滿運動中，秋瑾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為深入瞭解秋瑾與此期婦女運動的關係，本文對秋瑾的生平事蹟做了完整敘述。除了分析秋瑾的人格，介紹秋瑾的童年生活、婚姻狀況及留學生活之外，本文主要在探討秋瑾的女權思想及其實踐，從秋瑾遺留下的「敬告中國二萬名女同胞」、「中國女報」及「精衛石」等作品中可以看出，她的英雄主義和男女平等思想淵源。此外，本文由秋瑾重組共愛會、刊行女報、推行放足運動、提倡女子體育及籌組女國民軍等活動，說明秋瑾致力婦女運動的各種面相及其影響。

#### 7. 林景淵〈下田歌子與我國女子留學生〉：

下田歌子（1854~1936年）自1881年創立「桃夭塾」之後，即以從事女子教育為職志，其中由其主持的實踐女學校與我國近代女子留學教育淵源甚深。本文首先介紹實踐女學校招收中國女留學生的概況與人數，據統計，至清末該校約有八十名中國女

留學生；其次，說明實踐女學校的教育內容與校舍使用情形；其三，概述該校中國留學生的生活；其四，插敘孫中山先生與下田歌子的交往；其五，分析下田歌子的教育方針。最後作者指出，下田氏熱心教育中國女留學生可歸究於兩項因素，一是對中國文化的熱愛；二是受伊藤博文諸人影響，以致心胸開闊、氣度不凡，而她這種為中國女子教育造就人才的行為，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是值得注意的。

#### 8. 陳哲三〈清末革命書刊中有關女權運動的記述〉：

1900年，革命風潮日益澎湃，女權運動亦隨之擴大，尤其在革命書刊的宣傳下，獻身革命救國的婦女日漸增多。有鑑於此，本文特別介紹有關刊物以證明之，這些刊物包括游學譯編、江蘇、湖北學生界、國民日日報、浙江潮、雲南、中國日報、國民報、新世紀週刊及斧軍說部等，作者認為上述革命刊物提倡女權的因素是，漢民族與女子都是受壓迫的一方，而革命大業為全民事業，亦需女子參與協助。此外，又發現不少鼓吹革命思想與女權運動的刊物是出版於拒俄事件和蘇報案發生的那一年（1903年）。至於革命刊物中有關女權的主張，多由戒纏足、興女學、組織婦女團體著手，旨在求女子獨立、不依賴男子，貢獻才智予社會、國家，這些觀點和日後與男子互爭權利的言論大異其趣，故清季革命刊物對清季的女權運動有相當的意義。

#### 9. 金貞和〈太平天國時期的問題〉：

太平天國時期曾在軍事、教育、職業與經濟上認定婦女實質的權利，並推行男女平等的政策，但究在何種背景下實行？實行時產生那些問題？婦女的態度又如何？均是本文所期探討的。據作者研究，早期參與太平天國的婦女是來自廣西的客家婦女，她們同於男子般的體力與精神，誠有助於太平天國制度的實行。然而，太平天國制度的自相矛盾、婦女本身缺乏自發意識以及廣西省以外的婦女未具強韌的體力，使男女平權理想無法付諸實現。惟太平天國利用婦女從事勞動生產，並組成婦女團體的事實，不啻是對禮教社會的一種革命。

#### 10. 王爾敏〈近代湖南女權思潮先驅〉：

近代女權思潮於1985年之後，以上海、廣東、湖南三地為發展中心，作者認為，官方主動投入行動者僅湖南一地，故該地實為近代女權思想的先驅。由於湖南女權思想的發軔來自知識份子，故本文首先介紹譚嗣同、唐才常及長沙女子劉曾鑑等人的女權思想，再次，說明當地爭取女權的具體行動，如地方官率先倡導不纏足會、按察使黃遵憲頒發告示等。此外，作者強調婦女的痛苦首在纏足與社會地位的受歧視，而「不纏足」的觀念為女權思潮的主要內容，故湖南官員與民間的覺醒實有其歷史意義。

#### 11. 李又寧〈中國新女界雜誌的創刊與內涵～中國新女界雜誌重刊序〉：

中國新女界雜誌創刊於1907年，反映當代婦女拯民濟世的熱情與膽識，她們的文字與活動對當代與現今均有深遠的意義。有鑑於此，作者為該雜誌的重刊寫了序文，首先簡介近代中國婦女演變的由來及其重要性；其次，說明中國新女界雜誌的歷史背景，主要是以五個軸線分述：鴉片戰爭前譴責壓制婦女的言論與文字、太平天國的婦

女政策、傳教士的提倡放足、維新派與婦女問題及中國婦女運動的開始。再次，詳述中國新女界雜誌的宗旨、內容與價值。由作者不憚其煩的剖析可知，本文旨在引起各界重視這份珍貴的婦女史料，進而促進婦女史的研究。

#### 12. 李又寧〈傳統對於近代中國婦女的影響〉：

受傳統是近代化之阻力的觀念影響，許多中國婦女史的論著，視近代以前的中國婦女是父系社會、家長權威制度下的犧牲品。但作者認為這種觀點過於簡單化。故透過三方面，對傳統中國婦女的角色與地位重新評估。首先，作者認為傳統婦女具有勤勞的美德，使婦女不只是勤於理家，且是社會的生產者。其次，儘管傳統社會重男輕女，仍有部份人承認女子的能力不亞於男子，而且，在現實社會確實出現不少傑出婦女；其三，儒家的陰陽之說，固然意味著男女間理當不平等，但也有相輔相成之義；家齊而後國治的觀念，說明婦女須掌理家務，卻也表示婦女對整個國家負有一份責任。這些觀念顯示儒家有助於近代婦女地位的提昇。總之，本文藉由中國傳統文化，證明傳統不僅幫助婦女演變，也是近代婦女改進地位的緣由。

#### 13. 鮑家麟〈民初的婦女思想（1911~1923）〉：

由於1916年新文化運動的展開，中國婦女問題重新成為當代學者關注的焦點，而討論的範圍也較辛亥時期廣泛而深入。本文將這些議題分成男女社交與婚姻自主、貞操問題、經濟獨立自主、女子教育、婦女參政、女工福利及其他問題等六個部份詳加介紹。由這些議論可以發現，此期婦女思想深受西方經驗影響，對不利婦女的舊俗備加貶抑，並專注婦女權益本身，而不以國家利益為唯一前提。此外，作者強調男女於教育與立法上日趨平等，實奠基於此一時期的婦女思想。

#### 14. 呂士朋〈辛亥前十餘年間女學的倡導〉：

本文旨在回顧辛亥十餘年間女學的倡導情形與興辦成果，並進而析論其對辛亥革命的影響。根據作者的歸納，可得到下列四點結論：(一)西洋傳教士首倡中國女學的興辦，在開啓民智，提高女權方面，有助於中國現代化；(二)自強運動期間有關女學的倡導可謂是曲高和寡；至甲午戰後，梁啟超著文鼓吹，頗能振聵發聵；戊戌變法時，女學隨之興辦，卻又隨政變失敗而消逝；(三)辛丑新政期間，女學風氣漸開；至女子學堂章程訂立（1907年），女子教育始有法定地位，而女學亦逐漸普及；(四)蓋因女學使女學生產生愛國思想，以致參與革命活動者，多半是受過新式教育的女性。

#### 15. 王家儉〈民初的女子參政運動〉：

民初的女子參政運動雖不及一載，但卻在當時造成廣大震撼。本文首先分析此一運動產生的時代背景；其次，探討女子參政團體的成立及其初期活動，主要是以女子參政同志會、女子參政同盟會與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等三個團體為討論焦點。再次，闡述婦女參政運動受到限制而引起的一連串政治與輿論風波，如第一次參議院請願之受挫、女子參政權之論戰、同盟會內部之爭議及女子參政會之分化、第二次參議院請願及其遭受否決等。最後，作者認為民初的女子參政運動對日後女權的建立具有深遠

均多著；惟在社會基本結構尚未有重大變革之前，此一屬社會運動一環的女子參政運動實難一蹴即成。

#### 16. 戚世皓〈辛亥革命與知識婦女〉：

本文首先簡述辛亥革命前夕，各界提倡女學的動機與過程，如基督教會、清政府、維新派及革命派等；再次，簡介四位特殊的知識婦女，有邵毓秀、石美玉、曾紀芬和曾寶蓀等。文中作者提出兩項值得注意的觀點：一是基督教會固然為傳播福音而設女學，惟為配合中國社會需要，仍以保國強種、賢妻良母為教育宗旨；二是此期的女子教育觀念過於保守，但已是一項革命性的改變。此外，作者強調此期的婦女運動成就不大，然而對千餘年來受壓制的婦女而言，已是女子發展史上最燦爛的一頁。

#### 17. 廖秀貞〈清末女學在學制上的演進及女子小學教育的發展(1897~1911)〉：

本文以清末女學於學制上的演進與女子小學教育的發展為主題，俾對清末的女子教育做進一步的研究，首先探討清末女學在學制上的演進，以家庭教育中的女子教育與兩性雙軌制的女子教育為議題，藉此瞭解女學的演進過程及女學堂章程頒佈的背景；其次，討論清末女學的主流——小學教育，先是分析小學堂章程的內容，次則檢討歷年的發展、師資與經費、生活管理及男女同校等問題，至於討論的對象僅限於國人倡辦的小學，包括正規學堂和通俗教育。最後，作者對這十餘年間的女子小學教育所提出的結論，大致可分成下列五點：(一)清政府在女子小學教育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二)女學以富庶地區、通都大邑及沿海地區得風氣之先；(三)傳統禮教觀念對此期的女學有相當的影響；(四)師資與經費的匱乏，不利女學的發展；(五)女學旨在培養良妻賢母，而非女事業家。

#### 18. 丁碧雲、沙依仁〈近三十年來婦女對社會發展及貢獻〉：

本文旨在討論臺灣光復以來，臺灣婦女對社會的發展與貢獻，首先回顧以前中國的婦運概況，將之分為革命時期、北伐時期、抗戰時期和行憲時期，並統稱為萌芽期；其二，討論近三十年來臺灣婦女於教育與職業上的發展，作者強調，此期婦女能在社會上有所貢獻，主要有四項因素：(一)政府的扶持與輔導；(二)婦女本身的努力；(三)西洋文化的傳播；(四)工商業發展與社會建設的需要。其三，分析當前我國婦女的就業概況，包括教育界、生產線上、商業及金融保險、社會團體及個人服務、警察、專業人員與其他行業的婦女；其四，將中、外婦女的地位及貢獻做簡要的比較。作者發現，美、日等國的婦女在就業上受歧視的情形較臺灣嚴重。最後，作者建議，為便利職業婦女就業，應注重托兒問題；此外，各機構應增加中年婦女就業的機會，俾有助於婦女對社會的貢獻。

#### 19. 梁惠錦〈臺灣民報中有關婦女政治運動的言論〉：

臺灣民報是日據時期臺民的喉舌，該報除不斷批評殖民政策之外，也經常介紹世界新思潮、報導各界動態，婦女運動的言論即為其中一項。本文係根據該報有關婦女政治運動的言論進行討論，俾瞭解該報的輿論觀點及其功能。本文首敘臺灣民報重視

婦女運動之緣起，分成歐美女權運動的激盪、中國婦女運動的啓發、日本本土思潮的影響及臺灣社會的變遷等四項說明；其次，列表歸納臺灣民報中有關婦女運動的言論，並就與婦女政治運動有關的四十七篇文章加以分析；最後，作者提出三點結論：(一)臺灣民報的婦運言論有助於臺灣婦女的覺醒；(二)臺灣民報鼓吹婦運的觀點，可視為臺胞非武裝抗日行動的一環；(三)臺灣民報為光復後的婦運奠定良好的基礎。

#### 20.張素碧〈日據時期臺灣女子教育研究〉：

本文係以專書方式撰寫，共分爲七章。第一章「緒論」，旨在說明研究緣起及研究範圍與方法；第二章「日據前期臺灣女子中等教育」，將此期的女子中等教育分成準備時期、手藝科時期與技藝科時期等三個階段討論；第三章「日據後期臺灣女子中等教育」，探究學制沿革、課程內容、日臺共學制的真相及高等女學校各類活動；第四章「臺灣女子初等教育」，分成準備時期、日據前期、日據中期及日據末期四節；第五章「臺灣女子師範教育」，以民國八年爲分水嶺，分成日據前期與日據後期敘述；第六章「臺灣女子其他教育」，主在說明實業補習教育及屬社會教育範圍的日語講習所；第七章「結論」，作者認爲在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女子教育，雖然有新內涵和新制度，在發展過程中亦有可觀之處，但此一教育係以異民族、異文化方式展開，故於臺灣教育史上有特殊意義，可歸納成下列五點：(一)殖民統治下的差別教育；(二)臺灣女子教育在日據後期才有增長；(三)賢妻良母主義是臺灣女子教育的核心；(四)臺灣女子教育具有完成自我和貢獻國家社會的特質；(五)臺灣女子教育是程度淺近的實用性教育。

#### 21.李又寧〈孫中山先生與清末民元的婦女運動〉：

本文探討孫中山先生與清末民元婦女運動的關係，著重於女子參政問題的歷史爭論，敘述孫先生在此期間關於男女平等問題的言論和策略，兼及時人的有關主張和活動，相互比較，以見異同。從此文可見，孫先生倡言男女平等，始終如一；但民國初創，政局艱危，法制未立，加以保守勢力龐大，革命陣營分化，在許多事上他力不從心。由於不利的綜合因素，男女在政治上的平等未能實現。然而，從近代史總的過程來看，中國婦女第一次爲民主法制所作的奮鬥，並未枉費；相反的，它具有積極的歷史意義。它標誌著辛亥革命精神的延續不絕，同時展示女界服膺孫先生的倡導，深以「男女平權，實屬天經地義」。歷史證明：此說的倡導人和信仰者，承先啓後，目光深遠，是名符其實的民國前衛。<sup>②</sup>

#### 22.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的放足斷髮運動〉：

本文是以社會運動的概念探討放足斷髮運動組織的進展、運動方式的演變，以及社會大眾對該運動的迎拒過程，並分析該運動的意義和影響，此二運動雖互爲呼應，但此處爲針對婦女史研究，僅介紹與放足運動有關者。據研究，日據初期，總督府對纏足習俗採漸禁政策，透過學校、報章雜誌及民間團體來達成其間接禁纏的目的，迨

<sup>②</sup> 此處的簡介引自李又寧〈孫中山先生與清末民元的婦女運動〉提要，收入《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一冊（臺北，1985），頁250。

至時機成熟，遂明令解纏（1915年），使解纏運動順利推展，至於解纏運動的影響有三點：（一）改變社會的審美觀念；（二）增加人力資源、促進殖民地經濟發展；（三）開啓以社會運動達成同化目的之先河。此外，作者認為，臺灣放足運動的倡導、發展與成效，實有其獨特背景與條件，並非直接受大陸影響。

### 23. 陳曼玲〈戰時婦女動員與女青年從軍運動〉：

抗戰軍興，在國家總動員政策號召下，廣大的婦女群眾相率投入後方生產或戰地服務工作，其中女青年軍的徵集，誠可謂戰時婦女動員的極致。本文即以戰時婦女動員為背景，闡述女青年從軍的由來、經過，從而進一步了解戰時婦女所扮演的角色。全文分成戰時婦女動員、女青年軍之徵集、訓練與分發三部份。作者指出，戰時中國教育尚不普及，社會盛行重文輕武的觀念，加之，傳統婦女保守思想的影響，徵集女知識青年從軍誠非易事，但因有婦女動員工作為基礎，方得以完成此一徵集工作。綜論女青年從軍運動的時代意義有下列三點：（一）此次女青年軍從軍，是首次婦女志願從軍的集體行動；（二）此次女青年軍從軍乃與男子爭盡國民之義務；（三）此次女青年從軍，擴大了婦女工作之領域，證實了婦女本身的能力。

### 24. 周漢光〈清末的女子教育〉：

本文分成兩大部份，首先敘述我國傳統女子教育的概況，指出傳統社會的女性所受的教育，只在培養賢妻良母；其次探討清末女子教育的發展，並分成六個細目，即清末外國傳教士在華創辦的女校、清末我國知識份子提倡女學的主張、清末國人自辦的女學、清末「女子小學堂章程」及「女子師範學堂章程」的頒佈、清末女子教科書及刊物的編纂出版以及清末女子留學教育等；另將外國傳教士與國人自辦的女學分列成二表說明。作者歸論，清末是中國女子教育萌芽時期，無論女子教育方針、課程設計、學科內容或課程設置上均不够完整，故其發展須待日後不斷改進。

### 25. 梁惠錦：〈抗戰時期的婦女組織〉：

七七事變爆發後，不少中國婦女組織團體，獻身抗日運動，據作者統計，此類組織約有八百一十九個，可分成八類，即婦慰會暨其分支團體、新運婦女會暨其分支團體、婦運會暨其分支團體、江西婦指處及縣聯指處團體、不明系統的縣婦女會團體、戰時兒童保育會及育幼團體、生產合作事業及其他各類婦女團體組織；其工作性質繁多，包括宣傳、救護、慰勞、救濟、生產、出版、兒童保育、敵後工作等。據作者分析，這些組織由於分布廣泛，有經費不足及組織成員重疊、缺乏訓練的缺點；但也呈現三項特色：（一）婦女組織趨向多元化；（二）生產工藝團體勃興，吸引廣大鄉村婦女，擴展婦女組織；（三）婦女團體以貢獻才能代替爭取權利。

### 26. 顧燕翎〈從週期理論與階段理論看我國婦女運動與女性意識的發展〉：

本文旨在澄清以下三個問題：（一）「臺灣婦女比其他國家婦女幸運，不必經過爭取，就已獲得法律平等」，此一說法是否正確？（二）臺灣有無婦運，是否需要婦運？（三）臺灣婦運的特色是甚麼？爲了回答第一個問題，本文首先檢視十九世紀以來，影響中

國婦女地位和角色的許多客觀、主觀和行動因素；並以 Mauss (1975) 的社會問題自然史的五個階段為架構，以時間為主要變項，從縱斷面來探討歷次婦運和社會客體之間的互動情形及其消長的原因，但以臺灣經驗為主體。全文共分為八節，即女性意識萌芽期、不纏足與興女學運動，婦女運動集結期與國民革命、女權的削弱及參政運動的早逝、婦運第二生命週期與新文化運動、國共合作期間的婦運、抗戰時期的職業平等運動及臺灣地區的婦女運動。作者總結，由近百年婦運的縱斷面來看，婦運是一波接一波的展開，雖未必能完整的度過生命週期，卻是逐次提高問題層次，而關注內容也各有時代特色；由橫斷面來看，婦運的成敗受諸社會價值與觀念、社會結構及生產工具、權力機關以及領導者四因素的交互影響。此外，作者認為中國婦運一直停留於 Peggy McIntosh 所謂的無知期、認同期，並在抗議期受到阻力。

#### 27.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

日據時期的教育旨在達成同化臺民的目的，並貫徹殖民統治方針，而女子教育亦不例外，本文即根據此一政策的三個演變階段，探討女子教育目標和女子學制的建立，並分析臺灣知識界的反應。有關女子教育的目標，基本上與男子教育一致，使受教者能精通日語，並具備日本國民性格，但為強調女子特性，係以「涵養婦德」為目標，故此一目標有培養賢妻良母和忠貞不二女國民的雙重任務。有關女子學制的建立，女子教育系統確立於1922年，且於此後不斷成長，惟在殖民教育的差別待遇與隔離政策影響下，未建立公平平衡的女子教育，加以兩性不平等觀念的存在，使女子教育成為殖民教育體制中最弱的一環。而值得注意的是，面對由殖民政府倡導的女子教育，臺灣知識界的反應又如何呢？據作者分析，除了一致響應之外，在觀念上則有齊家興國和解放婦女等兩種女子教育觀，並由被動轉為自覺，故對女子教育的建立有極大的助益。

#### 28. 梁惠錦〈抗戰時期的婦女工作幹部訓練〉：

抗日期間，為了厚植總體戰力，必須動員廣大的婦女同胞，但由於婦女所能負擔的工作與男子不同，因此，作者以全國性婦女組織及地方或私人性婦女組織為研究對象，探討各婦女團體動員婦女的方式，由招訓婦女、分發服務及動員婦女以應急需等項逐一說明。據作者歸論，蓋因戰亂控憾，婦女幹部訓練有下列三項缺點：(一)缺乏全面的、長期的訓練計劃；(二)學員素質不齊，若干婦女常不願接受調訓；(三)訓練時間短促、課程繁雜，學習效果不彰。然而這項訓練仍有其肯定的意義，如：(一)開闢青年婦女服務社會、報效國家的大道；(二)使婦運推廣工作及於窮鄉僻壤，落實生根；(三)使婦女配合國家社會演變與需要，各盡其才。

#### 29. 楊碧玉〈秋瑾政治人格的形成、發展與特質之研究〉：

本文採用格林斯坦 (F.I. Greenstein) 和艾克力生 (Erik Erikson) 的理論，探討與秋瑾個人人格與態度形成有直接關係的家庭生活、教育環境、婚姻生活及社會經驗，俾進一步分析其政治人格的特質、形成過程以及原因。經由作者析論，獲得兩



點結論：(一)秋瑾能成為清末婦運的倡導者是受自由平等的家庭生活、不幸的婚姻生活與日漸展開的女權運動影響所致；(二)秋瑾參加革命則是歸功於書籍的潛移默化與對國事嫻熟的親身體驗。

30.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的領導階層與社會文化變遷～以放足斷髮運動為例〉：

本文係根據「日據時期臺灣的放足斷髮運動」一文中，社會領導階層在此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用做進一步研究，全文共分成四個部份，即：纏足辮髮漸禁政策與自發性放足斷髮、社會領導階層與放足斷髮運動之推展、社會領導階層與新觀念的普及以及社會領導階層與厲行放足斷髮等。根據研究，總督府在此一運動過程中，始終扮演著左右運動力量消長的角色，而社會領導階層乃是身先倡率者，如天然足會即由民間社教團體發軔，再在他們的引領下，由上而下，由點而面逐漸展開，致使絕大多數婦女能在十餘年間放棄纏足，影響所及，其他陋習的矯正、迷信的破除或日語的推動，莫不歸功於臺灣社會領導階層的努力。

31.梁惠錦〈北伐期間國民黨領導下的婦女運動（1926～1928）〉：

北伐期間，國民黨以其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內政策第十三條為方針，領導婦女運動。作者就國民黨領導婦運的宗旨、方法及助進女權的政策逐一分析，在宗旨方面，國民黨領導婦運旨在引導婦女加入革命行列、厚植社會經濟整體力量並指導婦女參加民衆運動。在方法上，國民黨採用三種方式，即積極宣傳並吸收女黨員，協助各地成立婦女團體與訓練婦女黨務工作人才。至於助進女權的政策則包括訓令政府立法保障婦女、咨請政府機關錄用婦女政策。綜觀此一時期的婦女運動，作者認為有三項特色：(一)它是由政治權力團體由上而下領導的婦女運動；(二)立法保障婦女權益，使日後婦女運動有所依據；(三)有主義、有組織、有系統、有訓練的婦女運動。此外，作者也提出婦運的三個缺點：(一)女權得之太易、婦女失去奮鬥精神；(二)偏重知識婦女與女工而忽視家庭及農村婦女；(三)社會結構、經濟發展未能配合，減低效果。

32.李又寧〈北伐時期的婦女〉：

五四時期，婦女受學生愛國運動的影響，亦奔走呼號，成為一股力量。為順應時代的要求，國民黨遂在改組宣言中，提出推行男女平等的原則，並於北伐期間加以推展。本文旨在鳥瞰此期中央婦女部及其支部於湖南、湖北、上海以及軍中等地的活動，俾瞭解此期國民黨對婦女的貢獻。作者歸論，此期各行各業的婦女是國民黨爭取的對象，同時，受重農觀念、民生主義的影響，將婦運擴展至鄉間。此外，北伐時期的婦女呈現千姿百態和亦新亦舊的一面，致有不願放足的守舊派、也有捐軀戰場的革新派。而值得注意的是，北伐期間參與全國性政治和軍事行動的婦女是首次來自各階層的婦女，雖然她們在此期僅屬次要角色，卻有其歷史意義。另外，本著男女平等的原則，國民黨藉由民法，給予婦女法律上的保障，助進女權的發展，故北伐在中國婦女史上是件要事。

### 33. 陳青鳳〈義和團運動中的婦女組織～紅燈照～的考察〉：

本文係針對文化大革命時期有關「紅燈照」的看法，提出進一步的考察與論辯。首先，探討紅燈照的組織性質，從其組織結構看來，紅燈照是由年青女子組織而成，並崇尚紅色；此外，作者強調，紅色是與离卦教有關，並不是革命造反的象徵。其次，討論紅燈照產生的背景，大約出現於義和團運動的第二期，旨在應和整個運動的多變局勢。再次，敘述紅燈照的活動，由資料顯示，她們憑藉法術從事醫療，戰時醫護及搜集情報等工作；此外，作者認為這種非理性的宗教特色正是紅燈照取得民心的根據。最後，作者從婦女解放運動的角度指出，紅燈照的活動僅是反帝排外運動中群眾運動的一環，事實上，並未提昇婦女的家庭或社會地位，惟其蘊含的改革思想與能源傳至秋瑾等人，終成為自主而積極的婦女解放運動。

### 34. 顧燕翎〈女性主義者秋瑾〉：

在婦運先驅者中，秋瑾是最早擺脫性別角色限制和最受後世肯定的一位，本文就她的生平、家庭背景、性別角色認同、婚姻生活、自我成長過程和女性主義思想，分析其女性意識的根源和內容以及其與時代、環境的互動，並將之與後世的國共婦女領袖略作比較。作者認為，在西方婦運思想尚未譯介至華前，秋瑾的女性主義充份反映了中國女性接受傳統教育之後，站在人的立場，要求與男性具有平等待遇，儘管她的女性主義的理論不十分成熟，但其所表現的女性意識的自主和對抗精神，以及對女性個人自由與尊嚴的肯定，則已遠超越國共兩黨政治體系內的婦女領袖。進言之，其部份女性主義思想已超越認同期，甚至已發展到了女性中心和兩性合作等。

### 35. 游鑑明〈中國國民黨改組後的婦女運動〉：

1924年國民黨改組後，即於中央及地方分別成立婦女部及其支部，並積極從事婦運，致使婦運的主導力量轉至國民黨手中；此外，蓋共產黨亦視婦女為群眾運動的一環，故於國民黨允許其女性黨員入黨期間，共產黨亦伺機活動，使此期的婦運深具意義。有鑑於此，本文首先探討國民黨婦女組織的建立與發展，俾瞭解婦女組織的內部結構與對外關係；次則討論婦女組織的政綱、宣傳方式及宣傳人員的訓練，最後以三個階段分析各婦女組織的工作概況，並檢討其得失。據研究，國民黨改組以來的婦運較諸清末與五四時代蓬勃，此係因改組以來，國民黨的組織結構較為完密，能採有計劃、有組織的婦運，強調各團體的整合，以營造大規模的婦運，並擴大宣傳對象與訴求空間。然而，國民黨在發展婦運期間，亦受內、外在環境的影響，遭遇不少困境，諸如發展空間的有限、組織機構的重疊、組織成員的相互攻訐、經費與人力的不足、社會保守觀念的續存與部份婦女畏懼黨派等，均使婦運工作無法充份發揮。惟作者亦指出，此一深具黨化色彩的婦運在中國婦運史上扮演相當重要的地位，並為往後中國婦運奠定深厚基礎。

### 36. 洪美華〈清代中期民間祕密宗教中的婦女（1736～1850）〉：

本文以清代中期的社會經濟為背景，採用宗教的社會功能和大小傳統文化的觀

點，探討秘密宗教中的婦女特質及其時代意義。首先概述清代中期以前秘密宗教婦女的活動情形，繼而分析婦女參與秘密宗教的內、外在因素，件敘述。再者探討秘密宗教婦女的地位及其矛盾之處；最後申論清政府的禁教鎮壓及其對秘密宗教婦女的影響，藉此了解當時下層社會婦女的生活特質及其宗教信仰的情形。作者認為從此期秘密宗教婦女的探討中，可得到五點意義：(一)傳統婦女的平等問題；(二)秘密宗教社會功能的重要性；(三)小傳統文化的特色；(四)秘密宗教中的婦女，並非反傳統、反倫理；(五)婦女的性格特色並非天生具有。作者又強調，民間秘密宗教的婦女所擁有的權力、地位，雖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或是具有高度的自覺，但這群婦女卻反映出各種不同的社會問題。

### 37.何思暉〈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之研究（民國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

為有系統的介紹民國以來的婦女團體活動，本文以抗戰時期新運動婦女會為個案研究，首述該會創立經過與組織概況；繼言總會的工作概況，包括戰地服務、宣傳慰勞、生產事業、兒童保育、文化事業、鄉村服務和幹部訓練等；復述各省及海外分支機構之工作。由該會的表現看來，作者認為具有如下特色：一、很少爭取婦女個人的權益，一切以國家民族為前題；二、為配合戰爭需要，積極投入各種戰地服務工作；三、鼓勵婦女進入工廠，從事生產工作；四、戰時的榮軍服務，奠定日後榮民及軍眷服務基礎。惟作者亦指出，該會在領導階層、幹部訓練、經費、內部組織與工作內容上仍存有若干問題。整體觀之，新運婦女層多半能配合戰時需要，並對中國婦運的發展有相當的貢獻。

根據前述的簡介，得知廿年來期刊與論文集集中的中國近代婦女史研究，無論在內容或範圍上頗為豐富、廣泛，而且研究方法也漸有突破，茲述於下：

- (一) 就內容性質言，大致可分成九類，有關婦女政策一篇、女權思想六篇、婦女問題一篇、婦女組織與工作六篇、人物七篇、女子教育六篇、婦女運動六篇、婦女生活史（包括政治、社會、經濟與宗教）四篇。
- (二) 就時間斷限言，由清末迄今均有專文討論，多數分成清末時期、清末民初時期、北伐時期、抗戰時期、日據時期及光復以來時期等六個階段。
- (三) 就研究方法言，主要是採歷史研究法，但有數篇文章嘗試以心理學、社會學與宗教學的理論來進行解釋；另外，量化統計與比較、歸納法亦被大量應用。



史料介紹

##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 及其典藏的民國史料

呂芳上\*

### 一、被視為「保守派思想庫」的胡佛研究所

1980年1月，雷根當上了美國總統，當時和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索忍尼辛（Alexander Solzhenitsyn）同時掛名為胡佛研究所名譽研究員的雷根，一口氣把三十多位「胡佛人」帶入白宮，美國政府中的「胡佛黨」一詞不脛而走，胡佛研究所也被紐約時報雜誌稱為「保守派中一顆閃亮的明星」。

學術介入政治在美國歷史上雖非無前例可援，但確是一個敏感的話題。當年雷根給人具保守作風的印象，加上胡佛研究所一向不與共產主義妥協的性格，還有豐厚的財源，「胡佛人」的抬頭不只叫學術界中的自由派嫉羨，也引起史丹福大學校園內其他教授的吃味：大學中的學術獨立是否被破壞了？半獨立狀態的胡佛研究所與大學之間的關係如何定位？豐厚的財源怎麼來的？又怎麼去的？十年後的今天，史丹福校園內，對這些問題爭論的聲音，似乎也還依稀可聞。

1919年，史丹福有名的校友胡佛（Herbert C. Hoover, 1874—1964）拿出了五萬美元，成立了胡佛研究所。最初的目的是在收購相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資料，其時適逢蘇俄革命，胡佛認為「布爾什維克比戰爭更壞」，故也收集蘇俄革命及戰後年代的文史資料，以便學者日後的研究，弄清戰爭的根源，也有助於「證實卡爾馬克斯的教條的罪惡」。到了一九八〇年代，這個研究所一年已有近九百萬美元的經費，除了大約三分之一的錢來自史丹福大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學本身的津貼，和一部分來自基金股息及出版品出售的利潤外，大部分經費來自私人或公司的捐贈。而龐大的經費，對於一個只擁有兩百個職員，六十五位專任研究學者和三十五位訪問學者的研究機構而言，足稱豐厚的了。佔了全部經費近百分之五十的研究費，百分之三十六的圖書館費用，表示研究人員享有叫人羨慕的研究環境，也有愁有錢沒處買書的苦惱。胡佛研究所今天擁有一百六十萬冊藏書，六萬個微捲，二萬五千種期刊，四千三百類約四千萬件檔案，估計圖書和檔案書架合擺起來約二十五英里長，每年還以一英里左右的速度在成長中。這個研究所，每年吸引了來自全世界四十個國家的一千二百位學者的利用和研究。豐富的藏書和美西學術重鎮的形成，的確叫人刮目相看。在該所成立四十年後，胡佛曾自傲的說：「凡是世上有關反共產主義、反納粹、反社會主義、反集權主義、反奴役、反宗教自由、反人權等各種歷史資料，此間收藏之完備豐富，無有出其右者。」

胡佛研究所的典藏和研究圍繞在戰爭、革命及和平三個主題上。由於近半世紀以來新科技革命，科技整合成了研究的主要趨勢，研究所的目標也擺在成爲「有關二十世紀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方面變化的國際性的資料研究和出版中心。」研究所的學者有百分之四十是經濟學家，歷史學者和政治學者也各占百分之二十，其他百分之二十的學者是屬於法律、社會、哲學和物理學的範圍。這些研究人員分爲兩組：（一）國際研究計畫小組（International Studies Program）「集中研究關係到國家安全的，同美國生命攸關的重大問題，包括對外政策、地緣政治問題和區域研究」。過去的主要長期研究項目包括基礎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或下列相關領域的研究：非洲殖民地主義、毛以後的中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蘇聯的非俄羅斯民族、拉丁美洲、國家安全及教育在戰爭、革命、和平和發展中的作用。近年來注意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國家安全、外交政策、武器管制、世界政治理論、全球戰略問題。（二）國內研究小組（Domestic Studies Program），過去注意力集中在政府對企業的調節和反調節問題、福利計畫、收入再分配問題及政府稅收和開支問題上。近年注意國家財政政策，宏觀經濟與貨幣政策、生產與人力資源、收入重分配、社會計畫、正規建構、美國制度與政治經濟以及社會行爲與公共政策的抉擇上。研究人員通常以個人獨立或合作的方式，透過長短期的研究計畫、大小型學術研討會或直接在報刊上發表公共政策意見，同時出版專書，表現研究成果，達成實際應用的目的。由此看來，埋首在大樹鎮（Palo Alto）那座高二八五英尺胡佛塔中的學者們，並不是藏身在象牙塔的蛀書蟲而已。

胡佛研究所的典藏分兩大部門，在圖書館方面，一百六十萬卷書分藏於非洲、中歐、東亞、東歐、拉丁美洲、中東、北美、蘇聯及西歐九個圖書館。一年來自全美乃至於全球的一千二百位學者，都為這裏的豐富收藏所吸引，據 1982 年的統計，這裏圖書研究資料的使用率，高達百分之十二。目前每年平均還以一萬六千五百冊的數量增加中。當然對於紙質保存不能超過五十年的報刊，如何編列鉅額經費維護，也成為急切又棘手的問題。最令人欽羨的典藏是在檔案館，兩萬五千冊以及六萬件有關沙皇倒臺，十月革命和俄國內戰的第一手資料，包括世上僅有的二〇二箱沙皇秘密警察資料、孟什維克的尼古拉耶夫斯基檔案四百箱、白俄軍官尤登尼奇專檔二十一箱以及大批托洛斯基文卷手稿等，都是稀世的珍藏。還有 1917 年 3 月 3 日蘇共「真理報」的創刊號，美國境內所藏唯一首版油印錯了一個字的馬、恩「共產主義宣言」，希特勒蓋世太保頭子希姆萊的六本日記，一張希特勒頭部的 X 光片等，都靜靜的躺在室內溫度保持華氏六十八度，濕度保持五〇度的檔案館中。顯然除了蘇俄的資料外，一、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從中歐、納粹德國、非洲、拉丁美洲、亞洲和中東地區，也收集、搶救了無數有關戰爭、革命及和平的史料。二次戰後，日本和中國成為資料搜集的重點，戰後中共的歷史資料，更受重視。有了豐富的收藏，許多知名的學人，包括六位得過諾貝爾獎的學者，選擇了這個地方作為安身立命的處所，是不無道理的。

還值得一提的是胡佛研究所也注意到青年人才的培育。每年有十四個全年獎助名額，提供來自全美各大學的傑出年輕學者作博士後研究進修的「國家獎助計畫」(National Fellows Program)，被視為一項發展基礎研究與激發新觀念，了解公共政策決策過程的重要投資。主持人的遠見，不能不叫人佩服。

## 二、「東亞圖書館」的民國史資料

「東亞圖書館」(East Asian Collection) 是胡佛研究所規模最大的圖書館，也可以說是中國大陸和臺灣以外，收藏中國近現代史資料最為豐富的圖書館之一。1945 年該館初成立時，即訂有三個典藏指標：一、有關「戰爭」方面，應蒐集「戰爭發生的原因與後果等資料，避免只注意軍事活動方面的內容」；二、在「革命」方面，應「衡量所有形式的革命運動」；三、在「和平」方面，應包含「國際關係的所有層面，不只在政治、經濟和文化

關係，還應包括和平的組織」等資料。目前館內大約有三十萬冊以上的藏書，加上八百五十種期刊，七千六百五十個微捲。其中百分之六十五是中文資料，百分之三十五是日文藏書。全部收藏的百分之四十是屬於政治、法律、經濟、財政、社會學、統計學和國防類別，百分之二十五是歷史和地理學，百分之十七是語言和文學，包括農業和工業在內的科技類占百分之十，其他書籍占百分之八。

東亞圖書館所以有今天的規模，除了有豐厚的財力外，前人的努力是不可忽視的：在日本，1945年11月，經由麥克阿瑟將軍的同意下，在東京設立辦事處，由史丹福校友，地理學教授 Hubert G. Schenck 和日籍校友東內義雄主持，每天派人到神田區舊書攤蒐羅，同時與書商打交道以便直接搜集圖書。兩年之間運回五千本書及相等數量的期刊、報紙、官方文書及數以噸計的資料。由1945年11月到1947年12月，估計約有三百箱日文資料運回史丹福。在中國方面，由於戰後中國特殊環境的限制，不能直接搜求，該館乃透過了加拿大友人的協助，經由渥太華轉運中文資料。1946到1947年東亞館派駐中國的主要代表是萊特夫婦 (Mary & Arthur Wright)，他們駐居北平，但活動範圍不限於一地，在美空軍的協助下，在政府軍攻克延安之前，萊特夫人已成功的在延安蒐集了不少中共相關的資料。這段兵荒馬亂時期遺留的材料，對今天研究延安時期的中共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仍具有絕佳的參考價值。在1949年之前還有 Ann N. Bottorff、John Berentz Getz Brothers、William C. Bergers、H. H. Hopkins、J. Hall Paxton、Pardee Lowe、R. H. Hainz、Richard P. Colon 分別在北平、上海、延安、重慶、迪化、南京、廣州和臺北，負責搜集有關的材料，在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之前，多數資料已在運往史丹福途中，僅只東京辦事處就轉運了四百五十箱書籍，大約五千冊以上珍貴的絕版書刊。1949年以後中國資料的蒐集雖已不再大規模進行，但每年透過香港和臺北的購書行動仍持續著。大陸開放以後，直接從大陸獲得相關資料，如1970年以後的「文史資料」、1978年大陸民主運動地下刊物，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文件圖書的徵集，都有顯著成果。在臺灣，1962年對陳誠石叟室1931至1934年中共蘇區時期文件的微捲製作；1970年以後對臺灣民主化運動，特別是黨外期刊的收集，也都有一定的成績，對日後的中國研究，相信也會有相當的幫助。

東亞圖書館的藏書主要仍以當代中國的作品為主，尤其是有關國民政府及執政的國民黨和在野的派系，包括中國共產黨的資料最引人注意，在

1949年以前的藏書中，最受矚目的中文資料有下列數種：

(一) 國民政府各部門政治史料，包括各部會、各省市政府公報、行政報告、民意機構會議紀錄；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本身不同派系的出版品及期刊，種類和數量均屬可觀。

(二) 近代經濟發展的資料，包括農業、銀行、工業等類別，八百種，一千四百冊以上。

(三) 中國左翼運動的小冊、期刊、單行本書刊，一千二百種，約一千八百冊。

(四) 有關中國近代學生運動方面的書籍九十種，約一百五十冊。有關日文的民國史資料，較特殊的有：日本對殖民地各種調查資料，八百種一千六百冊，包括 1895 至 1945 年日本占領下臺灣、東北及華北調查資料；爲了軍事部門參考需要所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日文資料，四十種六十冊。其他有關近代中國的日文著作與出版品，更不計其數。研究近代中國的學者，如從不同的角度出發，蒐尋不同主題的材料，在東亞圖書館都可能有意外的收穫。

東亞圖書館現任館長是經濟史家馬若孟 (Ramon H. Myers) 教授，館內的華裔職員包括譚煥廷先生、張富美教授、董王繆麗女士、羅珞珈小姐、胡英音小姐等，都不分彼此，熱心的爲到訪的學者，作周全的服務，給人印象極爲深刻。

### 三、「胡佛檔案館」的中國現代史檔案

胡佛研究所靠其富厚的財力，也廣泛的搜集世界各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檔案，據報告四千五百多類的檔案中，涉及美國歷史的最多，其次是蘇聯、東歐及西歐，直接間接涉及中國的，大約在兩百個類，其中絕大部分是個人檔案。個人檔案的來源，通常是私人捐贈，或由家屬委託代管，因此檔案開放的限度，往往取決於捐贈者或需經家屬的同意，多數的檔案甚至可以提供部分複印的服務。茲就重要的中國人個人檔案與涉及中國事務的外國人檔案，簡略介紹如次：

#### (一) 中國人的個人檔案：

1. 張嘉森 (1886~1969)，即張君勱，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兩封1947年涉及成立聯合政府事，給馬歇爾和魏德邁的信函。



- 2.張歆海（1898～1972），浙江海鹽人，曾任外交部歐美司長、駐葡（1933～1934）、駐捷克及波蘭（1934～1937）公使。資料十九盒，有通信、著作、剪報等，涉及戰時中美關係。
- 3.張嘉璈（1889～1979），即張公權，曾任中國銀行總經理，國民政府交通、鐵道部長（1935～1942）、軍委會東北行轅經委會主任（1945～1947）、中央銀行總裁等職。1960年代曾任胡佛研究所研究人員。生前捐贈的資料有二大盒、十三小盒、二十二個微捲，重要的是1945～1946年在東北的日記，已由馬若孟和格林二位教授合譯為英文出版，姚崧齡編著的《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也已善用了此中的藏檔。
- 4.胡世澤（1894～1972），浙江吳興人，曾任駐瑞士公使兼駐國聯全權代表辦事處處長（1932～1942）、外交部次長（1942～1945），資料八盒，有日記、通信、剪報、報告等，涉及中外關係、國際會議及聯合國問題。
- 5.黃郛（1880～1936），即黃膺白，浙江杭縣人，曾任北京攝政內閣總理（1924）、國府外交部長（1928）、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會委員長（1933）。資料七盒，包括1927年南京事件、1933年塘沽協定交涉、書信及報告等。唯需獲家屬同意才能參閱。
- 6.黃仁霖（1901～1983），江西安義人，曾任勵志社總幹事（1928）、新生活運委會總幹事（1937）、聯勤總司令（1953）、駐巴拿馬大使（1965）等職。一盒資料，含回憶、演說詞、剪報、照片等。
- 7.毛炳文（1891～1972），陸軍將領，資料一宗，係其個人自傳，與抗戰及戰後中國之軍事有關。
- 8.梅貽琦（1889～1962），曾任清華大學校長、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教育部長等職。文件一宗，內有1949～1956年間，在臺灣時之日記及信函。
- 9.宋子文（1894～1971），曾任孫中山英文秘書、中央銀行行長、總裁、國民政府財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外交部長、行政院長、廣東省政府主席等要職。資料最多，有五十七盒，另一大盒、兩卷宗、兩個微捲。其中十八盒中文，內信函一盒、電報三盒、中國銀行資料一盒，尚未開放者十三盒；英文資料四十盒，內信函十盒、電報九盒、文件及會議資料十盒、談話紀錄及手稿一盒、地圖照片一盒，其他四盒尚未開放。內容涉及1930年代及1940年代中國政治與經濟、戰時

中美外交等。編號六至十八及三六至三九各尚未開放文件，預定1995年4月1日解密。

- 10.金問泗(1892~1968)，字純儒，浙江平湖人，曾任江蘇省交涉員、駐荷蘭(1933~1944)、挪威(1945~1950)及比利時(1950~1952)公使、大使。檔案二盒，涉及國聯，中國與荷、挪、比、捷克的外交關係。
- 11.顏惠慶(1877~1950)，字駿人，上海市人。曾任北京政府外交總長(1921~1922)、農商、內務總長(1924)、駐美公使(1931)、駐蘇大使(1932~1936)、紅十字會長等職。文件一宗，係其英文自傳稿，已由姚崧齡譯為中文出版(1971)。
- 12.其他小宗的個人文件，例如趙恆惕致譚延闓的一封信，副本、1921年；陳獨秀為1932年被捕事，向江蘇高等法院提交的申辯書英譯本；宋慶齡1950年有關中美關係的一張留聲片，蔡孟堅1920至30年間反共活動回憶，甚至於「河殤」的錄影帶均被保存。

(二)涉及中國事務的歐美人專檔：

- 1.布斯(Charles B. Boothe, 1851-1913)，美國商人。三盒資料，涉及1908至1911年與孫中山、容闓、荷馬李等反清革命計畫的文件。其中孫中山與布斯往來的英文信函至少有十六件。
- 2.卜凱(John Lossing Buck, 1890-1962)，美國農經專家。資料一宗，內含1944年任職中國財政部顧問時之通信，以及1929至1958年中國農業生產的統計資料。
- 3.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 1880-1958)，美空軍將領，抗戰時在華組織美志願航空隊，即飛虎隊，1942年改編為美第十四航空隊，直至戰爭結束。資料係由夫人陳香梅女士捐贈，共十四盒，多為抗戰時期飛虎隊及中美關係資料，含備忘錄、命令、通信、報告、地圖、演講詞等。與飛虎隊相關的美軍個人專檔，館內還有Merian C. Cooper(飛虎隊參謀長、資料一盒)、Paul Frillmann(飛虎隊牧師、資料三盒)。
- 4.居里(Lauchlin Bernard Currie, 1902-)，美國經濟學家、羅斯福總統的行政助理(1939~1945)，抗戰時期曾以特使身份來華訪問。資料五盒加一函套，涉及各種通信、備忘錄、報告、會談紀要、訪華文件等有關中美戰時外交關係史料。

5. 包瑞德 (David D. Barrett, 1892-1977), 抗戰時期 (1944) 美軍駐延安觀察組上校組長。檔案一大盒一小盒、四函套、兩件留聲片。內容有在延安時文稿、通信、照片、筆記等。
6. 璧約翰 (J. F. Brennan, 1883-1953), 英國署理廣州總領事 (1926-1929), 文件一宗, 係有關與陳友仁談判中國抵制英貨及廣九路問題之報告。
7. 休斯頓 (Jay Calvin Huston), 美國在華領事。資料共十四盒加兩個函套。主要內容為至 1917 至 1932 年間, 有關駐在地, 特別是廣州的文化、政治、社會、經濟情形及早期中蘇關係的報告, 此中當然涉及孫中山在廣州的革命政府。
8. 凌格蘭 (Ethel John Lindgren), 英國人類學家, 資料五盒, 並有一卷電影紀錄片, 內容涉及 1929 至 1932 年在中國東北調查紀錄, 此一專檔需得她本人同意或她死後五年方得開放。
9. 林百克 (Paul Myron Wentworth Linebarger, 1871-1939), 美國律師、作家, 曾任孫中山法律顧問 (1907~1925)、國民政府法律顧問 (1930~1937)。資料共二十三盒、一個剪貼簿、五個函套。內容有日記、通信、著作、筆記及照片, 多與孫中山及中國政情有關。
10. 林白樂 (Paul Myron Anthony Linebarger, 1913-1966), 美國作家、政治學家。資料共三十一盒、七捲微捲、一冊剪貼簿, 另加二個函套。內容與中國政治有關的通信、撰著、演說和日記等。
11. 高爾德 (Randall Chase Gould, 1898-1979), 美駐遠東記者, 曾任英文北京日報副編、合眾社通訊員 (1923)、上海大美晚報總編輯 (1931~1941、1945~1949)。檔案十盒、二函, 另六大盒, 內容有在中國的信札、論述、剪報、照片, 抗戰文件尤多。
12. 梅樂斯 (Milton Edward Miles, 1900-1961), 美國海軍少校, 抗戰時期曾擔任中美合作所副所長。資料九盒另四卷宗, 含信札、報告、談話紀錄、命令、筆記本、照片, 涉及戰時中日及中美關係。
13. 巴斯圖厚 (Vladimir D. Pastuhov), 國聯中國東北調查團秘書。資料五十九盒, 另三大盒、二捲、及一個卷宗。多數涉及 1931 至 1934 年東北調查有關通信、報告、訪問、地圖、照片及印刷品。
14. 佩克 (Willys Ruggles Peck, 1882-1952), 美外交官, 在華領事 (1906~1926、1931~1940), 檔案有三盒、一大箱、一卷宗, 有日記、信札、備忘錄、傳記、剪報, 涉及中國內政與外交。

15. 佩特金 (Wilbur J. Peterkin) ，美國陸軍上校，1944~1945 年美國延安中共視察團執行官。檔案有二盒、二卷宗、一個剪貼箱、四卷電影片、一個微捲，含涉及戰時中共及中國淪陷區的報告、地圖、電影等。
16. 包爾斯 (Joshua B. Powers, 1876-1969) ，美國收藏者，資料六盒、一箱、六卷宗，內含與荷馬李夫婦往來信函，涉及孫中山的革命運動的電報、文章、小冊、剪報等。此宗與布斯文件中涉及孫中山之部分文件，胡佛研究所曾影印贈送國史館典藏。
17. 饒大衛 (David Nelson Rowe, 1905-) ，美國政治學者，美駐華大使特別助理(1941~1942) ，檔案一四一盒、另一大箱，內容涉及戰時中國及亞洲問題，戰後中共進入聯合國及亞洲共產主義問題，有信札、演說詞、筆記、照片、微捲、地圖、小冊等。此檔必需在饒氏死後十年才開放。
18. 史普羅滋 (Philip D. Sprouse, 1906-1977) ，美國外交人員，曾為馬歇爾、魏德邁特使團成員 (1945~1947) 。資料二盒、十八卷宗，多為中美關係及馬歇爾特使訪華時期之出版品、剪報、日程表、照片等。
19. 史迪威 (Joseph Warren Stilwell, 1883-1946) ，抗戰時期在華美華將領，曾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入緬遠征軍指揮官。資料有五十七盒、八大箱、一卷宗、八十二函套、十本剪貼簿、二個微捲，八卷地圖及圖表等。編號一至十七盒為中印緬戰區文件 (1942~1945) ，十八至二十二號為日記(1900~1946) ，二三至三十二號為個人文件，三十二至三十四號為個人及家庭文件，三十五號為個人著述，三十五至四十號為剪報及出版品，四十至四十一號為地圖，四十二至五十五號為早期服務軍旅資料 (1917~1919) ，五十六至六十一號為雜件。史氏過世後，1948 年雖曾就其日記函札輯印為 *The Stilwell's Papers* ，但此一專檔仍有相關於戰時中美關係之寶貴資料。
20. 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 ，曾任燕京大學校長，美駐華大使 (1946~1952) 。資料一盒，有日記、信函、備忘錄，涉及 1946~1953 年間之中美關係，日記內容為 1946 年 7~12 月，1949 年 1 至 12 月部分。
21. 陶德 (Oliver Julian Todd) ，美國土木工程師，曾任中國國際災荒救

濟署首席工程師、聯合國戰後救濟總署治黃計畫顧問等，有 1919 至 1949 年間的日記、通信、備忘錄、報告、照片等，共三十一盒另一卷宗。

22. 史諾夫人 (Nym Wales, 1907-)，美國新聞記者、作家，抗戰時期在中國參與工合運動。資料四十盒、二大箱、三十三卷宗、十一個大函套。有個人及收集的信札、演說、著作、訪問、報告、備忘錄、照片、筆記等，涉及中共問題、工業合作運動、學生運動、工人運動、西安事變、中日戰爭及中國左翼的文學與藝術等。此等資料之參閱必須獲得史諾夫人 (Helen Foster Snow 即 Nym Wales) 本人的同意。
23. 魏德邁 (Albert Coady Wedemeyer, 1896-1988)，美軍將領，抗戰後期在華接替史迪威職務。1917 至 1987 年資料，計一〇九盒、十九箱、二卷電影片。涉及中國戰場、中美戰時外交、戰後美國對外關係之命令、計畫、備忘錄、報告、通信、演說詞、剪報、小冊、照片等。目前此一專檔尚未開放。
24. 楊格 (Arthur Nichols Young, 1890-)，美國經濟學家、國民政府財政顧問 (1929~1946)。資料共一一九盒、一卷宗、一大箱。內容有日記、通信、報告、研究、統計表、剪報、出版品、小冊等，對 1920 至 40 年代之中國財政研究有幫助。
25. 其他專檔，比較大宗值得重視的有兩類：
  - (1) 教會及傳教士在華的活動資料：例如上海中華基督教續行委辦會、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幹事包引登 (C. L. Boynton)、南京教區布蘭迪 (R. F. Bradg)、推動青年會 (YMCA) 的布格士 (John S. Burgess)、毛蘭 (Hugh Anderson Moran)、推動女青年會 (YWCA) 工作的馬曜 (Martha Job) 都有值得重視的私人檔案。另外在北京教會醫院服務的殷格利 (John Inglis)，在福州華南書院的諾頓 (Lucerne H. Knowtton)，天主教比利時籍神父雷比 (Vincent Lebbe)、西灣子天主堂的神父雷格蘭 (Francois Legrand)、基督教華北教會佈道家馬修士 (Harold Shephard Matthews)、杭州地區傳教士馬托斯 (Elmer L. Mattox)、協和醫院的蒲愛德 (Ida Pruitt)、福州協和大學的史克德 (Roderick Scott)、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曾任蔣委員長顧問，參加過三十年代江西農業復興計劃的牧波恩 (George W. Shepherd)、清末民初在華從事傳教及教育活動的魏士達 (James Benjamin Web-

ster) 等，他們的個人專檔可能涉及的範圍，包括教會勢力的擴張、地方社會政治情況報告，教會推動的教育事業、醫藥衛生工作、慈善事業、鄉村建設運動等情形。

- (2) 中國戰後之善後救濟總署相關檔案。二次大戰末期聯合國成立善後救濟總署，中國行政院也成立相同機構，這方面的檔案，在胡佛研究所所有收藏，例如「中國善後救濟總署」檔 (Chinese National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1945~1947 年有四盒文件；有關華北（晉、綏、察）的救總工作可參考 Emmanuel Hanquet 專檔；聯合國救濟總署在中國的實際工作，可參考 John G. McMee-king 的報告以及 J. Franklin Ray 的文件。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機構本身及中國部門的文件，(1943~1948)，共四十三盒，有報告、年報、信札、行政命令、期刊出版品等，不失為研究此一主題的重要資料。

#### 四、目標：讓史料活起來

七十多年前，胡佛建立這個研究所的初衷是：收集資料，透過學術的研究，深入發掘「戰爭」與「革命」的原因，以便進一步促進「和平」的發展。胡佛總統顯然是有遠見的，當年以五萬美元建立的研究所，如今一年的預算逼近千萬美元，1960 年只有五位研究人員，如今已成長到一百二十位以上，圖書也從一百萬本增加到一百六十萬冊，檔案則接近四千萬件，從小店舖變成大行號，儼然已成為世界學術研究的重鎮。所以能有今天的成績，除了雄厚的財力外，以典藏、研究與出版並重，以學術與現實結合的政策，無疑的是正確的。1962 年成立的出版部，目前已出書四百多種，每年平均出版二十五部新書，「提供世界學者的閱覽與美國政府釐訂政策的參考」。研究所還有一個由十二位學者參與的「國家安全事務計畫」，許多人曾在國家安全會議、限武談判小組或國務院做過事，結合理論知識與實務經驗，提出新方案與新設想，供決策者抉擇，而不是去捉摸政府領導部門的意圖，投其所好，更非為主政者已決定的政策作論證。這也證明學術與政治之間，有不互相干擾的另一面。

胡佛研究所的民國史資料，並不是美國境內的唯一典藏，事實上如以教會在中國的活動而言，耶魯大學就還有二十五位傳教士的專門檔案；而以中

美關係史而論，首府華盛頓的國家檔案館的資料，大概只能以「汗牛充棟」來形容。不過，胡佛研究所的檔案館和東亞圖書館，以檔案與圖書蒐藏並重，在中國研究上近於民國史專業的圖書研究機構，恐怕在美國境內是相當具有特色的處所。檔案資料的蒐藏，過程既辛苦也重要。資料入庫後，它的確是可以長久客觀的存在著，但如何使這批死材料活起來起作用，便得從培養人才、方便研究下手。在這一方面，當年的胡佛先生的確有先見之明，而今天胡佛研究所能成為有名的學術重鎮，也絕不是偶然的。

(本文參考「胡佛研究所簡介」、「胡佛研究所年報」、胡佛檔案館藏檔目錄等有關資料。)

---

## 嚴復英文作品〈中國古代政治結社小史〉

孫 中 興\*

### 重印小記

嚴復的這篇英文文章是筆者於 1985-7 年間在美國蒐集論文資料時意外發現的。由於筆者最近在寫一篇「嚴復與斯賓賽」的文章，又從舊資料中找出這篇文章的影本。筆者查對了大陸最近出版的五冊《嚴復集》，發覺並未收錄此篇；而且國內外有關嚴復的學術或通俗論著，如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z)、周振甫、王枋、郭正昭、林保淳等人，都沒提到嚴復此篇英文著作，所以商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重印出版，以饗同好。

英文的《中國社會與政治科學評論》(*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是由 1915 年在北京創立的「中國社會與政治科學社」(*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所發行的。1915 年 12 月由當時北洋政府外交部長陸徵祥擔任第一任理事長，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 (Paul S. Reinsch) 和曹汝霖分別擔任第一、二任的副理事長。這個學社的

---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主要目的在於研究國際法和外交。

這篇文章刊登在《中國社會與政治科學評論》第1卷第4期，1916年12月出版，第18至23頁。當時編者用了近乎半頁的篇幅介紹嚴復。由於沒有註明是翻譯的，我們應該可以大膽斷定這是嚴復親筆所寫，或是演講記錄。這恐怕是嚴復唯一公開發表過的英文文章。由於現有的嚴復研究文獻中都沒提到此事，也許本文的重印，可以引起國內外研究嚴復的學者一些新的興趣。

•                      •                      •                      •

##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ANCIENT POLITICAL SOCIETIES IN CHINA

Yen Fuh\*\*

I often heard it said in Europe and America that there is no Polities nor Political Societies in China. This is not true. If you tell me that there are no societies in China such as one chartered by Charles II of England in the middle of 17th century—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Natural Knowledge—I shall admit it most readily.

---

\*\*Mr. Yen Fuh is an accomplished scholar respected for his knowledge in English and still more for his high attainment in Chinese scholarship. He began his foreign education in the Naval College in Fukien and was then sent to England to finish his selected study at Greenwich. After his return he was successively appointed the Dean, the Deputy-Director and Director of the Peiyang Naval College. After the year 1900 he became connected with the Board of Education at Peking in the matter of translation, and then successively acted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Anhui Provincial College, of the Fuh Tan College at Woosung and of the Peking University. But his greatest and lasting service to the country lies in the translation of some English standard works into Chinese notably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 Adam Smith's *Wealth of Nations*, Herbert Spencer's *A Study of Sociology*, John Stuart Mill's *A System of Logic*, 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 and Montesquieu's *L'Esprit des Lois*. Mr. Yen Fuh's translation works, on account of their literary excellence, have extensively reached the *litterati* of the population and powerfully influenced their thought thereby effectively paving the way for the reception of the western learning—*Managing Editor*.



Nature was never scientifically studied in this country; on the contrary, they rather despised it and considered it unworthy for the learning of a great man who had nobler aspirations in perfecting himself and improving mankind. To my humble opinion this is one of the very causes of China's present weakness. As for Politics, it is decidedly not so. What the ancient Chinese called learning is nothing beyond Politics, Ethics, Moral Philosophy, Metaphysics, Literature and some Fine Arts. To be a scholar, he was destined to govern, if he could attain a place under the sun; or to teach if he would remain in obscurity. In fine, he imitated Confucius. So in China, you may roughly call every school in any period a political society. If you doubt this, I may refer you to the most studied classic, *The Ta Shueh*, (大學) in which it is taught how a scholar is to prepare himself for the great post of ruling over a principality or an empire. He is to cultivate his intellect to the utmost. He is to be truthful to himself. He is to be exemplary to his family and to put his house in order. His business, in a word, as it was stated by a great Confucian scholar in the Sung dynasty (about the 12th century A.D.) Chang Tsai (張載) is "to represent the Soul of the whole Creation, to set up a standard for human lives, and to establish a moving equilibrium for the coming eternity." (爲造化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

All this, of course, sounds very archaic now; but as a Chinese scholar I pronounce it with profound reverence. One thing I may assure you all is this—these great teachers of the old are no Materialists. They looked upon the world with generous sympathy, accomplishing themselves with much excellence, and entertaining many good hopes. There was an honourable display of those qualities which make life better worth having, and they were sincerely earnest in making the world better worth living in for those who were to come after them.

Thus to begin with, the great Confucian school, that sage Master with his seventy-two intimate disciples, and three thousand followers, as it was recorded, formed a grand political society; all with the one

pervasive doctrine of reforming men, dreading the wrath of Heaven, and hoping to ameliorate mankind from illimitable miseries. He made a regular tour through the central districts of ancient China which was the most civilized part at that time, visited different courts hoping that some prince would give him a trial, so as to carry out the great mission which was believed to be appointed by Heaven. He, however, was disappointed, as we all know. Then he returned to Shantung, his native place, and became the author of the Classics. That one man's dictum, put as laws of conduct, has been obeyed by hundreds of millions through two dozen centuries and more is a thing almost inconceivable and never repeated in history. Confucius is unique in that.

Next, in the time of Chinese Heptarchy (about four Centuries B.C.) came the two great Political schools—The School of Mencius (孟子) and that of Sun Ching. (荀卿) They each had important ethical and political doctrine. Mencius believed that human nature was good, like the modern Jean Jacques Rousseau. Sun Ching declared that man was born bad, he would never be good unless obliged, like your Hobbes or Nicols Machiavelli. It was Mencius who proclaimed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and that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was the voice of Heaven. "To do one deed unrighteous, to kill one soul innocent, though you may compensate him with an empire, the superior man will not do." With so high and glorious a doctrine in a time when princes struggled for supremacy and when might and material interest demanded their first consideration, it is no wonder that he was doomed to failure and that no contemporary prince would lend him an ear. The Heptarchy, however, is the most prolific time in original political thinkers in Chinese History. Besides the two I have mentioned—Mencius and Sun Ching—there were Yang Choo (楊朱) and Mé Cheh (墨翟), —the former standing for Egoism or Individualism, and the latter for Altruism or Socialism. Mencius attacked both of them fiercely, but when we look at them with the cool eyes of history, they have their proper places in the evolution of ethic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He who is conversant with that marvellous book *Tsan-Ko-Chek* (戰國策) or "The History of Warring Nations" has no need to study "The Prince" of Machiavelli in order to learn anything new in statecraft. Then there were many illustrious names which I may note in passing: they are Siang Yang (商鞅), Sen Pu Hie (申不害), Han Fei (韓非) for legislation, Soo Chin (蘇秦), Chang Yi (張儀) for diplomacy; Woo Chee (吳起), Wang Chien (王翦), Lian Po (廉頗), Li Moo (李牧) and others for the Art of War. Every one of them was a genius, and was brought up in certain schools of Political science, such as that of Kwei Ku Ze. (鬼谷子) It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thing in history that Mencius with his followers should fail, while Li Sze (李斯) the great disciple of Sun Ching should become the premier of Chin Sze Huang (秦始皇) to help that awful despot in conquering the different nations and reducing all China to an integral monarchy. Owing to an incompetent successor, the life of that powerful dynasty was indeed but short;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s method of ruling over an empire has endured even to the present time.

Then came Han, the most powerful dynasty; we have then the orthodox school of Tung Chung Soo (董仲舒), whose political maxim was: "Do what is right despite interest, demonstrate your doctrine and let success take care of itself." This is of course glaringly Utopian and deservedly had no influence in practical politics.

When Han removed its capital from Si An to Lo Yang in the middle of 2nd century A.D., there was the *Chieh-I-Tang* (節義黨) which may be called the group of "Academicians," who fought fiercely with the raging Eunuchs who were then molesting and corrupting the whole empire. The history of that time was full of heroic deeds and martyrdoms, but they ended with the fall of Han.

After Han, China was again divided, first into three, then essentially into the N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Governments, till about the era of Mohamet, that is, the middle of 7th century A.D. There was then a great but quiet political party or school in Tai Yuen Fu (太原)

dominated by the great teacher Wang Tung (王通). Upon the accession of the illustrious dynasty of Tang (唐), the whole administration was organised of the members of that celebrated school.

But there is an inevitable political cycle that good government produces virtue; virtue, peace; peace, idleness; idleness, disorder; and disorder, ruin. So next to Tang there was an interval of anarchy and dissolution, then came the dynasty of Sung. When its capital was still in the North, that is, Honan, there was the great reforming party headed by Wang An Shih (王安石). They endeavoured to solve several burning political problems of that time, but they were opposed by influential conservatives, such as Sze Ma Kuang (司馬光) and others of great character and impeachable renown. If you want to see how party politics played in Chinese History this is the time that will claim your attention. Each party had their ideals and they fought bravely for them. Unfortunately Sung was overpowered by the barbarians outside of the Great Wall and its government dwindled away in the corner of Che Kiang, and since then the Chinese rulers looked upon political parties rather as an evil to the welfare of the country, and their princely duty has been rather to exterminate than to encourage them.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however, there was one party known as *Tung Ling-Tang* (東林黨) who, like those "Academicians" of latter Han, fought also with the all-powerful eunuchs. During the two and half centuries of the Manchu rule no political school or party worthy of that name existed. The Emperors from Khang Hsi to Tao Kuang were so absolute and the bureaucratic rule was so rigid, that it was not appropriate soil upon which such a plant could grow.

In conclusion, however, permit me to make one observation. In China, until very late, the form of Government which had worked satisfactorily while remaining outside the general stream of world politics, proved incapable of readjustment to novel conditions, and became an anachronism more and more discredited as time went on. The great

drawback of old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is that it never dared to pronounce bravely that the art of government—like the art of medicine or that of navigation, whose main point is to save the life of a patient, to guide a vessel safely through a storm—and morals are two separate things. Undoubtedly, the welfare of a nation greatly depends on the moral character of its members generally; but when living at a time when the old political order is collapsing and new problems both in State and in Society are rising with dazzling rapidity, when we endeavour to interpret the logical meaning of events, to forecast the inevitable issues, and to formulate the rules which are now taking shape among the fresh forming conditions of national life, you cannot come to a sound conclusion with Politics intermixed inextricably with Ethics or Moral Philosophy.

---

## 國史館「財政部檔案」概述

何 思 韙\*

### 一、財政部沿革

財政部為掌管國家會計、庫幣、賦稅、公債、銀行、官產事務與公共社會財產之機構。君主專制時代，國家財政，取之於民，用之於君，無以國家財力謀全民福利之觀念；民國成立以後，改專制為共和，國家財政乃改以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然國家初肇，即因袁世凱稱帝，軍閥割據，日俄侵略，致內憂外患頻仍，國家財政始終未能步入正軌，甚至瀕臨破產窘境，財政部及其所屬機關亦幾經變革。

民國 38 年政府遷臺前，財政部機關變遷，可概分二階段：北洋政府和

---

\* 國史館助修

國民政府時期。北洋政府時期之財政部隸屬於國務院，民國元年成立，下設賦稅、公債、錢法、庫務、會計等五司。國民政府時期之財政部，於民國14年設立隸屬國民政府，17年10月，改隸行政院，至38年止，其組織沿革如下：

民國14年，在本部下設有秘書和國庫主任。16年，在本部下設二廳（參事、總務），五司（賦稅、錢幣、公債、會計、國庫），八處（秘書、關稅、鹽務、煙酒稅、印花稅、禁煙、煤油特稅、土地），是年11月總務併於秘書處，關稅處更名爲關務署，土地處併於賦稅司之中。17年5月復設總務處並於當年12月改爲司，同時裁禁煙處和煤油特稅處，改設捲煙煤油稅處，並將關稅、鹽務二處改爲署，形成一廳（參事）、二署（關稅、鹽務）、六司（賦稅、錢幣、公債、會計、國庫、總務）、四處（秘書、煙酒稅、印花稅、捲煙煤油稅處）等機構。此後至24年，除捲煙煤油稅處於18年改爲捲煙統稅處外，餘皆未變動。25年7月，組織機構再度調整，鹽務署改爲鹽政司，會計司改爲會計處，裁撤煙酒稅、印花稅、捲煙統稅三處，增設稅務署，形成一廳、二署、六司、二處之組織結構。29年，組織再易，除將國庫司改爲國庫署外，另設直接稅處；30年11月增設統計處，31年6月復增設緝私署，32年3月再增設專賣事業司，並將直接稅處改爲直接稅署，賦稅司改爲地方財政司，並設人事處，<sup>①</sup>34年裁撤緝私署、專賣事業管理局，<sup>②</sup>將鹽政司和鹽務總局合併爲鹽政局，至此形成一局、一廳、四處、四署、四司之組織。此後至38年，除37年時將直接稅和稅務署合併爲國稅署，38年4月增設田糧署外，餘皆仍舊。

除直屬機構外，歷年來尚先後設有田賦管理委員會、貿易委員會、貨運管理司、金融研究委員會、鹽務總局、外匯管理委員會、財政部研究委員會、花紗布管制局、貨運局、公債籌募委員會、核銷債務司、發行準備委員會、整理公債委員會等附屬機構，並時有增減，不詳述。

## 二、檔案之接收與整理

爲保存史料，纂修國史，本館自立館以來，即積極徵校政府各機構檔案。民國62年在本館前館長黃季陸先生以六十二臺史秘字第〇五八號箋函

<sup>①</sup> 32年3月21日由人事司易名。

<sup>②</sup> 專賣事業司於34年1月擴大爲專賣事業管理局，然隨之裁撤。

及行政院秘書處臺六十二檔字第一八八一號函各部會處局署，以「各機關大陸運臺舊檔案及在臺已失時效案卷、文牘，移送國史館珍藏」情況下，自是年8月起，先後有交通部、內政部等各部會檔案移交本館典藏。目前本館所藏財政部檔案，亦於是時接收典藏。

財政部全部檔案計有一百一十九萬三千五百九十四件，時間起自民國元年及57年止。由於檔案幾經播遷，且運臺後，多年未清理，部分檔案已結成硬塊，或遭蟲蝕，污垢甚多，不易清理。經本館整檔人員仔細整編後，乃依原編之檔號及案名，略加修正，製成目錄二十五冊，以便調閱，並做進一步整理。

### 三、檔案典藏概況

本館典藏財政部檔案，以財政部所屬單位劃分，計有國稅署、人事處、國庫署、錢幣司、鹽政局、地方財政司、總務司、財政研究委員會、參事廳、秘書處、統計處等單位之檔案。現依序將其內容概述如下：

#### (一)國稅署：

國稅署檔案，時間起自民國25年至37年止，佔全部檔案約五分之二數量的數量，其內容可分成下列幾類：

1.稅政類：有煙、捲煙、糖、礦產、新統、棉紗等各項物品之法規、處分、決定卷宗和總案（違章、報表、徵稅報告、免徵、徵稅、建議、分運）

③等項。

2.財務類：有稅證（核銷、印製、改用、接收、發行、核示、法令、繳聯、冊表、領用、表報等）、稅照（稽核、偽照、法令）、補助（生活、救濟、借貸、合作金、獎金）、代解（捐募、壽險、劃撥、儲券、法令）、統計（表報、月報、調查、查徵、納墊、旬報、交代、法令）、會計（記帳、清查、報告、交代、印鑑、決算、交接）、損失（盜匪搶劫、兵燹）、獎金（超收、考績、長收、法令）、歲計（決算、署經費、各廠經費、各局、分局經費、駐徵經費）、支出（運費、房屋、督旅、修建、公費、購置、遣散、應變、房租、租賃、遷移、印刷、郵電、匯費等）、收入（比額、罰變、公庫、國庫、代庫、罰長、稅收、代徵、罰款、法令等）、稅徵（發行、法令、印照、核銷）以及報告、稅收、考核、審計、稽徵等項。

③ 括弧內所列乃該項內之主要細目，概列條款，僅供參考。

3.貨物稅類：計有登記（煙酒、糖類表報、火酒等）、改分運（本銷、分運）、報告（稅收、督察、調查等）、補徵（出境、法令、存貨）、稅率（煙酒）、認額（土酒、煙）、查驗（停開工、表報、處分、決定書、檢查等）、稽徵（法令、煙酒、糖、記帳、礦產）、駐徵（煙酒）、訴訟、征實（糖、法令、表報、計畫等）、稅證（票照）、評價（糖、表報、稅額、法令）、免徵（煙酒、法令、軍用、外銷、火酒）、代徵、專賣（法令）、原料（禁釀、火酒）、退稅（補徵、損壞）等項。

4.糖稅類：計有指訴、法令、供應、登記、折價、預算、訴願、違章、分運、表報、徵實、折徵、處分、拍賣、代運、損失、表款、憑證、控訴、分配、評價、補徵、議價、建議、稅收、稅政、免徵、改運、損失、記帳、差額、檢查、保證、批價、獎懲、專賣利益、印照、條例、折耗等項。

5.事務類：計有緝私（緝獲案件、煙酒查緝等）、法規命令和稅徵等項。

6.煙酒稅類：計有法令（組織章程）和處分書等項。

7.火柴稅類：法令（組織章程）。

8.礦產稅類。

9.物資類：處分（變價、銷燬）。

10.地域類：計有駐徵（廠棧）和分區（礦區）等項。

11.人事類：計有訴訟（訴願、糾紛、控訴）、印信和印模等項。

12.總務類：計有人事（考勤、法規調查、法規、控訴、保荐、考績、清查、檢舉、糾紛、交接、進修、異動、甄敘、任免、甄取、考試、訓練、通緝、述職、貪污等）、報告（檢討、兵變、稅收、督察、政績、法規、盜匪、兵燹、巡視、災荒、報表等）、法制（稅額、稅法、軍政、參政、計畫、建議、法規等）、事務項（電信、印信、會議、保證、動員、文書、捐募、函索、進修、出納等）、組織（本署、中央、各局）、緝私（稅警、查緝、法令）、物資（保證、保管、調查、銷燬、管制）、庶務、福利（救濟、儲蓄、撫恤、教育、壽險）、食米、編輯（年鑑、抗戰損失、報表）、地域（疏散、遷移）、交通、稅制、地址、稅額和蒐集情報等項。

## (二)人事處：

本處檔案佔全部檔案約近四分之一的數量，時間起自民國 29 年至 38 年止。可略分為人事、總類、文書處理、事務等四類。

1.人事類：財政部所屬各機關人員之錄用（呈請錄用、選用）、敘薪、



任免（含國民政府主席、各省主席、委員、財政廳長、貨物稅局、直接稅署等單位主管任免案）、銓審、考核（31至36年財政部所屬機關人事人員考核、平時成績、直接稅署考勤月報表等）、考試（財務人員特考、高考及格分發）、訓練（財務訓練所、中央訓練團財務人員訓練、查緝人員幹部訓練、貨運幹部訓練、糖煙業務人員訓練、黨政軍人事管理人員訓練等）、裁減遣散（花紗布管制局、貿易委員會、貨物稅局、清理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處、上海區處裁撤等）、差假、撫恤、退休、派調、獎懲等；以及各種表報（任免月報表、財政部所屬各單位職員登記表、調查表、職員名冊、人事動態月報表、工作月報表等）、貪污舞弊控訴案（鹽務總局、稅務局、貨物稅局、直接稅署、專賣事業人員控案等）、通緝案（漢奸、因案在逃人員通緝等）、從軍案（知識青年從軍、志願軍人事動態）、救濟、交接等。

2.文書處理類：包括公文稽核、印信、電務電報拍發、密碼、郵務、核發證明書等。

3.事務類：計有房屋租賃、傢俱、文具用品、辦公器材採購等。

4.總類：包括各稅務機關人員工作報告、各貨物稅人員、人事室工作計畫、財政部對國民參政會財政報告、部務會議、業務檢討會議、兵役會議、以及各單位之組織章程、法規條例等。

### （三）國庫署：

本署檔案時間起自17年至38年為止，其內容可概分為下列幾類：

1.庫政類：計有國庫（各省）和省庫等。

2.國庫收支類：計有現金收支、罰款賠款收入、規費收入、經臨費（中央會議、國民參政會、戰時生產局、振救委員會、歲出歲入等）、預備金（各部會、行政院及所屬機構、各省司法機構等）、預算通知書（水利部）、預算（歲出歲入、分配、各部會、教育部暨國立大中小學、經濟部等預算經費）、省庫收支結束、分庫收支、華僑捐款、救濟僑胞、鐵路工程、顧問經費等項。

3.糧類：計有軍糧（軍糧計核委員會、各省軍糧籌購委員會）、囚糧、稅警糧、僑糧、民工食糧（國防工事）、公民糧（各省）、專案糧（各省）、馬糧、食糧（各省食糧表報、各省田管處報表、田糧處表報）、糧食限價、田賦徵實、糧食運銷等項。

4.財產類：計有公地（國有土地調查）、官產、沙地等項。

5.軍事類：計有訂購軍械經費、外籍顧問薪津和勞軍服務等項。

6.債款類：計有內債（央行庫收報告聯、債務印刷及事務費、國防公債）、外債（美貨付款清單、購物購料船運文件、英金公債款）、賠款（美寯案、英商損害索賠）等項。

7.人事類：計有補助費、生補費、表報、代金、任免、福利等項。

8.總類：計有庶務、訴訟（民事判決、訴願、再訴願）、報告（考察、工作、財務通訊、政績等）、剪報（金融財政）、法規（施行辦法、施行細則）、會議（黃河泛濫區善後計畫、考績）、捐款、文書、抗戰損失調查和表報（工作檢討表、裁併駢枝機構參考資料）和施政計畫等項。

#### (四)錢幣司

錢幣司資料時間起自民國 14 年至 37 年止，可概分為幣政、法幣、公債和總類等四項，分述如下：

1.幣政類：計有通貨膨脹、工商業貸款（上海地區）、借款合同、外匯（匯率、匯款、僑匯）、銀行（中央、中國、中國農民、各省、淪陷區敵偽等）、白銀問題（銀進出口、銀禁）、黃金外幣、中儲券（收換）、錢莊（各省）、儲蓄會（萬國、中法）、中央信託局、幣政委員會、四聯總處、廢兩改元等項。

2.法幣類：計有法幣之實施問題、兌換、發行準備、發行、買賣、私運（取締私發、濫發紙幣）等項。

3.公債類：計有內債（四川省善後公債）、外債（英金公債）和賠款擔保（法規）等。

4.總類：計有經濟委員會、會議（紀錄）、報告書、法規和計畫等項。

如改以區域分類，基本上此一部分檔案可分為國民政府和戰後接收敵偽產業、銀行等兩類資料。

#### (五)鹽政局：

鹽政局檔案，時間起自民國 4 年至 57 年止，如以省區及區域性分類，可分廣西、廣東、湖南、河南、雲南、山西、江西、湖北、山東、四川、安徽、福建、浙江、陝西、臺灣、淮南、長蘆、川康、西北等地區之鹽政，內容有接收敵偽財產、鹽斤、存鹽、鹽價月報表、統計繪圖、鹽價彙編、鹽價細目表、登記簿、稅率表、鹽業貸款等項。其中臺灣地區檔案，以遷臺後之鹽務法規為主。

另外，部分檔案尚可概分為以下幾類：

1.會計類：計有歲出歲入分配預算、營業概算、決算等項。

2.人事類：計有求職、撤退、人員扣押（被中共所扣）和人事調動等項。

3.工程類：計有各省區及區域性之房屋修理、道路橋樑修建和建築鹽倉、航道整理等項。

4.總類：計有局務會議記錄、重要工作報告、業務報告、業務檢討會議紀錄等。

#### (六)地方財政司：

地方財政司檔案，時間起自民國 19 年至 37 年止，皆為全國各省有關財政稅務方面之資料，可略分為稅政和總務兩類。

1.稅政類：計有土地稅（各省徵收、減免、月報表、旬報表、經費預算）、地價稅、請願（免耕、免徵稅、取消營業牌照稅、屠宰稅等）、表報（職員名冊）、整理（各視察工作報告、各省自治財政報告、造產、違法案）、法規（法令解釋及法令）、報告（各省工作計畫、政績比較）、歲計（歲出、歲入、總預算、撥借）、營業稅、契稅、田賦（各省徵收、二五減租）、稅捐（雜捐、娛樂稅、建設捐、養路費）、款產、建議（省政改善、稅捐改革）、訴願（各省及財政部各類稅捐、公產租佃、土地承租）、公債（救債認購、金融公債、二十三年六厘英金庚公債基金）、財政年鑑三編等項。

2.總務類：計有經費、捐募、文書、人事、庶務和電信等項。

#### (七)總務司：

本司檔案時間起自民國30年至38年止。可概分為下列幾類：

1.出納類：計有經費、補助費、旅費、工程費、捐款、人事保險、罰提、租賃、購置費、設備費和招標等項。

2.庶務類：計有還都復員、購置（器材、日用品）、財產（各電臺財產目錄增減表）、整修、請領配購、註銷、接收（敵偽財產清冊）、結束（各電臺、農本局、物資局、花紗布管制局）、福利和合作社等。

3.電信類：有電報、電話和電臺等項。

4.人事類：計有任免、員額、勳章、考試、調用、撫恤、敘薪、獎懲、印信、關防和考核等項。

此外尚有法規、報告、會議紀錄、工作計畫、防奸和救濟等零散資料。

#### (八)財政研究所：

本所檔案多為民國 27 年至 37 年財政部所屬研究員對國民政府財政和汪偽、日軍佔領區財政經濟研究相關資料。主要內容計有：敵偽財政經濟動

態資料、降敵附逆、通緝和撤職、會議紀錄、稅制研究、抗戰損失調查研究、田賦徵實、田糧徵購研究以及相關之人事、法規、表報等資料。

(九)參事廳：

參事廳檔案主以抗戰期間財政部各單位相關之法規章程組織條例。計有直接稅、稅務、地稅、關稅、專賣、錢幣、鹽政、國庫、賦稅、軍政、緝私、經濟、公債、總務、人事、貿易等各項之法規。

(十)秘書處：

秘書處檔案，時間起自民國元年至 37 年止，但以抗戰時期之資料最多。主要是報告和會議等方面之資料。如：財政部對歷屆參政會有關財政詢問、工作計畫、報告，對歷屆中全會、國民大會有關財政報告，稅收損失估計、財政部部務會議、財政部對國民會議決議案、第二屆全國財政會議決議案、調整各戰區經濟委員會工作案、政治會議和行政會議等。

(十一)統計處

統計處檔案時間起自民國 17 年至 37 年止，計有稅收旬報、法規、事務、會計和各項財務統計表、統計年報、登記冊、統計資料等。

#### 四、結 語

綜觀本館所藏財政部檔案，以稅政、人事業務和各項法規條文佔絕大部分。在稅政方面，有關財政之各類表報及統計概況等資料，如：國稅專賣利益收入統計表、戰時財政金融統計、國庫署統計資料等，對研究抗戰時期財政問題，具有相當之參考價值。同時，有關日軍、汪偽政權之財政金融研究報告和戰時財政損失調查報告，亦有相當之可看性。人事業務方面，財政部及所屬各機關職員名冊、人事動態表，以及佔全部檔案約近五分之一數量的有關各機關貪污舞弊呈訴、控訴案件，則有助於對財政部人事動態之了解和財政人事負面問題之探討。而財政部所屬各機關組織章程、法規條文等，則可供戰時財政制度研究之參考。

大體而言，這一批檔案有一百多萬件之數量，以財政部直屬少數單位之事務性資料為主，其餘附屬機關和各省財政機構之資料仍滯留大陸；但由於本館人力不足，檔案整理工作仍在進行中，目前已整理完畢者僅有鹽務和人事等部分檔案，共計三百九十五卷可供參考，仍需假以時日，俟多方整編後，才得以全面開放供各界參閱。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檔案

## 保存與整編概況（八）

莊樹華\*

（續上期）本期所介紹之經濟部檔案內容包括：資源委員會、礦業司、國際貿易司、西昌辦事處、工礦調整處、工商輔導處、特種經濟調查處、處理日本賠償物資委員會、無線電總臺及接收工作審議考核委員會。分述如下：

### （八）資源委員會

資委會依檔案所屬行政系統之歸屬不同，可分為屬於資委會本部的檔案共 1418 函（參見本通訊第六期），屬於經濟部者，共 162 函。作此區分的原因是，公文檔案基本上係兩個單位之間的移文往來，甲單位發給乙單位的公文，甲單位常留有底稿，乙單位收到的則是清繕（或打字印刷）過的正本，故按理同一份公文，應同時存在於兩個機構（一份底稿，一份正本），資委會檔案就具有這種性質。由於檔案原屬保管單位不同，故宜先將其屬資委會本部留存之底稿（或接收之正本），或屬經濟部接收之正文（或留存之底稿），加以區分清楚。屬於經濟部管轄時期，且檔案係屬經濟部所保管歸卷者，計分以下幾項：

1. 總類：16 函（民國二十九年～三十六年）包括組織法規、移交案、人事任用銓敘、國營工業三年發展計畫、工作報告、進度報告、接辦及合辦事業案、借用庚款、對美德蘇購料案、建議案與視察報告等。

2. 電業類：除電業機構組織法規、電業保險及電價案外，各電廠組織章程、業務、人事資料如下：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審

單位名稱	函數	檔案主要內容	資料涵蓋時間
龍溪河水電廠	5	組織章程、業務	民國27~36年
長壽電廠	1	業務	37
岷江電廠	4	組織章程、業務	25~28
宜賓電廠	3	組織章程、業務	29~31
萬縣電廠	3	組織章程、人事、業務	27~37
自流井電廠	3	組織章程、人事、理事會 會議、業務	28~36
瀘縣電廠	2	組織章程、業務	30~37
灌縣、都江電廠	1	業務	29~37
昆湖電廠	5	組織、業務	27~37
螳螂川工程處			
雲南礦業公司	1	業務	26~30
開遠水電廠			
貴陽電廠	5	組織章程、業務	27~37
修文河電廠	1	組織、業務	32~35
湘西電廠	2	組織、人事、業務	27~35
衡陽電廠、浙東電廠	1	組織章程、業務	30~37
廣州電廠、滄江電廠	1	組織章程、業務	35~37
柳州電廠	2	組織、人事、業務	30~37
平桂礦務局電廠	1	業務	28~37
安慶電廠	1	組織章程、業務	27~37
皖南電廠	1	業務	37
西京電廠	4	組織、人事、業務	27~37
武昌電廠、大冶電廠	1	人事、業務	27~36
徐州電廠、青島電廠	1	業務	34~37

漢中電廠	2	組織、人事、業務	27~36
西寧電廠	3	組織、業務	29~37
蘭州電廠	5	組織、人事、業務	27~37
石微、王曲、西昌、 威陽、鄭州電廠	1	業務	31~36
各項水力發電計畫	2	業務	28~35
鄂南電力公司	1	業務	36~37
冀北電力公司(唐山 、北平、察中、天 津分公司)	4	組織、人事、業務	35~36
江南電力局	2	組織、業務	35~37
東北電力局			
揚子電氣公司、映廬 公司、湖南電氣公司	1	業務	27~34

3.礦業類：包括法規、計劃、各煤、鐵、石油、金屬礦之組織業務資料，以及鎢、錒、錫等礦管制情況：

單位名稱	函數	檔案主要內容	資料涵蓋時間
滇北礦務局	1	組織、人事、業務	民國27~35年
川康銅鉛鋅礦務局	1	組織、工程報告書	27~35
四川油礦探勘處			
平桂礦務局	1	工程報告書	28~31
西灣煤礦	1	工程報告書	28
南桐煤礦	2	業務	27~34
四川省各煤礦	3	業務、礦警、礦稅	27~33
雲南省各煤礦	2	組織、業務	27~36

明良煤礦公司	1	工程計畫	32~35
貴州、江西省煤礦	1	業務	27~33
湘南礦務局	3	業務	26~33
辰谿煤礦公司	1	業務	27~36
永邵煤礦局			
浙潭煤礦公司	1	業務	26~35
恩口煤礦公司			
湘江礦業公司			
中湘公司			
祁零煤礦局			
井徑煤礦公司	1	業務	35
河南、山西、甘肅煤 礦	1	業務	27~36
遼寧、安東煤礦	1	業務	36~37
撫順礦務局	1	業務、礦警	36~37
綦江鐵礦籌備處	2	業務、工程報告	27~34
明良、威遠、嘉陽煤 礦公司	1	工程計畫	34
鞍山鋼鐵公司	3	業務、工作報告	36~37
易門鐵礦局	1	組織章程、礦警、礦稅	28~32
其他各省鐵礦	1	業務	30~37
甘肅油礦	4	組織章程、人事、業務	29~34
四川石油礦	1	組織章程、工作報告	27~34
新疆石油	1	業務	32~33
採金局	1	業務	28~34
四川金礦辦事處	1	組織、業務	27~36
川康銅業管理處	1	組織章程、礦警、工程計	27~33



		畫	
彭縣銅礦籌備處			
雲南、西康、江西省 銅礦	1	組織、業務	27~33
鎢業管理處	2	組織章程、業務、礦警	27~31
鎢業管理處：粵分處	2	業務	27
廣東、江西、湖南鎢 礦	3	業務	27~37
廣東、廣西、湖南錫 礦	1	業務	29~35
雲南錫業公司	1	合約	29
江華礦務(錫)局	1	工作計畫	27~30
雲南錫礦工程處	1	業務	27~32
第三區特種礦產管理 處	1	業務	27~36
鎢業管理處	1	組織章程	27~31
雲南、貴州鋁礦	1	業務	30~34
各省錳礦	1	業務	28~36
汞礦管理處	1	組織章程、業務	27~37
貴州礦務(汞)局			
其他稀有礦	1	業務	30~37

4.工業類：包括各煉鋼廠、煉銅廠、機器廠、電機廠、車船廠、酒精廠、電工器材廠、化工材料廠、化學工廠之成立、經營情況：

單位名稱	函數	檔案主要內容	資料涵蓋時間
資渝煉鋼廠	2	組織章程、業務	民國30~34年

中央鋼鐵廠	1	業務	27~35
雲南鋼鐵廠		組織章程	27~35
資委會、礦冶所合資 煉鐵廠		組織章程	30
華北鋼鐵公司		組織章程	30~35
資蜀鋼鐵廠		組織章程	33~34
純鐵煉廠	1	組織章程	27~28
綦江純鐵煉廠	1	業務	28~30
電化冶煉廠	1	組織章程、業務	32~33
昆明電冶廠		組織規程	32~33
天原電化廠	1	接收	32~33
重慶煉銅廠	1	糾紛	27~29
昆明煉銅廠	1	組織章程	27~29
中央機器廠	1	組織章程、業務	28~33
上海、江西機器廠	1	組織章程	32~35
中央無線電機製造廠	1	工作報告	29~35
江西車船廠	1	決算報告、財產清冊	32~33
資中、北泉、四川、 簡陽、復興、重慶、 開遠、咸陽、遵義、 雲南、襄城酒精廠	1	組織章程、接收清冊	28~34
瀘縣、安順、廣漢酒 精廠	1	組織章程、接收清冊	30~35
中央無線電器廠	1	組織章程、業務	29~33
中央電工器材廠		組織章程、工作月報	30~37
中央電瓷廠	1	組織章程	27~33
中央電瓷廠：沅陵 、宜賓分廠	1	工作月報	30~32

華亭電瓷廠		組織章程	30~34
化工材料廠、化工實 驗廠、天津化學公司	1	組織章程、業務	27~37
重慶耐火材料廠	1	組織章程、概算、工作計 畫	
雲南硫酸銨廠	1	業務	30~31
裕滇磷肥廠		組織章程	31
植物油提煉廠	1	組織章程	28
動力油料廠			
甘肅水泥公司	1	停工案	33

#### (九)礦業司

礦業司之職掌包括國營礦業之籌設及管理、礦權之特許及撤銷、礦業登記、礦業保護獎進監督、礦區稅、礦警、礦業調查、礦區勘定、礦質分析、礦業用地事項、地質調查、礦冶研究及其他相關之礦業事項。現存礦業司檔案可分下列幾大類：

1. 總類：65函（民國二十年~三十七年）其項下又可分為若干小類：(1) 礦業法規(2) 各省礦區稅(3) 礦業救濟(4) 礦業技師(5) 礦警(6) 各大學申請礦冶獎金(7) 各礦工人工作競賽(8) 礦業同業公會及煤礦公司(9) 岐昆鐵路(10) 礦業調查報告(11) 各種礦務會議(12) 礦業計畫等。

2. 礦冶研究所：29函（民國二十七年~三十七年）附屬於礦業司下的礦冶研究所負責有關採礦、選礦、冶金、化驗、編輯等研究事宜。現存檔案內容包括章程、人事法規、技士、技正、技佐、考績、職業調查表等人事資料；業務方面則有二十七~三十三年度的工作報告、各省礦務調查報告、礦冶獎金委員會、威遠試驗煉煤、鐵廠等。

3. 採金局：29函（民國二十八年~三十三年）經濟部為辦理各省採金事宜於二十八年成立採金局，附屬於礦業司，三十四年後由資委會接收。本檔案內容有組織、人事、各年度工作報告、工作計畫、各省金礦局、探勘隊及採金處。

4.中央地質調查所：42函（民國二十六年～三十七年），成立於二十七年，原名經濟部直轄地質調查所，二十九年改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職掌調查全國地質及測量地質等研究事項。現存檔案有總務、組織條例、年度預算、人事案卷、各省地質調查所年度工作報告及調查報告。

以及各省地質調查所調查報告。

5.各省礦務：69函（民國二十六年～三十七年）包括河北、河南、山西、陝西、甘肅、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遼北、遼寧、熱河、察哈爾、寧夏、青海、西康省等之各礦開採、礦務糾紛、採礦執照。其中以四川省資料最多。

#### (+)國際貿易司

國貿司現存檔案數量不多，僅7函（民國三十二年～三十七年），有中外各國商約、外貿法規、採購辦法、關稅協定、進出口商行名冊、外商名冊等。

#### (+)西昌辦事處：

西昌辦事處：3函（民國二十九年～三十一年）設於西康省西昌，為抗戰期間推動後方經濟建設之典型，從事小型農工業之推廣，其下設有蠶桑場、苗圃、糖廠、皂燭廠、造紙廠、毛紡織廠、製革廠等，現存資料包括人事、資金撥付、經營概況、結束移交案等。

#### (+)工礦調整處：

工礦調整處職掌包括國內各工礦事業資金之籌措協助、材料之供需調劑、設備之遷移補充、建築之規劃協助、動力之調劑供應、物品之運銷分配等事項，現存檔案有兩大類：1.總類：6函（民國二十七年～三十三年）包括組織章程、法規、職員名冊、工作計畫、工作報告、調查研究報告、業務進行概況等。2.各工業公司營運資料：22函（民國二十七年～三十六年）包括衡陽麻織廠、廣西紡織機械工廠、廣東省麻袋廠、重慶纜車公司、成都自來水公司、雲豐紙廠、中國紙業公司、成都紙廠、西南麻織廠、湖南第三紡織廠、西北毛紡織廠、華新水泥公司、江西興業公司、貴州企業公司、重慶染整廠、四川榨油廠等近三十家工業公司之資料，其中衡陽麻織廠檔案最為齊全，包括籌組經過、組織章程、工場設計、撥發資金、土地取得、廠屋建造、添配機器、定購原料、材料、疏運器材、人事派用、招聘技術人員、經費使用等等。其他各公司所存資料有公司章程、資金情況、營業概況等。

#### (+)工商輔導處：

工商輔導處成立於民國三十六年，分設於瀋陽、天津、漢口、上海、重慶等處，職掌與前項工礦調整處（抗戰結束前即併入戰時生產局，戰時生產局在抗戰後裁撤）類似，現有資料包括人事任用、業務推動、經費預算、工作報告等。

(五)特種經濟調查處：

特種經濟調查處之前身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經濟調查處，三十六年改組，由經濟部接辦，職掌包括綏靖區工商業復興概況、物價變動、物資供應、生產運銷、經濟檢查、封鎖區經濟情報之調查等。現存資料有組織規程、預算、重要工作表、人事任用等。

(六)處理日本賠償物資委員會：

現存檔案共 10 函（民國三十七年）為各種接收清單及船運裝箱單，公文性質之檔案闕如。

(七)無線電總臺：

專用無線電總臺檔案亦少，僅 1 函（民國三十三年～三十七年），有組織規程、人事任用、經費案等。

(八)接收委員會、特派員辦公處：

行政院為辦理收復區全國性事業接收事宜，特設行政院收復區全國事業接收委員會，職掌一切經濟（包括工、礦、商業、農林、糧食、水利等）交通金融事業之接收移交。另於經濟部及戰時生產局下設立特派員辦公處（全國共分七區）專門處理收復區工礦及其他有關事業。

(1)接委會：5 函（民國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包括各接收委員會之組織章程、接收處理辦法、接收敵偽之製鹽、化工、軍需工廠、酒精廠、糧食工業、實業公司、鐵工廠等案。

(2)冀熱察綏區特派員辦公處：5 函（民國三十四年～三十六年）包括接收敵偽產業、處理敵偽產業審議委員會、接收各單位移交處理、人事、民營廠鑛審核名單等卷。

(3)魯豫晉區特派員辦公處：5 函（民國三十四年～三十七年）有人事、工作報告、接收調查報告及各省接收案。

(4)蘇浙皖區特派員辦公處：10 函（民國三十四年～三十七年）除人事、總務案卷外，另有各地接收案、呈請發還案、請撥借用接收產物案、標售承購案、接收工作報告及特派員辦公處結束案。

(5)湘鄂區特派員辦公處：11 函（民國三十四年～三十六年）包括人事、

接收、標售、承購、發還等案。

(6)粵桂閩區特派員辦公處：3函（民國三十四年～三十六年）包括人事、總務、接收、結束各案。

(7)臺越區特派員辦公處：15函（民國三十四年～三十五年）有日資企業名單、越南辦事處接收越南日資產、傳票及帳簿。

(8)東北特派員辦公處：3函（民國三十四年～三十七年）接收各廠礦名單暨接收財產清冊、東北工業概況暨蘇軍、匪軍運走東北物資表、人事、結束案。

### 三、結 語

從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八年（1937～1949），中國的大部分地區均處於動亂狀態，先是抗戰，後有戡亂（國共戰爭），幾無寧日。然而，在民國史上，這一段時期卻也是經濟建設最為活絡的階段（以1949年以前而言）。經濟行政機構在抗戰初期雖然一度緊縮，但在抗戰後期為了充實抗戰的國力，經濟主管機構再度擴張，農林部及水利委員會的劃出獨立為部會級機構，就是最好的例證。抗戰勝利後，由於接收敵偽機構，使政府主管的工商業務愈形增加，於是有資源委員會的改組、擴充。總之，從一九三〇年代國民政府標榜建設以來，經濟行政業務無論在機構、人員、經費、業務上，均有相當的發展，在中國政治、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寫下極為重要的一頁。

前述經濟部的各類檔案，僅為當時經濟檔案的一部分，若加上農林部檔案（已由近史所整編完畢，開放使用）、行政院水利委員會檔案（已開始整理編目）、水利部檔案、導淮委員會檔案（均已開放）則當時全國經濟活動的主要面貌，已可得其梗概。就資料性質而言，經濟檔案不但是研究當時政治文化的重要素材（經濟行政），也是研究中國接受西方科技過程的實證材料，尤其重要的是，這是研究當代中國經濟發展得失的最直接史料。換言之，當代中國政治、科技、經濟史之發展，均可在經濟檔案中找到豐富的題材。

以人事資料而論，經濟檔案中有最豐富而且完備的專業人材養成、訓練、任用之資料，對研究專技官僚之特性，及其與傳統政治文化乃至政治結構之變遷間的關係，提供最佳的史料。例如，資源委員會之專業人材無論量與質均屬翹楚，其中大部分身陷大陸，在中共政權統治下毫無作為。相反的，少數來臺者，卻成為創造臺灣經濟奇蹟的重要功臣，如李國鼎、楊繼

曾、孫運璿、趙耀東等。

就技術層面而論，農業、工業、礦業、水利檔案中，均有大量當代科技之研究成果運用於經濟活動之資料，最著名的如中央農業實驗所、中央工業試驗所、地質調查所、礦冶研究所、中央水工試驗所等機構所從事的技術引進與研究實驗，均在當代中國科技發展史上留下珍貴的史料。

工商發展是經濟現代化極重要的一環。經濟部所屬工業司、電業司、商業司、企業司、礦業司、資源委員會、工礦調整處、西昌辦事處等單位中，留有大量公、民營工、商、礦類公司行號之基本資料，從中可以研究當代中國企業的經營型態，資金籌措與運用，經營與管理之成敗得失等，許多工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根本問題，可以從中擷取經驗，中國經濟現代化過程中的時代限制、努力經過、發展方向等問題，也可經由對這些資料的掌握與研究，獲得較深刻的體認與展望。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收藏地圖簡介

謝 國 興 \*

水利為傳統要政，民國以後經營猶不餘遺力。開溝築堤，整治洪氾，有賴詳細地圖為索引，故水利行政部門每存有數量極夥之河道、地形、水文、工程等圖。清末以降，水利業務為經濟行政部門所兼管，以是經濟檔案中存有大量地圖資料。中國近代經濟檔案由經濟部移交本所保管時，其中即包含各類地圖，數量至為龐大，惟因飽經清末民國以來迭次憂患，流離播遷之餘，蝕毀之數實屬不少。民國61年前後，本所曾雇員稍事整理這批舊地圖，但未及全面清理，分類製卡方式亦不盡理想，一直未能開放使用。

民國 77 年元月，本所新建檔案館完工使用，於其中新闢地圖室一間，由檔案館編目室中調派人手，開始全面清理館藏地圖，裱褙裝幅，剔除重覆，分類編目，製作索引，至80年元月，終於完成整理編目工作。各類地圖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依性質區分為四大類，五十小類，登錄編號者計達一萬五千幅有餘，絕大多數為地形圖，間有少數河道圖，水利工程圖則未予收錄。各類地圖之測繪機關不一，有中央及省級之軍事機構、水利行政機構，甚至外國軍事及水利機構（以德國、日本為代表）；測繪時間亦不一，最早的是光緒年間，至遲不逾1940年代，民國初年至抗戰前後所繪製者為數最多；印刷方式有單色、套色、彩色之分，彩色圖以外國地圖或外國測繪之中國全國性地圖居多，有部份地圖則係手繪原稿圖；圖幅大小不一，最小的各省分幅空白圖為 $30 \times 21$ 公分，最大的一張外國地圖為 $154 \times 108$ 公分，佔數量最多的各省地圖為 $53 \times 38$ 公分；比例尺種類亦多，不過以一萬、五萬、十萬分之一尺佔多數。

以下分別就各類地圖數量、性質作概略介紹。

第一大類稱為全國性地圖，意指比例尺在五十萬分之一以上，繪製成圖以兩省以上為範圍之地圖。這類圖又依編繪出版機關之不同，細分為十三小類，包括：

(一)民國 6 至 7 年間，北京參謀本部製圖局編繪之五十萬分之一尺全國輿圖，共分成 237 幅，套色印刷，為一套印刷精美，保存完整之全國地圖。

(二)民國 20 年至 21 年間，參謀本部陸地測量總局編印之五十萬分之一尺全國輿圖，圖樣與分幅均與前者相同，惟採單色印刷，紙質較差，且已不完整，有圖 62 幅。

(三)民國 3 年陸軍部總務廳編繪之「川貴省五十萬分之一尺輿圖」，單色印刷，成圖 21 幅，保存完整。

(四)河西新疆五十萬分之一尺地圖，編繪者與測繪時間不詳，採黑、綠兩色印刷，成圖 40 幅，上有漢、回文地理名詞對照表。

(五)民國 3 年北京陸軍測量局編繪之「五十萬分之一尺輿圖」，單色印刷，僅存七幅，涵蓋範圍包括山西、陝西、甘肅、湖南、湖北、四川等省與蒙古的一部份。

(六)百萬分之一尺中國輿圖：包括北京參謀本部製圖局在民國 3 年測繪的 9 幅，南京參謀本部陸地測量總局在 1930 年代編繪的 5 幅，均採套色印刷，保存者均非成套。

(七)國防部測量局在民國 32 至 36 年間編繪的百萬分之一尺全國輿圖，分成 85 幅，單色印刷，為一套 1940 年代編繪之完整中國全圖。

(八)德國陸軍參謀處測量部於 1901 至 1912 年間編繪的百萬分之一尺中國輿圖，彩色印刷，存圖 22 幅，上有中文與德文對照地名。



(九)日本參謀本部在 1930 年代繪製的百萬分之一尺中國東部地圖，分成四幅，彩色印刷，上有中、日文對照地名。

(十)資源委員會在民國 25 年出版的一百五十萬分之一尺全國地圖，單色印刷，共 25 幅，為一套完整保存之中國全圖。

(十一)中國各省、區分幅圖；以省、區為單位，各自成圖（部份省份缺圖），包括蒙古、西藏、南海諸島，比例尺不一，共 22 幅。

(十二)郵政輿圖：係交通部郵政總局在民國 22 年編繪出版，套色印刷，圖幅甚大（146×107公分），計 30 幅，其中尚包括兩幅軍事委員會在民國30年出版的中華民國公路全圖。

(十三)各省分幅空白圖：係 1930 年代中央大學地理系繪製，以省、區為單位，各成一圖，每圖上以點、線標明縣界、縣治所在，各圖比例尺不一，以二百五十萬分之一尺居多，圖幅最小的只有 30×21cm，利用上十分便利。

第二大類為各省分幅地形圖，係以省、區為單位，分別編號。各省所存地圖數量不一，最多的如河南有 886 幅，最少的像西康省只有 61 幅，計登錄編號之各省地圖共九千七百餘幅，涵蓋省份有：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甘肅、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新疆、青海、西康等，東三省、西藏、蒙古、臺灣等省區之圖絕少。各省地形圖中，以五萬及十萬分之一兩種比例尺最常見，圖幅長寬以 53×38 公分居多數。

第三大類為水道圖及河流附近地形圖，又可分為十小類：

(一)參謀本部陸地測量總局在民國 25 年編繪之揚子江尺沙段航測圖，比例尺一萬分之一，單色印刷，共27幅，涵蓋湖北、湖南兩省的鹽利、華容、岳隆等縣境長江江圖及附近地形詳圖。

(二)黃河水利委員會在民國 34 年編繪的黃河下游地形圖，比例尺五萬分之一，套色印刷，共49幅，主要涵蓋河南、河北、山東省境黃河附近各縣。

(三)一萬分之一尺黃河下游地形圖。這是黃河水利委員會從 1920 年代至抗戰前測繪的大比例尺地圖，登錄於本目錄者有兩類，一為手繪原稿圖，圖幅長寬約 90×60 公分，一為膠片圖（附有膠片沖洗成的照片式地圖，收藏在本所經濟檔案中的全國經濟委員會檔卷中），係前述手稿圖拍攝而成（拍攝年代應在抗戰前夕），圖幅長寬為 23×15 公分。這一小類地圖數量多達 3651 幅，最大特色是圖上除有詳細的地形、地貌之外，村莊名稱、格局、大小、戶數、土壤種類、出產農作物種類、地價等資料俱備，對於研究1930

年代以前華北農村的社會經濟問題，是非常有價值的資料與工具。

(四)民國 34 至 35 年間黃河水利委員會測繪的寧夏省境黃河沿岸附近溝渠水道地形圖，係手繪原稿圖，共 72 幅，比例尺未載明（似乎是一萬分之一尺），涵蓋範圍包括寧朔、永寧、賀蘭、平羅、惠農等縣。

(五)綏遠省境內民生渠形勢圖：此圖測繪機關及比例尺均未載明，測量時間為民國 34 年，計存原稿圖 165 幅，從中可以看出民生幹、支渠分佈情況及其與黑河、黃河之聯繫關係。

(六)長江水道暨沿岸地形圖：係海道測量局及揚子江水道討論委員會在 1920 至 1930 年代所測繪編印，共存圖 48 幅，自長江口至漢口，各圖比例尺不一，多數為二萬五千分之一尺，少數七萬五千分之一尺，對於長江水道本身及沿岸地形（包括口岸城市）有詳細的描繪。

(七)江蘇寧鎮澄淞四路要塞圖：這是江蘇陸軍測量局在民國 4 年前後測繪的要塞形勢圖，包括地形圖、砲位圖，共 139 幅，除了將上起南京，下迄出海口的長江沿岸地形及江防要塞分佈描繪的鉅細靡遺外，並附有各要塞砲位數量、名稱、口徑、每砲射程、速率、攻堅、火藥、製造廠、製造年月、安置年月等資料，研究民國軍事史者，當可從中獲取不少寶貴資料，對聞名中外的江陰要塞佈防形勢有興趣的人，可以來看看這裏的巨幅地圖。

(八)中國沿海及南洋各島嶼港灣水道圖：這是日本水路部在 1920 至 1940 年代先後測繪的詳圖，共存圖 242 幅，範圍涵蓋中國沿海、臺灣及南洋羣島，圖中文字以日文為主，中國部份附有漢字對照。

(九)揚子江港灣及中國沿海水道圖：這類圖有兩種，一為海軍部水路測量局在 1930 至 1940 年代所測繪的長江沿岸及中國沿海各港灣水道及地形圖，共 56 幅；另一為海軍總司令部在民國 36 年至 37 年所編繪，計 12 幅，內容與海軍部時代所編繪類似。

第四大類是世界各國地圖，多數為彩色印刷，共 139 幅，其中有兩套地圖佔了多數：一為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陸地測量總局在民國 30 至 31 年間編繪的「世界形勢全圖」（共 22 幅），另一為俄國參謀本部在 1900 年前後編繪的「歐俄全圖」，共 96 幅。

以上大略介紹了近史所檔案館收藏舊地圖的種類與數量，相信在國內外的學術機構中，恐怕難以找到類似數量既多，種類也較齊全的舊地圖。目前這些地圖已開放使用，地圖的詳細目錄正在排印中，大約在今（民國 80）年夏天可以出版，屆時查閱將十分便利。



## 新書評介

# 戰爭與和平：王宏斌著《晚清貨幣比價研究》之評介

林 滿 紅\*

書 名：晚清貨幣比價研究  
作 者：王宏斌  
出 版 者：河南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1990年  
頁 數：261 頁

銀和銅錢是清代中國兩種主要貨幣。銀用於納稅及批發交易，銅錢則用於零售及工資給付。由是，銀多為政府及富商所持有，而銅錢則多為下層階級所持有。銀和銅錢相對價格（銀錢比價）的變動，也因而會深深影響不同貨幣持有人相對財富的盈虧。王著全書重點在討論乾隆 31 年（1766）到宣統 3 年（1911）間中國銀錢比價的波動趨勢及其成因。

王著認為以往有關銀錢比價的研究，大都由貨幣數量觀點出發。所謂貨幣數量觀點指的是「物多則賤，寡則貴」的由貨幣供給量決定價格的觀點。在這裏指的是：錢多則錢賤，銀少則銀貴。作者認為這種觀點，由古代到晚清，一直駕馭中國的貨幣思想。晚清時期的士大夫也用這個基本框架來詮釋其所面臨的銀錢比價問題。由於受所留存晚清史料的影響，王著認為即使這是馬克斯極為反對的一種分析角度，連在馬克斯學說籠罩下的中國大陸，經濟史家仍用貨幣數量的變化來分析晚清的銀錢比價問題（頁 183-184）。

作者所欲揭櫫的馬克斯貨幣觀點認為，貨幣的價值要由其開採過程中所付出勞動力的大小來決定。以貴金屬為例，其所以昂貴，主要是因其自然蘊藏相對稀少，人們要付出更多的勞動力來開採（頁 181）。再者，馬克斯受 Jacob 影響，認為貴金屬貨幣與賤金屬貨幣的供需會受戰爭與和平的影響而有不同的調整。在戰爭期間，人們會把囤藏的金銀取出來換取活命的糧食或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用來招募兵勇，社會上會有更多的貴金屬流通。又因為戰爭的摧殘，整個商業活動將會減弱，貴金屬貨幣的需求減少。反之，在整個商業規模變小的情況下，供零售交易用的賤金屬需求反而增加。在貴金屬貨幣供多求少，賤金屬貨幣需求日多的情況下，戰爭時期的貴金屬價格會相對下跌，賤金屬價格則相對上揚。而在和平時期，社會經濟較為發展，貴金屬貨幣需求相對賤金屬增加的快，人民也較有餘力囤藏貴金屬，是以貴金屬貨幣價格會相對於賤金屬貨幣而高漲。

王著全書即以此理論詮釋晚清不同時段內貴金屬貨幣（銀）與賤金屬貨幣（銅錢）間的比價變動。由乾隆末年到太平天國戰爭爆發前夕，是一個相對和平的時期，商業較為發展，社會對銀的需求較多，因而造成這段期間的銀貴錢賤。由乾隆末年到清朝滅亡，最顯著的一個戰亂時期，就是太平天國及隨後的捻、回、苗等亂事爆發的時期。在前述理論的引導之下，王著指出 1854 至 1865 年間的銀賤錢貴即因太平天國的戰亂所使然。1866 至 1874 年間，因戰事大致底定，社會經濟秩序逐次恢復，銀價又漲。1875 至 1904 年間，銀價跌落一時之後，1905 至清亡的 1911 年間銀價復漲。在 1905 至 1911 年間，銀價漲得較明顯的地區是商業較發達的地區。

除了中國境內的戰爭與和平之外，作者也由國際銀、銅價格變化的影響來說明中國境內銀錢比價的起落。如 1875 到 1904 年間中國的銀價下跌，作者即曾由國際銀價下跌來解釋。而於乾隆至道光年間，1866 至 1874 年間的中國銅價下跌，1854 至 1865 年間的中國銅價上漲，作者也分別由各期內國際銅價的下跌、上漲來解釋。

對於中國本身銅錢的供給如何影響銀錢比價，作者也曾加以討論。有關嘉慶、道光年間的銀貴錢賤，雖然頗多外國學者由中國本身的濫造銅錢來解釋當時銅錢的貶值，但作者認為前者對後者的影響很小。至於 1854 至 1865 年間，銀對銅錢價格下跌約 38~42%，以往有學者認為是銅錢供給減少所使然。一則因為有外國人到上海採買中國銅錢，二則因太平天國之亂擾亂銅運。作者則認為，外國人採買中國銅錢只是局部地區的現象，不能解釋全國性的銅貴。作者也認為在順長江而下的銅運受太平天國之亂阻隔之後，清廷命令滇銅改由陸路經河南運抵京師，並令五口通商大臣利用海關稅收採買洋銅，並嚴格限制民間打造較重的銅器，加上大錢鑄造，銅錢供給並沒有明顯減少的證據。有關 1875 至 1904 年間的銅貴，作者與以往學者一樣認為是銅錢供給減少所使然，銅錢減少的原因，一則因為國內銅產耗減，二則因洋

銅進口困難。至於 1905 至 1911 年間的銀價上漲，銅錢價格下跌，以往學者以為是當時銅元濫造的結果。作者則認為當時所發行的銅元事實上還不足社會所需。

在銀的供給方面，作者承認國際貿易的順差造成中國白銀供給增加是 1866 至 1874 年間銀價下跌的原因，1905 至 1911 年間中國國際收支逆差造成中國白銀供給減少，是當時中國銀價上漲的原因。至於作者認為深受戰爭影響而使銀價下跌的 1854 至 1865 年，他反對此期間的銀價下跌曾受貿易順差白銀內流的影響。對於嘉慶道光年間的銀貴錢賤，作者也反對貿易逆差所造成的白銀外流是主要因素。作者以乾隆年間白銀內流而銀價上漲，1854 至 1865 年間及 1875 至 1905 年間白銀外流而銀價下跌指出銀的流入中國不是嘉慶道光年間銀貴的重要因素。

在作者以上諸多新論當中，有關銅錢供給及國際銀銅價格如何影響中國銅錢比價的討論，評者以為大致都能够成立。其指出 1854 年至 1865 年間的銀賤錢貴及 1905 至 1911 年間的銀貴錢賤是前人較少注意到的現象。其由國際收支解釋 1866 至 1874 年間的銀價下跌，1905 至 1911 年間的銀價上漲也有意義。倒是其認為戰爭與和平關鍵銀錢比價的論點，評者以為部分可以成立，部分則否。而其認為嘉慶、道光年間白銀外流非此時銀貴錢賤之主要因素，1854 至 1865 年間白銀沒有內流來導致銀賤，以及中國傳統貨幣學說只是強調「物多則賤」的貨幣數量觀點這些論點則值得商榷。

有關戰爭的影響部分，作者在將晚清銀錢比價的變化分段討論時，忽略了 1798 至 1807 年間有一段錢價回漲的時期（參見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頁 37，所引河北商舖帳冊資料〕；楊端六：《清代貨幣金融史稿》〔北京：三聯書店，1962，頁 186-187〕）。1798 至 1807 這段期間之所以銀賤錢貴，道光年間在戶部工作的王慶雲指出戰爭的影響是可能的原因。他說：「嘉慶初年，錢仍貴，民間以銀易錢，虧失逾倍，乃嚴飭各省毋減卯毋虛報。竊意其時數歲軍需散部庫七八千萬於外，民間銀易得，故錢見貴，未必盡由於停爐減卯也。」（王慶雲：《石渠餘記》，1890年版，5: 10a）。嘉慶初年為了救平白蓮教、苗、蔡牽等亂事如果可能造成白銀大量流進民間而造成銀價下跌，太平天國、捻、回、苗等亂事也有可能由此影響。

但由《晚清銀錢比價研究》一書所提供的證據可以看出，戰爭也有可能增加貴金屬的需要而使銀價上揚。如作者在說明 1853 至 1854 年間銀價飛

漲時，他說是因為太平軍打下南京，「貴金屬成爲逃難者瘋狂追求的對象」（頁 55）。如果 1853 至 1854 年因爲戰亂，銀被逃難者瘋狂追求著，那麼而後的戰爭期間，何以銀不被瘋狂地追求呢？太平天國、捻、回、苗等一連串的亂事一直到 1877 年才平定（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1979，頁 183）。而 1855 至 1865 年間的十年戰爭期間雖有銀賤錢貴的現象，1866 年至 1874 年的八年戰爭期間，則是銀貴錢賤的時期，戰爭持續的時間與銀賤錢貴的時間並不一致。

再就戰爭影響商業衰微導致銀的需求減少的說法而論，作者由諸多地方志爬梳出許多太平天國戰亂期間商業衰退的例子（頁 83-91），極有貢獻。但作者也承認，此時茶絲出口與鴉片進口都大量增加（頁 70-72）。進出口的增加將刺激商業活動，而茶絲出口又以江浙爲其重心，依作者理論，該地銀價應相對較高，但書中指出，銀價在 1854 至 1865 年間的下跌以江浙最爲明顯（頁 3）。如果銀在此地並未因爲商業較發展而價昂，其價跌則可能因爲銀在此地供給較爲充裕。既然江浙是絲茶出口重心，其出口又不斷增加，銀的供給在此地較爲充裕也是一個自然的結果。這也就牽連到白銀移出入中國與中國銀錢比價關係的問題。

1854 年左右因爲白銀由外流轉爲內流乃至銀錢比價由銀貴轉爲銀賤的現象，道光、同治年間的士大夫馮桂芬早已指出。他說：「自道光中葉以後，銀價漸貴，逡巡至於咸豐三、四年而極，……迨咸豐五、六年，……中華絲市驟盛，各貨及鴉片不足抵，則運銀償之，銀遂驟賤，以迄於今。」（馮桂芬：《顯志堂稿》，1885 年版，11: 30a~b）。王著認爲，1855 至 1865 年間，因爲中國海關統計制度仍不健全，很多走私進口的鴉片沒有估入，事實上，鴉片所增加的進口值仍大於茶絲增加的出口值。該書根據某一年的鴉片、茶、絲價格與當時鴉片進口量、茶絲出口量推算當時中國的貿易收支，結果發現整個貿易係屬逆差（頁 70-71）。評者適於香港大學取得 1859 年倫敦海關有關中英貿易的報告，這份報告的中國部分還包括香港、英國部分還包括印度。在有由印度出口到中國的直接數據，有香港、中國合計的進出口數據之下，因走私而不納入中國海關統計的問題即可排除。而且這份統計是直接數據，並非推估值。根據這個數據做成的表一顯示，1852 年以前，中國經常入超，而 1853 至 1857 年則年年出超。雖然這個數據只記錄到 1857 年的情況。但就王著推算 1853 至 1857 年間中國年年逆差（頁 71），則與此數據相左。嚴中平也引 *North China Herald*, Donald Matheson,

表一 中英貿易收支 (1827~1857)

單位：英鎊

年 代	英 國 輸 入 中 國	中 國 輸 入 英 國	貿 易 收 支
1827	3,539,365	4,855,165	1,315,800
1828	3,124,952	4,208,161	1,083,209
1829	3,148,716	4,049,359	900,643
1830	3,064,438	4,043,148	978,710
1831	3,791,843	3,687,771	-104,072
1832	3,184,050	3,660,713	476,663
1833	4,211,159	3,808,382	-402,777
1834	3,743,392	4,022,257	278,865
1835	5,579,268	5,100,916	-478,352
1836	6,995,690	5,948,440	-1,047,250
1837	4,903,163	4,973,757	70,594
1838	5,576,476	4,770,970	-805,506
1839	1,893,148	4,179,106	2,285,958
1840	2,714,313	3,017,941	303,628
1841	3,791,998	3,531,484	-260,514
1842	5,427,130	4,528,562	-898,568
1843	7,474,173	5,270,529	-2,203,644
1844	7,940,830	6,369,906	-1,570,924
1845	9,023,566	6,554,456	-2,469,110
1846	7,158,644	7,309,556	150,912
1847	5,840,088	7,717,128	1,877,040
1848	8,061,744	6,650,040	-1,411,704
1849	7,991,213	6,980,473	-1,010,740
1850	7,976,090	6,838,394	-1,137,696
1851	10,756,470	8,895,650	-1,860,820
1852	10,178,669	8,579,714	-1,598,955
1853	8,511,489	9,065,952	554,463
1854	7,467,250	100,040,089	92,572,839
1855	7,896,949	9,534,307	1,637,358
1856	9,855,718	10,021,320	165,602
1857	11,872,011	12,364,497	492,486

資料來源：根據 John A. Messenger, *India and China (Exports and Imports)*, Office of the Inspector-General of Imports and Exports, Custom House, London, 15 June 1859. The House of Commons, Printed, 21 June, 1859 計算製表。

William Wells、《英國藍皮書》等留下的資料指出，「至少從 1853 年起，中國國際收支從入超轉變為出超是確定無疑的。」（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頁 363-364。）

在貿易有順差而使中國銀供給增加的情況下，白銀的流入中國仍是 1855 至 1865 年間銀價下跌的重要理由。至於錢價之所以上漲，除了相對於貶值的銀價格上漲之外，也有可能是本身的絕對價格上漲。王著指出：1861 年，江西某人手持 30 兩白銀到錢舖去兌換制錢，「遍省中錢店無能應換」（頁 92）值得注意。王著指出制錢本身的鑄造量在此期間沒有減少是有說服力的，但何以有嚴重缺錢的現象？除了此時小額交易增加使低值貨幣需求增加的可能影響之外，也有可能是因為大錢、紙鈔的發行而使制錢因為劣幣驅逐良幣而退藏，1854 至 1865 銀賤錢貴期間與大錢、紙鈔發行的時間雷同也是個可以留意的現象。（大錢、紙鈔發行時間見楊端六：《清代貨幣金融史稿》，頁 92-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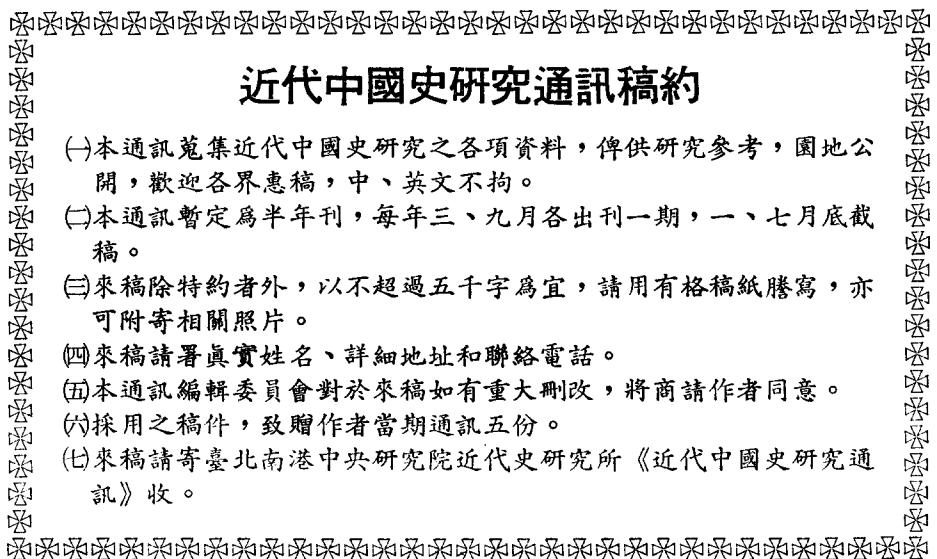
至於作者認為嘉慶、道光年間的白銀外流不是此期間銀貴錢賤的主因，是不能被接受的。作者所強調的乾隆以來商業發展導致中國對適合商業發展的銀倚重日深，的確是嘉慶、道光年間銀貴錢賤的背景。這一點，佐佐木正哉：〈阿片戰爭以前の通貨問題〉（《東方學》，8:94~117，1955 年 6 月）早有所指陳。陳昭南：《雍正乾隆年間的銀錢比價變動》（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勵委員會，1966）也曾予以指出。但關鍵銀價由乾隆末年之為一兩一千文左右漲到咸豐三、四年的一兩二千五百文左右，絕不是商業進一步的發展。因為在 1808 到 1854 年這段期間的商業正如馮桂芬所說：「富商大賈，倒罷一空。凡百貿易，十減五、六」（馮桂芬：《顯志堂稿》，11:32）。而此貿易蕭條與銀貴錢賤惡化背後的主要因素仍為表一所示的貿易逆差而使白銀外流的問題。作者提到國際銀價對中國銀價的影響，事實上也得透過銀流出入中國來運作，即國際銀價下跌造成白銀流入中國，而使中國銀價下跌，銀流出入中國仍為影響中國銀價之重要因素。

王著所說中國傳統貨幣學說傾向於「物多則賤」的貨幣數量觀點，由嘉慶、道光年間士大夫賀長齡的一則奏摺可以得到反證。賀長齡於 1838 年的奏摺如此討論銀貴錢賤問題：「銀何以貴，錢何以賤也？蓋天下之平久矣。二百年來，生齒日益蕃，費用日益廣。錢由官鑄，歲歲而增之，銀不能給也。兼之，錢質繁重，難以致遠，各處行用，良惡貴賤又不一致，故民間會兌止於近城，間有舟車，運載尚不及銀百分之一，積而見多，安得不賤。銀



則輕便易齎，所值又多，各處行用，大概相同，數千里外，皆可會兌，兼能運[遠]，致散而見少，安得不貴？」（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道光18年5月20日）。在這段討論當中，銅錢鑄造量隨人口增加的部分與貨幣數量有關；人口增加造成貨幣需求增加，銀比銅輕便，使得銀的需求增加更快，則與貨幣供給數量無關，而與貨幣需求有關。貨幣囤藏會影響貨幣價值的觀念，也存在於傳統中國士大夫的觀念當中。嘉慶、道光年間的士大夫吳嘉賓即由這個角度而不由銀流出入中國的角度思考他那個時代的銀貴問題：「市中銀價日昂。言者以爲由紋銀出洋，中國銀少所致。此猶飲水者，憂天旱水涸，不知特釜中涸耳。國家歲入銀幾何未嘗少，奈用之無藝，與權之不得其當何？漢銀錫以飾器，不爲幣，今乃專用銀，豈非以易於積藏乎？朝廷以府庫積藏，天下之人，小者積以箱篋，大者積以甕窖，人情之所私，安得不貴？」同樣的，以往研究清代銀錢比價的學者，也不如王著所說之只注意到貨幣供給數量對貨幣價格的影響前面所提及的佐佐木正哉與陳昭南都曾注意到貨幣需求面對貨幣價格的影響。

儘管有這麼一些可以商榷之處，但前面也說過，王著在指出國際銅價與中國銅價的關連，突顯 1854 至 1865 年間的銀賤錢貴、1905 至 1911 年間的銀貴錢賤，勾繪太平天國戰亂期間商業發展所受影響，及討論中國銅錢的供給等方面都有貢獻，其指出戰爭與和平對貴賤金屬供需的不同影響一點也爲我們思考銀錢比價問題多提供一個視角，因此王著仍值得對清代史、貨幣史感興趣的學者一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稿約**
  
 (一)本通訊蒐集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各項資料，俾供研究參考，園地公開，歡迎各界惠稿，中、英文不拘。
   
 (二)本通訊暫定爲半年刊，每年三、九月各出刊一期，一、七月底截稿。
   
 (三)來稿除特約者外，以不超過五千字爲宜，請用有格稿紙謄寫，亦可附寄相關照片。
   
 (四)來稿請署真實姓名、詳細地址和聯絡電話。
   
 (五)本通訊編輯委員會對於來稿如有重大刪改，將商請作者同意。
   
 (六)採用之稿件，致贈作者當期通訊五份。
   
 (七)來稿請寄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收。

## 蔡德金著：《汪精衛評傳》

王 克 文\*

書 名：汪精衛評傳

作 者：蔡德金

出 版 者：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1988年4月

頁 數：493 頁。附圖。張靜如序

這本書是多年來第一部用中文撰寫的學術性汪精衛傳記，作者又是研究汪政權卓有成就的專家，因此相當值得注意。

全書十二章（第十三章「結束語」不計），敘述抗戰時期汪氏主和通敵及組織偽府的就佔了六章，就頁數言更在一半以上。這固然反映出作者的興趣與功力所在，但作為一部完整的傳記，未免不够平衡。在汪氏的六十一年生涯裏，主持所謂「和平運動」的最後六年僅佔十分之一，也不足以代表其政治事業和性格的全部，故此書的頭輕腳重是一明顯的缺點，應先指出。

全書的結構既然如此，有關汪氏在辛亥革命前後活動的第一、二章，自然甚為簡略。其實此一時期（1905~12）長達七年，在汪氏政治性格的形成過程中，極關緊要。如 1910 年汪氏因謀刺攝政王不成而被捕入獄，1911 年出獄後又在同盟會及袁世凱之間調停奔走，便是他「浪漫衝動」和「現實妥協」兩種極端性格的交互表現，值得作進一步探究。作者在這一段裏比較重要的論點，是認為汪氏在辛亥革命後的調停活動，係代表同盟會對袁交涉，並非受袁收買而破壞革命。這段史實數年前沈雲龍在〈汪兆銘與袁世凱〉（《傳記文學》49卷5期）一文中曾有詳考未見作者引述。另一問題，是近來已有學者指出汪氏謀刺攝政王的地點，實係北京甘水橋南的小石板橋（見《民國春秋》1988年第2期），而本書的從銀錠橋舊說，不知有何根據。

---

\* 美國聖邁可學院

第三至五章指寫從國民黨改組到九一八事變期間之汪氏，這是他一生鋒芒畢露的全盛時代。本書在史實的鋪陳上，有幾處似嫌草率。如 1925 年的汕頭會議和選舉國府主席，正式確立了汪氏在國民黨內的領導地位，其間縱橫捭闔的過程，可見於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及湯良禮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等書（此二書均不見於附註），而作者卻輕輕帶過，放棄了一個探討汪氏政治手腕和國民黨內權力結構的大好機會。又如 1927 年底的廣州事變，孫發奎、黃琪翔以武力驅逐「桂系」在廣州的勢力，這是後來汪氏下野的導火線，而作者對此事究竟是否為汪氏主使，卻語焉不詳，更未說明汪氏及張、黃等人發動此事的可能動機及計畫。再如 1928 年「改組派」的成立，與當時汪、蔣之間，乃至汪、蔣、胡（包括「西山會議派」）之間的合縱連橫很有關係，《革命評論》之出版最初即受蔣氏津貼，此在陳公博《苦笑錄》中敘述甚詳，作者參考該書而未能點出這層關係，使這段時期一連串政治、軍事動亂的派系背景脈絡不清，十分可惜。

以上這些缺點多少總和本書的前半部太過簡略有關。從第七章「破壞抗戰暗中通敵」起，敘述即轉為詳細，此後數章顯然是全書的重點。作者過去曾編訂過多種有關汪氏在抗戰前後活動及汪政權的史料，如《周佛海日記》及刊載于《近代史資料》和《檔案與歷史》的函電、回憶錄等，對中日原始資料的掌握有甚嫻熟，在此書中也充分加以利用。值得注意的是，年前轟動一時的新發現史料《汪精衛日記》，見於本書附圖而不見於附註，是否因其用處有限，不得而知。

然而豐富的史料並未使作者的分析更為深入。本書在第六章中首次讀到汪氏的對日態度，當時尚在抗戰以前：「汪精衛贊同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政策，因此全力支持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方針」（頁 199），此後即據此基調描寫，從未就汪氏的動機和國內外環境作任何闡發，僅在敘述中偶以「畏敵如虎」、「畏蒞、避事」等語形容，論據相當薄弱。在第七章中，作者指出汪氏對日妥協和堅持剿共的立場，與八國聯軍時清廷「寧贈友邦勿予家奴」的政策「一脈相承」，並謂汪氏成為漢奸賣國賊之「極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頁 242），即在於此；這種不成為解釋的解釋，實無助于人們對汪氏或中國近代史的了解。

據此邏輯，汪氏在抗戰開始以後的「反對抗戰」和「倉皇出逃」，都是歷史的必然，反倒是蔣介石的態度為何在七七事變時發生一百八十度之轉變

而成爲堅決主戰派，顯得突兀。

1940年組織僞府以後，本書認爲汪氏及其黨羽便死心塌地的爲日本帝國主義者賣命，所有對日爭取更大自主權的努力，都只在「借以欺騙民眾，改變傀儡漢奸的形象」（頁468）而已；此說固有一定之真實性，但忽視了汪政權與日本之間既倚賴又衝突的微妙關係。自John Hunter Boyle的*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以來，西方學者對這種關係的探討頗有成績，本書均未採用。其實作者所編訂的《周佛海日記》中，有關線索便很多，大可參考。

「結束語」對汪氏一生提出三點總評：第一、汪氏「是一個應該徹底否定的反面歷史人物」（頁484），第二、汪氏的政治道路「是一條脫離人民、違背民意、背叛民族的道路」（頁486）；這兩點屬於政治評價，不必討論。第三、汪氏之墮落「並非偶然，是由他的主觀唯心主義世界觀所決定的」（頁487）。作者強調汪氏早年受王陽明「心學」影響頗大，因此凡事爲「我」，造成唯我獨尊的領袖慾，這是他一切政治活動的基本動力。如果這就是作者在詳考汪氏生平後所得出的最主要結論，未免令人失望。研讀王陽明學說是否即會導致唯我獨尊的性格，已需商榷；而汪氏究竟受此學說影響多大（作者所引證據僅爲其《自述》中一段誦讀《傳習錄》的回憶），亦難斷言。更何況一領袖慾來解釋某一特定政治人物的行爲，說服力太低，自蔣介石、毛澤東以降，從政者無一不受領袖慾之驅使，然而各人成就際遇不同，可見關鍵不在於此。要想探討汪氏的政治，恐怕還得從民國時代派系政治的模式、中日之間複雜而微妙的和戰關係，以及汪氏本身「浪漫衝動」和「現實妥協」的雙重性格等角度著手。二十多年前Howard L. Boorman有“Wang Ching-wei: China's Romantic Radica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Dec. 1964)一文，二十多年來有關汪氏史料的發掘與整理繼有進展，而綜合性的分析評論，似無更上一層樓者，此不能不稱爲一大遺憾。

作者在「後記」中批評John Hunter Boyle對汪氏的研究時說：「博伊爾(Boyle)先生是美國人，他不了解中國人的感情，不理解中國人對汪精衛是何等的切齒痛恨。因此，他在承認汪精衛通敵的同時，卻又不免對汪表示了某種惋惜與同情。」（頁491）其實作爲一部傳記的作者，若不能對傳主產生「某種惋惜與同情」，而只有「切齒痛恨」，於冷靜持平的研究必有妨礙。這或許正是本書分析不够深入的癥結所在。

體例方面，本書未附參考書目及索引，是大陸同類著作中常見的疏失。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  
1768. By Philip A. Kuh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00pp. □宋 光 宇\*□

作者孔復禮 (Philip A. Kuhn) 教授，多年來一直專注中國中下層民眾的「叛亂」活動。這本《叫魂者：1768 年中國的妖術恐慌》是孔復禮對這方面動亂活動研究工作的一種新嘗試和新貢獻。

對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學者來說，「盜匪」由於常見諸公文奏章，比較容易掌握；「乞丐」和「遊方僧」則很少見諸記載，研究起來，困難度自然增加許多。孔復禮這本新作就是選定「乞丐」和「遊方僧」，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誠然是件創舉，也擴大了讀者的視野。

孔復禮指出，在乾隆 33 年 (1768 年)，中國有十二個省份都發生了「叫魂」事件，在地方上，引起一陣恐慌。在浙江省德清縣，有一位農夫找造橋的石匠幫忙，把兩個忤逆不孝的侄兒的名字寫在紙條上，貼在造橋用的木樁上，因為農夫聽人家說，造橋的石匠為了把木樁順利打到河床，常偷偷的施展妖法，把生人名字寫在木樁上，然後連樁打下，不但可以增加打樁的力量，也可以藉生人的那股靈力保護木樁。對那被寫名字的生人來說，他的靈魂被偷走了，就會生病，甚至死亡。這種案例，叫做「叫魂」。

德清縣的叫魂案，並不是一項單獨的案例。那一年，在浙江省就發生好幾起，地方人士羣集指控外來的乞丐和遊方僧企圖偷取小男孩的魂魄，或企圖割取男人的辮子以達「叫魂魄」的效果。其目的是要煉製妖術。人們把外來的乞丐或遊方僧毒打一頓，而後扭送官府。官府受理後，再調查社會實際狀況，發現並沒有人因「叫魂」而生病或死亡。反而是社會大眾輕信謠言而擾亂了公共秩序。

在蘇州城裏也發生類似事件。衙役在乞丐身上搜出刀子和紙符。圍觀的人就說「聽說十多天以前，在某某地方，有人的辮子被什麼人偷偷割掉了。」結果，這些乞丐被「夾棍」侍候，打入大牢。

同年五月，有僧人從湖州乘船到胥口鎮許王廟，卻被當地漁人指控為企

---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圖前來偷割人們的辮子。當僧人奪門而逃時，漁夫在後面一邊追一邊叫，引起市場一陣騷動，人們抓住僧人，也打傷了船老大。衙門捕快訊問僧人和船老大，沒有發現什麼不對勁的地方。但是羣眾鼓噪不休。只得把一千人犯及原先出首控告的人帶到木瀆鎮，讓上級衙門處理。木瀆鎮上聚集更多的人，聲勢汹汹。到夜晚，更有人摸黑上了船，搶走船上的銀錢衣物，暴民更把船給砸了。

這些歇斯底里式的羣眾動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孔復禮在探討箇中原因時，分成幾個方面進行。一方面是統治者滿清皇帝怎樣看待這些「偷魂」「割辮」事件；一方面是中國人對魂魄的看法。他並且認為這種羣眾歇斯底里反應是一種「政治犯罪」(political crime) (p. 187)，因為它威脅到政治體制的基礎，為大規模亂事的先河。

孔復禮指出，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國，常有一種不安的感覺。剃髮留辮就是漢人順服滿人統治的象徵。任何有關留髮或割辮的舉動，都意味著向滿清統治權力的挑戰（第四章）。清廷絕不允許有這種挑戰存在。任何風吹草動都必需嚴加防範。每當有人被指控有這方面舉動時，清廷官府都要嚴密檢查，以防亂事發生。

出事的地點主要是江南。在乾隆年間，江南是全國首善之富庶區域。一個社會的組成份子總是多元的，有人穿金戴銀，當然也有人淪為乞討。無論是乞丐，或是遊方僧，都是以乞討為主要經濟手段。對江南這個富庶社會來說，乞丐和遊方僧都是被排除在正規社會體制之外的人 (p. 41-48)。再加上「外地來的」這個因素，乞丐和遊方僧就更可怕了。

自古以來，中國人就相信人有魂魄，而魂魄可以離開肉體，如睡眠作夢之時。如果，魂魄離開軀體而回不去，人就會生病，甚至死亡。道士和和尚都是有能力把人的魂魄叫走或收回的人。因而有「妖道淫僧」之說。一般說來，道士的工作花樣較多，煉丹、求仙、禳祓、除妖是他們的主要工作。而和尚的主要工作是幫助人們的魂魄順利送往西方。就是這一點差異，叫魂案跟和尚糾纏在一起。（113頁）。那麼，來自異鄉的和尚就變得更加可怕，不可信任。

胥口鎮案子最後水落石出，和尚和船老大無罪開釋，當初聲言指控他們的漁夫則繩之以罪，因為他惹起整個社會動盪不安（頁183）。蘇州割辮案也在查明真相是小孩子信口雌黃後，告一結束。（同頁）孔復禮指出，這些案例都顯示，中國社會大眾很容易聽信謠言，而這種態度正是嘉慶以降中國

內亂的根源之一。

綜觀孔復禮這本新作，可以看出他企圖從當時整個中國的統治機構和權術運用，來說明叫魂案的發生及其處置情形。在行文中，牽扯不少有關清代政治制度，滿人入關的統治技倆，滿人漢化問題，使讀者一時之間不容易掌握全書的發展脈絡，有失之零碎的感覺。

「叫魂」涉及到一個古老的「妖術」傳統。孔復禮在第五章「妖法恐懼的根由」(The roots of sorcery fear) 中約略提到一點。沒有能够詳細且有系統的說明這些妖法的由來與種類，是一大遺憾。其實，清人的筆記小說，如《聊齋》《閱微草堂筆記》等，都有這方面的記載。孔氏未能善加利用，殊為可惜。

這本書是學者們第一次處理有關「陌生人、乞丐、遊方僧」的著作，提出政治、社會、文化方面的解釋，而能有相當不錯的成績，值得我們為它鼓掌喝采！

---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by Emily Honig,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86. □李 盈 慧\*□

Emily Honig 所著的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中文書名是《上海紗廠女工》，於 1986 年在美國史丹福大學出版，由其博士論文修改而成。全書探討 1919 年至 1949 年間，上海紗廠女工的社會背景、家庭生活、工廠工作情形及此三十年間女工參與勞工運動的發展與轉變。對於研究中國勞工運動和婦女問題的學者而言，此書應是值得重視的。因為過去一些相關的研究，多半著重於男性勞工之參與工運，或婦女的家庭地位、社會地位，而此書把女人與勞工這二種身分結合在一起，作為研究的對象，同時以全中國最重要的工業中心——上海作為背景，無疑是一種新的研究方向。

此書除了緒論和結論外，共分八章。

---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第一章介紹上海的歷史。點明上海在中國經濟上的特殊地位；外國勢力、青幫的影響力、日本對上海的控制及 1949 年中共進入上海的情形。

第二章以 1925 年的上海申新一廠 (Shen Xin Number One Mill) 爲例，詳細介紹工廠內各部門男女工人 (尤其是女工) 的工作和活動。

第三章分析上海紗廠女工的地緣背景。上海紗廠女工多半來自上海、江南、蘇北三地，三個地區的女工各有其特色，但由於語言、習慣、社會地位、工作環境等種種因素，使得蘇北女人最受歧視。

第四章說明工廠雇用女工的方式。中國工廠、英國工廠和日本工廠各有其不同的雇用方式。但無論如何，女工之受雇，最重要的因素是在於其人際關係，亦即親族、同鄉關係。抗戰結束後，各紗廠改以養成工制度取代舊有的雇用辦法。

第五章探討契約工的買賣，包工頭對契約工的控制，青幫分子與契約工制度的關係，工廠廠主和管理部門對此制度的攻擊，包身制和包工制的異同。

第六章詳述女工從早到晚的工作情形，早班晚班女工的輪替，回家、休假的情形。

第七章把女工一生的童年、少年時期、結婚、生產、爲人妻、爲人媳、爲人母等不同階段的生活，一一描寫出來。

第八章論述 1920 年代到 1940 年代女工參加社會團體的概況，如姊妹會 (Sister-hood)、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及其加入中國共產黨與勞工運動的情形，同時分析各階段女工團體活動的新發展，由此導出 1948 年初大規模的女工領導罷工的事件，而成爲中共進入上海的前奏。

以往研究中國勞工運動的多數左派史學家有一些基本假設，諸如：資產階級壓迫勞工階級，外國資本家壓榨中國工人的勞力，因此激起中國工人反資產階級的勞工階級意識、反帝國主義的勞工運動。

此書作者對於以上的基本假設持懷疑態度，她提出一些修正，其主要論點是：上海紗廠女工的地方主義色彩 (同鄉關係)、青幫透過契約工制度對女工的控制、外國資本家不同的經營管理方式等因素，都使上海女工無法團結合作乃至於參與勞工運動。

基於以上的前提，作者展開詳細而冗長的描寫。其描述內容從時間上言，女工每日的工作及生活情形；從空間上言，女工在工廠，在家中，在姊妹會中，在 YWCA 夜校中的情形；從人際關係言，女工與包工頭，女工



與工頭，女工與同事，女工與家人的關係；以上種種實況都在作者的筆觸下逐一呈現。

經過詳細鋪陳後，作者作了總結：1920年代女工之所以不團結，確實由於作者所提出的幾項基本論點（地方主義、青幫、外國勢力），而1940年代末期，女工之所以能領導並參與大規模的勞工運動，主要在於女工原有的社會組織如姊妹會、YWCA 本身性質的轉變，加上中國共產黨的從中策動。

此書的完成，作者極盡搜羅史料、訪問當事人之能事。關於上海紗廠女工的史料，由於當時的紀錄、文件都不多見，因此增加收集史料的困難。作者廣泛地取材於小說、文件、調查報告、書籍、期刊，加上各種訪談紀錄，使其史料的範圍廣泛而豐富，是此書的一大優點。

其實，此書的最大特色在於其論點。作者的基本前提：地方主義、青幫、外國勢力阻礙女工團結，都遠比過去一味地將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截然劃分的架構較深入敏銳。作者的結論也擺脫前人研究的窠臼，而小心謹慎地論斷：現代的女工參與勞工運動，其實包含了傳統組織（如：姊妹會）的因子，只不過中國共產黨加以巧妙運用罷了！作者一方面否定勞資必然對立、帝國主義必然壓榨勞工的論調，另一方面肯定傳統組織（青幫、姊妹會）和傳統人際關係（親友、同鄉）的影響力依舊存在。同時強調 YWCA 在女工羣體中的角色及1920年代至1940年代間女工的社會組織之轉變。最後把女工對傳統組織的忠誠及其新產生的階級意識結合起來。這個結論，不僅意味著傳統與現代的不可截然分離；同時也說明西方勞工運動發展的軌跡不足以完完全全、恰恰當當地適用於中國勞工運動，換言之，全盤移植西方現代化文明的產物於中國，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上述各項，均是此書獨到的特色和貢獻，使讀者對於上海紗廠女工的生活、工作、人際關係、階級意識等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認識。

然而此書也有若干缺失，不容忽略。

(1)在第二章中，作者指出：1920年代至1940年代間，上海紗廠女工人數漸增，其原因是由於男工參加工運及經濟蕭條所致。同時，女工受雇人數雖然大增，但其工資反而減少。

對於男工參加工運及經濟蕭條如何影響女工受雇機會增加，作者僅以一些人的回憶作為解釋，似嫌證據薄弱，不易取信於讀者。其次，經濟蕭條與女工工資減少，是否促使女工日漸不滿而產生反抗意識？再者，女工人數大

增，而形成一股力量，是否對1940年代末期女工參與勞工運動有激發作用？這些問題，作者在第八章中雖再涉及，但卻只強調YWCA和中國共產黨的活動，而未提供確切解答。

(2)第四章敘述抗戰結束後，政府及各紗廠管理部門以訓練養成工（學徒）來取代工頭的招工制度。作者直截了當地推論：此舉是爲了控制逐漸昇高的勞工運動。作者表示管理部門有意改掉工人的「壞習慣」，而這些「壞習慣」根本是指工人的團結。如此推論，作者並未提供足以服人的證據。

事實上，實施養成工制度可能包含多種目的。第一是管理部門可能有意收回早已失去的人事任用權，而避免工頭壟斷工人的雇用。此舉自然是對工廠廠主和管理部門有利。<sup>①</sup>第二，此舉若能使工頭失去招工權，可能可以避免工頭對工人的敲詐控制，而保護工人。第三，此舉的另一面意義是可防止工頭利用其對工人的控制權而發動工人罷工，以對抗廠主。第四，訓練養成工，可以提高工人的技術和生產力；同時，在工人仍是「學徒」期間，廠主只須付較少的工資，實是一舉兩得。因此，採用養成工制度是否專爲壓制工運，恐怕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再者，誠如作者在第五章所述，工頭往往是青幫的一分子，而青幫在1920年代後期即與國民政府有合作關係，如果國民政府執意要對付工頭，壓抑工運，那麼顯然會動搖青幫與政府的關係，對於這一問題，作者又作何解釋？而從某種意義言，工頭才是真正壓榨控制工人的人，工人和廠主對之都深感頭痛，那麼所謂工人的團結，究竟是指工頭和工人的合作，或只是單純的工人之間的合作？這在勞工運動中的工人階級意識上，也是必須予以釐清的。

(3)作者在第五章中指出申新九廠(Shen Xin Number Nine Mill)的契約工人數最多，而1948年的女工領導大規模勞工運動，即發生於該廠。同時又說明契約工受制於包工頭，她們甚至依照工頭的意願而進行罷工。那麼，我們不得不問：1948年這年申新九廠的契約工究竟占全廠工人多大的比率？<sup>②</sup>契約工是否佔重要地位？她們的罷工是否與工頭有關？而此時的工頭是否仍是青幫的一員？如果以上答案都是肯定的，是否可據以推斷中國共產

① 關於此點，作者在第五章也曾敘述，但此處所述是戰前的情形，並非戰後的實情，原書頁128-131。

② Parks M. Coble 的書評，*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6, No. 4, 1987年11月，頁906也批評作者並未說明契約工的人數占多少比率。

黨領導工運也必須依靠青幫的援助？如果以上答案不一定是肯定的，是否可推斷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工運方面的勝利，即代表青幫在工人羣體中的勢力之消退？

作者既已在第五章詳述早期工頭、青幫對契約工的控制壓迫，但對抗戰後的契約工、工頭、青幫之間的關係卻著墨不多，令讀者懷疑是否抗戰後青幫和工頭都消失無踪，只剩下姊妹會、YWCA 和中國共產黨縱橫馳騁於女工羣體中。

(4)第八章談到1920年代的女工與1940年代的女工心態已有轉變。作者強調女工對傳統組織和勢力較能效忠，如忠於工頭、姊妹會等，因此1940年代中國共產黨就透過姊妹會來領導工運。

其實，傳統的因素，並不限於工頭和姊妹會。女人對丈夫的忠誠，對父母親友的忠誠，也是傳統形式，其對丈夫、父母的效忠程度未必低於效忠姊妹會的程度，那麼在女人參加工運時，其丈夫、父母，到底抱持什麼態度呢？是支持或反對？作者或許可以自圓其說地表示：勞工運動的活躍分子多是未婚女工，可以不受丈夫的影響。但是未婚的女工到底佔多少比率？她們真能影響其他已婚女工嗎？他們的父母支持她們的罷工行動嗎？何況作者也承認新入工廠的女工多半不能加入姊妹會，因此工運活躍分子（可能是已婚，可能是未婚；可能是新進女工，也可能是資深女工）能透過姊妹會去影響別人或受別人影響嗎？作者一方面強調鄉親關係和姊妹情誼，另一方面卻忽視了更親密的夫妻關係、母女親情，令人百思不解。

由此點出發，我們似乎更應追問：1920年代與1940年代的社會環境究竟有什麼變化？夫妻關係、母女關係是否有所改變？女人是否較能擺脫丈夫、父母的影響而接受結拜姊妹的影響？換言之，1940年代的大環境是否比較鼓勵女人自己決定自己的行動？亦即，女權運動是否正逐漸萌芽？1920年代到1940年代間在倡導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方面是否已有些微成效？

於此，已經觸及一個非常重要，但卻為作者所忽略的課題：上海紗廠女工的女性自覺意識究竟有無發展？此書的重點，始終在強調女工作為工人的階級意識，而不曾涉及她們的另一面：作為女人的女性意識；這確是一遺憾。

(5)在全書中，作者一再提到 1925 年的五卅運動是勞工運動的里程碑，同時作者也一再強調中國共產黨在1920年代到1940年代的勞工運動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但是眾所週知的，1925年正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合作時期；談論此時的勞工運動，如果只是一味地強調中共的角色功能，而不涉及國民黨的作用，似乎是忽略了當時政治環境的真實面。作者似乎有一預設的立場，此即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勞工運動，且也依靠勞工運動而得以掌握政權。但是國民黨是否完全與工人、工運絕緣呢？熟知國民革命軍北伐歷史的人，對此恐怕不能不有所質疑，因為五卅運動的罷工工人對於北伐確有推波助瀾之功<sup>③</sup>。

(6)就史料方面而言，此書的史料豐富詳贍，但也有其缺點，此即作者用了許多英文期刊書籍，但中文的期刊書籍反而少些，而且中文書籍有相當份量是小說、左派作家的作品。另外，作者也用了不少她自己作的訪談紀錄，這些訪談紀錄當然都是當事人的回憶。在中國共產黨統治大陸三十多年後，人們對往昔勞工情形和工運的回憶，究竟是否能完全客觀而不刻意偏袒中共？這是頗令人懷疑的。尤其如果把這些當事人的回憶當作唯一的證據，來證明任何論點時，就更缺乏說服力了。

綜上所論，此書在研究中國勞工問題方面，確有獨到的貢獻，作者以左派的階級意識理論來探討1919年至1949年間上海紗廠女工的工作、生活和參與勞工運動的情形，但同時又反對一般左派史家的論點：資本家剝削勞工、帝國主義壓榨勞工才形成工人的階級意識。作者認為上海紗廠女工由於鄉土觀念、青幫的控制及帝國主義國不同的管理方式，反而不易團結，不易產生階級意識。作者可說是以左派理論修正左派主張，並且突顯中國勞工運動異於西方勞工運動的特質：中國傳統的組織配合現代的階級意識理論，才足以團結中國的工人。但作者也忽略了中國女工的另一面：作為一個女人的女性意識。對此，此書並未提供可資參考的觀察。

<sup>③</sup> 請參看李健民：《五卅慘案後的反英運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5年10月初版，頁 176-181。李健民承認五卅慘案有助於國民革命軍北伐，但也同意五卅慘案使中共擴大活動，發展組織；可見此次事件是由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支持，且也對國共二黨都有利益。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by Linda K. Benson,  
Armonk, New York: East Gate, Sharpe,  
1990. pp. xxvii. 265      □王大剛\* □

1944年11月7日，中國西北邊陲以哈薩克、維吾爾為主體的新疆少數民族舉行暴動，攻占伊寧，成立了「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進而占領了塔城、阿山地區，形成與新疆省政府割據對峙局面達五年之久，直到1949年中共和平解放新疆為止。這個當時稱為「伊寧事變」的事件（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稱為「三區革命」），不僅影響了以後新疆及西北的政局發展，而且與當時中國國內形勢（特別是蒙古、東北）和遠東形勢均有聯繫。這一時期（1944~1949年）的新疆歷史一直為中外學者所矚目，已有眾多的論文和著作從不同的角度涉及了這一事件，但專門研究「伊寧事變」的學術專著，Linda Benson的這本書，還是四十多年來的第一部。

「伊寧事變」是在極其複雜的國內國際背景下爆發的。在新疆，盛世才於1943年9月離新赴渝，就任農林部長職，從而結束了他在新疆十一年的獨裁統治。盛世才的專制早已引起新疆各民族的不滿。民族矛盾，特別是少數民族與漢族的矛盾已十分尖銳。吳忠信受命為新疆省政府主席後，雖極力平反冤獄，安定民心，但他上任時阿山、伊犁地區動亂已起。此時，又正值中國抗日戰爭最艱苦時期，中國中央政府無力更多顧及新疆事務。中央政府直接管理新疆後，新疆經濟也受內地經濟影響，通貨膨脹日益嚴重，這也激化了新疆地區的矛盾。國際上，德國法西斯的戰敗為時不遠，蘇聯已開始重新經營其在遠東的利益。美國也在考慮要蘇聯加入對日作戰的問題。1943年，在盛世才與蘇聯友好時期進入新疆的蘇聯軍事、技術、政治人員全部被迫撤離。隨後美英勢力開始進入新疆。應該說，「伊寧事變」是在民族聯繫（漢族與少數民族，以及不同的少數民族之間），中國中央政府與新疆地方當局

---

\* 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聯繫，美蘇關係，中蘇關係中的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的背景下爆發的。

Linda Benson 的書詳盡地分析了漢族與穆斯林民族的關係，特別是中國中央政府的新疆政策。她認為，蔣介石處理新疆問題的方針與處理中國其他省份的問題一樣，在地方軍閥或分裂分子的活動危及中央政府的統治時，他就要極力維護中國的傳統邊界的完整，並阻止任何個人或集團建立地方割據的統治。「伊寧事變」一爆發，中國政府不從內部檢討原因，卻企圖通過外交途徑尋求解決。這樣就把純粹的國內政治問題 (purely domestic politics) 變成了 1945 年夏蘇美英中複雜的國際談判之一部分。事件爆發之初，中國政府就斷定完全是蘇聯在背後操縱，當時所面臨的不是穆斯林民族的反抗，而是蘇聯分裂新疆的陰謀。中國政府的這種估計束縛了它解決新疆問題的手腳。盛世才離新後，中央政府急於在新疆全面建立和其他行省一樣的軍事和行政管理制度，以確保新疆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就導致了中國政府處理新疆問題的失敗。

Benson 批評張治中的治新方針，她說，新疆省政府不願新疆文化、宗教、社會經濟與中國內地之不同，而要求新疆（包括三區）遵循中央政府的全國性方針，並認為不如此就會導致新疆脫離中國。儘管成立了有少數民族代表參與的新疆省政府，但大權仍掌握在漢族官吏手中。把新疆當做中國其他行省一樣對待的一個惡果，就是把貪污腐敗、通貨膨脹帶到新疆。她還批評警備司令宋希濂對民政事務的干涉。宋希濂認為新疆問題只有用軍事手段才能解決，他用「鐵拳」處理了迪化「二·二五」事件，又勾結烏斯滿進攻三區，使張治中苦心經營的省聯合政府遭到破壞。

新疆的穆斯林民族為什麼要發動這場暴動？該書認為是強烈的突厥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情緒即受泛土耳其主義的影響，又受已經建立近代政府的土耳其及蘇聯中亞穆斯林共和國代議制政治的影響。穆斯林文化的因素與當代代議制政府的概念相結合，使新疆的穆斯林的民族情緒更加強烈。蔣介石政府所面臨的新疆問題，正如二次大戰後許多國家政府所面臨的一樣，是要求打碎舊的殖民帝國主義體系的民族解放運動。這樣，本書就把中國與各列強並列為殖民帝國的帝國主義國家了。「伊寧事變」就解釋為完全是漢族（統治者）與穆斯林（被統治者）的矛盾所引起的。其他因素，特別是蘇聯介入的外部因素竟被忽略和否認了。作者認為，蘇聯只不過是「默許」(with acquiescence) 了穆斯林起來暴動，至多是應起義者的要求，出售一些軍火給他們。對蘇聯軍事人員的介入持懷疑態度，只說「可能」、「或許」，更

不認為三區政權是蘇聯代理人」。

如前所述，此一事件的發生有其複雜的國內外背景，不單純是中國的內部問題。新疆內部固然本已存在矛盾，但在此時此地爆發，卻是因受外部影響，尤其是蘇聯的影響。多年來，蘇聯一直視新疆為其勢力範圍，盛世才反蘇後，蘇聯並不甘心情願退出新疆，更不願意讓美英勢力進入中國中亞地區，因而培植新疆民族主義勢力。這是促使「伊寧事變」爆發的外部因素。此時，中國政府在國內面臨四大問題：中共、外蒙、東北和新疆。中共武裝力量在抗日戰爭中迅速壯大；東北在日本投降後如政府軍隊不能及時接收，會被在蘇聯幫助下的中共武裝進駐；外蒙地位尚無定論，新疆又動亂，並打出獨立的旗幟。而這四大問題均與蘇聯有密切聯繫。蔣介石的對策是穩定新疆，爭取外蒙，保住東北，切斷蘇聯中共的支持。斯大林在雅爾達與羅斯福達成交易之後，就以新疆和中共問題為籌碼，許諾不介入新疆和不支持中共，換取了在中國東北和遠東的權益，以及中國政府對外蒙獨立的承認。這就是 1945 年中蘇友好條約簽定的背景。從雅爾達密約到中蘇友好條約的成立說明中國雖是一個大國，但在國際政治舞臺上仍處於被宰割的地位。中蘇條約後，三區軍隊也停止了軍事行動，開始與新疆省政府和談，隨後新疆政局的發展，均是這個中蘇友好條約直接或間接影響的結果。三區的穆斯林為什麼在此時表現出如此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如果把這看做是二次大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部分，它為何在此時（二次大戰結束前一年，恐怕早於任何一個戰後的民族解放運動）發生在亞洲腹地中蘇邊境的伊犁地區？這個答案顯然不能只從新疆內部尋找。Benson 也承認「東土耳其斯坦運動」有外部影響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她對此一筆帶過，未作進一步的分析。這是本書重大的缺點。

本書使用了大量英、中、俄、土耳其文的材料；其中英、美政府近期公開的有關新疆的外交檔案，在土耳其出版的新疆哈薩克，維吾爾移民的口述歷史和回憶錄，目前還鮮為新疆問題研究者所知。作者本人到新疆、北京、臺灣做過調查採訪。許多中文材料還是首次由歐美學者使用，如：張大軍的《新疆風暴十七年》、包爾漢的《新疆五十年》和在臺灣國史館、調查局所存的新疆檔案材料。但一些重要的史料並沒有被作者所重視。如近年來在臺灣已公開的總統府機要檔案、王世杰的日記等。這些材料可看出新疆在當時中蘇關係中的微妙地位。近年在中國大陸也有越來越多的材料可供學者深入地研究1944至1949年的新疆政局，其中包括主要當事人的回憶錄或對他們的

採訪。這些材料中包括來自原三區領導人之一的賽福鼎；由莫斯科進入伊寧的中共中央特派員鄧力羣；替蘇聯做過情報工作的新疆省主席包爾漢。這可能因為作者是一位外國人，不易得到中國官方所控制的某些材料，但已正式出版的張治中、宋希濂、陶峙岳的回憶錄，以及由在新疆和北京的中國學者利用近來官方所允許使用的檔案材料所寫出的論文，也被忽視了。此外，蘇聯官方承認支持三區革命的材料(如蘇聯對新疆的廣播)也未被作者所採用。

## 許著《龍井林家的歷史》試評

黃 富 三\*

書 名：龍井林家的歷史

作 者：許雪姬

出版者：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時間：1990年6月

頁 數：260頁。附圖

許雪姬博士所著《龍井林家的歷史》是繼 J. M. Meskill 之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尹章義《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楊玉姿《清水同發號之研究》後的臺灣家族史的力作。①本書的主要內容在於敘述臺灣中部一個中型地方豪族的發展史，並解析其盛衰之

\* 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① 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專刊(59)，1990。  
J. M. Meskill,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 1729-1895*, Princeton Univ. Press, 1979。  
尹章義：《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張士箱家族拓展史研纂委員會，1983。  
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自立晚報》，1987。  
楊玉姿：《清水同發號之研究》，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88。



理。

本書共分八章、二附錄，並附有不少舊文書、圖表。除第一章前言、第八章結論外，第二章為「龍井地區簡介」，介紹該區的自然、人文環境。第三章「林姓家族的來臺」共分七節，敘述林家自大陸移入本區後的發展情形，自傭工而經商、墾田、效力清廷，成為地方頭人。第四章「宗族的發展與社會的整合」計分四節，解析林家透過「強固家族」、「共同信仰圈」、「共同防禦圈」、「市場圈」的形成，發展為山腳村的巨族。第五章「林本榮派下的盛衰」分四節，介紹林家大房——林本榮——派下的興衰史，由擴張田產而起蓋大厝、開發蔗廊，成為當地首富，但在清末由盛而衰。第六章「日據時期的林氏家族」述介林家仍能應付政治變局，維持地方政治、社會領袖的地位，然而由於分產、訴訟等問題漸衰。第七章「戰後的林家族人與山腳社區」，敘述土地政策的改變對地方頭人的影響，由於田地面積的減少，林家的地位似降低不少，不過仍能發揮某種程度的影響力。

本書基本上以微觀（micro-view）方式處理問題，即以林家的個案深入探討一個中型豪族在地方上的滄桑。這種處理法有一大優點，即就是可以將林家的資料鉅細靡遺地搜集、排比、分析，藉此建立較完整的、客觀的歷史，並可以此為模式檢討同類家族的歷史，驗證其異同。當然，過度偏於一族、一地也有見樹不見林之弊，須以宏觀（macro-view）補其不足。作者頗能照顧到此點，旁徵博引學者論著以驗證其所處理之林家問題。

本書最大的價值在於搜集不少的林家地契、文書，並由這些一手資料重建林氏家族史，提升了臺灣史研究的內容與水準。為增進了解，作者也費心製作不少有價值的圖表，誠難能可貴。

家族史應以何種方式寫作是件惱人的問題。傳統的族譜式的或編年紀事式的寫作法顯然有極大缺點。晚近的歷史研究受社會科學的影響，多採問題導向的方式，因而不斷有嶄新的論點出現，對史學的進步貢獻極大。然而，利之所在，弊亦隨之，許多不在研究者「問題意識」內的材料被割捨了，歷史的真相因而蒙塵。原來，歷史的發展並非依後代學者所設想出的理性（或標準）模式發展的，它是各種複雜因素交織出來的綜合體，過度簡化的、定型的解說體系反而是對歷史之神的強暴。因此，傳統的敘述性的歷史雖有其缺點，仍有不可取代的價值。本書在敘述林家歷史時頗能面面俱到，留下珍貴紀錄，作為同類題目之研究的參考。

不過，本書也許由於研究與寫作時間太短，在某些細節方面仍有瑕疵。

茲提出幾點淺見供作者參考。

(一)在章節結構上仍有改進的餘地。第一、目次章節之列舉有助於對全書內容之了解與對作者思路之掌握，但本書只列章名，不列節名，是一大疏誤。第二、在處理多重項目時，作者多用一、二、三；(一)、(二)、(三)；①、②、③模式，由於讀音相同，在閱讀書極易迷失、混淆，如能間隔使用不同數列，如一、二、三；甲、乙、丙；④、⑤、⑥等，當較清楚。第三、章節應予更有機的整合。如第五章分(一)土地的擴張、(二)大厝的建立、(三)開發蔗部、(四)由盛轉衰的關鍵等四節，如能將(一)、(三)先處理，以顯示林家的經濟取向，再談(二)、(四)有機的整合當較佳。當然，作者依時間順序敘述也有其優點。

(二)本書附有不少地圖，極有助於對內容的了解。但大多照已出版的地圖影印，以致模糊不清，如頁 8 與 10 之圖二、圖三，頗減損插圖之效。又頁 47 圖九「戴潮春之役清軍四圍彰化縣城圖」中，林文察進軍路線標明由阿罩霧至彰化，似有誤。按林文察軍先攻斗六，再北上經鹿港至彰化。<sup>②</sup>

(三)有數處待商。④、頁 27，言中部地區的稻米開始輸往大陸的時間是乾隆中期以後之事，似太遲。按康熙末年彰化八堡圳完成後，中部似已能將剩餘的米出口。<sup>③</sup>⑤、頁 101，以日學者石田浩調查現代臺灣社會的標準檢討清代的交易圈，如電化製品的購買，似不妥，亦多餘。事實上，只要以文獻實證方式探討當時的交易圈已足。<sup>⑥</sup>、頁 171，言移民自大陸帶來一田二主或三主的習慣，恐有待驗證。查清初臺灣契字多為一墾戶（或一業戶）每一佃戶，基本上是一田一主制，其後由於小田化運動，勞力需求增加，所謂一田二主的大小租制方誕生，亦即至此時大陸的習慣方發生作用。換言之，先有臺灣的客觀條件之變遷方引進大陸的習慣。

筆者學淺，未知以上之苛評是否妥當，深盼許博士指正賜教。無論如何，許著乃據辛苦搜集之一手資料完成之力作，不但豐富了臺灣家族史研究的內容，而且提升了地方史研究的水準（尤其是中部），對臺灣史研究的學術化貢獻甚鉅。筆者期望許博士以其豐富的、紮實的臺灣史素養，對家族史研究繼續奉獻，以建立臺灣家族發展史的理論。

② 黃富三：同上，頁 286。

③ 王世慶：〈從清代臺灣農田水利的開發看農村社會關係〉，《臺灣文獻》，36卷 2 期(1985.6)，頁 112。

*DAS CHINESISCHE DEUTSCHLANDBILD DER  
GEGENWART*

*A. Deutsche Kultur, Politik und Wirtschaft im chine-  
sischen Schrifttum 1970-1984*

*B: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im chinesi-schen  
Schriftum 1970-1984*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image of Germany, vol.  
A, German culture,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Chin-  
ese literature; vol. B; Marx and Engels in Chinese  
literature; both from 1970 to 1984.)*

By Wolfgang Bauer, Chang Peng, and Michael  
Lackner.

Mü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 50, A+B.  
Stuttgart: E. Steiner, 1989.

□ Ursula Richter\* □

Ever since 1984, researchers at the Sinology department of Munich University'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have been carrying out a project on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ideas from the German speaking world. In 1983, a research group of the department, supervised by Professor W. Bauer, yielded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German impact on China's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viz. a bibliography of related Chinese publications. Now, the project has come to fruition by putting out these two colossal volumes, comprising more than 2000 pages. Entries include both translations of German literature into Chinese and Chinese publications on German-related issues ("German"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always understood as including all German-speaking peoples).

Vol. A, containing over 9,300 entries, draws its materials from among books and articles published in China between 1970 and 1984, a time marked by the isolationist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opening-up in the early "Four Modernizations" period. The representation of German culture became, as we learn from the entries, surprisingly variegated, no longer focusing solely on a few culture heroes such as Goethe, Hegel, Beethoven, or the mother of socialist realism, Käthe Kollwitz, but including previously "suspected" personalities such as Nietzsche, Max Weber, Freud, or Kafka, "formalistic" expressionist and abstract art, dodecaphonic music, Fassbinder's films, and a number of contemporaries such as Dürrenmatt, Grass, or Christa Wolf (whom the Chinese sources seem to have trouble placing in either East or West Germany). In this respect, the bibliography exceeds the "Germany" image as it reflects a general broadening of China's perspective of the West. Although the bulk of materials comes from the PRC, a number of publications from Hong Kong and Taiwan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Materials are classified into twelve sections (each again subdivided), ranging from philosophy, language, religion, letters, and art over economy and social life,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politics, and history, down to military science, law, and sports.

Vol. B, comprising 6,500 items, deals with the perception of th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in the PRC. It is divided in much the same way as Vol. A, with the omission, naturally, of sports, and the addition of a section concerning work editions of the "teachers of revolution" and another on Marx' and Engels' idea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volume allows an evaluation of the profile Marx and Engels assumed in the PRC and explains the distinct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works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s.

A work of this size can hardly avoid a few flaws. One lies, I think, in an over-generous selection (which can hardly be called a flaw,

after all): Thus one wonders at the inclusion of articles and books by Japanese authors, notably in the Music section, the fact that they deal with German issues and we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notwithstanding; the same may be said for reviews by German authors of, say, Mexican art, the Louvre in Paris, the American painter Rauschenberg, Soviet, Indian, and Italian cinema, or Isadora Duncan; likewise, Gounod's "Faust" as well as novels or essays by Lunačarskij, Rolland, G. B. Shaw, Igor Stravinsky e. a., no matter what about, seem to force the issue; so do reviews of Chinese music or theatre ensembles, exhibitions, or motion pictures touring the West. In the anthology sections, more details of the contents might often be helpful particularly in cases such as "Selected East European short stories" or a drama anthology called "The Cat on a Hot Tin Roof" which is of course not a German play.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terms might have been unified (*yishu zuopin* is rendered now as "Kunstwerke" now as "künstlerische Werke"; for *yishu tese* we find "literarische Eigenheit" and "künstlerische Eigenart" respectively; the Chinese attribution *yue-sheng* for Beethoven is given as "holy musician" in one place, "divine" in another; his 9th symphony "*hechang*" appears either as "Chor" or "mit Schlusschor" while "Choral" would have been the word).

However, such minor inconsistencies do not depreciate the value of the compendium whose items are listed in Chinese (Pinyin and characters) along with German translations. Appended to both volumes are four indices listing 1. Chinese periodicals; 2. authors 3. translators; and 4. a general index of names and institutions mentioned in the text. Thus, scholars in the Chinese-Studies field will find in these two well-organized bibliographies a wealth of handy references, as will those who have no Chinese but are interested in Sino-German, or indeed Sino-Western, cultural contacts 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investigation; vol. B provides, as is hardly necessary to point out, a superb research aid to those working on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worldwide Marxism or rather, Marxisms.

# 國內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 博碩士論文目錄 (1990-1991)

## 一、博士論文

<u>畢業學校</u>	<u>畢業年月(民國)</u>	<u>作者</u>	<u>論 文 題 目</u>	<u>指導教授</u>
師範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謝國興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 研究：安徽省	張玉法
師範大學	八十年一月	吳在環	利瑪竇的儒學觀和 朝鮮反教運動	林明德 李國祁

## 二、碩文論文

<u>畢業學校</u>	<u>畢業年月(民國)</u>	<u>作者</u>	<u>論 文 題 目</u>	<u>指導教授</u>
臺灣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邱純惠	十九世紀臺灣北部的犯罪 現象	曹永和
臺灣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張麗芬	湖南省米糧市場產銷研究 (1644~1937)	劉翠溶
臺灣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曾薰裴	日據高雄築港對高雄地區之 影響	曹永和
臺灣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林美莉	外資電業的研究	劉翠溶
臺灣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何素花	抗戰時期國營煤礦業的發展	劉翠溶
臺灣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陸啟超	清末學制改革中的學生訓導 ——論學生反規制行為之 原因	陳永發
臺灣大學	八十年元月	金世忠	民國保甲制度之研究：以抗 戰前後的四川省為例， 1935~49	古偉瀛
臺灣大學	八十年元月	陳美錦	反孔廢經運動之興起	李永熾
師範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王隆華	瑣春事件之研究	張存武
師範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張起鳳	黃炎培——中國職業教育之 先驅	張朋園

師範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姜文求	關稅特別會議之研究	張玉法
師範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廖咸惠	抗戰時期的話劇活動	張玉法
師範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朱瑞月	申報反映下的上海社會變遷	張玉法
師範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陳德馨	抗戰時期西康彝務問題之研究(1937~1945)	李國祁
政治大學	七十九年一月	呂紹理	近代廣東的米糧貿易(1866~1931)	劉翠溶
政治大學	七十九年一月	林秋敏	近代中國的不滿足運動(1895~1937)	張玉法
政治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陳祥雲	近代四川農村經濟(1891~1935)	呂實強
政治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李力庸	中央農業實驗所對中國農業科學化的推動(1931~1950)	王樹槐
政治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李道緝	清末民初潮州人移殖暹羅之研究	蘇雲峰
政治大學	八十月二日	何鳳嬌	日本對臺灣的糖業經營與農民爭議	張炎憲
政治大學	八十月二月	鄭懿瀛	魯迅與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從「吶喊」到「徬徨」的心路歷程	尉天聰
政治大學	八十年二月	金泳信	抗戰前全國經濟委員會之公路建設	陳慈玉
清華大學	七十七年	劉麗娜	臺灣科學的一種開始及其歷史轉折——以體質人類學及蛇毒研究發展為例	傅大為
清華大學	七十七年	林崇熙	臺灣科技政策的歷史研究(1949~1983)	傅大為
清華大學	七十七年	崔小茹	清末民初的達爾文進化論	黃進興
清華大學	七十八年	陳錦慧	倭仁的生平與思想	黃進興
清華大學	七十八年	江珍賢	七〇年代科學普及與科學權威之意識型態——以科學月刊為分析個案	洪萬生
東海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林玲玲	廖仲愷與廣東革命政府	呂芳上
東海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簡翰龍	從中、西傳統政教關係之背	查時傑

			景探討基督教入華及入臺 後早期的政教關係	
東海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李淑芬	慈禧太后之得權方式及其統治特質	莊吉發
東海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傅光森	清代總督制度	古鴻廷
文化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林堃輝	清朝內蒙古放墾之研究	李毓澍
文化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邵銘煌	汪偽政權之建立及覆亡	李雲漢
文化大學	七十九年六月	鄭雍明	江西時期中共農業經濟政策 (1930~1934)	陳永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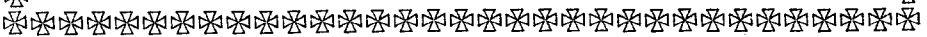


## 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史研究 再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上下兩冊

- 王爾敏·鄭宗義：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顧
- 李恩涵：中國外交史的研究
- 李國祁：中德關係研究的回顧
- 陳三井：中法關係研究之回顧
- 王成勉：馬歇爾使華（1925.12~1947.1）研究之回顧與展望
- 葉振輝：中國與國際組織關係史研究
- 張玉法：中國政黨史研究
- 張維安：近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士紳與商人階層文獻之檢討
- 李又寧：婦女史研究之回顧與檢討
- 莊吉發：中國秘密社會史的研究與出版
- 陳秋坤：明清以來土地所有權的研究
- 王家儉：清史研究的回顧——開國與建制
- 蔣永敬：早期國共關係的研究
- 李雲漢：對日抗戰的史料和論著
- 林明德：中日關係史研究的回顧
- 張存武：近代中韓關係史的研究
- 王樹槐：近代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中英文部份
- 陳慈玉：近代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日文部份
- 陳慈玉：近代中國工礦業史的研究
- David D. Buck: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Urban History (近代中國城市史研究成果)
- 陳明鈺：中國勞工運動史研究
- 陳捷先：民國以來的中國族譜學研究略述
- 張力：近代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研究
- 黎志剛：自強運動
- 梁伯華：中外學者對「幼童留美」研究的成果
- 李永熾：變法運動的研究
- 李金強：辛亥革命的研究
- 趙中孚：近代東北移民開發史研究的回顧
- 劉鳳翰：中國近代軍事史資料與研究
- 張玉法：民初軍系史研究（1916~1928）

兩冊合計定價：精700元，平600元，郵撥八折。







大事紀要

##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1989年11月至1991年3月)

李宇平\* 輯

(1989) 11.20 中共「第三屆近代中國教案學術討論會」在貴州省貴陽市召開，與會學者九十餘人，會議主要討論近代中國教案的起因、反洋教鬥爭與愛國主義的關係、反洋教鬥爭的發展等問題。大會歷時六天(11.25)結束。

11月 中共中國現代史學會在浙江寧波舉行「紀念建國40周年學術討論會」，大會以「中共解放戰爭和建國初期的歷史」為中心議題，另就 1.中共在解放戰爭初期迅速取得全國勝利的因素、2.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統治迅速崩潰的原因、3.解放戰爭時期的中美關係、4.解放戰爭時期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等項子題，進行討論。

12.5 中共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主辦、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贊助召開的「中國人口遷移與城市化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召開，與會學者分就 1.中國人口城市化進程的模式特點、2.中國人口遷移的現狀、3.關於區域性人口遷移、4.關於人口遷移與城市化的影響、5.研究方法的探討等多方面問題展開討論，會議歷時四天(12.8)。

(1990年) 2.27 中共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主辦的「紀念甲午海戰95周年學術座談會」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部召開，有三十多名專家學者與會，提交論文20餘篇，會議就 1.晚清海軍建設與甲午海戰失敗、2.中日雙方作戰指導思想、3.威海衛之戰失敗的戰略因素、4.威海衛之戰失敗與丁汝昌戰術運用的關係等項問題進展開討論。會期歷時兩天結束（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至2.28)。

3月 中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史研究室和《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聯合主辦「清代社會經濟發展問題學術問題討論會」，與會學者三十餘人，分就清代經濟發展的階段劃分、清代人口和耕地面積、清代社會經濟發展的社會地位等項議題，進行討論。

4.4 中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及歷史系舉辦「紀念鴉片戰爭150周年學術座談會」，計有六十餘名學者與會，分就近代以來愛國主義之發揚及其意義、近代中國救國救民道路的探索兩項議題進行討論。

4.23 中共全國第二屆「國共關係史學術討論會」在陝西師範大學召開，主要討論：1.國共關係史涉及的內容與主題、2.國共關係史的特點與規律、國共關係史的分期及劃分標準等問題。會期歷時四天(至4.27)結束。

5.25 中共「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成立大會暨第一屆學術討論會在南京太平天國遺址舉行，計有大陸各省、市、自治區從事太平天國史研究的學者專家和新聞出版單位的代表150餘人與會，中心議題為「太平天國與近代化」，計有七十餘篇學術論文發表，會議歷時三天(至5.27)結束。

五月 美國哈佛大學舉辦數場中國研究學術討論會，論題與近代史研究相關者，其講者、議題及日期分別如下：① Steve Averill, "Origins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Kiangsi in the Late 1920s," (5.3) ② Justin Lin, "The Agricultural Crisi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5.15)

6.5 中共江西省社聯暨省歷史學會、省世界史暨國際關係史學會在南昌聯合舉辦「鴉片戰爭150周年、八國聯軍侵華90周年學術研討會」，會期兩天(至6.6)。

6.6 中共「慶祝張學良將軍九十壽辰全國學術研討會」在瀋陽遼寧大學召開，與會代表計九十六人，提交論文七十一篇，會期五天(至6.10)。

7.21 日本中國近現代經濟史討論會事務局假東京學士會分館舉辦第六屆中國近現代經濟史討論會，大會以「清末の開港場と對外經濟關係」為中心議題，計有四位學者宣讀論文，分列如下：①朱蔭貴：「1860~90年代に中國資本主義が順調に發展できなかつた内因の考察」；②宮田道昭：「開港以後における汕頭港の流通狀況と地域經濟」；③本野英一：「1880年代の茶貿易衰退をめぐる一考察—漢口、上海のイギリス向け紅茶取分を中心に」；④黑田明伸：「書評：浜下武志『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をこう讀む」。

8.2 由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主辦之「第六屆中國科技史國際會議」假英國劍橋大學舉行，會期六天（至 8.7），會中宣讀論文與中國近代史相關者，開列如下：① Lo A., "Ming/Qing manuals on the game of dominoes," ② P. Golas, "Mineral Knowledge and mining practice in China," ③ Yang Qing, "Technological process in the Qing dynasty," ④ Smith R., "Divination,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Qing China," ⑤ Ma Kanwen, "History of Sino-British medical relation," ⑥ Ye Xiao-Qing, "Acceptance of Western medicine in 19th C. Shanghai," ⑦ Huang Yi-Long, "Auspicious dates in geomancy in K'ang-Hsi Period," ⑧ Jiang Xiaoyuan, "Political Astronomy in China," ⑨ Jami C., "Scholars &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n Ming/ Qing China," ⑩ Metailie G., "Sources on plant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⑪ Fan Dainian, "Debates on concepts of science in China, 1923-24."

8.19 第三十三屆國際亞洲與北非研究大會 (33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sian and North African Studies) 假加拿大多倫多市 (Toronto) 的多倫多大學舉行，會期七天（至8.25），會中宣讀論文與近代中國史研究相關者如下：① Danny Shiu-lam Paau, "Bertrand Russell's (1872-1970) China Sojourn: Quest for Humanity," ② Yoshihiro Murayama, "James Legge and China: Mainly on His Translation of the Shi Jing," ③ Min-sun Chen, "The Confrontation of Mythologi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Sino-Western Contacts," ④ John E. Jr. Wills, "The Dominican Missions in Fujian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⑤ Kenneth E. Rea, "Interpreting China: The Role of Early American Missionaries," ⑥ Peter Chen-main Wang, "Missionary Attitudes toward the Indigenous Movement in China: The Case of Wen She, 1925-1928," ⑦ Marilyn Levine, "Chinese Students in France: Pedagogy and Politics," ⑧ Nicolas Standaert, "Inculturation and Catholic Chinese Relations in Late Ming & Early Qing," ⑨ David E. Mungello, "A Late 17th Century Confucian Attempt to Inculturate Christianity by Attacking Buddhism," ⑩ Weizheng Zhu, "Errors 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 Re-examination of Chinese-Christian Cultural Relations in Ming-Qing Transition Period," ⑪ Chieh-hsien, Chen, "An Examination of Manchu Sini-

fication as Reflected by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Ch'ing China," ⑫ Rosemary Queded, "The 1900 Conflict in Manchuria According to the Tsarist General Staff Papers," ⑬ Tatsuo Yamada, "China's Political Part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⑭ Robert Entenmann, "The Anti-Catholic Persecution of 1746 in Jiangjin Xian, Sichuan," ⑮ D. E. Mungello, "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angzhou at the Turn of the 17th-18th Centuries," ⑯ Joanna Waley-Conen, "Good & Guns in 18th Century China," ⑰ Bernard Hung-Kay Luk, "Illegal Prisons in the Local Governments of Qing China," ⑱ Shung-tse Sha, "U.S. Policy and Its Influence on Sino-Soviet Relations after World War II," ⑲ Jun Fang,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An Exploration of Its Statu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⑳ Chandra Kanta Khan, "Sino-British Rivalry and Tibet's Struggle for Autonomy: 1908-1914," ㉑ Qiang Zeng, "Economic Fluctuations vs. Human Behaviour in China, 1949-1988," ㉒ Kam Hing Lee, "The Economic & Social Leadership of Chinese in Malaya, 1900-1942," ㉓ Romeyn Taylor, "The Construction of Orthodox Chinese Social Hierarchy at the Xian Level: A Proposed Study of Local Histories," ㉔ Norman Girardot, "James Legge (1815-1897) and the Taoist Tradition."

8.22 中共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吉林大學歷史系等十六家科研、高校、出版單位聯合發起主辦的「1990 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吉林省長春市、吉林市召開，與會學者一百二十餘人，提交論文七十四篇。本屆大會以「乾嘉道時期的中國」為中心議題，學者另就文化思想、社會經濟發展、道光朝政與鴉片戰爭等議題進行專題討論，大會歷時五天（至8.26）結束。

8.27 歐洲漢學學會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第三十二屆年會假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舉行，會期四天（至8.30），會議共分六大主題進行，宣讀論文71篇，其中議題與近代中國史研究相關者如下：  
① V. F. Sorokin, "From the History of Sino-Soviet literary contacts,"  
② V. S. Miasnikov, "The Qing empire and Russia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19th century," ③ E. Eide, "An example of accommodation policy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the Norwegian missionary K. L. Reic-

helt and Buddhism,” ④ K. Lundbaek, “Liu Ning (Erzhi),” A Christian Chinese author of the 17th-18th century,” ⑤ G. Merchionne, “Permanent tenancy on reclaimed land in South East China and Taiwan in the early Qing period,” ⑥ E.B. Vermeer, “The mountain fronti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conomic & social developments in the Dabashan,” ⑦ G. Malmqvist,” Bernhard Karlgren, Swedish sinologist,” ⑧ S. R. Belousov, “The conception of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an alternative to development,” ⑨ R. Felber, “Kang Youwei’s great Utopia reassessed,” ⑩ R. Müller, “Li Dazhao’s conception of democracy,” ⑪ “W.L. Chong, “Philosophical Roots of totalitarianism: Liu Xiasho on Anthropocentrism and Mao Zedong’s Personality cul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Nietzsche).”

8.31 中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假北京龍泉飯店舉辦「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計有美、加、法、日、港、臺暨中國大陸等地區七十二名學者提交論文，會期四天（至 9.3）。

10.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淑雅小姐應邀前往美國賓州出席「艾森豪百年誕辰紀念學術討論會」，並宣讀論文：“Unleashing Chiang Kai-Shek? Eisenhower and the Policy of Indecision toward Taiwan, 1935.”

10.18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助理研究員朱德蘭小姐演講：「1838 與 1866 年的冠船貿易」。

10.19 荷蘭萊登大學歐洲擴張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ies of European Expansion) 包樂史教授 (Prof. L. Blussé) 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共進午餐，並就有關臺灣史研究、荷人領臺時期檔案史料典藏與分布狀況等兩項問題，交換意見。

九月至十月 澳洲國立大學太平洋研究院東亞歷史系舉辦下列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相關之討論會：① Mark Elvin, “The Spectrum of Accessibility: Aspects of Humor in the Destinies of the Flowers in the Mirror,” (9.18) ② Stephen Morgan, “East China Urbanization: Historical Roots and Quantitative Dimensions of Post-1978 Rural-Urban Transformation,” (9.25) ③ Geremie Barmé, “Using the Past to Save the Present: Dai Qing’s Historical Dissent.” (10.12)

11.1 法國社會科學學院當代中國史料研究中心教授畢仰高先生(Prof. Lucien Bianco) 在中央研究院與該院合作項下，前來近代史研究所訪問研究六個月。

11.15 中華民國中琉經濟協會在臺北市青島東路一號禮堂舉辦「第三屆中琉歷史關係學術會議」，應邀出席會議之中，琉、日、韓、美、法、加拿大學者專家約九十餘人，提交論文三十八篇，議題與近代史研究相關者有：①田里修：「沖繩與臺灣的地租改革事業——土地整理與土地調查事業」；②石堂德一：「日本殖民地教育之始末——芝山巖事件及霧社事件」；③朱德蘭：「一八三八年與一八六六年的封舟貿易」；④西里喜行：「清末的新聞資料與琉球問題」；⑤赤嶺守：「脫清人與分島問題」；⑥徐玉虎：「清趙新使琉期間賓主饋贈禮物之分析」；⑦張啟雄：「中日兩屬下的琉球王國地位——『中華世界帝國』概念下的考察」；⑧莊吉發：「從故宮博物院現藏檔案看『歷代寶案』的史料價值」。

11.15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學術演講會，邀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教授艾爾曼先生(Prof. Benjamin A. Elman) 演講：「從康梁今文學到莊劉今文學」。

11.23 由中興大學歷史系主辦教育部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等單位協辦之「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在中興大學舉行，會期兩天(至11.24)會中宣讀論文與近代中國史研究相關之論題有：①胡昌智：「西化的辯證：中國近代歷史思考方式之一」；②王英男：「有關『戰前中國東北鐵路問題』研究之中外史料析論」，③楊意龍：「Matteo Ricci and Chinese History」。

11.29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歷史系教授(Prof. Benjamin Elman) 應邀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是：“From Intellectual to Cultural Histor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十月至十一月 美國哈佛大學舉辦數場學術討論會，其中論題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相關者，其講者、講題及日期分別如下：① Pamela Crossley, “Literary Fundamentals of Ch’ien-lung Ideology,” (10.1) ② Ding-an Peng, “Lu Xun and Hu Shi: Men of Different Cultural Character and the character of Different Cultures,” (10.2) ③ Jiaming Zhu, “The Role of Young Economists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1979-1989,” (10.5) ④ Tong Shen, “Almost a Revolution: Provincial Narrative of the Nation China,” (10.24) ⑤ Prasenjit Duara, “Provincial Narrative

of the Nation: Centralism and Feud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 (10.25)

⑥ Ezra Vogel,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Postwar opportunities and Taiwan.” (11.1)

12.1 由中華民國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及韓國中國研究會聯合主辦的「第五屆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假韓國漢城總統大飯店 (Hotel President) 舉行，會期四天 (至12.4)，會中宣讀論文與近代中國史研究相關者如下：①宋晞：「論流傳於歐洲的中國地方志」；②陳捷先：「略論中國域外漢籍的史料價值——以清初阿克敦訪韓事為例」。③張存武：「韓國所存十四至十九世紀的中國文獻」。

12.4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劉翠溶女士演講：「生育和死亡的季節性：明清家族的例證」。

12.1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秋坤先生應邀前往美國出席「第六屆臺灣研究國際研討會」，並宣讀論文：“State Property Rights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Ch’ing Taiwan, 1680-1840.”

12.15 由胡適研究會與政治大學聯合舉辦的「胡適思想研討會」在政大企管中心舉行，提交論文十二篇，會期二天 (至12.16)。

12.2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熊秉真小姐在該所與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合作計畫下，前往該中心訪問三個月。

12.2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新聘助研究員張壽安小姐到職。張小姐為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香港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博士論文題目為「清中葉徽州義理學之發展」。

(1991年) 1.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趙中孚先生逝世，(1934-1991)，享年五十七歲。趙先生治學專研近代中國軍事史及東北區域史，撰有「清季東三省界務交涉」、「我國東北海疆研究」等專書二種，並著有論文近三十篇。

1.10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舉行學術討論會，該所研究員吳劍雄先生演講：「紐約市華人行業職業的變遷 (1855-1965)」。

1.28 中央研究院新聘助研究員許文堂先生到職。許先生為法國巴黎第七大學遠東研究所博士，博士論文題目為：“Les Organisations Politiques des Etudiants Chinois en France dans l’Entre-deux-guerres.”

1.28 由韓國高麗大學與中共北京大學主辦的「中國史研究之成果與展望在韓國」研討會，在北京友誼賓館舉行，會期四天 (至2.1)，中韓學者共

宜讀論文八篇，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相關之論題，分列如下：①吳金成：「明清時代紳士層研究之諸問題」；②閔斗基：「中國近代之改革與革命」；③李炳柱：「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人之理念的分歧與實踐問題」。

2.28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舉行學術討論會，邀請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教授畢昂高先生 (Prof. Lucien Bianco) 主講：“Peasant Response to Mobilization Policies, 1937-1949.”

3.1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劉鳳翰先生前往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研究四個月。

3.1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秋坤先生前往美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訪問研究兩個月。

3.24 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第四次會員大會在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第二會議室舉行，海內外學者、專家多人與會。

3.2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張玉法先生應邀赴美國史丹福大學訪問。

## 中研院近史所研討會論文集

- |                                  |         |         |
|----------------------------------|---------|---------|
| ①辛亥革命研討會論文集                      | 精 500元  | 平 450元  |
| ②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                  | 精 700元  | 平 600元  |
| ③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 (1912-1927) (二册) | 精 1400元 | 平 1200元 |
| ④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二册)            | 精 1300元 | 平 1100元 |
| ⑤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 (二册)                | 精 1400元 | 平 1200元 |
| ⑥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 (二册)              | 精 1400元 | 平 1200元 |
| ⑦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 (二册)               | 精 1500元 | 平 1300元 |
| ⑧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 (二册)             | 精 1500元 | 平 1300元 |
| ⑨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論文集                    | 精 1110元 | 平 1000元 |

函購八折，郵撥帳號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消息

## 新書出版消息

李宇平·洪秋芬\* 輯

### 一九八九年出版

王文俊 梁吉生等編 南開大學校史資料選（1919~1949）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十月 九一六頁

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編 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檔案史料選編 北京 檔案出版社

牛仰山、孫鴻霓編 嚴復研究資料 海峽文藝出版社 一月 五一七頁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 口述歷史 第一期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十月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委編 中共中央南京局 北京 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十二月 七〇四頁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 八路軍回憶史料 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 十一月 五七九頁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 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 十月 五〇〇頁

「中國近代鹽務史資料選輯」編輯委員會 中國近代鹽務史資料選輯 第二卷（南京國民黨政府時期） 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十月 七五〇頁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雍正朝硃批奏摺匯編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天津市檔案館編 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03~1911）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九月 二八〇八頁

包樂史·莊國士 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 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

四川大學歷史系編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十二月 四四三頁

吉林省社科院歷史所明清史研究室 明實錄東北史資料輯 全五冊 瀋陽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 遼瀋書社 九月 二五〇〇頁
- 何力編纂 明清名案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吳廷燮等纂 北京市志稿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 李世平主編 中國現代多黨合作簡史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十二月 三〇五頁
- 林慶元 林則徐評傳 河南教育出版社 四月 四三〇頁
- 南方局黨史資料徵集小組編 南方局黨史資料 全六輯 重慶 重慶出版社
- 南京市檔案館編 南京解放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十二月
- 南開大學校史編寫組 南開大學校史(1919~1949) 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十月 四五六頁
- 俞兆鵬主編 中國貨幣金融史論著索引(1900~1986)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 重慶市沙坪壩區地方志辦公室編 抗戰時期陪都沙磁文化區 重慶 科學技術文化出版社
-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 三卷 北京 軍事科學出版社 十二月 一六三〇頁
- 孫中山研究叢書編輯委員會 孫中山與中國近代軍閥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月 五九六頁
- 高賢治、劉燕儷編 臺灣地區文獻會期刊總索引 臺北 龍文出版社 九月
- 桂崇基 中國現代史料拾遺 臺北 中華書局
- 許明龍 孟德斯鳩與中國 北京 國際文化出版社
- 陳寅恪 陳寅恪讀書札記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張 鳴 武夫治國夢：中國軍閥勢力的形成及其社會作用 北京 國際文化出版社
- 郭文韜、曹隆恭主編 中國近代農業科技史 北京 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
- 莊國土 中國封建政府的華僑政策 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 六月 三六三頁
- 馮佐哲 貪之王：和珅秘史 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 馮契主編 中國近代哲學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楊新華、楊建華編撰 魂系中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中國外交官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 劉桂生主編 時代的錯位與理論的選擇：西方近代思潮與中國五四啟蒙思想

-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劉國光、王明哲主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49~1952）  
綜合卷 十二月 城市經濟出版社 一一四〇頁
- 劉裕仁、張曉光整理 吉林他塔拉氏家譜（吉林烏拉檔案史料叢編）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院 五月 三〇六頁
- 蕭一山輯 近代秘密社會史料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十二月
- 嚴中平主編 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十月  
一七一八頁
- 井上久士編、解說 華中宣撫工作資料 東京 不二出版社 三〇〇頁
- 石橋秀雄 清代史研究 綠陰書房 三六五頁
- 岩見宏、谷口規矩雄編 明末清初期の研究 京都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  
所 三月 五八二頁
- 姬田光義、陳平著 丸田孝志譯 もうひとつの三光作戰 東京 青木書店  
二二八頁
- 溝口雄三 方法としての中國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三一二頁
- 聲明有志、西村成雄等編著 中國——民主と自由の軌跡——天安門事件の  
歴史的背景 東京 青木書店 二八八頁
- Crouch, Archie R. et al. *Christianity in China: A Scholars' Guide  
to Resources in the Libraries and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onk, N.Y.: M.E. Sharpe, Inc.
- Barwig, K., Lörcher, K. and Schumacher, C. *Asylrecht im Binne-  
nmarkt: Die Europäische Dimension des Rechts auf Asyl.* Baden-  
Baden: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363 pp.
- Clegg, Arthur. *Aid China 1937-1949: A Memoir of a Forgotten  
Campaign.*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205 pp.
- Aix-en-Provence, Colloqu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Tradition et modernité.* Aix-en-Provence: Publications de l'Univ-  
ersité de Provence, 37 pp.
- Dirlik, Arif. and Maurice Meisner. eds.,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New York: M.E. Sharpe.
- Peter Duus, Ramon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Princeton: Princeton

- Univ. Press, 472 pp.
- Fitzgerald, John. ed. *The Nationalist and Chinese Society, 1923-1937: A Symposium*. Melbourn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169 pp.
- Gittings, John. *China Changes Face: The Road from Revolution, 1949-198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36 pp.
- Heinzig, Dieter. *Die Sowjetunion und des Kambodschkonflikt*. Köln: Bundesinstitut für Ost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 38 pp.
- Howe, Christopher and Walker, Kenneth R. *The Foundations of the Chinese Planned Economy: A Documentary Survey, 1953-1965*.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370 pp.
- Kuhn, Philip A. and Timothy Brook. eds. *National Policy and Local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ink, Perry, Richard Madse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Unofficial China: 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San Francisco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Inc.
- Little, Daniel.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acfarquhar, Roderick, Eugene wu, and Timothy Cheek.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00 pp.
- Mungello, David E.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405 pp.
- Nelsen, Harvey W. *Power and Insecurity: Beijing, Moscow and Washington, 1949-1988*.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Sheel, Kamal. *Peasant Society and Marxist Intellectuals i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90 pp.
- Service, John S. *Golden Inches: The China Memoir of Grce Service*. Berkeley, Los Angeles,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42 pp.

## 一九九〇年出版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等編 上海對外貿易（1840~1949）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

王宏斌 晚清貨幣比價研究 鄭州 河南大學出版社 二月 二六一頁

王萍主編 鄧嘉玲、吳鳳蓮、龐桂芬編輯 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 第五輯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十二月

王嵩山 阿里山鄒族的歷史與政治 臺北 稻鄉出版社 十月

王樾 譚嗣同變法思想研究 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 八月 一五八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老一代革命家家書選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周恩來年譜（1898~1949）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六月 八四五頁

中央圖書館 明清檔案第七輯（三十二冊） 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 十一月

中央檔案館編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30） 全六冊 北京 中央黨校出版社 四月 六六〇頁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 紅軍長征——綜述、大事記、表冊 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 二九三頁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 淮海戰役——綜述、文獻、大事記、圖表 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組編 明清徽州社會經濟資料叢編 第二輯 五月 六一〇頁

中國哲學史學會 中國近現代哲學史論集 北京 人民大學出版社 十月 三六六頁

中國郭沫若研究學會等編 郭沫若史學研究 成都 成都書店 六月 四六〇頁

天津市檔案館編 北洋軍閥天津檔案資料選編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二月

史全生主編 中華民國文化史 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天兒慧 中國近代の調査紀錄 東京 研文出版 二月 三二二頁

吳家瑩 中華民國教育政策發展史——國民政府時期（1925—1940） 臺北 五南出版社 三月

李筱峯 二二八消失的臺灣菁英 臺北 自立晚報社 二月 二七八頁

白壽彝主編 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八月

## 六二七頁

朱宗玉、楊文華、竇暉撰 從香港割讓到女王訪華：中英關係 1840~1986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朱杰勤 東南亞華僑史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五月 二七九頁

江燦騰 現代中國佛教思想論集(一) 臺北 新文豐出版社 七月 二七四頁

吉林省軍區政治部編著 走向光明——長春國民黨軍投誠史料 長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七月 四〇一頁

「江蘇航運史編寫組」編 江蘇航運史 近代部分 交通出版社 十二月  
一二五頁

何鳳嬌 政府接收臺灣史料彙編 臺北 國史館 六月 一三四〇頁

李慈銘 荀學齋日記 北京 燕山出版社 四月

吳蕙芳 明初直魯豫盜匪之研究(1912~1928) 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 十二  
月 五二八頁

林桶法 民國八年之南北議和 臺北 南天書局 六月

林聰舜 明清之際儒家思想的變遷與發展 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 九月 三  
四八頁

胡適 胡適的日記 手稿本 十八冊 臺北 遠流出版社 十二月

姚傳旺 鄧小平著作專題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二月 三八一頁

孫哲生學術基金會 孫哲生年譜 臺北 正中書局 十月 五四六頁

孫健 中國經濟史：近代部分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部

容鑑光 長沙三次會戰 臺北 國史館 六月 六五〇頁

孫翊剛主編 中國農民負擔史 財經出版社 十二月 二〇〇頁

唐君毅全集編委會 唐君毅年譜、著述年表、先人著述 臺北 臺灣學生書  
局 七月 五八八頁

烏嫩齊 蒙古族人民革命武裝鬪爭紀實 內蒙人民出版社 四月 一九九頁

徐新吾主編 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二四  
〇頁

張革非 中國近代史料學稿 北京 人民大學出版社 三月 四九二頁

張靜如、唐曼珍主編 中共黨史學史 北京 人民大學書版社 三月 四一  
二頁

章伯鋒等著 北洋軍閥(1840~1949) 武漢 武漢出版社 六月 四三四  
七頁

- 陳木杉 二二八真相探討 臺北 博遠出版公司 二月 三一四頁
- 陳能治 戰前十年中國的大學教育(1927~1937) 臺北 商務印書館 七月
- 陳從周、章明主編 上海近代建築史稿 上海 三聯書店 六月 二二六頁
- 許雪姬 龍井林家的歷史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六月 二六〇  
頁
- 國史館 中華民國史 教育志 臺北 國史館 六月 三五〇頁
- 國史館 中華民國史 公職志 臺北 國史館 五月 五八八頁
- 國史館 中華民國史 地理志 臺北 國史館 五月 三五五頁
- 張惠珠 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 第3編 臺北 國史館 十  
二月 五七六頁
- 黃士旂編著 臺灣研究要目(1945~1989) 捷幼出版社 十二月
- 湯明遂、黃啟臣 紀念梁方仲教授學術討論會文集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六月 四二一頁
- 路哲 中國無政府主義史稿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五月 三三五頁
- 廖承志 廖承志文集 香港 三聯書店 十月 八一四頁
- 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史料編輯部 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史料選編 北京 解  
放軍出版社 八九八頁
- 劉素芬 煙臺貿易研究 臺北 商務印書館 十月
- 劉敏編 中國不發達地區農村社會發展 中國經濟出版社 十一月 三六〇  
頁
- 劉福祥編著 智者的迷惘——晚清士大夫中西文化觀演變的縮影 長春 吉  
林文史出版社 六月 二二九頁
- 劉鑑唐、張力主編 中英關係繫年要錄 成都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 蔡國裕 中共黨史 第二冊 延安時期 臺北 國史館 六月 六五〇頁
- 謝正光 明遺民傳記資料索引 臺北 新文豐出版社 十二月 六〇〇頁
- 賴建誠 近代中國合作經濟運動 臺北 正中書局 十月 二七八頁
- 賴淑卿 警政史料 第二冊 整建時期 臺北 國史館 六月 六一四頁
- 戴考慶等主編 中國遠征軍入緬抗戰紀實 西南師大出版社 十二月
- 璩鑫圭編 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鴉片戰爭時期教育) 上海 上海  
教育出版社 六月 五二七頁
- 魏宏運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稿 北京 檔案出版社 六月 八二  
九頁

魏秀梅 趙聚鈺先生年譜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十二月 四五〇頁

蘇愛榮等編 孫中山研究總目 團結出版社三月 四六八頁

山中德雄編、解説 『集報』—南京日本人收容所新聞 三月 東京 不二出版 一五〇頁

山本秀夫編 橘樸と中國 勁草書房 五月 三四〇頁

小谷豪次郎 蔣經國傳 プレジデント社 五月 三五五頁

今村與志雄 魯迅の生涯と時代 第三文明社 七月 四〇〇頁

天兒 慧 中國近代化の調査記録 東京 研文出版 二月 三二二頁

白雲莊主人 張作霖 中央公論社 七月 二一四頁

石井明 中ソ關係史の研究 1945~1950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三二〇頁

吉田 裕編、解説 思想彙報〔上、下〕 十五年戰爭極秘資料集 東京 不二出版 一一八四頁

淺田喬二 日本帝國主義と舊植民地地主制——臺灣、朝鮮、「滿洲」における日本人大土地所有の史的分本 東京 龍溪書舎

春山明哲編、解説 臺灣島内情報、本島人の動向 十五年戰爭極秘資料集 東京 不二出版 二月 一九〇頁

茶園義男編、解説 滿州移民拓務局資料 十五年戰爭極秘資料集 東京 不二出版 二月

淺井 紀 明清時代民間宗教結社の研究 東京 研文出版

濱下武志 近代中國の國際的契機— 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廣田鋼藏 滿鐵の終焉とその後—ある中央試験所の報告 評論社 五月 二六四頁

Airlie, Chona. *Thistle and Bamboo: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James Stewart Lockhar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72 pp.

Benson, Linda K.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and London: M.E. Sharpe, 291 pp.

Bergère, Marie-Claire, Bianco, Lucien and Domes, Jürgen eds. *La Chine au XX<sup>e</sup> Siècle, Tome II, de 1949 à aujourd'hui*, Paris, Fayard,



- 448pp.
- Brandt, Loren. *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al & eastern China, 1870-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46 pp.
- Chew, Daniel. *Chinese Pioneers on the Sarawak Frontier, 1841-1941*.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302 pp.
- Eastern, Lloyd.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52 pp.
- Fabre, Guilhem. *Genese du pouvoir et de l'opposition en Chine: le printemps de Yan'an 1942*. Paris: L'Harmattan, 216 pp.
- Hayford, Charles W. *To the People: Y.C. Yen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20 pp.
- Herrmann-Pillath, Carsten. *China-Kultur und Wirtschaftsordnung: Eine System und Evolutions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421 pp.
- Hsüeh, Ch'i. *The Foreign Factor: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Modern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 Huang, Philip C. *The Peasant Family &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 Kyle Crossley, Pamela.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21 pp.
- Laitinen, Kauko.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Binglin as an Anti-Manchu Propagandist*. London: Curzon Press, 223 pp.
- Lee, Robert. *France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China 1885-1901: A Study in Economic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72 pp.
- Link, Perry, Madsen, Richard and Pickowicz, Paul. *Unofficial China: 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50 pp.

- Ma, L. Eve Armentrout. *Revolutionaries, Monarchists, and China-towns: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Potter, Sulamith Heins and Potter, Jack M. *China's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74 pp.
- Sinor, Denis. *Mongol Studies in the Soviet Union: A Bibliography of Soviet Publications 1981-198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 Zarrow, Peter. *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60 pp.

#### 一九九一年出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 口述歷史 第2期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二月 三〇二頁
- 文化部黨史資料徵集工作委員會對外文化聯絡局領導小組編著 當代中外文化交流史料 第一輯 文化藝術出版社 二月 六二四頁
- 田子瑜、劉德軍主編 中國近代軍閥史詞典 北京 檔案出版社 十二月 六二五頁
- 朱漢民 湖湘學派與岳麓書院 教育科學出版社 二月 二五六頁
- 李文治 明清時代封建土地關係的訟解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二月 五九四頁
- 黃茂卿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迪隱觀音山教會早期五十年史(1949~66) 臺北 共同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九頁
- 張瑞德 中國近代鐵路事業管理的研究——政治層面的分析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二月 二九九頁
- 趙靖主編 中國經濟思想通史 第一卷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二月 七四〇頁
- 十五年戰爭重要文獻シリーズ中華民國よりの掠奪文化財總目錄 一月 東京 不二出版 四二二頁
- 宮下忠雄 近代中國銀兩制度の研究 一月 東京 有明書房 七二〇頁
- Christine Vertense、許雪姬、吳密察 先民的足跡——古地圖話臺灣滄桑史 (比) Mappamundi、臺北 南天書局 一月 一六〇頁
- 李筱峯 臺灣革命僧林秋梧 臺北 自立晚報社 二月 二三三頁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一至十期總目

\* 篇名之後括弧內為作者，阿拉伯數字代表期數 \*

發刊詞	1	紀念抗戰五十年學術研討會（邵銘煌）	4
學術會議		「七七事變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經過	
抗戰建國史研討會（楊明哲）	1	（吳天威）	4
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抗戰文學研討會（莊華）	4
（呂芳上）	1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國	
記「臺灣開發史研究會」（許雪姬）	1	際研討會（呂士朋）	4
會議消息——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	1	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許雪姬）	4
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林滿紅）	2	中國大陸的兩項學術會議	4
記「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		會議消息	4
（呂芳上）	2	明清中國地方精英和支配模式研究會議	
青年軍史研討會（張力）	2	（陳水發）	5
亞洲學會第三十八屆年會		南懷仁逝世三百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第三十二屆「亞洲與北非研究國際會議」	2	（呂進財）	5
會議消息	2	澳洲「亞洲學會」第七屆全國大會簡介	
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明清與近代史組		（張玉法）	5
（沈松橋）	3	報導「臺灣史研究會第一屆史學研討會	
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許雪姬）	5
（張力）	3	記「第二屆臺灣開發史研討會」（許雪姬）	5
香港「中國近六十年來之憂患與建設」		中國大陸的學術會議	5
學術會議（王綱○）	3	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陸賢千）	6
香港大學「臺灣歷史國際學術會議」		廿世紀中國民主運動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陳三井）	3	（蔣永敬）	6
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許雪姬）	3	紀念蔡元培先生誕辰 120 周年學術討論會	
出席「西安事變五十週年紀念國際學術討		（陶英惠）	6
論會」之追憶（李雲漢）	3	亞洲研究學會西部分會第二十五屆年會	
「第七屆中韓學術會議」報導（葉得英）	3	（鄧汝言）	6
第一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		聖地牙哥「第五屆國際中國科技史會議」	
（朱德蘭）	3	側記（張瑞德）	6
亞洲學會第三十九屆年會	3	會議消息	6
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楊翠華）	4	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陳慈玉）	7
基督教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王成勉）	4	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張炎憲）	7

第一屆國際近代日本華僑臺灣史研究會 (張炎憲)	7	蔣廷黻先生對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倡導 (王聿均)	1
臺灣大學創校六十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 (黃富三)	7	略論新航路發現後的海上絲綢之路 (全漢昇)	2
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國際學術討論會 (譚法謙)	7	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問題 (墨子刻)	2
亞洲學會第四十一屆年會 會議消息	7	歷史人口研究的基本觀念(劉翠溶)	3
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研討會(王樹柅)	8	<i>Hsieh-tou Violence and Lineage</i> Feuding in Southern Fukien and Eastern Kwangtung (Harry J. Lamley)	3
十九世紀以來德中關係國際討論會 (吳素樂)	8	關於晚清自強運動的幾點意見(劉廣京)	4
香港「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紀念國際學術 會議」(李金強)	8	研究中國思想史的一些方法問題(史華慈)	4
中華民國與歐洲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會議消息	8	<i>New Perspectives on Japan-China</i> Relations, 1870-1945 (Douglas R. Reynolds)	5
「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 討會(林美莉·陸啓超·李君山)	9	中研院近史所學術討論會一覽， 1987.8~1988.3	5
「中共革命的新透視」研討會	9	商人與經世(劉廣京)	6
中國現代化研討會(呂芳上)	10	<i>The Prussian Expedition to the Far</i> East, 1860-1862 (Bernd Martin)	6
近代中國科技史研討會(楊翠華)	10	中研院近史所學術討論會一覽， 1988.4~1988.9	6
「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研討 會」紀要(吳振漢)	10	再談「我對李約瑟和《中國科學技術史》 的認識」(何丙郁)	7
中國海關史第二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實 (趙淑敏)	10	一九二七年的中德關係(郭恆柱)	7
「孫中山與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介紹 (蔣永敬)	10	中研院近史所學術討論會一覽， 1988.10~1989.3	7
香港「近百年中日關係國際研討會」 (張啓雄)	10	中研院近史所學術研討會一覽， 1989.4~1989.9	8
The XXXIInd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Ursula Richter)	10	中國民權思想的特質(溝口雄三)	9
亞洲學會第四十二屆年會	10	日本的中日戰爭史研究現況和教科書訴 訟判決問題(堀田光義)	9
第八屆澳大利亞亞洲研究雙年會(胡國台)	10	中研院近史所學術研討會一覽， 1989.10~1990.3	9
亞洲研究學會西部分會第二十六屆年會 追記(鄧汝言)	10	<i>Capital Punishment and Violent</i> <i>Crime in Late Imperial China:</i> <i>A Preliminary Statistical</i>	
亞洲研究學會西部分會第二十七屆年會 (鄧汝言)	10		
學術演講			

Analysis (James Lee)  
中研院近史所學術研討會一覽  
1990. 4~1990. 9 10

學人簡介

郭廷以 (呂實強·張瑞德) 1  
韋慕庭 (C. Martin Wilbur)  
(張玉法·張朋園) 1  
吳相湘 (陶英惠) 1  
全漢昇 (李木妙) 2  
沈雲龍 (陳三井) 2  
市古宙三 (林明德) 2  
梁嘉彬 (王樹槐) 3  
衛藤藩吉 (張啓雄) 3  
Otto Franke (Ursula Richter) 3  
John King Fairbank (郝延平) 4  
Joseph R. Levenson (沈松橋) 4  
李定一 (張力) 4  
伊原澤周 (張存武) 4  
Sow-Theng Leong (梁肇庭)  
(Tim Wright) 4  
蕭公權 (黃俊傑) 5  
鄭學稼 (周玉山) 5  
鄧嗣禹 (黃培) 6  
Frederic Wakeman, Jr. (葉文心) 6  
In Memoriam Karl August Wittfogel  
(1896-1988) (Ursula Richter) 6  
Knight Biggerstaff, 1906—  
(Jessie G. Lutz) 7  
傅衣凌 (楊國楨) 7  
石川忠雄 (林明德) 7  
坂野正高 (林明德) 7  
Philip Alden Kuhn (林滿紅) 8  
Hellmut Wilhelm, Sinologue  
(Michael Gasster) 8  
蔣永敬 (張力) 8  
戴玄之 (林能士) 9  
Hommage à Wolfgang Bauer  
(Ursula Richter) 9

黃嘉謨 (朱滋源) 10  
李雲漢 (鄧鏡煌) 10  
森田明 (石田浩) 10

研究概況

「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第二期研究計畫 1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West Europe (I)  
(Ursula Richter) 1  
近年來大陸對臺灣史的研究——介紹與  
評估 (許雪姬) 1  
「抗戰前大學教育研究」計畫 1  
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  
(黃克武) 2  
中國大陸「中國近代歷史發展基本線索  
問題」(遠耀東) 2  
近十年來大陸的近代科技史研究 (楊翠華) 2  
中國近代史研究在新加坡 (梁元生) 2  
英國的中國通：量的觀察(一) (朱滋源) 2  
簡介日本「辛亥革命研究會」(小島淑男) 2  
Research Note: Some Recent Soviet  
Publication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Ursula Richter) 2  
研究計畫 2  
國史館研究近況簡介 (遯景德) 3  
簡介「早稻田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學習會」  
(細野浩二) 3  
英國的中國通：量的觀察(二) (朱滋源) 3  
「中國近世幼兒史」研究 (熊秉真) 3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West Europe (II):  
France (Ursula Richter) 3  
「臺灣傳統民居之個案研究——龍井林  
宅的歷史與建築」計畫 (許雪姬) 3  
介紹「北美廿世紀中華史學會」  
(陸培湧) 4  
亨利·魯斯基金會「基督教在中國之歷  
史」研究計畫 4  
Christianity in China: One Scholar's

Perspective of the State of the Research in China Mission and China Christian History, 1946-1986 (Murry A. Rubinstein)	4	Kuei-feng's <i>Chiao-pin-lu k'ang-i</i> (Philip A. Kuhn)	9
臺灣傳統民居之個案研究——龍井林宅的歷史與建築 (許雪姬)	5	關於戰前十年舉借外債的基本估計 (鄭會欣)	9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Europe (III): Germany (Ursula Richter)	5	最近美國的民國史研究：國民黨治下的中國 (William C. Kirby 著 賴惠敏·張力譯)	9
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簡介 (張存武)	5	臺灣地區對抗日戰史之研究——兼論南京大屠殺的「數字」問題 (劉鳳翰)	10
中國近代史研究在香港 (李木杪)	5	簡介國內的「臺灣抗日史及其相關題目」研究狀況 (翁佳音)	10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簡介 (鄧錦煌)	5	簡介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 (許雪姬)	10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近況報導	5	「中美日荷公藏臺灣史檔案手稿資料之搜集整理與聯合目錄之編製及殖民地時期臺灣歷史國際合作研究計畫」介紹 (吳密察)	10
中國近代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Roger V. Des Forges)	6	最近美國的民國史研究(2)：中共領導下的革命運動 (Stephen Averill 著 張淑雅·張力譯)	10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的課題——訪濱下武志教授 (吳密察)	6	澳門在珠江口地位之探討 (魏美昌)	10
附錄：傳統經濟與現代化問題 (濱下武志)	6	史料介紹	
Li Hung-chang: An Assessment (Samuel Chu)	6	英國「國家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 收藏有關中國史料初步調查報告 (朱淑源)	1
阿根廷學人發起組織「寰球東亞研究會」從中國海關研究首次國際研討會看大陸的海關研究 (張存武)	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經濟檔案保存與整編概況(一) (近史所檔案館編目組)	2
香港學界消息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資料部)	7	介紹葛懋春等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 (李又寧)	2
中華民國史研究在臺灣 (張玉法)	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經濟檔案保存與整編概況(二) (近史所檔案館編目組)	3
近廿年來大學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婦女史研究概況 (臺灣地區) (游錫明)	8	新出章炳麟致張學良兩函年代考 (汪榮祖)	3
「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通訊」簡訊 (賴惠敏)	8	張維翰先生史料兩種 (蔡相輝)	3
近代中國笑話研究之基本構想與書目 (黃克武)	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報紙簡介 (藍旭男)	3
上層文化與民間文化——兼論中國史在這方面的研究 (李孝悌)	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經濟檔案保存與整編概況(三) (近史所檔案	
Papers on China (林滿紅)	9		
The Case Against Reform: Some "Conservative" Reactions to Feng			

館編目組)	4
國史館典藏政府檔案史料介述 (遲景德)	4
澎湖史蹟考察 (魏秀梅·許雪姬·楊翠華)	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經濟 檔案保存與整編概況(四) (檔案館 編目組)	5
介紹「現藏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目錄」編 輯計畫 (許雪姬)	5
韋慕庭教授贈書近史所	5
中法戰爭的法方檔案與法文著作 (陳三井)	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報紙簡介 (二) (藍旭男)	5
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組工作現況	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經濟 檔案保存與整編概況(五) (檔案館 編目室)	6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檔案簡介 (楊翠華)	6
上海市檔案館開放檔案全宗目錄	6
蔡元培自寫年譜(1868~1900) (陶英惠)	6
陳炯明哲嗣搜集乃父資料有成	6
韋慕庭教授贈近史所資料一批	6
國史館「資源委員會檔案」概述 (程玉鳳)	7
柏克萊加州大學圖書館所藏保皇會、中 國民主憲政黨、中國民主社會黨史料 (余慧子)	7
介紹美國國會圖書館特藏之臺灣資料 (吳文星)	7
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檔案 簡介	7
政大社資中心有關中國近現代史資料介 紹(一) (陳方中)	8
上海市檔案館開放檔案全宗目錄(第二批)	8
簡介北海道大學圖書館有關臺灣史的藏書 (許雪姬)	8
Olyphant's Island: China Trade Materials in Manhattan Library Collections (Murray A. Rubinstein)	8

章太炎先生研究論著索引初編(一)	8
(章念馳)	8
張之洞的中國官僚系統民主化構思—— 對張之洞的再認識 (蘇雲峰)	8
《山東文史資料》的內容分析 (張玉法)	9
《王世杰日記》 (陶英惠)	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檔案保存 與整編概況(六) (楊同慧)	9
《謝彬先生遺著》簡介 (賴惠敏)	9
政大社資中心有關中國近現代史資料介 紹(二) (陳方中)	9
章太炎先生研究論著索引初編(二)	9
(章念馳)	9
四川保路運動中極其重要的史料—— 《西顧報》 (戴執禮)	9
《盛宣懷實業函電稿》之編纂經歷 (王爾敏)	10
臺灣地區收藏《日本外交文書》簡介 (卓憲雪)	10
「清末民初改革志士流亡日本監視記錄 」簡介 (黃自進)	10
四川保路運動的血的紀錄——《四川保 路同志會報告》 (戴執禮)	1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檔案保存 與整編概況(七) (莊樹華)	10
章太炎先生研究論著索引初編(三) (章念馳)	10
梁氏三兄弟捐贈國防部抗戰史料 (趙聚明)	10
新書評介	
張著《民國初年的政黨》評析 (蔣永敬)	1
評介胡著《民國初期的復辟派》 (趙中孚)	1
柯著：《美國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 (張朋園)	1
陳三井著：《華工與歐戰》 (李國祜)	2
魏秀梅著：《陶澍在江南》 (王家儉)	2
卓遵宏著：《中國近代幣制改革史 (1887~1937)》 (王樹槐)	2
郝延平著：《十九世紀中國的商業革 命》 (劉石吉)	2

- 史卡拉賓諾、于子橋合著：《現代中國及其革命進程：對傳統秩序的不斷挑戰（1850~1920）》（張玉法） 3
- 韓特著：《斯文的福音》（李又寧） 3
- 李健民著：《五卅慘案後的反英運動》（李守孔） 3
- 郭廷以著：《近代中國的變局》（張玉法） 4
- 黃宇和著：《英雄形象的來源》（李又寧） 4
- 許雪姬著：《清代臺灣的綠營》（石萬壽） 4
- 王汎森著：《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彭明輝） 4
- 朱滋源著：《同盟會的革命理論》（何思睦） 5
- 李雲漢著：《盧溝橋事變》（蘇啓明） 5
- 周元正編：《抗日戰爭史參考資料目錄》（張瑞德） 5
-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宋光宇） 6
- Susan Naquin and Evelyn Rawski,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梁其姿） 6
- Susan Mann, *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1750-1950*（何漢威） 6
- 施添福著：《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章英華） 6
- 湯清著：《中華基督教百年史》（查時傑） 6
- Joseph W. Esh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劉錫雲） 6
- 王守中著：《德國侵略山東史》（張玉法） 6
- Diana Lary, *Warlord Soldier: Chinese Common Soldier, 1911-1937*（張瑞德） 6
- 耽雲志著《胡適研究論稿》簡介（李又寧） 7
- 評介郭著《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李雲漢） 7
- 張憲文著：《中國現代史史料學》（劉維開） 7
- 馮爾康等編著：《中國社會史研究概述》（陳秋坤） 7
- 李澤厚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薛化元） 7
- 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朱滋源） 7
- 王綱領著：《歐戰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胡國台） 7
- 劉維開著：《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蘇啓明） 7
- 胡平生著：《民國時期的寧夏省（1929~1949）》（張力） 7
- Steven L.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陳永發） 7
- 向山寬夫著：《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臺灣民族運動史》（許雪姬） 7
- 譚汝謙編：《港日關係之回顧與前瞻，1845年~1987年》（李培德） 7
- 比較三本有關譚嗣同思想研究的著作（陳儀深） 8
- 評介天兒慧著《中國革命與基層幹部》（林美莉） 8
- 評李志剛著《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朱滋源） 8
-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王正華） 8
- Jorg-Meinhard Rudolph: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Chinas and Taiwan (1921-1981)*（Ursula Richter） 8
- 資中筠：《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和發展》



(張淑雅)	9
Denis Fred Simon, <i>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ost-Mao China</i>	
(王萍)	9
俞辛焯：孫文的革命運動と日本 (黃自進)	9
評介《國民黨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劉維開)	10
評劉鳳翰著：《抗日戰史論集》(陳新珍)	10
《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述評(李德超)	10
<b>論文目錄</b>	
國內歷史研究所歷屆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53~1986)	1
國內政治經濟研究所歷屆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	2
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所歷屆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	2
國內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85~1987)	3
日本早稻田大學人文社會各研究所研究生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論文目錄	3
國內新聞、外交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碩士論文目錄(1956~1987)	4
香港大學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61~1985)	4
國內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87~1988)	5
國內教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碩士論文目錄(1956~1987)	5
日本慶應大學人文社會各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論文目錄(黃英哲輯)	6

國內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88~1989)	7
國內東亞、大陸問題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70~1978)(賴瑞貞輯)	7
國內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88~1990)	9
<b>大事紀要</b>	
一九八五年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1
一九八五年底至一九八六年八月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楊明哲輯)	2
一九八六年七月至一九八七年三月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楊明哲輯)	3
一九八六年五月至一九八七年九月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萬麗鴻輯)	4
一九八六年九月至一九八八年三月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萬麗鴻輯)	5
一九八六年九月至一九八八年九月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6
一九八七年一月至一九八九年三月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李宇平輯)	7
一九八七年九月至一九八九年九月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李宇平輯)	8
一九八八年七月至一九九〇年三月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李宇平輯)	9
一九八九年九月至一九九〇年九月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李宇平輯)	10

**出版消息**

國內外新書之出版資訊，見於各期。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歷史叢書三種

### ②3 杭立武先生訪問紀錄 ——學術、外交與人權——

王萍訪問 官曼莉紀錄 精 250元 平 200元

杭立武先生，安徽滁縣人，生於民前八年。民國十三年畢業於金陵大學，十八年獲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學位。歸國後受聘為中央大學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二十年轉任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達十數年。其間並創立中國政治學會及中英文化協會。抗戰期間任國民參政會參議員、美國聯合援華會會長。三十三年任教育部常務次長，兩年後調政務次長。三十八年出長教育部。任內並曾負責搬運故宮文物來臺工作。四十五年至六十一年間，歷任駐泰國、寮國、菲律賓及希臘大使。六十四年任亞洲反共聯盟秘書長。六十八年創立中國人權會。先生為人熱誠，處事練達。六十餘年來，在教育、文化、外交方面貢獻卓著。至今仍精力充沛，致力於反共及人權工作，未嘗稍懈。

### ②4 魏火曜先生訪問紀錄 ——臺灣與近代醫療——

熊秉貞、江東亮訪問 鄭麗榕紀錄 精 250元 平 200元

隨着歷史之進入近代，中國人的健康環境和醫療條件也起了很大的變化。中央研究院院士魏火曜先生（1908～——）早年習醫東瀛，專攻兒科，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執業臺灣、大陸、日本等地；戰後主導臺大醫院及醫學院之轉型，畢生閱歷為近代醫療在臺灣發展之最佳佐證，本書為史學和醫學雙方學者合作訪問魏先生之紀錄，敘事詳盡，並附珍貴舊照多幀。

### ②5 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 ——民主的播種者——

沈雲龍、林泉、林忠勝訪問 林忠勝紀錄 精 400元 平 350元

齊世英先生（1899～1987），字鐵生，遼寧鐵嶺人。民國五年畢業於天津新學書院，負笈日本京都帝大哲學科，及德國海德堡大學哲經系。民國十四年學成歸國，佐郭松齡籌辦同澤中學。是年冬參預「回師奉天」之役，事敗，蟄居新民屯日領館，倖脫險走扶桑。次年返國，加入國民黨，復赴日入步兵學校習軍事，間曾為中日外交奔走。十八年春返國，應陳立夫之邀任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嗣遷委員，主持東北黨務，並兼第六屆中執委，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創辦中山中學，及「時與潮」雜誌社，行憲後膺選立法委員。大陸變色前輾轉來臺，由於堅持民主理念，參與民主運動，見忤於當道。本書記述先生來臺前經歷甚詳，允為珍貴史料。

函購八折，郵撥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李守孔教授是臺灣研究中國近、現代史開風氣者，用力甚勤，成果豐碩



圖左：溝口雄三教授是日本研究中國思想史最具代表性的學者

圖右：研究中國基層社會結構、市集和城市體系卓然有成的施堅雅教授

## 本期要目

- 「胡適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  
「紀念中國近代史開端 15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  
東亞研究所簽署合作協定  
Two Different Kinds of "Food Riots": Kiangsu,  
1910 and 1932  
Models of Historical Change: The Chinese State  
and Society, 1839 - 1989  
The Evolution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學人簡介——李守孔、溝口雄三、施堅雅、Hellmut Wilhelm  
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  
「林本源」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細菌部隊罪證陳列館簡介  
十年來中國大陸華僑史研究的回顧與前景(1979 - 1989)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及其典藏的民國史料  
嚴復英文作品〈中國古代政治結社小史〉  
國史館「財政部檔案」概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收藏地圖簡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檔案保存與整編概況(八)  
新書七本評介

191 5 1083

\$100